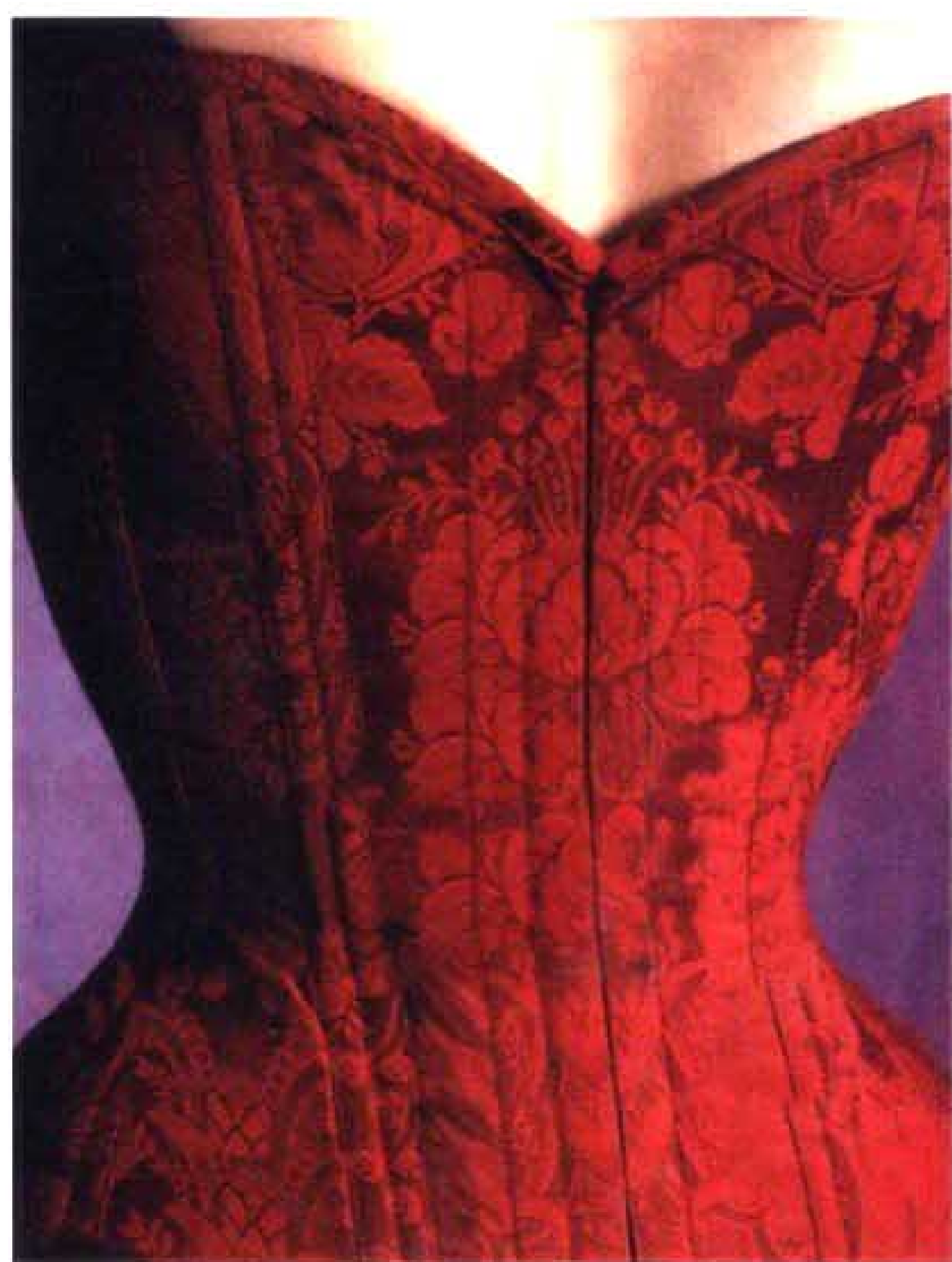


Alternative 另类丛书 ①

石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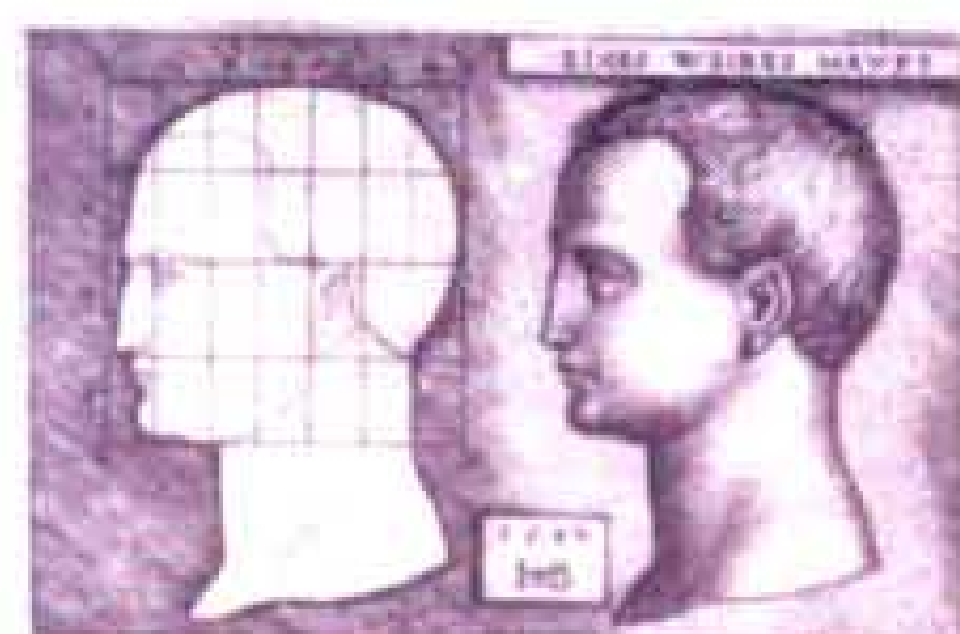
漂亮者生存



[美] 南茜·埃特考夫 著
盛海燕 / 刘雪芹 / 张进 译

Survival of the Prettiest

by Nancy Etcoff



Survival of the Prettiest

by Nancy Etcof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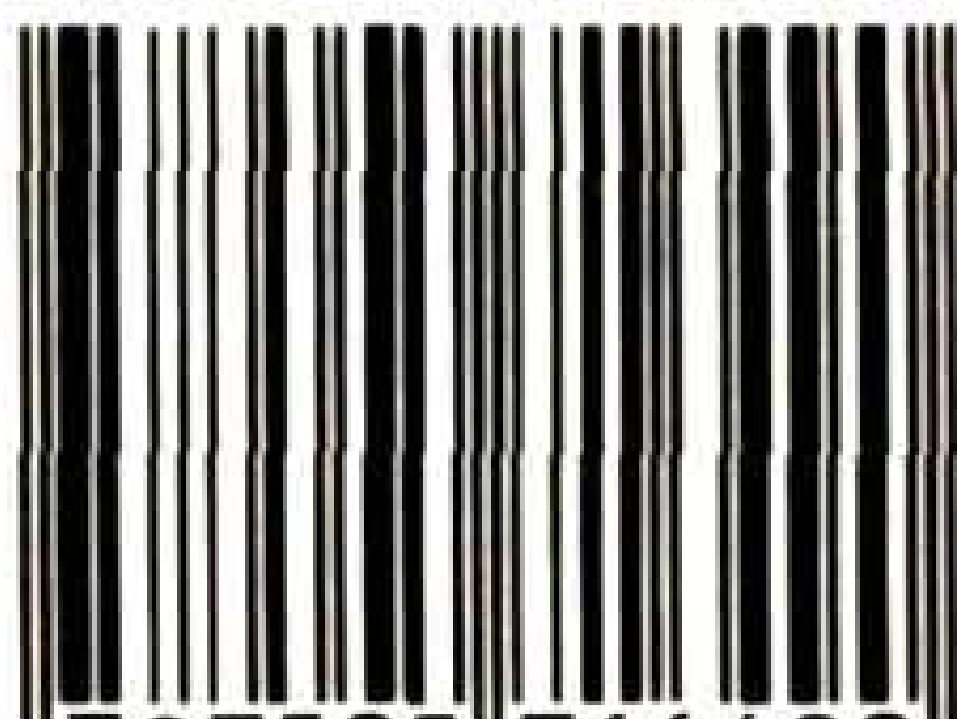
美丽的容颜让我们心动，健美的身材为我们所钦羡，曼妙的舞姿，甜美的嗓音，迷人的气息……在我们的感官世界中，无时无刻不受到美的诱惑。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美的脚步。

然而，究竟什么是美？如何才能透视美的真谛？并不是所有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本书作者从美的本性、特征及其在时尚文化中的地位等多种层次深入剖析容貌之美，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肉体美的追求是人类基因进化的动力，也是人性欲望与幻想的混合体，它无所谓好，当然也不等于坏，相貌并不代表一切，它无法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智慧、善良、同情心等等内在品质。而这些，同样是我们之所以称为美的原因。

《纽约时报书评》、《华尔街日报》一致推荐

本书是第一本深入探讨人体美的科普著作。作者从美丽面孔的构造谈到人类的生存空间，指出崇尚美丽是人性不可磨灭的基本部分。每一种文明都崇拜美，也都付出庞大的代价追求美，并承受追求过程中所衍生的悲与喜。

ISBN 7-5057-1649-2



9 787505 716490 >

ISBN 7-5057-1649-2/G · 121

定价：20.00 元

漂亮者生存

关于美貌的科学

[美] 南茜·埃特考夫 著

盛海燕 刘雪芹 张进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亮者生存：关于美貌的科学 / (美) 埃特考夫著；盛海燕、刘雪芹、张进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6

书名原文：Survival of the Prettiest

ISBN 7-5057-1649-2

I. 漂… II. ①埃… ②盛… ③刘… ④张…
III. 美学-普及读物 IV. B8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2196 号

书名	漂亮者生存
著者	美国 南茜·埃特考夫
译者	盛海燕、刘雪芹、张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199 千字
版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649-2/G·121
定价	20.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0-1590

为何alternative

关于“alternative”一词，我取“其他”和“另类”之意。由此，丛书的意图已经彰显。

多年来，我们对译介主流思潮和经典学术所倾注的热情，使我们对其他有趣的思想 and 知识闭上眼睛。

读书人渴望从书中获得享受，一板一眼的论述和陈旧庞大的主题令人望而生畏。

此套丛书，力求从这两个方面给读者以乐趣和满足。

——石 涛

漂亮者生存

关于美貌的科学

[美] 南茜·埃特考夫 著

SURVIVAL OF THE PRETTIEST

by Nancy Etcoff

目 录

1	导论：美的性质	
	美是什么？我们缘何而知道它？	/ 9
	美的理想在于人心而非在于人体	/ 14
	美的准则	/ 20
	美的邪恶性与神圣性	/ 24
	美的演变历史	/ 27
2	美即诱惑	
	婴儿的可爱	/ 43
	爸爸最清楚	/ 48
	外表与现实	/ 50

看上去很美 / 52

命定的不公 / 57

美即身份 / 60

予之愈多，欲之愈多 / 62

包装热 / 64

3 美的愉悦性

男女有别 / 75

青春之爱 / 79

攀龙成凤 / 82

嫉妒与美 / 84

美的生物学特征 / 88

生殖女神 / 90

重要的是实力 / 94

归 类 危 机 / 102

金钱 / 106

幸福 / 108

4 论装饰

裸 体 之 躯 / 116

身体的清洁 / 119

化妆品 / 121

刮 去 体 毛 / 122

装饰 / 125

美 容 之 术 / 127

秘密与谎言 / 129

梦露与“猫王” / 131

羞红的新娘	/ 135
让皮肤紧些	/ 137
洁白无瑕	/ 142
无表情的魅力	/ 143
肤色与美	/ 146
头发	/ 152
头发的梳理	/ 154
让你的头发飘起来	/ 156
头发的脱落	/ 158
金发热	/ 161
好头发 坏头发	/ 164

5 特征表现

共性美	/ 173
平均之美	/ 181
相似的家庭成员	/ 185
女人味儿十足的女性	/ 188
神秘的男性	/ 196
转瞬即逝的诱惑	/ 202
对称	/ 203
其他	/ 205

6 与尺寸有关

能源之塔	/ 217
没有胸肌就没有性	/ 222
男性生殖器，威胁还是魅力	/ 226
匀称	/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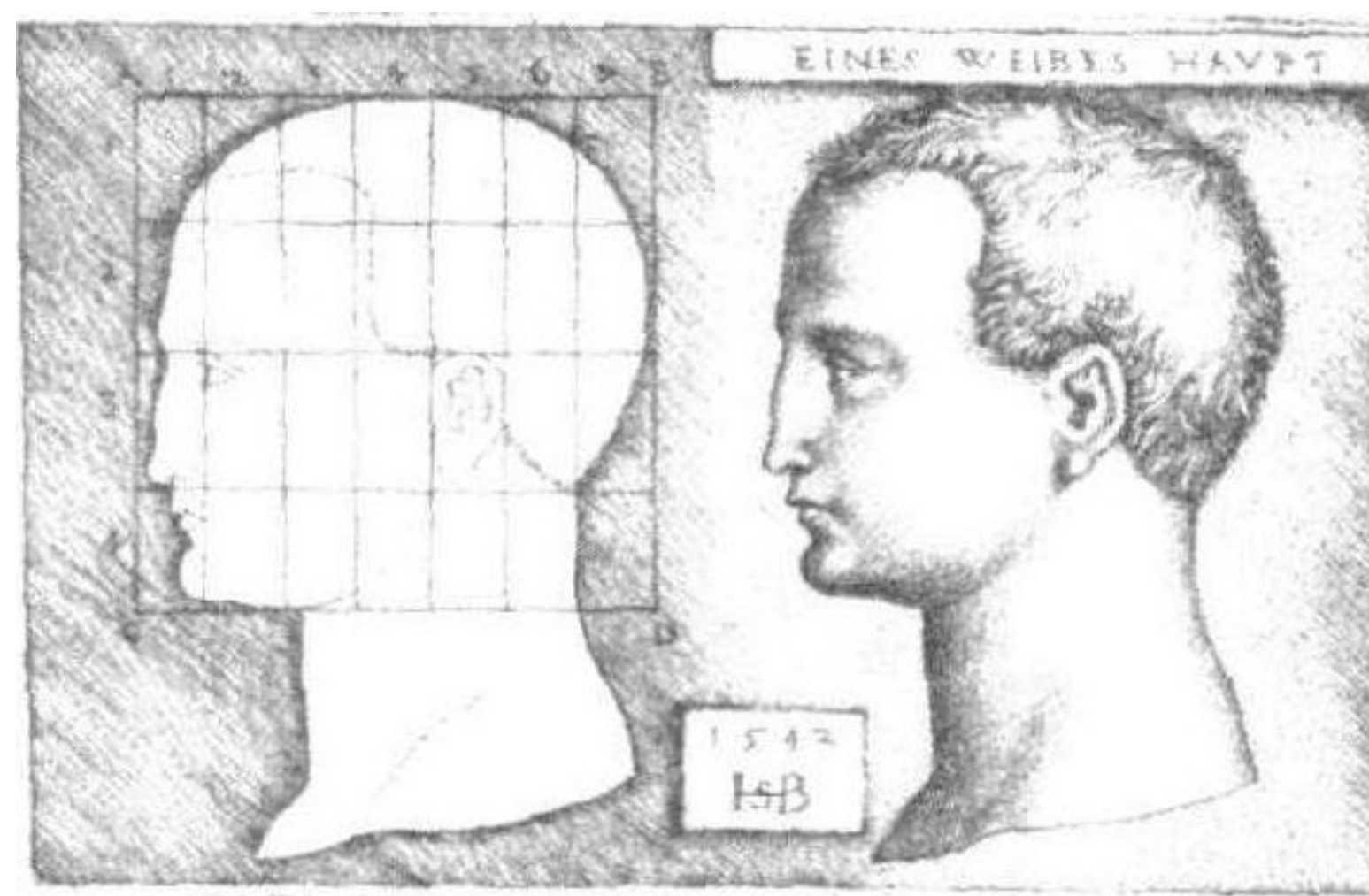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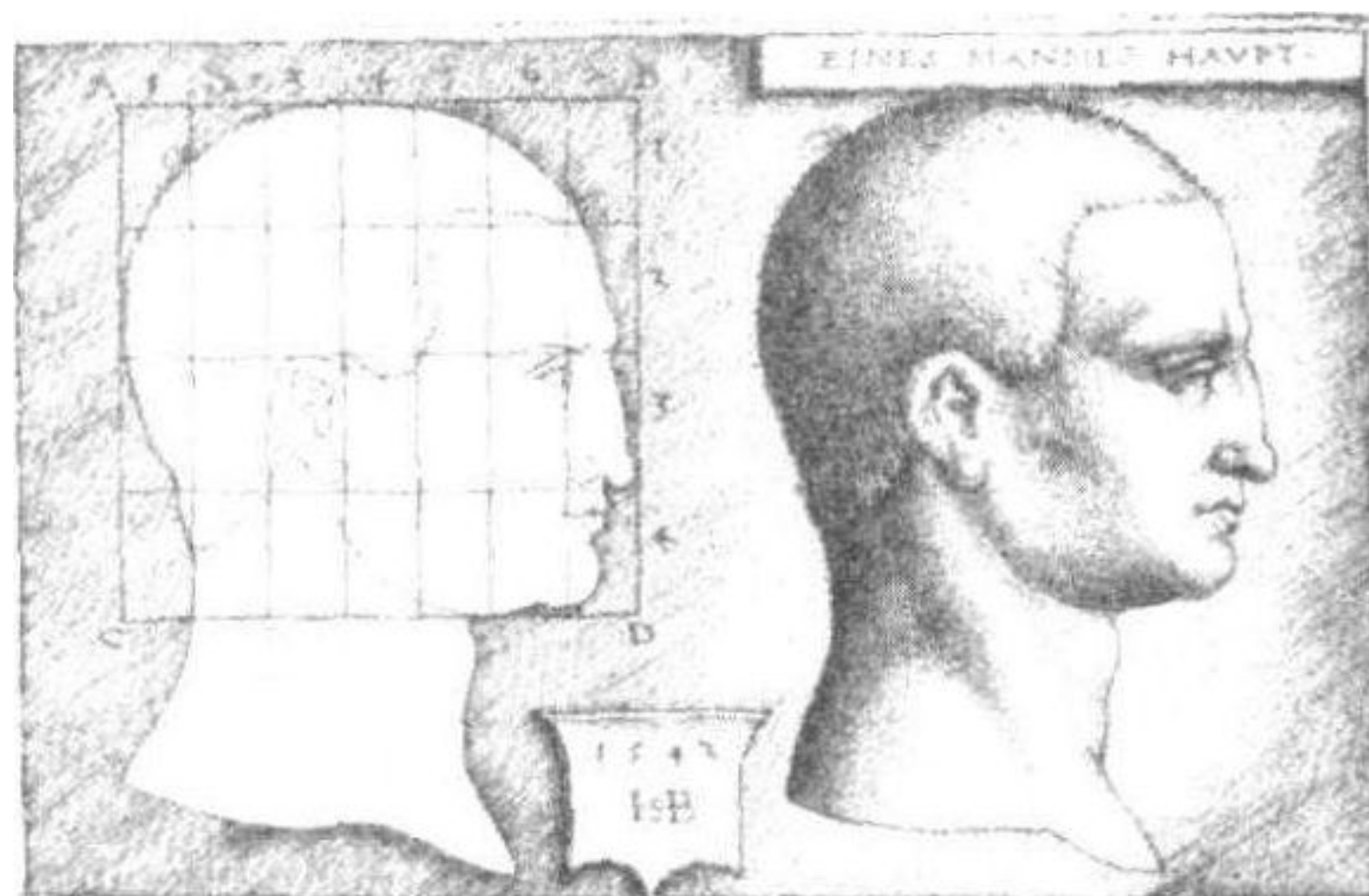
对胸部的欲望	/ 235
腰际	/ 239
挑剔的体重	/ 245

7 时 尚

性	/ 261
社会地位	/ 264
时尚的诞生	/ 266
消费、浪费和消遣	/ 268
出格	/ 272
控制大众	/ 274
对服装设计师的崇拜	/ 276
时装名牌	/ 279
超级模特和名牌身体	/ 280
万变不离其宗	/ 284
智慧服装	/ 286

8 总 结

除了容貌以外的信号	/ 292
声音	/ 293
气味	/ 296
不等待美	/ 301



1 .

导论：美的性质

人的心愿不外有三：健康的身体，通过诚实
劳动获得的富裕和看上去优雅美丽。

——柏拉图

正是在我们的自然天性中，存在着一种激切的
弥漫一切的情绪，这就是关注美、珍视美。如
果忽视了我们心智的这种显著的力量，则对我们
精神世界的任何描述都是不完全的。

——乔治·桑塔亚那

是的，我知道，你对我这里所说的还一无所知。
很久以前，美就已消失，它滑落到喧嚣的噪音
之下——语词的噪音，就像传说中沉入大西洋
底的亚特兰提斯岛。惟一还留存下来就是语词，
年复一年，它们的意义越来越失去了明晰与简
洁。

——米兰·昆德拉

美为哲学家所沉思，却由色情画家来加以展现。如果要问人为什么都渴望形体的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回答是：“只要他不是瞎子，人就不会问这个问题。”美俘虏人的心灵，魅惑人的思想，激起人感情上的熊熊烈焰。从柏拉图（Plato）的哲学著作到现代画家笔下的各种美女招贴画，那一副副尽现人体美的描绘已将人类对美的渴望与想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丑为美的时代，美之存在的道德意义已受到人们的怀疑，而丑陋却展现出一种少有的魅力。美既表现为肉欲，又表现为想象——两者在美中平分着秋色。我们既可以将它投入于美妙的梦想，又可以对它进行充满色情的想象。换一个说法就是，人可以因逃避现实而尊崇美——这种行为表现了我们天性中恒在的青春气质：拒绝接受一个有缺陷的世界；又可以用一句常说不败的话将之一挥而去，说“美是人心造的幻影”，以此来向人们表明，美仅仅是一种让我们自身感到愉悦的东西而已（其潜台词就是美这种东西没人能说得清）。倘若如此来定义美，美便成了无意义之物，就像格特鲁德·斯坦恩（Gertrude Stein）说起她的家乡——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市时所说的：“世上本来就没有那么一个所在。”

1991年，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说：美，作为一种客观而普遍存在的实体，实际上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一说法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美的哲学沉思一扫而光。“美是一种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由

政治起着决定的作用。而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一个最后形成的、也被认为是最好的信仰体系就是保持男人的统治地位永不动摇。”按照沃尔夫的说法，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美的景象都是来自神话传说。美就像关于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的神话故事，什么帕里斯（Paris）的裁判、不和的金苹果等等，都不过是一种修饰。美是廉价小说，由一个产值上千万的行业操纵着，一个又一个幻影从它们的笔下推出，然后像鸦片似地推销给那些多情善感的女子。美将女人引到一个男人需要她们的地方——这是出于权力结构的需要。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为了文化消费的意义给美下定义，他们让美的形象四处泛滥，以期激起人们满腔的嫉妒与欲望，而这样的煽动只是为了两个目的：赚取财富和维持现状。

许多有识之士要我们相信，美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它既不说明什么、解决什么，也不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在关于知识的谈话中没有它的地位。对此，我们似乎应该发出松快的一呼，大大地吐出一口气来：怎么，美这个东西如今已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可是这样一种对美的描绘是错误的，在远离观念世界的地方，美仍在行使它的统治。无人不在凝视它的娇颜，也无人不在欣赏它的媚艳。要使凝视美的眼睛没有感觉，就如同要压下体内的欲火，或者以一颗冷漠的心去面对孩子的哭叫。我们可以说美已经死亡，但这只不过更加加深了真实世界与我们所理解的美的世界之间的距离。

在美跌落到更深奥的地方之前，请让我们将它拉到近

前，好好地对它审视一番。如果说麦迪逊大街的男人具有像斯万加利（Svengali）一样的力量，能支配女人的行动和喜好、并按照自己的意思给美下定义的话，那就等于说，女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还没有头脑。可是现实情况表现得恰恰相反，女人们不是正在那里培育美、借助美容业将美所带来的力量发挥到所能利用的极致吗？当今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不正是女人们常常没有机会去开发别的财源、而只能开发利用美所带来的好处吗？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麦迪逊大街只是聪明地利用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好恶之情，而不是创造了它们，他们所做的开发与利用不比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之流所做的更多。沃尔特创造了我们对大眼睛、小躯体的动物的喜爱，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创造了我们对甜食和多脂肪食物的渴望，广告商和企业家中帮助我们确定了该穿些什么衣服以及如何找到对美的感觉。但我想说的是，这些只属于时尚的范畴，而非美的范畴。时尚，正如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所描写的，是“看起来悦人的、有诱惑力而且使人胃口大开的圣饼上的糖衣”，但不是圣饼本身。

媒体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欲望渠道，但是却将我们的爱好范围大大地缩减了。公众喜爱的形象成了楷模，美的后面跟着一大群模仿者，模仿者的身后又跟着新的模仿者。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公众楷模，她被许多人所模仿，从吉恩·曼斯菲尔德（Jayne Mansfield）到麦当娜（Madonna）。种族主义和等级歧视也在美的形象中反映出来，尽管美本身对人种之类的区分不感兴趣，而

呈现为丰富多彩的形象。正如达尔文（Darwin）说的：“如果人都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话，那也就不存在美这种东西了。”

对美的反动也部分地来自这样一种担心：即人们对美的追求已经达到了史诗般的规模。只要我们仔细翻查一下古往今来的文献资料就不难发现，人类对于美的追求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他们在皮肤上刻记、纹身，对身体穿刺、拔毛，垫高脚跟，给腰背加撑，用涂料擦拭身体等等，不一而足。19世纪，达尔文乘比格尔（Beagle）号旅行时，发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对身体装饰的热情”，为了一种“极为美丽的东西”，人们常常不惜牺牲自己和忍受痛苦。

在原始文化中，或者说在人类的远古时代，这种对肉体的暴行十分盛行，然而今天我们同样发现，对美的过于热衷又将人类天性中这种特有的“原始性”引发出来。仅1996年一年，据说就有69.6万多的美国人对自己的肉体施行了暴力，为了所谓的整容，他们自觉自愿地让自己的身体被切割或灼烧，把自己腹内的脂肪抽掉，让不属于自己身体的异物植入体内。在1992年FDA限制将硅胶植入人体之前，每天有400名妇女在做这种手术。隆胸术曾经是性感明星的独擅，而今它已成为好莱坞女演员们的常规做法。就是对于家庭主妇，做一个高高隆起的乳房现在也不是什么希罕事。

这样一些听起来骇人的做法，其目的不是用来改善身体的缺陷，而是为了增加身体某一部分的美。尤切契特大

学教授凯茜·戴维丝（Kathy Davis）在荷兰时看到不下50人正在努力劝说医生为他们施行手术，以便改变他们的外形。而这50个人中，除了一名男子因为鼻子有点问题、需要整形解决外，其他所有人，从外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她这样写道：“我发现自己大大地为这样的情景所惊讶，即大家都心甘情愿地经受这种非常的手段，去改变那些在我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的缺陷。”然而，当事情涉及到人的脸面或身体的时候，就不存在什么算得算不得了。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脸部的起伏情况和身体的凹凸变化，就像绘图师清楚自己笔下的地形会如何走向一样。在外人的眼里，我们从最好状态到最坏状态只是变化了那么一点点，而对于我们心灵的眼睛来说，我们形象上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一个没有整理好的发型，一个小小的褐斑，一点点增加的体重，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自信，而这些微不足道的变化，如果发生在我们的情绪、体力或心境上，则一般是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

人们以美的名义做了许多极端的事情，他们将大量的钱财精力投资在美容上，而且不惜为它顶风冒险。在他们看来，生活就以它为倚赖了。在巴西，使用雅芳（Avon）化妆品的女士比军队里的男人还要多。在美国，更多的财富花在美容上，而不是教育和社会服务上，在每一分钟的时间里，就有1484管唇膏、2055瓶护肤用品在各个商场里售出。即使是荒年，非洲丛林的卡拉哈里人还要用动物的油脂滋润他们的皮肤。1715年，法国发生了一场暴乱，原因是贵族们将面粉用做扑发粉，造成了粮食短缺，为了

美容目的而大量贮存面粉的做法只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才销踪匿迹。

要么是这个世界陷入了疯狂，要么是在这种疯狂中还有个什么说道。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抵御得了外表的冲击。每一期《时尚》（Vogue）、《GQ》和《掌故》（Details），每一幅凯特·莫丝（Kate Moss）、纳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辛迪·克劳馥（Cindy Crawford）的动人肖像，都会令我们产生熊熊欲火。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总是一尊尊完美无缺的青春胴躯，这些胴体令我们产生难以遏制的欲望，无一能够幸免。当有人问起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她今生还有什么遗憾时，她的回答居然是：惟愿自己长得更漂亮些。这是一句经过审慎思考而说出的话，是从一个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女士嘴里说出来的，她这一生所过的生活应该说基本上是很满意的。而这样的哀叹不仅仅属于女人。在《童年·少年·青年》三部曲里，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写道：“我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绝望，感到这个世界是不会给这样一个丑陋的人以幸福的：鼻子这么宽，嘴唇这么厚，眼睛小小的，还是灰颜色。还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外貌更能影响他的前程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外表更能决定一个人是可爱还是可厌的了。”

外表是一个人最公开、最外在的部分，它是我们的仪式，是这个世界认为可以由此而得知其内在心灵的人的可见的自我。这个认为可能并不正确，它没有说明我们身内那个最好的道德领域将会如何表现自己，但是这丝毫未减

少它所具有的真实性。美的绩效，我们无法一笔抹杀，它将继续作用于我们的世界——人类魅力统治的世界，这是法律的效力所无法达到的。学院派可能将它禁止在智慧的谈话之外，恃才傲物者也对它嗤之以鼻，说什么美肤浅而微不足道，但是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现实而又现实的世界中，美的神话很快就要与真实的情形不期而遇了。

本书所做的仅只是一个探讨：我们认为的美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认为？人的天性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因素，使我们对美这么敏感？人的身体内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质素，竟引得人对美做出如此的反应？为什么对美的善愁多感在人类中如此地普遍？我提出的观点是：我们人类对美不惜追逐的热情只不过顺应了人的一种基本天性。正如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所说：“如果说，我们的感官与我们的快感毫无联系，那么，我们最好马上就闭上眼睛，对一切不闻不顾。我们被赋予一种对美的感觉完全是上天所赐。”我的观点将主要以现代认知科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为理论依据，虽然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一切有关美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借此来向各位表明，它能够说明很多问题，能够为美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提供一个新的参照视野。

美是什么？我们缘何而知道它？

我们总喜欢对他人品头论足，我们的美感永不会打烊，像商店似地还分什么白天黑夜。我们自动地就注意到

面庞的美丽与否，就像判断这张脸儿是不是曾经相识。美的感觉像雷达一样扫射四周，看见并判断一张脸是否美丽只需要几分之一秒的时间（这是从一次心理学实验中得来的数字），在这样短的一瞬间所做的判断甚至与长久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不同。过后，我们也许已经忘却了那些重要的面部细节，可是对于一个人最初的感觉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美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本然的愉悦。请想想如果你失去了对美的感觉，如果真这样，你一定会认为自己病了——或者体力不支，或者精神萎靡，或者感情上受到了伤害。对美的事物缺乏反应，这是更内在的精神沮丧的标志——这种病况是如此地普遍，以至常规检查中也要把对他人的身体的美是否有感觉这项检查包括进去。

然而，何谓美？正如你所知，没有一个固有的定义能够涵盖它。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我准备从那些把美作为一种商品来销售的人的说法开始，他们关于美的标准有着非常确切具体的意见，而不是飘浮在空中的那种。阿隆·斯伯林（Aaron Spelling）是“湾景”（Baywatch）和“欢地”（Melrose Place）的创始人，他曾经这样说：“我无法给它一个定义，但它走进我的房间时我会认出它。”我曾经和一位模特儿经纪人谈起最佳男性模特儿应该是个什么样，他对他们的描述是：“那是一种当他走进来时你不能呼吸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是常常会发生的。你与其说是在看他，不如说是在感受他。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人在街上走过时，你是没法不停下脚步来对他注目的。”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从事美的事业的专家在说到美的时候是描述见到美时的整个心灵体验，而不是给美下定义说它该如何如何。总之，我所从中得到的美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高高的个儿、白白的皮肤、充满青春活力的身躯。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牛津英语词典》把“美丽的”这个词定义为“形状优雅、肤色迷人，以及具有其他的种种特质，尽足以愉悦人的眼睛，唤起人爱恋的情绪：1，人的脸庞和体形所有的；2，其他事物所有的”。它的第二个定义是：“在现在的日常用语中，这一词汇常用来描述那些令人感到极其悦目的任何事物。”而在我的计算机网络上所提供的关于这个词的定义是，美“可带来感官的愉悦或使精神和心情感到开豁、兴奋”。

词典要么把美定义为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如颜色、形状和其他种种特质），要么仅仅是事物本身所引起的观看者的一种快乐感受（哲学家桑塔亚那把美称为“客观化的快乐感受”）。如果我们循着时间的流程，追踪一下美的观念的发展历史，便可以清晰地见到一条在二者之间不断摆荡的轨迹。对于古希腊人，美像第六感官；而对于20世纪的人，在马歇尔·杜尚普（Marcel Duchamp）把一个便池当做一种高级艺术形象、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把一个汤罐也做了如此处理之后，美的性质就不再居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转移到了那些观赏到事物的美的眼睛里。

然而，产生争议的是美的客观性，而不是美的经验。

美能够激起人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愉悦的感觉只有一种（痛苦的欲望和嫉妒与愉悦之情是不相和谐的）。我们对美的反应牵动整个身心，对美的感觉的描述居然与身体的灾变和毁灭同义，什么非凡的（brehtaking，原意为拿走人的呼吸）、尤物（femme fatale，原意为致人命的美妇）、了不得的（knockout，原意为击昏过去）、妙不可言的（drop-dead gorgeous，原意为倒下死去）、令人吃惊的（bombshell，原意为狂轰滥炸）、极富魅力的女子（stunner，原意为使人昏迷）、惊人的（ravishing，原意为抢劫）。我们对美的体验不是出自于理性的沉思，而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

1688年，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表达了自己超越性别界限的渴望：“从13岁到22岁，最好做一个女孩，一个漂亮的女孩，而从22岁以后，则做一个男孩。”一个青春女性所具有的美的力量是巨大的。1957年，23岁的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主演了《上帝创造女人》这部电影，从而一举成名。那一年，据法国的《电影世界》杂志统计，发表在法国报纸上的有关她的文字达到100万行，周报上200万行，并且还伴有她的玉照2.9345万幅。《电影世界》甚至还报道，她是47%的法国人谈话的主题。1994年，模特儿克劳迪亚·希弗（Claudia Schiffer）穿着黑色的天鹅绒服装在罗马的西班牙式舞台上仅仅走了4分钟，据英国记者为《每日电讯报》撰文中所称，当时驻足观看的人数达到450万，整个城市一时之间都为之“静止不动”了。

这种迷狂可能不过是由媒介控制、煽动起来的，不比

从电视机中发出来的事先录制好的笑声更加真实。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不乏有一些奇异的遭遇，其中最有名的是那种描述与孤独、自然、陌生的美不期而遇的文字，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所写到的。这是写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在海边看见一个年轻姑娘时的情景，他看见她时，她正用“一双修长、纤秀、光裸的腿”站在海边，“那张绝对标致的脸宣示着人类之美所能达到的极限”。她的美转化而为他感官与精神上的双重渴望。“她的形象永远地进入到他的灵魂中，这是一个无言的时刻，所有的只是那充满狂喜的神圣的寂静……一个意外遭遇的天使来到他的跟前，一个以年轻和美为标志的天使，她是来自公正的生命法庭的使者。在这充满狂喜的一瞬间，通往谬误和光荣的所有大门都在他的面前打开，它们一直朝着无限的远方延伸着、延伸着！”

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有一个突然灵悟的时刻，这一时刻使他天成了《在地铁站》这首诗歌。这首诗只有两句：“黑暗人群中幽幽闪现的面孔：潮湿、黝黑的枝上的花朵。”后来庞德描述了他为何会写出这两行诗句的情景。“三年前在巴黎，我从拉孔柯德走出地铁站，突然间看见了一张非常美丽的面孔，然后又是一张，又是一张，再后是一个孩子的漂亮的脸，然后又是一张妇女的美丽的脸。我想了一整天，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句子来表达我所有的感受，可是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用来表达我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优美感受的词句都逃匿了我……像面前这首短诗

就是试图记下那一瞬间情绪的语句，在那一刻里，一样外在的、客观的事物突然转化成了内在的、主观的东西。”

有时，一个特别的眼神或一种特具的嘴形会使我们感到格外地动情，而其他的人却不会，为什么会这样，很难用语言说得清。即使是诗人，也常常是言不及意。面对着美这种东西，我们看到的是人类数世纪来希望抓住它内在本质的挣扎。

美的理想在于人心而非在于人体

人对他人做着美或不美的判断，就好像他们心中存在着一个美的标准或美的理想形象，只要看见这个形象，他们就能认出，尽管他们对此并不能预期。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在她父母的屋子里度过了一生大部分光阴，曾就我们那天然具有的能瞥见美的想象力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我从未见过沼泽 / 我从未见过海洋 / 但我知道石楠花丛如何开放 / 浪花会是怎样的形状。”凯妮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她的论著《裸体形象》中写道：每当我们批评一个人的形象，说这个人脖子短了呀，那个人鼻子太长呀，或者是某某人的脚太大了呀等等，都表现出我们心中有着一个理想的人的形象。阿尔布勒奇·丢勒（Albrecht Dürer）则说：“人生在世，无一美者不可更美矣。”

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是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人类学家，他曾向我叙述了一种卡特西安（Cartesian）式的经验。他曾参加过一次讲座，这个讲座是

由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主持的。这个外科医生在讲话的同时放了许多美人的幻灯片。给西蒙斯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人虽然都长得很美，但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他不是看见一个人上嘴唇太长，就是发现另一个人鼻子太钩了。并且，他觉得由于他们的美，这些“缺陷”便显得格外地突出。但是他又想，说人家上嘴唇太长或鼻子太钩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对于西蒙斯来讲，这次观看漂亮非常的面孔以及发现它们多多少少总有缺陷的经历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的内心有着一个美的模式，这个模式虽然非我们所能直达，但却是衡量所有我们看到的事物美不美的标准。这些面孔几乎都合乎这个标准，但又都不能完全符合。就像丢勒所说的，他可以想象它们能再美些。

在审美形象的创造上，人类真可谓手法翻新、花样百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此世之中绝无仅有的理想形象。当竺西斯（Zeuxis）试图描绘特洛伊城中的海伦（Helen）时，他找了5个当时长得最漂亮的妇女，各取所长，仔细地、认真地描绘海伦形象的每一个细节，希望真能逮住并画下她那举世无双的美。然而真正的海伦像是描绘不出来的，别的故事和传说中的美女形象如但丁（Dante）笔下的贝亚特丽齐（Beatrice）等也是如此。她们的脸只是一个不断变幻的白板，从中显示的只是我们人类对理想美的想象所能达到的程度。

不管是在电影中，还是在杂志里，现代的竺西斯们从各自的理想角度出发创造了许多多美的形象。好莱坞使

用替身手法来进行特技拍摄，让那些替身演员代替演员完成某些动作。他们之所以经常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与那些漂亮面孔般配的应该是那些完美无缺的身躯。詹妮弗·比尔斯（Jennifer Beals）80年代因为一部名为《辣身舞》的影片而声名鹊起，尽管后来有文章披露说，影片中有关她身体的特写镜头并不是她本人拍摄的，可是人们并不在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将她的脸与她的替代者的身体合而为一，将这一珍贵的形象长久地保存在自己的想象中。

名模是天生的尤物，她们的脸与身体的比例都长得恰到好处，不能不激起人们的狂热和快感。但是即使是她们，也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超级名模辛迪·克劳馥的两只手腕大小不一（更别说她脸上的痣了！），琳达·伊万杰妮斯塔（Linda Evangelista）不喜欢自个儿的嘴巴，觉得它太小而且有皱褶。而另外有些人呢，却有着完美的脚完美的手或完美的嘴巴。她们以特型模特儿的身份，充分利用局部的完美，也成天做着模特儿的工作。她们的手与名模切丽尔·提格斯（Cheryl Tiegs）、劳伦·哈顿（Lauren Hutton）等的脸摆放在一起。手的价值市场还可进一步地细分为“魅力手”和“效益手”。“魅力手”必须皮肤光亮、白皙，指型尖尖的，修长修长的样子——是“那种天生适于穿金戴银的手”。“效益手”是做事用的，它们具有少见的灵敏，坚定的神经，可用来摆弄洗洁精呀、洗发香波呀等等一类的东西。脚是另一类特型模特儿发挥作用的领域，特别是因为一般名模身高均在5英尺9英寸到5英尺

10英寸之间，因而都有一双大脚，而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崇尚的都是那种精致小巧的脚，如《灰姑娘》中辛德瑞拉（Cinderella）的脚。在美国，脚模特又分为6个型号，这些脚都应有光滑的皮肤，精美小巧的脚趾，按模特经纪人的说法，那些脚趾头看上去应该就像“5个小银虾”。

当然，人都是以不可分割的整体形象出现的，所以，如想将部分的完美统一起来，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修饰打扮；只有这样，一个人看上去才可能显得十分的赏心悦目。凯妮斯·克拉克写道：“用一种直接描述裸体的方法，是很难将一具赤裸裸的身体变成艺术的。人体不是老虎，也不像雪景，它赤裸的样子并不会引起我们的同情与共鸣，相反，只会让人失望和沮丧。我们要的不是模拟，而是美化。”西方人物肖像的表现原则一直是这样，直到现代主义出现，才打破了这种人体表现的模式。在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中，人物形象的理想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画成的形象与原型只是约略相似。如16世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II 的肖像画，她的脸一律被描绘成“一种不透明的、没有丝毫瑕疵的形象”。当时，画家贺拉斯·瓦尔帕（Horace Walpole）被要求准确、真实地表现女王的形象，对此他采取了一套固定的画法：罗马人的鼻子，装饰着珠宝与花饰的头发，王冠，质地考究、做工精美的服装，豪华的圆形领圈，再加上不以颗粒计的大簇大簇的珍珠。伊丽莎白的画像可能从来也没有跟她本人相似过，而到她年事渐高的时候，肖像画中的形象则变得更加抽象了。画家开始把笔触集中在她那精美绝伦的服饰上，而对她头部的

处理则只限于用简略的手法表现她那金红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和高高的鼻梁。

一个人面对镜子，总试图作出一副愉悦自己的样子。如果我们对自己都要故作姿态，那么，对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我们都想让人看到自己意欲让人看到的一面。而美的尊崇者只不过比这更进了一步，他们每次出场或上镜头之前，都要刻意打扮一番。20世纪30年代的银幕女星们总是浓妆艳抹地出场，她们的衣服精致而讲究，滤光镜前的动作夸张而又做作，一种人工雕琢的色彩十分浓厚，将那种艺术化了的形象魅力直逼到你的眼前。今天我们又开始崇尚起了自然妆，可是自然妆所显示的感染力不会比以前的浓妆更少人工色彩。当有人问起模特儿维罗尼卡·韦伯（Veronica Webb）她化一个自然妆需要多长时间时，她的回答是：“两个小时，外加两百美元。我不能永远让自己表现得像在杂志中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生动感人的色彩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而非天然的。以前是用喷笔喷画出想象中的事物，如今则是使用数码技术。不要惊奇我们意欲改善人的形象的愿望为什么总那样强烈，因为我们总想让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更美、更宜人，更能诱人喜爱。我们要不这样做才真叫做傻瓜呢。

当代艺术家们向我们展示剥去了魅力幻影的形象。戴安·阿巴斯（Diane Arbus）以一种不动声色的特写镜头表现那些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长得美的人们；摄影师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摄下了一系列美国西部人的肖

像，这些照片以赤裸裸地表现现实而著称；画家鲁西恩·弗尤德（Lucien Freud）和菲利普·皮尔斯泰恩（Phillip Pearlstein）则以不加掩饰的手法，无情地描绘出人体上所有的皱褶、斑点、青苍和松弛。但是这些表现方法不一定更真确地表现了我们的真实形象——不论是从我们眼中所见到的，还是从艺术家本人看到的来说。我们眼中所见到的不是摄影师眼中所见的，那种将镜头拉得可以清楚地看见人物身上每一个毛孔和头发的细微特征的见法。认为这种形象比那些看上去美好些的形象更真实也是毫无道理的。这些人物在这里是被抛在了外科医生手术室冰冷的灯光下，从一个窥淫癖的眼中或他们最大的仇敌的眼中被观看的。如果被看者是我们所深爱的甚至仅只是喜欢的人，他们还会显得如此吗？这只是艺术家在创造一种人工的效果，认为我们只需把人看作一堆堆的肉而已。

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曾说，我们背负有三重肉体问题，而且永无解决的途径。第一重是我们正“据有的”，即我们正生活着的。这重肉体对于我们无论谁来说，“都是最最重要而且客观存在着的”，是我们正体验着的另一个自己。第二重是公众面前的，“这重肉体被艺术家所描画，承受着种种物质的修饰、装璜和保护，这是我们的爱恋者所看到和需要看到、并渴望着去触摸的。”我们可以说，传统艺术所表现的就是这第二重身体。第三重肉体是人的生物体，这重肉体之所以被我们了解是通过“解剖和肢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怀疑肝脏、大脑或肾器的存在”。这重肉体是我们极力要疏离逃避的，而美

就是用来掩饰它、并帮助我们否认它的存在的。

我们对修饰普遍都怀有一种激情。人们喜欢将照片修改来修改去，画家笔下的形象总是被描绘成理想的样子，其原因也就是希望它们不仅是自然的产品，而且还是艺术的产品。我们意欲把瓦雷里的三重肉体融合成一个。从某个方面而言，这渴求精神性的，即希望有一个能与我们的梦想、期冀及道德追求相符合的外表。这也是一种寻求爱与接受的行为，即希望自己有一个人人都渴望凝视与接触的身体和容貌。生物学家会论证说，这种对美的要求本质上是受到种的意识影响的，人类需要传宗接代，需要他们的生存环境尽可能的有吸引力。昆丁·贝尔（Quentin Bell）则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论人的华服》中写道：画家和服装师内心里都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戏剧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因为历史只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而戏剧告诉我们应该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服装师和画家都是哲学家，因为画家寻求以完美的方式重新塑造人体，而服装师寻求用衣饰将平凡的人体装扮得更加美好。”

美的准则

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一直往下，贯穿着一条人类对美的认识的主线，这就是认为美是建立在比例和数的基础上的。组成美的基本成份有4个：清晰、对称、和谐和生动的色彩。柏拉图说：美在于恰当的尺度和大小，在于各个部分以完美和谐的方式连成统一的整体。他将这种比

例的概念扩展开来，用于阐释所有事物美，他谈到文章的长度要适当、绘画的结构要精当、诗歌中语言的运用要恰到好处等等。圣奥古斯丁（St . Augustine）认为美在于物体的形状和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他认为等边三角形比不等边三角形要好看得多，因为它的各个部分是那样的平衡。正方形，由于各边相等，也很美；还有圆形，也是要美得多的；最美的是圆点，因为不可分割而格外纯粹，是众美中之最美者。“人体之美在于什么？”他问道，“是各部分的和谐再加上动人的色泽。”亚里士多德的美是存在于“秩序、对称和明确”中的。对西塞罗（Cicero）而言，美是“肢体成对称发展的形状，再加上迷人的色泽”。而在普罗丁诺（Plotinus）看来，美是“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相对于整体的对称。美的事物本质上是对称的”。普罗丁诺相信，美不仅呈现在细节中，而且表现在整体里。“从丑中是产生不了美的，美的律则必将贯穿始终。”所有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切事物中美性质都是同样的，不论是一个美丽的妇人，还是一朵鲜花，一处风景，或者是一个圆环。

整个人类历史，艺术家们都试图用一套对人体各部分的度量标准来捕捉、表现人体的比例和美。艺术史家乔治·何塞（George Hersey）曾经指出，西方艺术中最重要的身体比例体系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塑家玻利克利图斯（Polyclitus），他的雕塑《执长矛的男人》和《受伤的亚马逊妇女》为后世男人和女人的形象树立了比例标准。玻利克利图斯的同时代人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在他雕

塑的克力多斯的阿芙洛狄忒形象中，也确立了同样的女性人体标准。这些人体规则影响了从公元前450年直到20世纪初期的整个西方艺术，只是到了现代派手中，才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表现视野大大地拓展了。玻利克力图斯把他的《执长矛的男人》称作“典范”，所以它被保存至今。

对于玻利克力图斯，以及以后的阿尔布勒奇·丢勒，列奥·巴蒂斯塔·阿尔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等等，美是存在于对称之中的。在这些艺术家和理论家眼里，对称所具有的意义与今天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说到对称的时候，意思往往指分隔线或分隔面或中心轴两边的形状完全一样。而对于古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与学者来说，对称意味着关系，意味着所有部分之间成比例的相应，它常常表现在整体中或合理的数字中。按乔治·何塞的说法，对称就是一种“对等性”。所以，那时候，人体的高度是用手长、头高和两指间的宽度来衡量的。葛伦（Galen）曾论证说，胳膊的长度如为三个手长则更为对称，因而也就比两个半手长或三个半手长美得多。

丢勒以自己的手为尺度，作为衡量比例关系的标准。他让中指的长度与手的宽度相等，而手的宽度又与胳膊的长度成相当比例，并由此进而确定了整个体长的比例关系。他将衡量理想人体美的整个标准都建立在他的手的长度上，那是一双修长的手，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此大感疑惑，如果丢勒的手稍微小一些，西方艺术史上将会发生什么！然而，在西方历史上，像这样将个人特征融进一种普

遍标准的现象并非只此一例，艺术史和科学史上的例子都不少见。爱德华·安吉尔（Edward Angle）于1907年出版了一本牙齿矫正术的书，其中的理想脸型用的便是他自己的脸。这意思就是说，亚洲人和非洲人都需要将他们的牙齿矫正。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将注意力格外地放到理想的脸部比例和人体比例上。丢勒提出，脸长应该分割成4个相等的部分，而其他的人认为只能分成三部分：从发际到眉头是一部分，从眉头到鼻翼又是一部分，从鼻翼到下巴则是另一部分。其他一些新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指南则告诉你：耳朵的高度和鼻子的高度是相等的，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与鼻子的宽度也是相等的，嘴的宽度为鼻子宽度的一倍半，鼻梁的倾斜度与耳朵的中轴线应当平行等等。数个世纪以来，这些规则一直支配着西方艺术对人体美的表现，进入20世纪后，这些规则更是成了整形外科手术的一整个基础，使之得以大胆地去重塑或再造人的脸型。

在西方文明中，标准是受到尊崇的，但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很少有人想到应对活生生的美的事物去做一番实际的、科学的测量，以证明这种美的比例安排是合理的。虽然如此，有一个人体比例学家勒斯里·法卡斯（Leslie farkas）却携带他的两脚规，对200名妇女的脸进行了测量（其中包括50名模特儿），另外还测量了一些青年男子和小孩的脸，同时又请了许多人给他们美的程度打分。然后他将这些测量的结果和所打的分数与古典美的标准进

行了比较。得出来的结论很不确定，但却提供了十分有趣的资料。古典的标准并非理想，其中有许多事实上证明并不重要，譬如对耳朵和鼻子的相对角度的要求。而有些纯粹是出于理想化的想象，在测量中没有一张脸或一颗头是按照两分法或三分法四分法形成的。有些对距离的要求也不对，如美人脸部眼睛间的距离比标准中所要求的宽。法卡斯的结论并非是说活人脸型的美与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的标准完全不相合，但它们确也表明了古典艺术家可能对人的美的基本性质理解有误。可能他们认为确实存在一种数字理想，这一理想数字与柏拉图和宗教关于世界起源的观念刚好是吻合的。

一套度量系统不能形成美的模式，普遍的美的比例与丢勒的手指比例可能并不相符，这并非是令人惊奇的事。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美与数字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但这更多的是来自我们的生物特性，而并非与理想数字有关。

美的邪恶性与神圣性

综观整个人类历史，人们对美的态度从来就不是一致的。有的人尊崇美，而有的人贬低美和厌恶美。柏拉图认为美是内在精神的外在显现，感官的美是模仿人无由得见的纯粹的美。美，就像真理和正义，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存在，对于这些不见形影的东西，这个有形的世界会让我们有时得见，但永远不会让它真正显现。这是柏拉图对美所

具有的陌生、感人力量的解释方式，他强调了美的那种唤醒人至高至远境界的神奇能力。诚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威尼斯之死》中所写的，所有的德行只有被看见，才能唤起我们的尊敬，而“只有美，它的精神特质我们通过感觉就能获知。如果神圣性，如果理性、美德和真理也以感觉的形式向我们呈露，那么我们将会成为什么？难道我们不会因为这一种爱而被毁灭、被耗尽，就像西米妮（Semele）与宙斯在一起时那样？”

随着基督教的产生，人们对美的理解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教会领袖人物以反对的态度对美作出了反应。“肉体中不存在美的东西。”圣克莱门特（St. Clement）说，“神之子必须禁绝这种肉欲之物。”杰罗米（Jerome）将肉体看作须加以征服的东西。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摒弃欲望和这个世界中所有其他的短暂之物。美为人们所恐惧，当成感官欲求和尘俗世界虚荣的表现，但它同时又被尊崇为神的恩宠在其中显现的优美形象。按照《创世纪》中的说法，人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来塑造的，他的外形具有神的神圣性，因而更美，比任何其他事物更像神。“美是完好的标志，无论它是普遍之物，或是单一之物。”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如是说。而完好，又是一种“对创造者头脑中所有的观念的模仿”。朱蒂欧·克里斯蒂安（Judeo-Christian）对美的态度的演变过程则反映了一场痛苦的心灵斗争，他想在美作为一种欲望和作为神的荣耀之间取得平衡。丢勒曾写下一部4卷本的论人体比例的书（此书在他于1528年去世以后才印行），书中，他谈到了

阿波罗（Apollo）、堕落前的亚当和基督等身体上的美，他们身体的完美是他们神圣性的象征，而我们身体上的不完美则是我们不得不从神的眷顾中堕落的原因。

我们对美的态度围绕着肉体与精神一直存在着深深的矛盾。我们把身体比作如下之种种：神庙、监狱、不朽灵魂的居所、刑房、获得尘世快乐的花园、一具生物外壳、一架机器或一个家。不理解加诸于肉体上的这些言辞的意义，就无法谈论我们对身体美的反应。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围绕着人体，人有一种自古而然的羞耻感。对此，弗洛伊德（Freud）写道：“对美的爱恋是深藏于它之中的欲望的完美例证。”这就是说，美来自于性的快乐感受，但却不得不与其起源相分离。“值得一提的是人的阴部，见到它总是令人激动不已，但它本身却不能说是美的。”过于注重自己外形的美，反映出一种病态的自恋倾向。如受虐狂和被动性快感的追求者一样，自恋症也主要地以女性病人为主，是她们羞耻心和微不足道感觉的保护伞，是妇女们比较喜欢的感觉。

那些寻求用整形外科手术改变自己外型的人，一直被作为一种病态现象来诊断，只是到了最近，这种观念才开始转变过来。这些人过去通常是要被贴上情绪沮丧、歇斯底里、迷狂症或自恋癖等等名称的。如果病人是个男性，则总会被诊断为变态病患者，因为一个男人过于注重外表比一个女人要显得病态得多。近20年来，根据病理学研究显示，接受整形外科手术的人中“健康者”的比例大大增加，这反映了人们对整形外科手术的接受程度越来越

高，接受整形的人群越来越复杂。而这也同时反映了现代病理学中所发生的变化，那种寻求外表优美的努力不再被看成是一种不健康的病态现象。精神分析学家约翰·杰多（John Gedo）新近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看法，说整形外科与通过精神分析改变性情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意在塑造一个新的自我。病理学家皮特·克莱默（Peter Kramer）更是在整形外科与他称作的“整形精神治理术”之间做了个类比，他举例说，服用普罗扎克（Prozac）之类的药不是为了治疗沮丧，而是为了改变性情，使自己“感觉起来更好”。

美的演变历史

奇怪的是，社会科学从不参与到这些具有丰富的知识性的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之中。你会发现，本书中所引用的许多研究资料都是70年代以后出版的。加德勒·林采（Gardner Lindzey）1954年发表了一本名为《社会心理学手册》的书，这是一部收录颇富的大部头著作，内容主要是关于社会交往的，可是在“身体作用因素”的条目下却只列出了一条。60年代末之前所有的心理学和人类学著作都会向你表明，人的容貌和外表与人的生活观念或感情世界绝对不搭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社会学对有关人体的事儿就如此地不感兴趣呢？

一个原因是社会学并不在意人的生物假定前提。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心理学家勒达·柯兹迈慈

（Leda Cosmides）曾经指出，过去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正统的社会学模式（SSSM）将人的心灵看作一块白板，其内容由周围的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内容所决定。人们相信所谓心灵就是由几个大致分了工的器官所组成，用于观看和理解周围的世界。这种模式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分离开来，然后将生物性（只是白板一块）弃置一边，而只去探求文化对人的影响和作用。本世纪社会学模式的根子存在于政治、社会 and 知识体系中。

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说，你除非懂得他们争论的是什麼，否则你不可能了解一个人在说些什麼。20世纪20年代，文化相对论一跃而为美国的知识前沿，原因在于有人宣扬族群论，认为少数民族、下层阶级、妇女等等天生就是低贱的。这种结论遭到了人们的反驳，行为主义用事实证明，人的行为会因为环境的奖励或惩罚而产生极大的变化。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约翰·B·华琛（John B. Watson）这样写道：“给我一打婴儿，只要他们身体健康、发育正常就行，允许我对他们按照我的计划实行特殊培养。我保证对他们决不刻意挑选，每个行业只随机抽取其中任意一个来训练。我相信我一定能将他们培养成某个行业的专家，或医生，或律师，或艺术家，或经理人才，甚至是乞丐和小偷，而不管他们的天资如何，性情、气质怎样，能力和天赋是不是有所不同，或者他们的祖先是属于何种人种。”

无独有偶，传统社会学模式从别种文化中收集而来的证据也表明，人类行为是可塑的，富于弹性，大部或全部

是从生活经验中形成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以田园诗般的笔调，描画了萨摩亚女子在这种传统中所具有的性自由。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家们对美都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只存在于观看者的眼中”，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人类热衷于对自己的身体做各种各样新奇古怪的装饰与变化，装饰形式的丰富多彩又一次反映了人类所具有的创造性，从用铜圈将脖子变得像个长颈鹿，到对牙齿和嘴唇进行彩绘，使得人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美只是个人趣味的事情，美是文化的产物。

对社会学家们有意回避加入关于美的对话，加德勒·林采提出了另一个理由，说他们是因为那个“显赫的失败”——即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所做的要将一个人的生理特征与其行为和未来的命运联系起来的努力，如颅相学、面相学等等，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获得成功。在下面的章节，我们还要对这一类玩意儿进行分析，我们将看到它们并没有提出多少科学的事实，只不过散布了许多假说，这也就难怪许多科学家急于要将自己的研究与这种事情区分开来了。像许多人一样，查尔斯·达尔文也险些成为面相学的牺牲品。正如他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比格尔号的船长深受面相学家乔安·卡斯帕·拉瓦特（Johann Caspar Lavater）的著作《论人的面相》的影响（这本书写于1772年），书中提出，通过人的面相特征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性格。达尔文在他的传记中写道：这位船长“是一个热切的拉瓦特信徒，他怀疑长着像我这样鼻子的人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和意志开始一次航行”。心理学家勒斯里·泽布罗维奇

(Leslie Zebrowitz)说：“进化论险些因为缺少一个适当的鼻子而失去。”

社会科学家回避美，将它看得微不足道，缺少民主基础，总之一句话，就是不适合用作科学研究的题目。但是到了60年代末期，林采开始谴责他的同行“忽略了形象的作用”。他发出号召，“或许现在正是开始恢复对美和其他一些形态学因素进行社会现象学研究的时候了。”于是接下来的30年，便有接二连三的研究成果出现，其中提出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使人们对人体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事实表明，认为美只是任意的文化传统的产物的观点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当科学家对人类行为和文化间关系的许多假设提出新的问题的时候，研究也就开始了。正如勒达·柯兹迈慈、约翰·图比和杰罗米·巴科夫(Jerome Barkow)所指出的：“文化不是无缘无故、不见形影的东西，其产生的方式极为丰富复杂，因为信息处理的机制是在人脑之中，而非别处，而这些机制反过来又是人类进化过程精雕细刻的产物。”很清楚，文化不会从无处而出，它肯定由基本的人类直觉和天生的喜好形成，同时也是对人类这些本性的反应。直到60年代，人们还相信，语言可以任意改变，没有限定，然而今天，在语言学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在语言的丰富多彩、约定俗成之下，还存在有一种普遍适用的语法。同样地，从前人们多认为面部表情因为文化的不同可以任意变化，但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指出，许多感情的面部表达在各种文化中是相同的。

在具有普遍性的面部感情表达（包括笑、凝眉、蹙额等等）和显示文化差异的何时表达之间，埃克曼做了重要的区分。同样，美不美的判断可能因文化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给人带来美感的面部形象的总体特征则到处都是一样的。

当然，没人说人们在对美做出反应时明确地意识到了进化原理，或者在人脑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原理自动形成了一种压力，规范着人们的反应；但也没人说学识与文化在我们对美的判断中根本就不起作用。19世纪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在他的著作中写道：美由“恒久不变的”东西和“相对的、有条件的东西”综合形成，所谓“相对的、有条件的东西”即是指“年龄、服装、道德和感情”。他说，“我反对任何人说美——哪怕一丁点儿美——不是由这两者构成的。”

将美置放于生物学的领域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最近，一些女权主义的著作，比如纳奥米·沃尔夫的《美的神话》一书，就受到了卡米尔·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和其他一些人的批评，说它们对历史事实混淆不清。它们将美的形象看成是这个世纪才有的事物，而不是贯穿于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帕格里亚提出美在古埃及的时候就有了。而本书立论的前提却是美的历史比这还要长得得多得多！感受美与反应美的能力在我们成为男人和女人的时候就有了。

柯兹迈慈和图比说，“慢慢地影响一件事物，让它与它所必须在其中生存的环境相适应，这之间所耗费的光阴

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就像是一块石头，要通过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才终于成形。即使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变化，也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来促成。”我们的心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经过无数代生命的过渡。有99%的时间，人类是以打猎者的身份、成群结队游牧着生存的，所以如要理解人类的天性，就必须返回到过去的历史中，将我们精神本质的起点放在那个原始的“生物圈”中去加以考察。

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就要看到：美的存在，是人类适应生存选择的生物规律的证明。这个证明很简单，即美是人类经验中最具普遍性的一部分，它在人的体内激起快感，吸引人的注意力，驱使人的行动，以此来保证人类种族得以延续。我们对美的极度敏感是根深蒂固的，是自然选择形成于我们头脑中的那一固有本性所支配、决定的。我们喜欢看光滑的皮肤、厚密闪亮的头发、线条优美的腰肢和对称的形体，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了这些标志，预料到这些标志的拥有者具备比他人更强的生育能力——我们正是他们的后代。

自然，这些标志如今都被置于化妆术、整形手术、服饰的控制之下——这三大行业都部分地致力于对人体进行虚假的广告。此外，人还无法逃避性魅力如今所面临的反讽处境：在男人和女人的性交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方设法避免怀孕。可是即使如此，我们的性偏向还是遵从着一种古老的规则，即最最吸引我们的仍是那些显示了最强大生育力的身体。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想法是我们所无法逃避的：男人们都一门心思地向着那些娇艳青春的女性胴

体，而女性们则必须在这种前提背景下为自己争得一个夫婿。这不是一种有意而然的行为，也不是人所希望发生的，这是一种生物遗传现象，是那个久已消失的年代留传给我们的。能否抗拒呢？也许，对美的反应不由人自主，但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最终还是受着我们理性的控制。

第2章我们要开始对美进行科学的探讨，这一章的重点是一个最少争议性的话题：为什么我们觉得婴儿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此外，我们还要涉及到其他一些争议性比较大的问题，如为什么父母都对外表极为可爱的新生婴儿表现出更多的爱怜？最后，我们还要引入一项关于婴儿感觉的研究，并分析为什么只有3个月大的婴儿，他们凝视美丽脸庞的时间也要比凝视一般脸庞的时间长。婴儿来到人世，似乎天生携带着辨别与区分美的能力。这是一项很有说服力的研究，它证明人类对美的偏爱不是后天习得的。

接下来的两章，我们要观察一下日常生活中美所发挥的力量。美影响着我们对他人的感觉、态度和行为。经济学家大卫·马克斯（David Marks）曾说，美是一种与种族和性别同样强大的社会力量。但是与种族论和性别论不同的是，我们对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作用有明确的认识，而“感觉主义”，或者说美感偏见则更多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起作用。这些研究还将人们对美进行追求时所做的不懈努力展示在大家面前。成千上万的钱财被人花在化妆品和整容术上，而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个，即这些行业满足了一个世界的需要，在那里长得美具有着生存的价值。

尽管许多人都说，他们不再认为“美的就是善的”这一说法，但是长得美的人所得到的偏爱仍然很容易加以证明，而不美的人受到的歧视也是如此。从孩童到成人，长得美的人都受着眷爱和肯定的对待，这一点无论男女都一样。长得美的人很容易找到性伙伴，即使在法庭上，他们也会比别人得到更多的宽容，从素不相识的人那里获得帮助。美意味着一种不太显明但确实存在的社会与经济的优势，与此相应，丑会给个人带来相当多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那么，美的人是否就是幸福的呢？回答会让你感到吃惊的。

在5、6、7章中，我们将观察美本身。从孔雀的尾巴到夜莺的歌声，这个世界多数的美都是一种求偶的信号，都意在将他人的注意力引导到自身所具有的美上来。人类也不例外，我们发觉那些美的生理特征暗示着性成熟、多产、健康和好看的形体等等。那么，这些美的信号又是什么呢？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提出，美丽的脸就是平常。就是说，美的脸型体现了一般公众都该有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还表示：如果平常的就是吸引人的，那么最最漂亮的就不在平常之列，而是在有数的几个方面溢出了平常人的特征。这种“越多就越好”（“More is better”）的观点自有其赞成者，他们认为，如同华丽的孔雀尾巴一样，我们用夸张的手法来昭示健壮的身体和延续种族的能力。

对于人体的研究，还产生了一个与直觉无关而令人惊奇的结果。比如说，对称，比例，尤其是腰与胯部的比例关系，对于女人体形的美（男性也同样）比单纯地讲究体

重（可以阻止人过胖或者过瘦）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这里我要简单地提一下在吃饭不正常问题上传媒所起的作用，对于这些作用已经产生了相当多的争议。现在，美国有三分之一强的人口处于肥胖状态，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至今仍没有迹象表明，人们对于苗条的赞美正在缔造一个瘦人的社会。大众传媒只是使得人们对于现实的体形产生更多的不满，使得我们一门心思去追慕那些极端化的形体榜样。然而，吃饭不正常的问题有着更复杂的原因。

有些怀疑论者提出争议说，对美做心理—生理研究的方法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存在着“一种理想的美”。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一理论只是提出看法说，人的脸型、体形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和某些夸张之处具有美的意义，而另外一些搭配方式和体形特征不具有美的意义。美的模式体现在极其多样的脸型、体形之中，而不是像点心机切割出来的那样千篇一律。

接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时尚及对时尚的追求。时尚是不稳定的，人总是不断地追求新奇，但尽管如此，时尚的变化发展永远不会使人变得更美。事实上，那些最最吸引人的时尚往往最终以滑稽可笑而收场，并很快堕入到模仿他人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好好观察一番驱动时尚的机制：性与现实；以及时尚所反应出的美学的、个人的以及社会的追求。

结束部分，我们打算将美再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角度上来加以观照。首先是从超越语言的其他有效的联系方式（包括气味）上来看美，其次是在人类生活的总体环境中

来考察它。女权主义者及其他有思想的妇女和男性同胞，都对美抱着深深的矛盾的态度。它被人既看做力量的源泉，又看做软弱和屈服的总因——一种妨碍他人看到我们更内在本质的东西。对女人的欲望，特别是将她们做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的欲望，已经深深地被感觉到了。美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痛苦”，但它的社会效果——从对美迷醉、惶惑到歧视、排斥长得丑陋的人，再到对人的内在精神美的忽略——可能更多的表现为消极的意义而非其他。

如何与美共存，如何将它重新请回快乐的王国，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责任。妇女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是人类内在固有的不适应的表现，这种不适应存在于我们所由之进化而来的古代环境与现代文明之间。但是解决美的矛盾的最终办法肯定不会放弃那从我们存在以来就伴随着我们的美的快乐与力量。



2 . 美即诱惑

美是比任何语言都有力的推荐信。

——亚里士多德

美给人以强力，给人以益处，我珍视美的这些品质，这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美是人际关系的第一要素，它总是凸现在所有品质之前，引起我们的欲望，充盈于我们的判断，对我们行使着至大的权威，并给人留下奇异难忘的印象。

——梅切尔·德·蒙田

遗憾的是，我无法不服从他，因为他像黎明般俊美。

——加德林一世

许多人认为孩童时期是纯朴自然的，因为美还没有介入孩子的生活。然而，只要听听学校里孩子们之间互相嘲弄时都用些什么词儿——“矮冬瓜”，“豆芽菜”，“四眼

狗”，“胖猪”等等，人们就不会再抱有这种错误的看法了。孩子天性就是爱美的。在摄影师理查德·亚维登（Richard Avedon）最早拍摄的照片中，有他妹妹路易斯7岁时的一张小照。当时才9岁的亚维登对妹妹非常着迷，以至他把那张照片的底片用胶带粘在自己的肩膀上，让太阳将底片上的影像“印到”自己的皮肤上。路易斯长着一张鹅蛋脸，头发又黑又亮，眼睛很大，脖子颀长，这一切都使亚维登感到了一种震撼。他说：她“成了我衡量美的模子，她是我心目中最早的美人形象。”后来，他给多薇玛（Dovima）、苏茜·帕克尔（Suzy Parker）、多林·蕾（Dorian Leigh）和卡门·戴尔·奥蕾费斯（Carman Dell Orefice）等名模都拍过不少照片，但它们都是“对路易斯的回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孩子对美就有特殊的感觉，但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何种方式形成自己对美的喜爱的呢？人们惯常认为是通过同化作用形成的。真实的情况可能是，首先是父母将某种审美趣味强加在孩子心上，随后是孩子的同伴们叛逆性地又将这种强加的趣味进行了修正，最后，在社会流行文化的综合作用下，这一切得以大功告成。1984年，罗宾·拉考夫（Robin Lakoff）和拉奎尔·舍尔（Raquel Scherr）发表了《论脸的意义》一书，书中他们提出：“美这种东西，不是靠本能一眼便能认出来的，审美鉴赏力必须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培养。”

但是心理学家朱蒂斯·朗格洛伊丝（Judith Langlois）认为对美的感觉不需要人工训练，因为人生来就是爱美的，即使是婴儿，见到美也能识别出来。朗格洛伊德丝收集了

数百张人像，将它们制成幻灯片，用来测试成人们对美的感受力。而当她将这些幻灯片放给从半岁到三岁的孩子们看时，她注意到，孩子们的目光在那些长得更加标致的脸上停留的时间确实要长久一些。符合孩子们标准的美人多种多样，而他们较多注意到的是那些长得最有吸引力的男人、女人、婴儿、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高加索人的脸庞。这不仅表明婴儿有识别美的能力，而且表明人的特征虽然多种多样，但某些面部特征却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

朗格洛伊丝认为婴儿们都爱看陌生人的漂亮脸庞，这个结论显然有点草率。若把与孩子生存息息相关的因素考虑进去，则会发现，婴儿对照料自己的人的反应是不受这些人是否长得漂亮的影响的。朗格洛伊丝还认为，漂亮母亲生的孩子有特殊的审美鉴赏力，这也不对。无论婴儿的母亲长得漂亮还是不漂亮，婴儿们总是对漂亮脸庞注视的时间要长些。

10年前，当朱蒂斯·朗格洛伊丝刚开始她的研究的时候，那种认为婴儿先天就具有觉察美的能力的观点还不怎么流行。婴儿一出生就能用与生俱来的审美眼光凝视世界，这一观点是绝对令人不能接受的。难道那些小不点儿一生下来就能注意到相貌的美丑了？但是朗格洛伊丝的结论是建立在日益增多的大量证据上的，这些证据表明婴儿与大人一样，具备一套普遍的感官偏好。他们喜欢看对称的东西而不喜欢看不对称的，爱触摸柔软的物体而不爱触摸粗糙物体。生下来的头4个月，他们就爱听谐和音，而

不爱听不谐和音。当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和玛瑟尔·曾纳（Marcel Zentner）给婴儿们弹奏不谐和音时，他们便厌恶地皱起鼻子。凯根和曾纳觉得自己看到了婴儿最早表现出的偏好，即爱听那种简单易懂、甜美柔和的乐音。我们能够学会对非谐和音进行欣赏，但这是后天习得的趣味。

婴儿最注意的是人的脸庞。在从母腹坠落人间的头10分钟里，他们的目光只会追随人脸部的轮廓和线条；两天以后，他们就能把妈妈的脸与从未见过的陌生人的脸区别开来了；到了第三天，他们就已开始学习、模仿人面部的表情，如果你向新生儿伸出舌头，小家伙也会向你伸出舌头。每个新生儿都会毫不迟疑地趋向那些对他有着生物学意义的事物，而这方面最有意义的莫过于那些能保障孩子生存的人。

婴儿看人眼睛的时间与看人面孔的时间几乎一样长，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需要从那里了解情况。眼睛的顾盼开阖，眼部周围肌肉的运动，瞳孔的大小变化，目光是炯炯有神还是迟钝呆滞，都能传达出一种微妙的情绪。面部骨骼结构所造成的两眼间距的差异，构成了每个人可见的、永久的特征，就像手纹一样与众不同。电脑自动识别面相系统只从人的眼睛来分辨人，这比仅从鼻子或嘴巴来分辨人的效果要好得多。叫计算机将人的脸部部位与非脸部部位分别开来的时候，只要在眼睛上做些手脚，它就很容易出错。这就是为什么从14世纪的唐璜（Don Juan）到20世纪的朗尼兰格（Lone Ranger）都只用面罩遮住两眼

周围就可以大胆行事的缘故，因为这样化妆确实效果很好。

如果婴儿看到有人注视他，他也会回视那个人，并常常笑逐颜开。如果小家伙来了兴致，他还会用注视看着别处的人的脸的三倍时间去看那张正在注视着自己的脸。人不像兔子和小鹿，作为被捕食动物，它们都有一种全景式环视视力；人与鹰隼、鬣豹及其他食肉动物是一样属性，双眼只紧紧地盯着可猎之物。这就是为什么婴儿一出生就有一种机能，知道辨别视线所来自的方向，这也是人类的眼睛为什么会逐渐进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与大多数动物的眼球巩膜会随着年龄渐长而变黑不同，人类的巩膜却可以终生保持白色。看人的眼白，可以准确地判断他的眼睛在朝哪里看、注意到了什么，以及他心里可能正在想着的问题。

狮子能看清一英里外的猎物，当猎物受到狮子追逐时，猎物无法看清狮子眼白的变化，所以就难以享受到上述的好处，这样猎物就只能自认倒霉了。但是人类为了生存的缘故而互相亲近、彼此依赖，对于人来说，不论你是用攫取的目光、还是用恳求的目光或是爱恋的目光去注视对方，注视的方向性都会产生一种有效的沟通。

孩子儿时的偏爱是他成年后偏爱的“初始模型”（formesfrustes）。婴儿长大成人后，也喜欢对称和谐和手感光滑的事物；他们同样被人们脸上的一切所吸引，当目光与他人的目光相遇，就显得兴致勃勃；如果婴儿3个月大就爱瞪着眼睛凝视漂亮的面庞，那么在他们长大以后，通

常也就会成为在美丽的面孔面前心猿意马、看到异性漂亮就会坠入情网的人。当初涉人世的婴儿就知道把目光更多地凝注在那些成人也认为颇富魅力的脸孔上时，本身就是对必须由文化才能教给我们怎样鉴赏美这一观念的驳斥。

婴儿的可爱

在婴儿评鉴大人的时候，大人也在评鉴婴孩。50年前，个体生态学家康拉德·洛伦兹认为，婴儿的特征开启了人特殊的感情世界，令人一看到他们心中就溢满了柔情。婴儿一落地就惹人疼爱，他们皮肤细腻，头发柔顺，眼睛大，瞳孔也大，面颊鼓鼓的，鼻子小小的。他们的脑袋硕大，四肢却很短小，柔软灵活。没人照料婴儿是不能存活的，因此，他们应该不遭任何拒绝地来到人间。

人对婴儿体貌特征做出的反应是自动的，所以我们总是温柔地对待那些有着类似于婴孩特征的动物。人类的这种天然的怜惜弱小之心，被玩具厂家和动画制作者利用了去。出现于30年代的米老鼠，以其生命之初的快活敏捷赢得了我们的爱，以至于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将电影《好礼帽》中的角色弗雷德·亚斯戴尔（Fred Astaire）称为“全人类的米老鼠”。但是随着50年的光阴荏苒，米老鼠渐渐长大了，他的眼睛和脑袋也越变越大，四肢却越变越粗、越变越短。现在的米老鼠形象模仿的是婴儿的基本几何形状。迪斯尼乐园的班比有一个夸张的、像婴儿般宽阔的前额，其他的一些小鹿的眼睛也基本

上如此。

相貌生成的可爱是生物进化的偶然所为。人类婴儿最先发育的是脑神经系统，他们刚生下来时眼睛就有成人那么大，而四肢很细小，就像是对他们成年后四肢的袖珍模仿。虽然大眼睛小胳膊的样子还谈不上美，但是婴儿身体的基本构形对于我们却有着深在的意义，因而不由自主地引发人们对他们产生温柔的情感。就像小鸡身上有条纹、幼狮身上生斑点尾巴生环纹、小猩猩长着白色尾毛一样，人类幼儿的特征则表现为大脑袋、大眼睛、鼓脸颊和小鼻子。这一切都表现了他们的娇小无力。简·古达尔（Jane Goodall）发现，只要小猩猩的白色尾毛未脱，它们就不会受到攻击。这种白色尾毛就是小猩猩的生物标签，它警告大猩猩不得伤害它们。初来人世的第一年，人身上的这种表示弱小的可见标志也起着与小猩猩同样的功能，使孩子免于受到成人的攻击。

维多利亚女王是9个孩子的母亲，她曾经对人说：“丑陋的婴儿最令人厌恶了。”也许她只是表达了她那种维多利亚式的对肮脏不堪、行为不适的厌恶。而对于大多数人，婴儿是不丑陋的，就像人不觉得自己的宠物丑，或不觉得自己的新娘丑一样。婴儿都是可爱的，至少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是如此。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父母就觉得他们的孩子乖巧无比。正如安娜·昆丁兰（Anna Quindlen）所说的：“是谁创造了这个古老格言：上帝把婴儿造得如此可爱，以至没人忍心去杀死他们？这个格言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特别能引起人的共鸣。”

然而，在婴儿刚出生的头几个月内，母亲们对待婴儿的态度与反应是有着微妙的差别的，其中有些是来自对婴儿相貌的反应。为了研究的需要，心理学家为出生数日的婴儿和母亲们的生活进行了录像，3个月后又录了一次；他们还找了一批人观赏婴儿的彩色照片，并要他们对这些婴儿的相貌做出评价。

结果他们发现，漂亮婴孩的母亲大部分的时候都把孩子抱在身上，总是注视孩子的眼睛，并对孩子念念有辞。如要这种孩子的母亲去注意别的人和事，则非要对她们采取强制的办法才行。而不怎么漂亮的婴儿呢，他们的母亲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照料孩子的生活上（如给孩子擦洗身子，拍孩子的背让他打嗝，经常查看孩子有病没病，调拨孩子的姿势等等），她们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被人从孩子身上引开。这不是说她们疏忽冷淡，而是表明她们对孩子的情感还是有所保留的，不像前面那种孩子的母亲，完全地为孩子心醉神迷了。

研究者没有请母亲们来评价她们婴儿的长相，也许这样就太煽情了，但是他们确实问了许多有关婴儿和婴儿护理方面的问题。不怎么漂亮的孩子的母亲更容易诉说她们的紧张情绪，比如埋怨时间不够用呀、精力不济呀、财力有限呀等等。但是这些差别在婴儿出生3个月后基本上就消失了，虽然这时漂亮孩子的母亲对自己乖孩子仍然更怜爱、更愿意花时间逗他们玩儿。

人们发现，说哪个孩子最最可爱是很容易的（因而才有了婴儿选美竞赛和判定聪明宝宝的活动）。漂亮婴儿是

一种有代表性的婴儿，就是说他们的相貌是适度地放大的标准婴儿的相貌，所以他们处处惹人疼爱。被认为丑陋的婴儿就不能获得这样的优遇了，这使得他们显得老气，就好像是将他们未来成人后的面孔缩小了长在他现在的脸上一样。早产的孩子有如危病婴儿，他们都长着一张不真实的老成面孔。把他们的照片与足月出生的婴儿放在一起比较，人们会觉得这些孩子既难以伺候、又容易哭闹，因而不大愿意承担去照料他们的责任。事实上，不漂亮婴孩未来的结局也会更加不幸。在加利福尼亚和马萨诸塞州，人们研究了那些被置于法庭保护下的受虐待儿童，结果发现，不漂亮的儿童占到了不成比例的多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抚养，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面部表情缺少别的小孩所特有的快乐，而是他们的脑袋与面部比例看上去较缺乏孩子气，因而显得不够可爱。这样的孩子更有可能遭受虐待，因为他们的脸孔不能像大多数孩童的面孔那样，唤起别人自然而然的护爱之情。这些孩子还可能被看得比他们实际有能力，由于相貌老成而让人们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有证据显示，父母对孩子施虐往往是因为对孩子怀有一种不实际的期望造成的。最后，他们不同寻常的面相还可能意味着体质虚弱，长大成人的可能性不高，就像早产儿给人的感觉一样。

在动物界，母性动物也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那些表现得健康和具有强大生存能力的幼儿。美洲黑鸭是一种生着灰黑色羽毛的水鸭，它的雏鸭长着一身鲜艳的橙色羽毛，头顶则光光的，没有毛。当老鸭给它们喂食时，幼鸭的头

顶就变得鲜红鲜红。所以当幼鸭肚子饿了，求母亲喂食给它们时，就会闪动它们红色的头顶和橙色的羽毛，向母鸭发出信号。如果将一只雏鸭的橙色羽毛剪短，那么这只雏鸭受到母亲注意的程度会相应减少，得到的食物也跟着减少。因为母鸭一般先衔食给那些闪着鲜艳色泽的雏鸭吃，而似乎不怎么理会那些它们认为不够健康、没能力展示自己羽毛的雏鸭。

心理学家珍妮特·曼（Janet Mann）对美国郊区的一对双胞胎做过研究，这对双胞胎初生时体重很轻，属于高危婴儿，其母亲的表现与黑鸭的表现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曼注意到，孩子生下8个月后，母亲对其中的一个表现出明显的偏爱，她花更多的时间去哄她、抱她，逗她玩儿，哼歌曲给她听。这里不牵涉到究竟哪个孩子对母亲咿咿呀呀说得更多，或笑得更多，或尾随着母亲的时候更多，所有的母亲都偏爱双胞胎中更健康的那一个。通常，母亲们对两个孩子给予的关心与食物大致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情况例外，就是当那个双胞胎的家庭非常贫穷的时候，双胞胎中那个病弱些的就肯定会遭到严重的忽略。曼的结论是，在双胞胎中，母亲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最可能生存下去的那一个孩子产生偏爱，这种偏爱产生自一种人类进化的生物机制，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正是这种机制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母亲们对人类再生产的满足。

这颇为费解，但却是真的。在人类进化的早期，父母亲面对的是有限的、易变的资源环境，因此危病婴儿成活的可能就要小得多。母亲对婴儿所表现的健康状况和成活

能力的特征越敏感，她生殖的成功率就越高，因为她知道在不危及自身和其他孩子生存的情况下，应对这个病危儿投入多少。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学问题，而是严酷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实实在在的境况。

今天的父母可能永不会再面对如此令人心碎的两难抉择，他们有财力和安全保障，可以将时间和精力倾注给一个面临生命威胁的孩子。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新生儿的母亲，我们就会发现，她们要这样做，仍须超越那个从古代大脑进化而来的生物机制。父母亲仍然趋向于更喜欢那些健康些的婴儿，对那个长着典型的大眼睛、小鼻子、胖嘟嘟的小脸颊的小家伙倾注更多的爱。在我们祖先所处的环境中，婴儿的外表是最好的显示健康与否的标志，它将表明这个孩子能不能活下去，值不值得父母为之付出毫无保留的爱。

爸爸最清楚

父母在付出自己的爱心之前虽然谨慎，但如果婴儿能够养活，父母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们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抚养长大。记住，在婴儿刚出生的几天里，他的长相如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从此以后（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父母亲就相信，从所有其他真正的品质上看，他们的孩子比别的孩子要漂亮得多。父母和家里人都非常注意观看孩子的小脸蛋，看他长得究竟像谁。几乎是在孩子刚一落地时，母亲就说孩子长得像父亲。

心理学家玛果·威尔逊（Margo Wilson）和马丁·戴里（Martin Daly）曾发出数百张问卷对新生儿的父母及其亲属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人们普遍都说孩子长得像父亲，这一数目远远超过了说孩子长得像母亲的人。事实上，在许多家庭里，“每个人”都得说孩子长得像父亲。

对于这种发现，戴里和威尔逊的解释是这样的：母亲毫无疑问知道孩子是自己的，但是父亲常常有受到蒙蔽的危险。以前没有DNA亲子鉴定技术，父亲只能从两个方面来判断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一个是对孩子母亲是否忠诚的认识，另一个就是孩子的长相这一生理依据了。面部特征是极具遗传性的，强调孩子长得像父亲，有助于消除父亲的疑虑，让他开始把感情、关心和爱尽数倾注在新生儿身上。母亲要证明的是宝宝健康可爱，父亲则须证明：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出自自己？看到小家伙脸上有自己的影子，便会强有力地激起父亲的舐犊之情。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深入南太平洋的特罗布里安群岛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特罗布里安人相信，母亲受孕是因为与神灵相遇的缘故，而不是因为男性的精液。然而，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更多地偏向孩子长得像父亲，而非像母亲或其他家族成员。人们甚至认为，说孩子像母亲是不礼貌的行为。

戴里和威尔逊认为，世界各地的父亲都对孩子像不像自己这个问题很敏感，而世界各地的母亲则总是想方设法让父亲相信这孩子就是他的。这些行为可能是下意识里完成的，甚至在父亲对孩子是如何受孕的毫无知识的情况

下，人们依旧这样做，譬如特罗博里安人就是这样。戴里和威尔逊告诫人们，在父亲希望孩子长得像自己的意识深处，也许藏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比如，在那种有一个孩子将要被挑选出来做替罪羊的家庭里，很可能被挑中的就是那个长得最不像父亲的孩子。在收养的情况中，如果养父母觉得孩子长得与他们相似，则收养的成功性会更大。戴里和威尔逊还提出见解说，孩子长得像谁这一点对养父的重要性远比对养母重要。

当然，婴儿的长相总是令人爱怜不已的，一看到婴儿的照片，妇女和儿童的瞳孔都会不由自主地放大。没有人会对幼儿的美产生嫉恨，而大多数人也不怀疑婴儿之所以长得讨人喜欢，是为了适应人类进化的需要，即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婴儿的情况使我们懂得，人们对于肉体美的感应是不由自主、无法抗拒的，这种感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外表与现实

如果我们至今仍保留着婴儿时期的迷人力量，那么生活就会变得容易多了。告别了襁褓，我们便也失去了可爱的长相所给予我们的保护。失去了表示弱小无助的小猩猩尾巴上的白绒毛，我们不得不以无助之身面对这个世界，长大成人后的美虽然带来的益处与庇护更多，但它只对少数人才是如此，而多数人是无缘的。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感觉主义普遍流行而又为偏见所左

右的世界。人们乐于相信，外貌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每一个市场营销人员都懂得，商品包装和商品形象如果不比产品本身更重要的话，至少也与产品本身是等价的。我们不只把外貌看作是愉悦和羞恶之源，而且还看作信息产生的地方。人的心智不是生来就能解开表象与本质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从深层上说，很少人会相信表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或任意规定的。小孩子觉得要分开表象与实质特别的难。心理学家先给孩子们看了一只松鼠，然后将这只松鼠的毛剃光并涂上颜色，使它看起来极像小浣熊，再让孩子们看，孩子们都说是浣熊。孩子们完全被外表迷惑了，以致忘掉了本来是松鼠，它只是被剃掉了毛并涂了颜色这个事实。

我们何以如此看重事物的外表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牵涉到进化的问题。外表一直是人们明白事理的向导，有时是惟一的向导，让我们得以分辨事物的好坏。水果上的褐色斑点和它褶皱的表皮告诉我们，水果熟过头了；如果皮还是青的，就告诉我们水果尚未成熟。生物学家乔治·奥里安斯（George Orrians）相信，人们普遍对风景地区感到兴趣，是因为它们对人意味着安全和保护。他与朱迪斯·贺华根（Judith Heerwagen）合作，对画家、花匠、摄影师及其他人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让他们评论哪一种风景最美。结果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如下的风景所吸引：那种有大树、能望见地平线、有水、地势起伏不平、有一条条小径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摄影师杰伊·阿普顿认为，这样的环境能带给人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庇护，使人能置身于

安全地带，俯瞰外面的大千世界。

我们在他人身上究竟想得到什么呢？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的脸庞预示了人的个性和人格。托尔斯泰就曾经悲叹说：“人们认为美即是善，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谬见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善，至少是道德上的善，与美是毫无关系的。

看上去很美

肉体美是精神美可以眼见的证据，这一观点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那里。柏拉图相信，人间美只是理性美的映像。萨福（Sappho）在她的诗歌中写道：“美的就是善的。”这些见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中间颇为流行。马希里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把美看成是“表现善的花朵。这朵花，就像是一种诱饵，只要受到它的诱惑，在它之中所潜伏着的善就会吸引住所有看见它的人。……我们是不会知道隐藏于事物天性中的善的，也不会去渴望它，除非我们被显现于外的美所引导。”波尔达赛厄·卡斯蒂柯里奥（Baldassare Castiglione）在1561年写道：“美是神圣的，……鲜有邪恶的灵魂寄寓在漂亮的身体里，因此，外貌美是内在善的真正表征，……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美善同一，在人体美方面尤其如此。我要说，我们肉体美的直接根据就是心灵美。”社会学家安东尼·西诺特（Anthony Synott）评论说：卡斯蒂柯里奥的观点代表了“生物学与神学、渎神与神圣、性欲与上帝的完美

综合”。他们沉迷于肉体美，并将之称为是对心灵美的敬仰。

丑陋是邪恶、疯狂或危险的表征。畸形、丑陋和疾病被看成是神在暴怒时烙在人肉体上的耻辱的印迹。卡斯蒂柯里奥说：“大部分的丑同时也是恶。”16世纪的时候，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写道：“畸形人……——像《圣经》上说的——没有人自然而具的情感。”

最早试图从外貌中区分那种特殊的、能作为性格表征的面部特征的是亚里士多德。1586年，意大利博物学家、哲学家齐奥万尼·德拉·波尔塔（Giovanni Della Porta）写了一部名为《论人的面相》的书，意欲阐明人类肉体与心灵间的关系。由于人类性格的不透明性和多样丰富性，他觉得用心理活动相对简单的动物心理来类比人类的心理是可行的。他的设想建基于一种巫术信仰，即看上去相似的东西本质上也是相同的。每个动物都有一种确定的激情，依此类推，与动物长得相似的人也会有这种激情。驴子愚蠢，骡子顽固，兔子胆怯，公牛喑哑沉默，猪肮脏贪婪等等。德拉·波尔塔认为：如果一个人与某个动物相像，“就可让他明白，他的行为方式与那个动物也会相同”。换言之，如果你看起来像驴子，那么你就会像驴子那样去行事；如果你看上去像狐狸，你就具有狐狸的性情。

从柏拉图以来的许多著作中，有着挺拔轮廓的希腊头雕侧面像都被看成是人类最理想的面部形象。这种雕像留给后人的财产之一，就是它们没有任何像兔子、山羊、猿猴、青蛙或其他种种卑贱动物的地方。如果美意味着看起

来不像兽类，那么阿波罗雕像就为人类树立了具有完美意义的标准。1496年在罗马梵蒂冈发现的古希腊雕像“贝尔福德的阿波罗”（the Apollo Belvedere，其创作日期可追溯至公元前320年）被历史学家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偶像”。（Belvedere源于老梵蒂冈宫后的一座别墅名，16、17世纪的时候，罗马教皇的家族成员都在那里存放收集而来的古希腊、罗马的大理石雕像。）

对于18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l）来说，希腊雕像“绝不仅仅是外在的、偶然的形式，而是真正的美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因为它的存在，人们找到了面部构造的体现方式，通过这种构造，人的内在精神得到了完美的表现。”黑格尔作出这种判断是基于如下一种事实：希腊人有笔挺隆起的鼻梁，在头像的侧面轮廓中，这道鼻梁从人的思维中心（前额）一直而下，直到脸的中部，形成了一条连续的轮廓线，因此使得观看者的视觉注意力都集中在脸的上半部分，而不是集中在注重感官享受的下半部分。

18世纪荷兰画家和解剖学家佩特鲁·坎波尔（Petrus Camper）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从侧面像上来测量人面部的角度。他测量的办法是从耳朵到嘴唇引出一条水平线，再从前额最突出点到下颌最突出点之间引出一条垂直线，两条线相交之处所形成的角度就是面部角度。坎波尔的面部角度测量法成为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面部比例度量系统，它可用来鉴别不同人种之间的颅骨差别。但是坎波尔的发明目的是为了量化美的性质，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希腊古迹

中的雕像代表了人类美的理想范式。他这样写道：“世上没有一个人不认为，阿波罗或维纳斯（Venus）的头拥有超越一切的美，也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这些头颅之美是世间最美的男女的头颅所无法比拟的。”坎波尔发现，古希腊雕像的面部角度是100度（从相对较直的侧面像上看），而大多数人的面部角度在70至90度之间。因为猴子、猎犬和其他动物的面部角度比一般人低，而希腊雕像的又比一般人略高，坎波尔于是认为他发现了美的角度。恰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构成了一张漂亮的脸庞呢？我的回答是，是各种特点的合理配置，也就是脸部的垂直线与水平线的构成为100度的角度。”在测量不同种族的人的颅骨时，他发现从猩猩、猴子到非洲黑人，再到东方人、欧洲人，最后到希腊雕像，其面部角度呈逐渐增大之势。他将欧洲人放在最靠近美的理想范式的位置，而将非洲人放在距这一范式最远的位置。一位瑞士牧师卡斯帕·拉瓦特公布了自己的一套面部角度测试数据，也是呈现一个逐步递升的顺序，只是这一次是从青蛙排列至罗马梵蒂冈的贝尔福德阿波罗像。在这一序列中，他也将欧洲人放到了最靠近美的理想范式的位置上。

经过这样一番类比和对照，欧洲人提出，欧洲的男人和女人是人类中最美的。既然他们在面部角度上接近希腊众神，那么，在性格和智力上也同样接近那些神祇。这种工作被赋予了一种种族主义的使命，目的是想用来证明其文化和种族上的优越性。然而，贝尔福德的阿波罗侧面像肯定不会比非洲美男子的侧面像更美；外貌不等于现实，

类比不说明任何问题，种族主义论调是那种浮浅的荒谬学说的最明确例证。现在，科学家们承认，种族理论解释不了任何人类进化演变的问题。掩藏在人们皮肤下面的遗传上的差异，用划分种族的方法还解释不了其中的七分之一。同一种族内的遗传差异比两个不同种族间的遗传差异还大。容貌不同者可以是同胞姐妹，而容貌相同者，则可能在人格上迥然相异。种族主义的确存在，而种族却不存在。

近来，我们知道了仅凭眼睛是难以“读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智力水平和心灵状态的。如果特丽萨修女一眼看上去就像个世界小姐，那么这个世界就真叫公平正义了，而相貌也是个不难读懂的东西了。但是迄今为止，尚无人提出证明说，哪些特征表明了一个人是圣人，而哪些特征预示了一个人是恶汉。有时候，将人的相貌特征与某个具体动物的相貌类比是很容易的事，如将人的眼睛比作狗眼睛，但这仅仅是视觉意义上的描绘，而非道德意义上的。对人格和人品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这人对我们及他人的所作所为中总结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形体美是“肤浅的”，而“漂亮仅仅不过是漂亮而已”。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并不总是这样看待人的。人们对相貌出众者通常抱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而对于不漂亮者，则总是轻易地就做出不客气的评价。比如，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胖人非懒即贪。我们知道把美与善连在一起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有时不一定会以理性判断为指导。

命定的不公

不管美是善的，抑或是不善的，美似乎总能将他人的善端彰显出来。在一项心理测试中，人们给75名大学男生看了一些女人的照片，这些女人有的非常漂亮，有的则十分一般。他们被要求从中选出一位女人，并甘心为她做如下事情：帮她搬家具、借钱给她、为她献血、为她捐肾、游出一英里的路程去救她、从失火的楼房里把她救出来，甚至为了掩护她而去扑恐怖分子的手榴弹。这些受测试的男生大多愿意为自己选中的美人去做一切有利于她的事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而惟一不太愿意做的就是借钱给她。

对心理学家虚拟的这些情境的回答，也许与他们实际上会做的相去甚远，但从后面的几次测试上看，人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愿意相信这些学生们说的是真的。在分阶段所做的几次实验中，心理学家测试了人们是否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漂亮或不漂亮的人，如对他们诚实、为他们做出一些牺牲等等，结果发现，人们并不是将善行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例如，在一次实验中，让一个漂亮女人和一个丑女人分别走近电话亭，向打电话的人询问“我是不是把一角银币掉在那儿了？”（电话亭里确实有一枚银币）结果，有87%的人将银币还给了漂亮女人，而将银币还给了丑女人的比例只有64%。还有一次实验，是让两个女人分别站在路边一辆爆了车胎的小车旁，结果仍是

漂亮女人先得到救助。

人们更爱帮助漂亮的人，纵然他并不喜欢这个人。在另外一次实验中，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一个不漂亮的女人都对男人的工作提出批评或赞扬，然后问男人他们喜欢哪个的批评或赞扬，不喜欢哪个的。男人们的回答是：特别喜欢那个赞扬他们的漂亮女人；也特别讨厌那个批评他们的漂亮女人。但是要求他们自愿分出时间来陪伴两个女人时，他们都愿意把时间花给那个漂亮女人，即使内心里并不喜欢她。心理学家说，这是她的外貌吸引了男人。甚至在不是遇见了自己真正倾心的对象的情况下，只要那个女人很漂亮，男人也会被吸引。在一次实验中，人们将一些填写好的大学入学申请书扔在底特律机场，申请书上附有一张便条，上面写明表格是女儿托付给父亲的，结果让他给粗心地弄丢了。申请书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申请书上贴着的照片各不相同，有美有丑，结果那些被捡起来并投寄出去的大多是那些贴着漂亮女人照片的申请书。

有趣的是，人们很少请求漂亮的人帮忙。这对男人与漂亮女人相组合的情况尤其如此，而当涉及到男人与漂亮的男人相遇、女人与漂亮女人相遇的情况时，情形仍是如此（女人与漂亮男人之间的情况并不在此列）。但是，就像进化论心理学家勒达·柯兹迈慈和约翰·图比所指出的，人们总是留心谁为他做了些什么。我们之所以努力取悦那些漂亮的人，而又不期望得到他们立即的回报或回报的表示，是因为我们这样做只是藉此强调美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与一个人诞生在贵族之家或者继承了一笔财富没有

什么不同。正如作家吉姆·哈里逊（Jim Harrison）所说的，美代表着“天生的不公平”。

美所具有的高贵价值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它是一种充满了热烈情感的事物。难道民主社会没有取缔贵族阶层、并普及原本只有贵族才能出入的野外运动场吗？或许这一现实也使得我们容易产生如下的观念：即人人都可以通过寻常的民主手段——如努力工作和金钱——来得到美。如果美给予人一种高贵身份，那么，我们一定要让这种身份建基于后天努力和工作成就之上，而不是一种先天就具备的优越性。历史学家洛伊丝·班纳（Lois Banner）逐年记录了“20世纪早期那些选美专家就美所发表的民主主义说辞”，它们都坚决地肯定“每个女人都是美丽的”这一说法。洛伊丝·班纳认为这一类运动对于妇女来说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为妇女们树立了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理想。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的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在宣传中告诫人们：“世间没有平常的妇女，只有粗心大意的妇女……妇女应该强烈地渴望美，然后在精心选来的商品的衬托下，让自己变得美起来。”一种悖论的情况是，20世纪选美专家的言论常常不智地将美与善联系到一起。现在，不满于自己镜中形象的妇女，觉得自己不仅没有魅力，而且还懒惰、无能，缺乏内在心灵的美，而心灵美才被人们认为能发出良好习惯和丰富内涵的光辉。

美即身份

当我们走在街道上，我们事实上就在与别人暗暗协商：谁该占有多少空间？不管我们坐着还是站着，我们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小领地，这是我们周围的一片得到保护的势力范围，未经许可，别人是不能侵入的，离得太近了，人就会觉得不舒服。大高个儿的领地大些，他们鹤立鸡群的个头令人自觉敬畏。如果让人走近一个陌生人，他到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停下来，那么，这个停下的地方对于个子高大的人是2英尺（确切地说是22.7英寸），而对于个子矮小的人则不到1英尺（9.8英寸）。长相美丽的人，不管个子大小，别人都会留给他（她）们一个较大的个人空间，在他们的周身，笼罩着一种特权。

漂亮的人赢得争论的可能性更大，也更能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人们向他们敞开心扉，告诉他们自己内心的秘密，袒露有关个人的信息。人们基本上都想取悦长得好看的人，向他们做出息事宁人的表示，听任自己被说服，告诉他们各种消息和闲话，而在他们走过大街时，则主动为他们让开道路。

然而，人们这样做，也许是真的慑于他们的自信和决断，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相貌；也许他们是真的运用自己的智慧或人格魅力说服了他人。事实上，有魅力的人在社交场合确实显得比没有魅力的人更加轻松自然，信心十足，更少可能担心听见反对意见。他们更有可能认为，是自己

在支配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命运和环境在支配。在做出决断上，他们是毫不犹豫的。在一项很有趣的研究中，一些人被邀请来参与与心理学家的个人谈话。会谈过程中，心理学家的一位同事进来打断了谈话，心理学家于是抱歉地去与同事说上一会儿话。如果被会见的人有耐心，那么这个插话的时间将长达10分钟。经过统计，漂亮的人平均等待的时间为3分20秒，然后就要求心理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而不怎么漂亮的人则平均等待了9分钟才这样做。在对自己的决断力做出评价上，两组人并无不同，只是漂亮的人觉得自己有资格享受更好的待遇。

我们知道，行为常常是“预言的自我实现”。如果说，美人们平时就得到了更多的遵从、赞成和惠爱，他们便自动地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特权，那么，这是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的。人若被当做美人对待，即使只有10分钟，他们的行为也会有些不同寻常。心理学家进行了一个实验：让女人与男人在电话里交谈10分钟，交谈中男人尽量试着去了解这个女人。交谈之前每个男人手里都拿着一张女人的快照，他们被告知就是在这个女人说话，让他们在心中设想这个女人的美丑，事实上是所有的男人都在与同一个女人谈话。测试得出的结果很有趣，如果与她谈话的男人认为她漂亮，则这个女人就显得更有生气、更具信心。如果男人表现卖力，大胆勇敢，浪谑调情，或幽默滑稽，那么对面的女人也会表现得更大胆和性感。当她被假定为有魅力时，电话中听起来也显得更有魅力。

高贵的身份是一件宝贵的商品，我们将它授给那些长

得美丽的人。正如我们下面会看到的，人都相信美貌者拥有许多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所处的地位或许能帮我们也获得这些东西。

予之愈多，欲之愈多

我们期望，有魅力的人在所有事情上都干得很出色。我们猜想他们的婚姻更幸福，工作更顺心，心理更健康，情绪更稳定。几乎所有正面的品质，只要我们能想得到的，我们都认为这些长相俊美的人基本都能得到，他们做得更好，享受得也更多。

这些期望我们从小孩子的时候就有了。研究者向密苏里州400个班级的教师发放了一份五年级学生的登记卡，卡片上需要填写的内容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作息习惯和上课情况。登记卡基本相同，惟一不同的就是卡片上所贴的孩子们的照片——他们当然有的漂亮，有的——一般。不管有关学生行为表现出的信息有多么丰富，长相却支配着老师对孩子们的评价。老师们都期望漂亮孩子更聪明、更爱社交、也更受同伴们欢迎。令人不安的是，漂亮学生的分数也确实比别的学生高些。当取消学生考试评分的主观因素、统一采用标准化试题考试后，漂亮学生的分数优势也随之消失了。

有趣的是，人们并不理会“笨蛋多美貌”的古老格言，认为不论男女，只要他们长得有魅力，他（她）们就比别人更聪明。对于男性人们尤其持此观点，对于女性也

不例外，多次不同的试验都表现了这个规律。只要贴在表格上的人（有画家、随笔作家、学生等）越漂亮，则他或她的工作得到的评价就越肯定。这些研究表明，对一件确实做得不是很好的工作，长相能给予很多补偿，而且它们甚至使得人对确实做得好的工作予以额外的提升。社会心理学称此现象为晕轮效果，即受尊重的人的周围笼罩着一圈灵光。

即使事实告诉我们就是如此，我们也不情愿去设想：在优美的形象外表下面，也会存在有邪恶。最早对魅力效应进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克伦·狄昂（Karen Dion）请一些成人想象了这样两幅画面：一幅是一群7岁的孩子正用脚踩踏狗的尾巴，另一幅是一群孩子正用冰冷的雪球击打其他孩子的脑袋。当描述中有一个漂亮的孩子做这些事时，大人们一般表示不相信，并认为这孩子那天的情绪一定不好，或认为他不过是不良环境的牺牲品。大人们不认为这个孩子以前这样做过，也不相信他今后还会这样做。而那些参与其事的不漂亮的孩子，大人们则用猜度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将他们看成是未来的少年犯。

漂亮者更有可能避开人们的怀疑，人们认为他们是不会入店行窃、考试作弊或以身试法的。他们更少可能被揭发（因为人们不怀疑他们），即使被告发了，也更少可能被起诉或处罚。执法人员、陪审员和法官不是依据当时的情境和当事人以前的行为做出裁决，而是先看一眼嫌疑人，然后想：她会做出这种事情吗？正像老师们拿着同样学生的操行记录、却会基于相貌做出有偏向的评价一样，

法官和陪审团也是这样行事的。这种魅力效应在女性嫌疑犯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貌偶尔也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但这仍然暴露出了我们对于漂亮的人所特有的期待。诈骗是骗取他人钱物的犯罪行为，典型的骗子常常能说会道——这种人常为男性，他会向你许诺可以立地发财的种种计划；至于女骗子，其可比于电影明星的美貌，肯定使得深为她所迷的人一般难以发觉她暗藏于其演技中的金钱目的。如若被控有罪，那么，这种貌美者的处境将比一般的人糟糕得多——他们本来是不该与这种事情有缘的，然而他们却滥用了美的权力，因而应该受到惩罚。

在生活的任何领域，美都是一种优势，然而，更重要的是实现这种优势和实现的程度。大多数研究表明，美貌者的魅力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宁小而勿大。大多数研究者将看起来有魅力的人与没有魅力的人进行了比较，人们大多偏向于选择那些靠近平均值的人，即那些既不算丑也不算美的人。研究认为，相貌上低于平均水平者的劣势正与美人所拥有的优势一样大，而事实证明，对丑陋者的惩罚却可能比对美貌者的奖赏要大得多。

包装热

但是，在性欲问题上，相貌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人们以为有魅力的人更受人欢迎，在社交场合十分自信，而且轻松自然。人们还以为他们性欲旺盛，反应敏

捷，经验丰富，并且花样翻新。男人们预期漂亮的女人有更强烈的性冲动，喜欢做爱的形式丰富多彩。人们设想，漂亮的人，不论男女，都要比一般的人有更多的约会、更经常地坠入爱河和更早地开始性生活。

诚如我们所看到的，漂亮的人在社交上也确实自信而且自在，纵使这只是一种自我完成的预期。即使才4岁和10来岁的孩子也希望他们所交的朋友长得漂亮。一旦到了约会年龄，漂亮男孩和漂亮女孩都比较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他们比其他同年龄段的人有更多的约会，更多调情的机会，也更容易引人注目。至于说到友谊，则是另一码事。漂亮女人尤其易与其他女人产生不和，她们不受别的女人的青睐，即使对方也是漂亮女人。

请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面，你正在与一个漂亮的陌生人在屋里谈话，突然又闯进来了一个更加漂亮的陌生人，这时，那个原本看上去漂亮的谈话者在你眼里可能就变得不漂亮了。心理学家称这种情况为“对比效应”。男人在这点上比女人似乎更易受到影响。看过一个绝代佳人的玉照，男人与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子约会的欲望就大大降低了。经常看色情画上的美艳胴体，会对某些男人的判断力造成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一项研究就是让一些男人看这些色情画上的美女人体，过后，这些男人觉得先前自己认为很有魅力的女人的身体也不再激动人心了，有些男人甚至声称不如先前那样爱自己的妻子了。虽然真的爱情不会因为瞥了一眼美女照片就产生动摇，但是男人们的反应显示，令人眩晕的美人形体可产生暂时性的强大力量。我们

总有不断的机会根据生活中的相貌来调整我们的意识，人人都见过成千上万的人的脸孔，但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哪怕数百人的裸体。假如人脑是一个小小的数据库，那么，各种媒体中那些着衣极少的半裸体像和裸体像会不成比例地占据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偏离可能的、甚至是一般人的观念。

这也许是因为什么妇女通常不喜欢她们的男性伙伴沉溺于色情画的一个原因，而这也从最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漂亮女人与女性朋友保持良好关系的难度很大。我们总是力图建造一个可以为我控制的社交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本人显得相当不错，或者至少比在其他环境中显得漂亮。没有一个女人希望自己身边还有更加光艳照人的女人来使得自己黯然失色。

在戛皮鱼的世界里，雄性鱼色彩鲜明，纹饰华丽，它们喜欢在其他斑纹没有它们漂亮的雄鱼身边游来游去。科学家给鱼做了一种装置，在这个装置里，一些雄鱼既可以游到它们喜欢去的任何地方，又被一块看不见的隔板与雌鱼隔开。而其他的雄鱼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并以为离开雌鱼游到别处去的雄鱼是被雌鱼拒绝了。随后，把观察到这一切的雄鱼放入水中，让它们自由游荡。结果，它们会长时间地游在那只“被拒绝了”的雄鱼旁边，显然是想从与那只雄鱼的对比中寻求优越感。它们希望产生一种“对比效应”。

美在性生活中的神秘之处是什么呢？研究结果显示，漂亮男女在性上比其他人更有经验，他们的性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漂亮男女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比一般人早，虽然对女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就有更多的性伙伴。科学家兰迪·托恩希尔（Randy Thornhill）和斯蒂文·冈格斯塔（Steven Gangestad）所做的研究表明，漂亮男人更可能让女人达到性高潮，并且与女人同时达到性高潮。这很有趣，是吗？是的。但是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必须放下这个话题了，但我们会在第6章讨论身体的匀称性及其种种好处时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的。所有这些都不过显示，漂亮的人真的更能玩乐，至少在床上是这样的。

这并非说只有漂亮的人才精通性技巧，但他们的机会确实要更多些，他们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惹得性伙伴们想入非非。下面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几个女人在短短1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突然变得十分妩媚而富有魅力，这不期然地证明了，性伙伴的话语能轻易地煽起对方更佳的表现。人们在与自己的性伙伴做爱时，心中想着的却是另外一个更加漂亮的陌生人，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之所以会如此，其真正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在研究漂亮者的一些典型特征时，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这些典型性同时存在于漂亮男女身上。美是一种优势，对男人如此，对女人也一样，虽然女人的优势更大些。有人告诉我们，女人的相貌是一种负担，而事实上，男人又何尝不是呢？但是两性之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些差别的程度还不小。其中一个就是，在以貌取人方面男人对女人的挑剔远比女人对男人的挑剔来得严重。男人更容易认为漂亮女人在性方面要更加

放得开，性欲旺盛，大胆自信，女人便不能如此肯定地对漂亮男人做出这样的判断。

男人们相信，一个性生活开放、性欲旺盛的女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别人的求爱。男人的这种坚信可能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因为这一信念可以让男人更加主动地去接近对方。男人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策略，比如，他们更容易把女人的友好表示当成性兴趣和女人试图勾引男人的表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风流韵事，也常常渴望自己的性对象更加多样化。如果他们相信自己捕捉到了一个女人对他们感兴趣的信号（不管真的是否如此），他们都更有可能去接近她，即使这只是创造了与女人建立性联系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只要他们相信，他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不放，并把它变得硕果累累。

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漂亮，人们就会对他们寄予厚望。诚如我们看到的，美在性和浪漫史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下面还要对此做更为详尽的考察与分析。在对美的种种特权做了如此细致的分类之后，再提出“美是否使人更幸福”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必要，但是我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



3 . 美的愉悦性

我怎么说你不美丽呢？假如你不美丽，
我就不会爱上你。

——约翰·济慈致范妮·布朗

如果有谁希望创造出一个对美有着强烈感受的事物，那么，他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性了……性赋予人一种无声而强劲的本能，这种本能控制着人的肉体 and 灵魂不断地趋向他人，促使人终其一生热切地择取和追逐一个伴侣，让人享有至乐，与狂怒竞逐争胜，与永恒忧郁的孤独同在。

——乔治·桑塔亚那

没头没脑地工作，就跟我从前的似的，当工作完成后，喊上几声“哟，哟”，然后说“拿掉这对黑镜片，让我们看看那些蓝眼睛吧”。这样的人生图景是多么地令人乏味啊！

——保罗·纽曼

在动物世界，绚丽的羽毛和巨大的身体装饰是在性成熟时才显露出来的。动物们将这些最鲜亮的色泽保留到这个时候才显露出来，只是为了便于它们追求异性。到了繁殖期，丑陋的幼虫一变而为漂亮的蝴蝶，原本灰色的小孔雀一夜之间绽放出梦幻般的光泽。百花怒放，蜂飞蝶舞，昆虫们竞相停驻在鲜艳的花朵上传授花粉：它们是植物的性媒介。整个大自然中，美是性繁殖开始的报信使者。

青春期来到，男孩女孩纷纷告别了豆芽菜般的形体，展露出新的形象，女孩有了曲线，男孩出现棱角。男孩们的声音变粗变重，皮肤渐成深色，肌肉块儿开始出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他们脸的颞部向前突出，眉宇渐渐隆起。女孩子则因为性激素分泌旺盛而皮肤更加白皙、光亮，双唇饱满而富有弹性。她们的身体新增了许多脂肪，它们积聚在臀部和胸部，用于保证将来的生育，经此一番变化，那原本纤纤秀秀的身体便开始具有了沙漏般的浑圆。

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人们是在青少年时期（即13至19岁之间）就完成婚配的，女人20岁时就已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样，13—19岁之间的青春期生活，一切都围绕着求偶和择偶而进行，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仍然是这样。人类学家苏珊·弗雷泽（Suzanne Frayser）考察了454种传统文化，发现女人当新娘的年龄大多是在12—15岁，而最大岁数的新郎的年龄是18岁。

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异常美丽。超级名模克里斯蒂·特林顿是在13岁的时候走红的，凯特·莫丝是在14岁。遥

想1937年，勒娜·特纳（Lanna Turner）成为“甜蜜女孩”时，才年仅15岁；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把18岁的霍莉·格赖特里（Holly Golightly）描写为一个长着一张“刚刚脱去童稚而又有点近乎成熟的女人的脸庞”的女人，意即处在天真无邪与阅世经生的转折点上。青春期的如此美好的一段时期，在这里，我们发现异性对我们的感召力是那么不可抗拒。心理学家玛丽·皮弗尔（Mary Pipher）说：“这一时期，人对身体的迷恋怎么描写也不过分”，青春期的男女是出了名的吹毛求疵者，他们极其注重自身的美，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人们对身体的注重并不随着青春的逝去而逝去，人终其一生都将被当做一种性爱对象而受到他人的评价。在影片《嘟嘟玩具》中，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终日双目凝注，沉迷于要将玩具Tootsie造成一个美貌女人的工作中，他要使她不仅让人信赖而且妩媚动人。他并未取得真正的成功，恰如剧中人比尔·默雷（Bill Murray）对他所说的：“可不要为达此目的不择手段啊。”霍夫曼认识到：“如果我在聚会上遇到像我这样的人，我决不会走到他跟前，也决不会邀请这个人一块儿出去。一想到这些，就使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知道，在我的一生中，已经错过了许多好女人——真正有趣的女人……”

在幻觉世界，人人都有一个理想的配偶。现实行为受制于机遇，但在想象中，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有所欲有。

《花花公子》和《花花女郎》是一种专门制造幻觉的杂志，它们的内容为各种各样健康、年轻、漂亮的男女所充斥。

而这些幻觉形象的欣赏者90%以上都是男性。描写浪漫史的小说同样到处通行，占据了大众读物类消费市场的40%，它们对永久爱情的叙述则主要是为了迎合女孩的口味。人们只要瞥一瞥读物的封面，就知道这些书籍也是培养视觉幻想的温床。5000多万册浪漫小说都是用费比欧（Fabio）装饰封面的，他是一位米兰的模特儿，身長6英尺3英寸，体重220磅，一头金色长发，一年四季日光浴晒得皮肤黝黑黝黑，胸膛宽阔，肌肉强健。费比欧1986年登台亮相，从那时起，便以赤胸裸背的形象横扫浪漫小说的封面。现在，他拥有一套销路不错的宣传挂历，其销售量足以与辛迪·克劳馥的同类产品相媲美，他向公众们大谈特谈他的爱情箴言不下900次。

在现实生活两性相吸的关系中，你不必是一位白马王子或一位“嫦娥仙子”，但是两人成为配偶的契机却是毫无根据地以外貌为转移的。社会心理学家伊莲娜·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和苏珊·斯波雷切（Susan Sprecher）断言，“在浪漫史的开头，可能没有比相貌更重要的东西了。”哈特菲尔德60年代开始研究美的魅力问题，在此之前，她组织了一次大学生舞会，舞会上她将一半人按照所谓的社會期望值（智力和人格）事先配好了对，而另一半则让他们随意选择自己的舞伴。很显然，这种配对方式忽略了某些事实，精心搭配的学生玩得不如那些自由组合的学生愉快。由此，她注意到了长相问题，发现那些与漂亮舞伴跳舞的人都喜气洋洋，会后还各自留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事过20年，心理学家在一个茶座舞会上又为100

个男同性恋者找来了相同数目的舞伴，结果不管其自身漂亮与否，所有这些男同性恋者都喜欢那些长得漂亮动人的舞伴，而且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他们。

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基于长相而生的偏爱随处可见。1990年，心理学家大卫·布斯（David Buss）与1万多人谈话，讨论他们对配偶的偏好问题。这些人来自37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他们的年龄从14岁到70岁都有。结果他发现，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对善良品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每个人在排列所有他认为最重要和最宜人的品质的时候，也都将肉体美和相貌美包括在了前10项之中。

人们一直指责西方文化过于注重肉体美，但是布斯的研究发现，有1/3以上的非西方国家的人比美国的大学生们还看重配偶的相貌。布斯及其同事史蒂文·冈哥斯塔德（Steven Gangestad）发现，一种文化中是否流行寄生虫病和是否受过超级模特的影响，是这种文化将外貌置于何种地位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寄生虫病盛行的文化中，人们可能更看重外形美，因为，秀亮润泽的头发、光洁的皮肤、健壮而没有赘肉的躯体，是身体健康的明确标志。

在动物界，科学家记录了易染病种群显示自己健康的各种信号。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和马雷恩·苏克（Marlene Zuk）研究了数以百计的鸣禽，结果发现颜色最艳丽的鸟都是来自寄生虫病最严重的种群。如果这有点儿反常的话，那么，请注意，根据进化理论，最易染病的物种应该是那些最爱炫耀的物种，因为它们迫于进化的压力，需要凭借漂亮的外形来张扬其天生的抗病

能力。鲜艳的色泽可以使它们与那些身上爬满寄生虫、颜色黯淡的鸟类区别开来。如果寄生虫缠身，孔雀便没有足够的力量撑开它那从新陈代谢的角度看来显得过于奢侈的尾屏，就如同一个缺少蛋白质或铁的人没有足够的营养来培育一头浓密润泽的长发。易生寄生虫的种群极力炫耀它们鲜艳的色彩，还有助于引导其成员找到最健康的配偶。数百种新热带地区的鸟类也是一样，在羽色的鲜艳、健康状况的好坏和是否爱炫耀之间保持着同样的关系。

大多数人不会仅仅满足于在所有可能成为自己配偶的人中间，自己选中的那位只有最润泽的头发和最光洁的皮肤，相反，男女双方的相貌一般也都是般配的。正如一份名为《性在美国》的综合述评所指出的，“在稠密拥挤的空间，你从不会随便看到什么人就马上坠入情网，更多情况下，你注意到的那个人在相貌上与你大体上是相当的。”换言之，那个被你爱上的人看上去与你差不多的。人长得越好，他的伴侣也可能越漂亮，这是一种激励机制，它促使人变得尽可能地美一些。

男女有别

节食的女人比男人多，所以，女人肠胃方面的小病小痛是男人的9倍。1996年，在“美国外科整形暨康复协会”接受美容手术的妇女人数，占全部手术整形人数的89%。妇女比男人更有可能染头发、买衣服、涂脂抹粉、佩戴珠宝和使用香水，并因为爱美而穿着夹脚的鞋子。

分析起来，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因为男人。男人比女人更加重视其既性感又浪漫的女伴的长相——至少他们本人是这样说，而且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或者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说和这样做的。在1939年，研究者调查了外貌在夫妻的生活中的地位，结果表明男人和女人的看法不一致。如将人对外貌重要性的评价比作一个从0到3的刻度表，那么在男人那里外貌占到1.5，而在女人那里只占到0.94。1989年，此一问题再度被提出，男女双方对相貌的重视程度都加强了，但男人和女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基本保持未变，男人认为相貌的重要性占2.1，女人认为只占1.67。

每一种文化中的情况都是如此，男人比女人更看重外貌。20世纪50年代，生物学家克雷兰德·福特（Clelland Ford）和费兰克·比奇（Frank Beach）发现，在近200种部落文化中，女人的外貌是不是美丽受到了比男性外貌更为“明显的关注”。大卫·布斯1990年的研究也发现，在他考察的37种文化中，有34种认为，男人比女人更看重对方的肉体美和容貌美。只有在印度、波兰和瑞典这3种文化中，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表现出什么差别。而在所有这些文化中，女人比男人更看重相貌的事则是从来不存在的。

价值80亿美元的色情业的主要消费者是男人而非女人。按照《美国淫秽色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光顾这类书店和电影院的人中，绝大多数是白种中产阶级的中年已婚男人。裸体男人画像也有市场，但消费者仍是同性恋男人，而不是女人。妇女杂志《女人万岁》（Viva）70年代

曾以对折中页的形式登载过男性的裸体照片，但后来又中止了。《花花女郎》杂志进行过一次个人调查，以确定女性对男性裸体像的喜爱程度，结果只有1/4的女人表示对男人的裸体像“十分爱看”。有谣传说，《花花女郎》杂志主要是为了迎合男性同性恋者才这么说的，但是杂志社对此做了否认。

色情艺术从未像它迷住了大多数男性那样使得大多数女性也着迷，这是因为色情艺术可以更直接地撩拨男性的欲望——对陌生性对象的欲望、对松快活泼的性生活的欲望和对视觉刺激的欲望。男人更爱幻想他们的性伙伴是陌生的，甚至在同一次幻想中，性的对象还不断变换角色。男人一生中，可能在想象中与成千上万的女人发生过关系，这种现象是男人所特有的。女性则只幻想与自己认识的人做爱。所有对性爱好进行的研究显示，与女人相比，男人觉得与陌生女子的性行为更具有吸引力，这一感觉不只存在于幻想中，而且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虽然男人花了大量时间去注意女人，但女人却懒得对男人也花上这么多的时间。事实上，妇女花时间看得最多的照片，是那些刊登在妇女杂志上的漂亮女人的照片，她们对仔细打量自己的竞争对手表现得饶有兴味。唐纳德·西蒙斯甚至认为，女人可能更喜欢以“女孩子的方式”注视色情艺术中的裸体女人，而不喜欢以“男孩子的方式”注视色情艺术中的裸体男人。西蒙斯把这一现象比喻为学习“他人娴熟地使用工具的艺术”。

撰写求友广告的人有意无意地力图将自己描写得符合

自己心目中爱人的求偶要求。最有可能提及征聘者本人相貌的，是那种“女觅男”的广告，其次是“男觅男”的广告，最后是“女觅女”的广告。事实上，每一个寻找男伴的人，不管是同性恋者还是女人，都会提到自己如何如何的漂亮；而每一个求觅女人的人，则往往只提及他的真诚、对友谊的重视和经济能力。正如交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说的，“男人只看照片的美丑，女人则读实际的内容。”

唐纳德·西蒙斯认为，男男联合与女女联合最能说明很多男人和女人的复杂心理，它们代表了男人和女人性生活的纯粹形式，没有异性伙伴间的那种用来取悦对方的委屈求全和调适改变。从同性恋得到的证据显示，男性对对方的漂亮感兴趣，不是男人将对方女性化并对之进行贬低，而是如同男女之间的恋爱那样，天然地对对方的美貌与青春感兴趣。女人，不管是异性爱的还是同性恋的，虽也都喜欢美，但从来不像男人那样把对方的美看得高于一切。

不论是对男人还是女人，相貌在非正式的短期交往中比在真诚、正式的长期交往中作用更大。由于大多数男人都比女人更强烈地希望碰到一种非正式的、临时性的男女关系，所以相貌在男人心目中的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男人对临时性伙伴美貌方面的要求似乎没有止境，但女人在这一方面的要求也逊色不远。那么在正式的恋爱关系中相貌的作用又如何呢？在从3（表示不可或缺）到0（表示不相干或不重要）的衡量体系中，美国男人对长期性伙伴相貌重要性的评分是2.1，女人是1.67。在37种文化中，

这种男女间的差别也同样存在着，男人是1.86，女人是1.47。这种差别看上去不是很大，但是却有着重要的统计学意义，不仅如此，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它还有着重要的心理学意义。男人和女人都不把配偶的漂亮看成中性的或无关紧要的品质，也不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但男人和女人都希望对方是美丽的，只是男人的希望比女人更甚。

青春之爱

外表的美就像体育运动技巧，在人年轻的时候达到顶峰。极端美貌的人并不多见，但如果真有的话，也几乎都是年龄不到35岁的人。我们常说时光是美貌的盗贼，而真实的情形只不过是时光从人最理想的时刻逝去了，人的身体在某一时期发展到了生理和创造力的顶峰，然后健康和生殖力便慢慢地由盛极走向了衰退。许多苦苦希望挽留住美的人都竭尽全力要将这短短几年的黄金岁月延长为永恒，让青春永驻。诚如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所写的：“衰颓之势……已经纠缠上了我，就像已绑在了狗尾上一样。”如果我们真能抓住风华正茂的青春，把它装进魔瓶里封存起来，那该多好啊！我们不仅希望在心灵、精神上永远年轻，而且也希望在肉体上永远年轻。

青春岁月犹如5月的花蕾遭到狂风的劲吹，对于男女双方都毫不容情，但是，只有女人才会不顾一切地希望将它留住，她们想以此将男人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因为男人的心总是向往那些更加年轻的女人。同性恋男子和异性恋

男子都认为，在可能的“性伙伴”照片中，年轻的比年老的更有吸引力；异性恋女子则趋向找一个比自己大的男人；只有女同性恋者在这一点上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首次婚姻中男女年龄的差别一般是2到3岁，新娘比新郎年轻。例如，1996年美国首婚新娘的平均年龄是24.8岁，新郎的平均年龄是27.1岁。

男人一进入而立之年，就开始崇拜更年轻的女子。如果男人再婚，他的再婚妻子一般比他小5岁。如果男人还有第三次婚姻，那他新婚的妻子则可能比他小8岁。男人喜欢年轻女人有诸多原因，有的出于对自己已逝青春的追恋，有的出于要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有的则出于支配和控制他人的需要。从婚姻统计资料来看，与比自己小的女人结婚可能只是反映了男人想与处于生殖高峰期的女人——或至少看上去如此的女人——做配偶的欲望。

大众传播媒体中，男人的婚配偏好可以不受现实的约束。好莱坞电影《我爱麻烦》中，53岁的尼克·罗尔特（Nick Nolte）与27岁的朱莉亚·罗伯兹（Julia Roberts）结为夫妇；《布尔沃斯》里61岁的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与29岁的霍尔·波莉（Halle Berry）配成了一对。按照好莱坞的观念，男人在任何年龄段都是可以信赖的、罗曼蒂克的主角，而且他们在出演比他们年轻的角色时，也同样能说服人（换言之，就是他人很少留意他们脸上或身上的衰老迹象）。尽管女人为了显得年轻付出了比男人多得多的代价，但是，好莱坞的鸳鸯谱却不是好糊弄的。女人若到了35岁，导演就只让她饰演比她本人老的角色，而

不会让她再演小年龄的角色，即使角色与她同龄，也未必可能。在影片《毕业生》中，说话结巴、天真无邪的20岁男孩本亚明·布拉道克（Benjamin Braddock）与比他年龄大而冷酷无情、喝马丁尼酒、勾引男人的女子罗宾逊小姐配成夫妻。饰演罗宾逊的安妮·班克洛夫特（Anne Bancroft）当时是36岁，而饰演布拉道克的达斯汀·霍夫曼已31岁。影片《廊桥遗梦》描写了一对中年男女的浪漫故事。当时为了让45岁的梅里尔·斯特丽普（Meryl Streep）饰演45岁的农场主妻子，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直到所有入选的年轻演员都试过镜之后，才确定了由她来演这个角色。相反，男主角的选择则一帆风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被选定时已经65岁，比他塑造的角色大13岁。一个男人的表演天赋和明星力量可以压倒对其年龄的计较，而女人却没有这样的优势。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和电影观众对浪漫剧女主角形象的要求近乎苛刻，其一就是她必须具有显而易见的青春活力。

在谈及成年男影星和小童星配对的现象时，《纽约时报》引用了大卫·布斯的话，他说：“在让男人体现女人渴望的品质上存在着一个限度，但是这个限度在关乎坐在轮椅上且需要全面医护的男人时却是可以不顾的。”也许说这话时他心中想到的是某种夫妻配对关系，如前花花公子封面女郎、模特儿安娜·尼柯尔·史密斯（Anna Nicole Smith）与89岁高龄、坐在轮椅上的得克萨斯百万富翁J·霍华德·马歇尔第二（J. Howard Marshall II）的婚姻。然而尽管如此，多数性伙伴之间的年龄差距不超过8岁。男

女两性都会跟着健康伙伴发出的信号走。女人并不喜欢衰老的男人，她们只选择这样的男人，即他们向她们表明，自己不仅有实力，而且还愿意将自己的一切交付给她和未来的孩子们。这种处世方式和实力与男人的年龄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对于男人，年龄上的偏爱则是明确无误的：性伙伴必须年轻。

攀龙成凤

对美的种种偏爱，如果不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其意义就显得不是很重要。我们可以用登广告的方式来征寻一个理想情人，用付钱的方法让自己沉浸于幻觉之中。然而问题的关键是，鉴于我们所有的选择，我们该做出怎样的决定？所有的事实都显示，男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选择受到容貌的严重影响。一个高级中学的校花结婚的可能性要比丑陋的女生大10倍。稍有姿色的女孩都希望“高攀上嫁”，即嫁一个受教育比自己多、收入比自己高的男人。一个高中男孩的长相，或任一年龄阶段男子的长相都不能预示这个男人将来是会结婚还是不会结婚，也不会预示他未来太太的收入是多还是少。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就是，不够漂亮的女人在生儿育女上处于劣势。她们或者不结婚，或者与一个实力较差的男子结婚，这都减少了她们生育孩子的机会，也降低了将孩子养大成人的机会。如果说学生时代的种种往事始终萦绕她们心头，则是因为她们没法完全摆脱那如回声般降落到她们身上的命运的判决。

那么高智商的女人在婚姻市场上又表现出什么样的优势呢？这方面的证据我们掌握的还不多。最近在威斯康星州进行的一次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某些情况，在经过对1万多名男女调查后人们发现，未结婚的妇女毫无疑问地要比结过婚的妇女更聪明一些。

与漂亮女人在一起能提高男人的身份。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男人与一个漂亮女人在一起的照片，一种情况是告诉人们照片上的女人是男人的女朋友，一种情况是告诉人们那女人与那男子素不相识。结果，第一种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个男人自信而且聪明，讨人喜欢。

诚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女人不找英俊的男人，而找那些与漂亮女人在一起的男人。”反过来，一个女人与一个漂亮男人在一起又会怎么样呢？不会怎么样，她决不会被看得更聪明或更可爱些。

在婚配世界里，女性的美价值连城，而作为人之所欲的观赏对象，这种美的高贵价值在形体市场上同样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几乎所有的职业中，男人的工作可以值到1美元的，女人只值到70美分，但在形体展示行业中，基于性别的差别对待却发生了逆转。1994年，《福布斯》杂志估计，世界上3位顶尖级的女模特儿的年薪依次是辛迪·克劳馥，年薪650万美元，克劳迪亚·希弗，年薪530万美元，克里斯蒂·特林顿，年薪480万美元。而男模特儿的年薪一般最多只能拿到小6位数。在顶尖级的模特儿中，男模特儿的薪水只有女模特儿的1/10，而在那些没有名气的、年薪不超过5万美元的模特儿中，女模特儿的年

薪是男模特儿的两倍。

相貌美是女人最具兑换力的资产，它可以用来换取社会地位，换取金钱，甚至换取爱情。但是这份资产倚赖于一具会逐渐衰老的躯体，所以这是一份既可利用又将失去的资产。容颜的美丽，如同扳机扣动时的一道闪光，像精致优雅的一瞬间平衡，又像迅速一顿的后挫力，其短暂性是令人无可奈何的。美能轻而易举的换来男性的青睐，这不仅显而易见，也有一个明白的解释，即男人希望与她发生性关系。有趣的是，美不仅使得男人喜欢，也易引起女人和儿童的兴趣（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美貌的男性给人的感觉也是一样的）。这是因为美可以转换成人之所欲的其他种种资产：财富、社会地位、众多的求爱者等等。

嫉妒与美

前面我们说到，女人在乎美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男人，另一个就是女人自己了。女人的轻轻一瞥与男人的凝神注视相比，同样明察秋毫，但却更加挑剔。从本质上说，女人和女人是相互竞争的，因为她们都想获得男性的青睐，就像男人之所以有攻击性和竞争心，是因为他们都想获得女性的认可。科普作家曼特里·德雷（Matt Ridley）认为，男人与女人相互塑造，同时又分别在各自的性别里铸成了一种身份等级制度。

“帕米拉·安德森·李（Pamela Anderson Lee）由男人铸就，正像迈克·泰森（Mike Tyson）由女人铸就一样。”一

代代的男人都想要妖娆的女人，一代代的女人也想要杰出的男人，选择的力量造就了我们追求的东西。

女士们为自己身上一点小小的瑕疵而折磨自己，她总禁不住要将自己的容貌与其他女人的容貌相比较。当别的女人比自己漂亮时，她们就嫉妒不已，并下意识地竭力要拉平二者之间的距离，以达到心理平衡（她在心里说，那女人肯定傻得可以或是胸无点墨；要么就是那女人是一个骚货，一个讨厌鬼）。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e Paglia）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谈话时，对女人的这种心理进行了嘲笑，她说，“我要是站在漂亮的人面前，是丝毫不会感到自己缺少什么的。我也不会说，噢，我永远不可能长得人家那么漂亮。持有这种态度是十分可笑的！……这就像男人们看运动会或足球比赛，他们就决不会说，噢，我永远也跑不了那么快，我永远也不可能长得那么强壮！当人们欣赏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大卫》雕像时，难道会因为自愧不如而自杀吗？绝对不会的。懂我的意思了吗？”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一方面，女人羡慕美丽的女人，模仿她们的做法，让她们在女人世界里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她们又嫉妒这些女人，这种嫉妒的情感败坏了由于爱慕而带来的喜悦。嫉妒与人所欲望的东西是相敌对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自我否定现象和嫉妒情绪呢？这是因为，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每一个女人都将发现自己被卷入到了与别的女人的竞美之中。女人总是被人与其他女人相比较，并且总是被发现存在着种种不足，而且不管

这种做法与女人的追求目标如何地不相干，与她的才能和天赋如何地不相称，或这种对比是如何地可笑。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发型和玛西亚·克拉克（Marcia Clark）裙子的长短，以及她们的言语、行动，都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奥克塞娜·巴乌尔（Oksana Baiul）夺得了女子花样滑冰金牌，但这并未使她觉得自己可以面对镜头而不会自惭形秽，于是她借助化妆，希望以此来美化自己。这一下让她的竞争对手、因为败给她而恼羞成怒的南希·克里甘（Nancy Kerrigan）心头大喜。人心中那种卑下渺小的念头在这里变得如此的昭然若揭，奥克塞娜虽然滑冰滑得比南希好很多，但她就是不如南希漂亮。

在许多需要展开形象竞争的领域，男人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不论是运动员、政府官员还是公司的执行总裁在世界先生的角逐中都不可能获胜。可当你去询问政客和运动员对于他们对手的看法时，你会感觉到一股浓厚的嫉妒之情，其强烈程度比一个女人评价另一女人相貌时显露出来的嫉妒丝毫不少。嫉妒通常集中在首要实力的竞争上，对于女人，相貌一生都在发挥着主要作用。如同亚里士多德·奥那西斯（Aristotle Onassis）说的：“如果世上没有女人，那么世上所有的金钱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对于女人，性成功与否仍须以她们长得如何来决定。

女人基于相貌的角逐是带有伤害性的。弗兰·勒伯维兹（Fran Lebowitz）曾经说，大多数女人对嫉妒的反应是“感到心中不安，感到内疚，感到自己伤害了别人的感情；而男人则把嫉妒看成是一种成功的标志，这一认识鞭策着

男人走向更大的成功”。消费文化使女人之间对美的竞逐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我们不会把自己与那些非我等能望其项背的人相类比，但是人生而平等的意识却告诉人们：没有做不到的事，没有赶不上的人。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嫉妒是民主的基础。”没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这一观念将许多人引向一种极度欲求的境地，以致这种欲求最终不可能得到满足。罗素还写道：“如果你渴望光荣，你可以嫉妒拿破仑；拿破仑再去嫉妒凯撒，凯撒又嫉妒亚历山大，至于亚历山大呢，我敢说，他嫉妒的是大力神赫拉克利斯（Hercules），可赫拉克利斯却是一个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的神祇。因此，你不能仅仅以成功来摆脱嫉妒，因为，在历史上或传说中，总有一个人比你更为成功。”

今天，长相平平的妇女总是拿自己的肉身凡躯与那些经过上帝之手精挑细选出来的人间尤物相比。尽管那些模特儿的美是超现实的，但是媒体却硬要把她们说成是人人可以达到的，只要通过辛苦的锻炼和努力，运用适当的化妆品就行。曾几何时，我们只嫉妒我们的邻人，因为她们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世界。与邻里相比的结果远不及今天这么难受，因为与邻居相比获胜是一回事，而与世界顶尖级美人相比却是另一回事。

美的生物学特征

为什么男女两性都如此在意情人的长相、而男人们又更甚呢？答案是确定的，这就是性。性的生物学目的是繁殖，而不是娱乐、友谊或心与心的交流。差不多所有的历史阶段，具有生育能力的男女之间的每一次性交都有怀孕的可能。性持久地改变着这个世界，为世界生育出一个个带有其父母遗传特征的新人。

我们的祖先是用身体来暗示他们是否适合做将来的性伙伴的。这种生物意义上的信号系统不同于男女求爱和调情时的手势和姿态——它们主要用来表示我们对由肉体之美激起的种种活动感到兴趣。生物信号容易看懂，而心理信号则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能力探察出什么样的身体是健康的、多产的，那我们早就进入到物种生存的死胡同了。正如查尔斯·达尔文就浪漫和魅力所说的那样：“它们真正的目的的确比人类的其他任何目的都重要。”这里，他指的是下一代的素质构成，意即物种的生存，或者如现代进化论者所说的，基因的生存。

人类像其他所有的动植物一样，都寄寓在一个外形之中，这个外形既具功能性，也具审美性。优美的兰花长得酷似母黄蜂的外形，引得雄蜂眼花缭乱，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地就来与它交尾。白色花卉常有浓香扑鼻（想想用茉莉花和栀子花做成的香水！），且在入夜时香气最盛。白色花卉这种色浅香浓的特点产生自它们需要只在夜晚活动的

昆虫来传授花粉。每一个物种都按照自己预期的光顾者来展现自己。19世纪，一些神学家相信，花卉是来自天神的礼物，它被创造得如此美好为的是供人观赏。当然今天我们会认为这个说法荒诞不经。在加勒比海域，赤道鱼身上的带状条纹为的是彼此吸引，而不是为了向潜入到它们水域的人类卖弄。

人类性能力的展示是专门用来煽起人的欲望的，这之中蕴藏着使人勇气顿消的力量。人体美的构形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了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即如何形象地昭示自己作为潜在配偶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通过这一视觉形象来确定其他人作为配偶的价值和意义。人们会觉得这一观点荒诞不经，即人们迷恋肉体的美，归根结蒂是为了适应人类进化生存的需要，需要凭此对他人做出能否生育的评价；但是，人们之所以这样觉得，是因为20世纪下半叶人类对自己本质进行认识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即性与人类再生产的目的已经部分地分离了。

在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人们又继之以对不孕症进行治疗。正如作家乔伊斯·威纳（Joyce Winer）所言：“如果60年代是只有性而无孩子的年代，那么90年代则是只要孩子而无性的年代。”性常常是欢乐的源泉，而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现在婴儿可以在医生的手术台上诞生，也可以在家里与一个女人结合而怀上。即使性生活一直是而且只能是生育孩子的方法，我们仍不会、也不需要与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一什么人做爱。但是，我们的心灵是从小部落时代而非全球化时代演化而来的。在小部落时代，生

育并不实行计划和控制，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而不是70岁，婴儿和儿童们夭亡的比例也很高，所以，为了适应生存，人身上的那套生物系统就自动地对每个人实行着检测，以寻求到性能力较高的人做为配偶。到今天，留存下来的只有我们对一个陌生人所抱的觊觎心理和对脸蛋与胴体所怀有的性兴趣——对此，我们是希望着自己能有一个更为公允的评价的。

每一个个体都差异很大，但大家又都具有同一的形式。在我们的皮肤方面，有毛孔是大还是小、是长毛还是如婴儿般地光滑、是生满斑点还是没有斑点、是松弛还是紧绷等方面的差异。我们的头发，有的长得粗糙，有的生得精细；有的浓浓密密，有的稀稀疏疏。我们在身高、脂肪的分布、体形的对称与否以及五官的大小和形状方面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则更为明显，他们存在着骨骼大小、体形结构、面部轮廓以及性器官形态等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是自然选择在上面起作用的因素。我们不会基于一个人嘴唇的线条是否优美或腰身是否苗条来与之交朋友，但我们却可能因为这些生理上的细节而被某个人所吸引。当我们瞄上某个人并把她看成可能的性伙伴时，我们甚至会注意到这人身体表面一些最微妙的差别，并对这些差别投以极大的兴趣。

生殖女神

人都认为男性的注视是寻找目标的表现。精神病医生

罗伯特·斯托勒（Robert Stoller）把“多数文化中的多数男性”描绘为“与色情拜物教者是一丘之貉”。男人们在一起谈论的就是他们要做女人的“差役”，以及如何喜欢女人的丰乳肥臀，甚至还细致入微地探讨他们所喜欢的身体部位。进化论心理学家认为，男人们这样做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行为，他们受到来自女人的、标志着女人已经成熟、健康并且尚未怀孕的信号的刺激。

为什么男人总是对女人是否生过孩子这一点很在意呢？唐纳德·西蒙斯相信有两个理由：第一，是男人有独揽女人生育大权的欲望，他希望自己是她所有孩子的父亲；第二，是女人第一次生育与其后的生育能力的关系。人类历史有99%的时间是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女人通常是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就连续不断地怀孕、分娩、哺育孩子。据唐纳德·西蒙斯和马基·普罗费特（Margie Profet）计算，女人这种不断怀孕、哺乳的状况意味着她们有99%的时间不能受孕。下面就是他们所做的计算。假定一个女人有一个正常的生命过程，从16岁到40岁都能够生育孩子，那么，她要花6年的时间进行妊娠，18年的时间给孩子哺乳——因为母乳哺育必须基于排卵之上，这将留给她仅仅26个排卵周期，而每个周期只有3天是可以受孕的。这意味着在8030天内，她只有78天有可能怀上孩子，也就是说，只有不足1%的时间可能受孕。当然，这一计算方法可能有点夸张，因为对于年轻妇女来说，哺乳可能只抑制数个月不能排卵，而不会是数年。然而，正如西蒙斯所指出的，直到本世纪实行计划生育之前，保证

一个女人受孕的最好办法还是趁她年轻而且尚未生育时就抓住她。可能这也是男人之所以更喜欢达到生育高峰期之前的女人（20岁以下）的缘故，就好像是在开始工作的前一年就签订了合同。

雌性动物直到老死都有生育能力，而人类的女性却不能，因此年龄就是一个女性生育能力的重要信号。女人生育的高峰是20到24岁之间，这以后至30岁，是次高峰时期。到即将进入40岁时，女人的生育能力已降低了31%，从此以后便一直下降，通常一过50，女人不再来月经，也就不再生育了。男人却大不一样，一个男人直到94岁还可能使女人怀孕。没有可见的信号显示男人的精子何时最优，至少是现在还无人发现。不像女人，男人生育能力的高低在身体上并无明显的表现，他们之所以爱色迷迷地盯着十几到二十几岁的女人看，其根据也就在这里。

对于一个想在40而不是16岁才要第一个孩子的妇女来说，停经是一个残酷的生理期限；而对于一个不想怀孕、只想仍然像她二三十岁那样对男人有吸引力的女人来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烦恼。女人不愿向男人说出自己的年龄，甚至也不愿意向其他持双重年龄标准的女人说出年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将此称作女人的一种“小小的苦刑”，对这种考验，女人是避之惟恐不及的。女人们觉得她在尘世间生存过的那些年是一种屈辱而不是骄傲。模特儿劳伦·赫顿（Lauren Hutton）在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时曾这样说道：“女人一旦没有了卵子，就即

刻没有了事业。”

但是，如果大象和乌龟可持续60年或更长时间产生卵子的话，那么，人类应该也是可能的。生物突变可能改变卵子的死亡率，但是这在过去还不曾发生过。生理学家杰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相信，停止排卵是生物学上的策略，女人的生育活动是按照“少即是多”的原则进行的。人类的婴幼儿时期较长，孩子需要纯粹地依赖大人，随后虽然孩子不是全然的无能，但仍需借助大人的力量才能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人多生孩子要比不生孩子担更多的风险。如果停止生育，将有助于保证她现在所做的投资——即她已经生下的孩子们有一个母亲，这个母亲仍然活着，可以给现有的孩子们照料，她没有因为忙于要生新的孩子而将有限的精力铺得太广，或者因为生育而不幸死亡。

现在，由于生育与生殖医学的发展，女人在60岁时生育孩子也有了可能。如果身体已停止了排卵，她们可以移植其他女人的卵子；如果她们体内的激素已不能维持生育孩子的需要，可通过人工的方法使这种状况得到改变。一位遗传学家最近告诉我说，她相信，不久的将来，年轻妇女可以取出自己年青健康的卵子，以备将来想要孩子的时候用，最多不出10年，这样的情景将会十分普遍。

所有这些变化是否会改变人们对美的看法、使得女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年龄和生育特征不再有用了呢？在一个纯粹由思想而不是本能支配的世界中，回答可能是“是的”；但是我们是进化的产物，我们不可能像改变趣味或更新信

息那样轻易地就改变我们的本能。对美的迷狂和力图为人再现青春的美容业的兴盛都向我们显示：我们依然受着本能的支配。直接地改变人类的天性是很困难的，但是若以欺骗的方式改变起来则可能容易得多。随着形体锻炼热和整容术的兴起、以及美容技术的提高，一个30或40多岁、甚至是50岁的女人的容貌，可以变得像我们先辈十几、二十几岁时那样娇艳。人们可能会说，这种模拟效果就是10亿美元之巨的美容业的追求目标，而且这个产业做得非常成功。1996年，全美身价最高的女演员是黛米·摩尔（Demi Moore），她在影片《脱衣舞娘》中饰演一个脱衣舞明星。黛米·摩尔已生育了3个孩子，但是她的身体看起来还是像没有生过孩子的少女一样。

一个男人可能无意让女人怀孕，他采取了极其小心谨慎的措施去避免，但是他体内的求偶本能并没有失去作用，所以他还是莫名其妙地陷入到了对那些表现出明显的生育能力的女人的依恋之中。而女人也一样，虽然一点儿也不想怀孕，她也还是模仿着男人所钟爱的那个年龄段女人的种种特征。

重要的是实力

动物用一定的性别生理因素诱导异性，达尔文把这种明显的性优势称作“性选择”。但是，生理上做为装饰物存在的一切——如鲜亮的色彩和动听的歌声——并不仅仅是为了诱惑异性，还是为了威吓竞争对手，并在同性内赢

得竞争。请想想那些漂亮、巨大的鹿角。当进化论者谈及男性之美时，他们通常意味着它们是男人的武器而非色相，是男人用以战斗的鹿角而不是秀而不惠的鲜艳色泽。简而言之，在人们的观念中，男性之美之所以能够演变至今，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对来自他人的评判做出回应。

男性在建立他们在男人中的支配地位时，相貌有着重要的意义。男人们之间很快就可以形成等级秩序，即使他们还是孩子。在男孩子的露宿营区，等级秩序可于一小时内形成于小木屋内。处于最高地位的不一定是最大的，但往往是最英俊和最强壮的，这种男孩已显露出成人般的体格。等级最高的男孩起发动和组织作用，等级低的男孩遵从和质询。他们服从那个居统治地位的男孩，后者则以对他们实行保护和领导作为回报。

在以后的生活中，相貌英俊的男子依然是同伴中的领导者。在一份西点军校的研究资料中，社会学家阿兰·马祖尔（Allan Mazur）发现，容貌上的优势对新老士兵的军衔影响很大，看上去处于支配地位的是那些长相英俊的男人。他们的下巴向前突出而非往后缩进，眉宇深浓高耸，双眼深深凹陷，两只耳朵则紧紧贴着两颊。他们的脸形或宽展开阔，或成棱成角。而模样柔顺的男人则表现得脸形狭长或者浑圆，双耳向两边支楞着，下巴向里缩进去。凭相貌就可以猜出一个人在军校里的军衔和成就，以及他们将来在这一行业内的发展。然而，那些看似有支配能力却没能在军校取得重要成就的人，他们的一生将会过得比谁都糟。他们将因为自己是披着狼皮的羊而遭受惩罚——当

他们无法显示出与外貌相符的领导才能时，他们的惩罚就到了，就像是谎称自己的能力非凡或者潜力无限，或者像向人提交了一份虚假的简历，却被人揭穿了一样。

然而，为了赢得女人的芳心（当然还有身体），有实力的男人除了需要彼此竞争之外，还需要直接向女人发出感召力。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向女人展示他们的身份和实力。奥维德（Ovid）在2000年前就写道：“姑娘们崇尚诗歌，但却追逐昂贵的礼物，大字不识的白痴也会得到她们的青睐，只要他腰缠万贯。”大卫·布斯的研究发现，在37种文化中，有36种文化中的妇女比男人更加看重异性的经济前途（只在西班牙这种表现不明显），而且，有34种文化中的妇女很看重男人在获取财富上的资质，就像经纪人唐·金（Don King）评论迈克·泰森时所说的：“任何一个拥有4200万资产的男人看上去都像克拉克·盖博。”

男人，其工作越体面，收入越高而且越稳定，就比那些收入低而工作又不体面的男人更容易结婚。而对于已婚者，如果男人收入相对下降（与过去和同事比），则分居和离婚的比例就会增高。人类学家苏珊·弗雷泽（Suzanne Frayser）考察了48种传统文化中男女分居和离婚的现象，她得出的观察结果是，人们对关系破裂说得最多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合不来”；另一个则分两种情况，一为对女人而言，男人已经无法尽到养家糊口的责任；另一为对男人而言，他们之所以抛弃妻子，是因为对方不能生育。

两性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来自于两性在生物学上的差异。男人在生育中充当的角色，可以同与女人数分钟的性

生活相始终。而女人在这之后，就得承担起怀孕、生育甚至终生为孩子承担责任的风险。一个男人，只要女人愿意，就能使无数的女人怀孕，因为他体内的精液会源源不断地补充上来。而一个女人一般一次只能怀一个孩子，也即是只能允许一个男人使她怀孕。不管她有多少情人，她的身体限制了她的生育能力。男人可以一无子嗣，也可以子孙成群。而女人一般一生生子不会超过11个，尽管她可能有上千个情人。对女人来说，配偶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而把与男人长相厮守（如果有了孩子，他会是个好父亲吗？）和暂时快乐的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总是不会吃亏的。

男人和女人在生育子女上承担的任务是不均衡的，而且，评价一个男人有没有能力、愿不愿意把财力投资给未来的孩子，这个问题也很复杂。这就把男女双方引导到不同的择偶策略上，这种不同从他们第一次短暂的会面时就开始了。男人几乎一看到女人的照片就立刻做出反应，而且许多男人对女人的看法惊人地相似。男性更注意女人纯粹外表上的内容，因为这里面能够显示出很多的信息：女人是否健康，是否有生育能力，是否能完成妊娠，是否能接纳这个男人等等。

女人对男人的评价要来得慢一些，而且，如果别的女人有不同的看法，她还可以改变自己的看法。她可以一个人偷偷地长久注视她认为英俊的男人的照片，注视的时间越长，越发觉对方不像自己原先以为的那么漂亮。如果她需要对男人进行再度审视，或将自己的看法与其他女人的

比较一下，或经过谨慎的思考而又改变了主意，这不是因为她优柔寡断，而是出于她的聪明与睿智。择偶不只是生育的问题——多数男人在大部分年龄段或整个一生中都有生育力——而且还关乎找到一个真正的帮手、共同完成抚养后代的任务的问题。

几千年来，男人们都是通过使自己的体魄强健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猎手来获得资本的，所以可以想见，一个男人的相貌对于女人并不是十分重要，虽然它也仍在考虑之列。几千年来，女人们依靠男人的能力获得肉蛋白，它们与女人采集来的蔬菜和果实等一起，构成了人类的膳食。男人保护妇女免遭野兽和其他男人的袭击，让女人可以安全地抚育孩子。古代的武器，如石器和棍棒等等，只能徒手使用，这使得男人本来比女人强大的上肢力量发展成一种更大的优势。男人比女人个儿大，肌肉强健，脂肪少，更有强壮有力的上身。男人的肺活量也比女人大，血液中的血红蛋白也更多。

现代男性可以手无缚鸡之力，但人们在描述一个男人的漂亮时都会强调其身量的因素。《牛津大词典》对英俊的解释是“模样或姿态优美，通常与人的身材高大或雄伟有关”。模特儿霍伊特·瑞恰兹（Hoyt Richards）称他的男同伴为“公马”（hunkychunks），“hunk”在字典中被解释为“大块儿”的意思，再就是指体魄发达、有性吸引力的男子。

记者大卫·雷尼克（David Remnick）在采访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时，注意到“不管球员们在哪家宾馆居

住，宾馆的大厅都建得像模特儿公司的接待室，女人们在那儿正大光明地向他们演示自己。”球员丹尼斯·罗德曼（Dennis Rodman）说，“对于NBA的人，生活的一半内容是性，另一半则是金钱。”雷尼克对此评价说：“罗德曼的话只是稍有些夸张而已。”职业体育明星就像摇滚乐歌手，吸引着那些主动寻求与之交欢的女人，当然他们不是通过色情、温柔和激情的歌声，而是通过身体和技能，通过取得对其他男性的支配权，以及通过像音乐家一样的、能够赚取大把钞票的能力来赢得女性的心灵的。篮球明星还另有优势，他们一个个都长得人高马大，令女人们觉得这样的男人真是魅力无穷。

尽管有人宣称男性的美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是男人似乎也有一个颇受偏爱的年龄段。唐纳德·西蒙斯推测，男性的身体美在25—30岁之间达到顶峰，其固有的而非由训练得来的力量直到这期间一直稳步地增长。如男模特儿和脱衣舞明星大多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按照中古时期对生命阶段的分法——如在西维尔的伊莎多尔（Isidore）的作品中就这样认为——男人到28岁的时候，才获得最强的体力、最高的智慧、最佳的品德和最动人的身躯。1500年，阿尔布勒奇·丢勒28岁时画了一张自画像，这是他最负盛名的一张画，画中他把自己描绘成基督的形象。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经典画派的主要画家，显然是画了一张他自认为达到生理最高峰、最完美时期的自画像。

然而，一个男人的形体美可能受到来自另一个男人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说：“权

力是一剂春药。”基辛格长得身材矮小、粗壮，还戴着一副眼镜，而他的夫人则身材颀长，青春而魅力十足，两人走在一起，正应了那句古老的格言“郎才女貌”。这对男人们也是个提醒：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权力，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女人。即使在动物界，雌性动物也可能被雄性动物丰厚的馈赠和可观的势力范围所诱惑。除非雄虫有礼物相赠——譬如至少16平方毫米的昆虫蛋白——否则，雌性蝎虫甚至连看也不会看一眼雄虫。如果雌虫接受了礼物，它们就会交尾，交尾的时间与吃食物的时间等长。所以，礼物越大，交尾的时间就越长。礼物的功用是双重的，一可以导致交尾，二是雌虫吃掉多余的蛋白质将产生更加优秀的卵子。当然，即使在这里，相貌也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雄虫礼物的大小与它捕食的能力有关，因而也就必然地涉及到它的体魄和力量。

人类学家约翰·马歇尔·汤逊德（John Marshall Townsend）让一些人看了一些男人和女人的照片，这些男女的相貌从十分漂亮的到不怎么漂亮的都有。这些人的职业和收入被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有做服务员的、做教师的和做医生的。测试的问题是，这些被测试的人可能会与照片上的哪些人喝咖啡、约会，与之发生性关系或与之结婚。结果是预料之中的，即女人们首先喜欢的是一个长得很漂亮又有钱的男人；仅次于他的，是那些其貌不扬、或甚至有些丑的男医生，女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与那些长得很漂亮但赚钱不如他们的男教师相等。可见，社会地位能弥补男人相貌的不足。男人对女人的评价则简单得多：不美

的女人男人是不会喜欢的，不管她们的社会地位如何高。

汤逊德与同事盖里·列维（Gary Levy）把男人社会地位上的差距极度拉大之后再行测试，女人的偏爱倾向便表现得更加明显。汤逊德和列维给几个男人拍了一些照片，他们有的穿一身汉堡包服务员制服、戴棒球运动员帽子，有的则穿衬衫、打领带、戴劳力士手表、着颜色鲜亮的法兰绒上装。被测试的妇女分为两组，一组看到的是穿着汉堡包服务员制服、戴棒球帽的汤姆、哈里和穿着套装、戴着劳力士手表的吉姆、丹，而另一组则看到的是穿着套装和戴劳力士手表的汤姆、哈里和穿汉堡包服务员制服的吉姆、丹。结果，女人们都愿意与穿西装、戴名表的四个人中的不论哪个约会、发生性关系和结婚，而不愿与穿着服务员制服、戴棒球帽的任何人做这些事。这真是一次妙趣横生的测试，“人靠衣装马靠鞍”，外表的穿着标志着金钱和地位，并使男人成其为男人。

女人不是生活在幻梦之中的，而是生活在家庭里、在文化中。如果女人嫁了个收入比她低的男人，别人会说她这是“屈尊下嫁”，而不管这个男人其他方面的财产如何。一个500强企业的女总裁可以被她的私人教练或伺候她午餐的男侍吸引，但是如何将他介绍到自己的世界中去，如何处理她与他的感情，对她来说却是个难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男人发现比自己挣钱多的女性并不漂亮，换句话说，他们如果相好就必定感到一种来自社会的压力，使他们的处境变得很尴尬。男人因其收入和职业地位而受到评价，女人则是因为容貌的美丑而得到评估。女权主义

作家莱蒂·柯婷·波哥勒宾 (Letty Cottin Pogrebin) 就曾经写道：“社会深层鲜为人知的秘密是阶级差别，而阶级再加上性，则是你所能设想的最难以捉摸的东西了。”

归类危机

如果女人与男人一样，都能得到同等的实力，那么两性在择偶的喜好和选择的优先性上是否就会相像了呢？如果世界经济与政治力量分布得更为均衡一点，或许我们会看到性选择上的偏爱能得到彻底改变。然而，诚如“汉弗莱公共事务研究所”所发现的，现在世界的情况依然是“女性占世界人口的1/2，她们工作的时间却占全世界工作时间的2/3，而所得到的收入仅占全世界收入的1/10。她们在世界财富中所占有的比例还不到1%”。一个平等的大同世界只不过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正如弗兰·勒波维茨 (Fran Lebowitz) 用俏皮话所说的：“男人搂抱着这个世界的臀尖。”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证据显示，高收入或有相对经济保障的妇女都希望自己能嫁一个更有财力的男人。杰奎琳·博维耶·肯尼迪 (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 再婚时嫁给了亿万富翁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黛安娜 (Diana) 王妃与查尔斯 (Charles) 王储婚变之后，是与多迪·阿尔-费耶德 (Dodi al-Fayed) 再续罗曼史，后者是亿万富翁哈罗兹 (Harrods) 的后裔。希望赚大钱的医学院女生说，她们想嫁的男人应该收入比自己高或者至少与自己相当，没

有一个人表示愿与一个收入比自己低的男人结合。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希望将来挣大钱的女性对她们未来配偶的期望值很高，她们希望未来的丈夫能赚大钱，而期待值较低的女性则没有这样重的倚赖心理。

女性的财运对婚恋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明显。同一次研究还发现，在医学院女生都希望嫁一个收入比自己高或与自己相当的男性的同时，医学院的男生有60%的人表示，他们更愿意自己的配偶比自己挣的钱少，40%的人希望配偶的职业地位比自己低。究竟谁的要求更低呢？

即使最卓越的男人也会告诫女人说，不要与男人在同一块地盘上竞逐。我们姑且将这称作性别歧视吧。18世纪的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这样写道：“辛勤的学习或痛苦的沉思，即使女性在这些方面成就巨大，也破坏了于女性最适宜的德行……这将使女性成为大家冷眼称羡的对象，可同时也削弱了女性的妩媚，而只有妩媚，才是一个女人对异性产生支配力量的素质。”

男人都爱囤聚力量，他们不仅要与其他男人作殊死搏斗，而且要与女人作激烈争夺。人类学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说：当女人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后，离婚率便急遽上升。不管是在原始部落，还是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不管是在穷国还是在富国，情况都是一样。对此有几种解释，其中一种是女人有了较强的挣钱能力之后，离婚就不会对她形成太大的威胁，这样她就可以大胆为之了。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采用“获利交

易”原则来解释女性的这种婚变现象。如果日本的电视更好，而美国的飞机更优，那两国的交易将会使双方受惠。如果日本也开始制造自己的高质量飞机，那么相应地来自与美国交易的获利就会下降。女人即使有专职工作，也要负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并且生儿育女。一个既狩猎又采集果实的女子可能觉得不太需要一个仅仅会狩猎的男人做帮手，因为她还得为他采集果实。

有关女性与工作的最新资料显示，金钱给女人带来了独立性，但这并不必然使她们觉得婚姻并不美妙。像社会学家米甘·斯维尼（Megan Sweeney）所说的，这只是“改变了婚姻交易的实质”。仅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内，婚姻状况就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60—70年代，地位较高和收入较高的妇女结婚和再婚的可能比无业和低薪低职的妇女要小，80年代的情况正好翻了个个儿。事实上，《纽约客》杂志在1998年6月15日的封面故事中写道，如果一个华尔街的百万富翁离开了妻子再娶，那么这个新的“战利品”很可能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女同辈。女性的收入可能最终会成为夫妻关系中地位的标志。这并不意味着，男人将不想再多赚钱，或女人将不再寻找那些比自己赚钱多的男性。

哈佛英语教授玛乔里·加勃（Marjorie Garber）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归类危机”之中，反映社会变化的文化、社会和审美上的一系列差别特征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妇女们如今夸耀的是她们那紧绷绷的、结实有力的身体，而不再是那种柔和浑圆的体形。大概就在10年前，高大

而结实的女性身体被认为是畸形的。那时，不管是高大丰满，还是小巧优雅，女性的体格看起来总是柔软的，散发着一股既性感又娇弱的迷人力量。今天，女人眼里最漂亮的女人和男人一般高（5英尺10英寸），和男人一样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最大的女性化妆品公司MAC，曾雇佣了两个绝无仅有的形象代言人，他们是男扮女装的男同性恋者、拉索舞后鲁保尔（RuPaul）和女扮男装的女同性恋者、歌唱家K．D．朗（K．D．Lang）。口红是女性专用的化妆品，为的是向男人争宠的，现在则由扮成女装的男人和扮成男装的女人来推销。

现在，男性每年花在整容、化妆品、健康设备、头发护理（包括染发、锡油定型、头皮移植等）上面的费用就达到了95亿美元。有人说，男人是意欲借此使自己显得年轻，从而保持自己在工作中的竞争力。但是他们的另一个动机恐怕也是为了保持在性选择上的竞争力。当女人花更多的时间到外面的世界中与自己男人的竞争对手混在一起的时候，男人肯定觉得有必要向自己的武库中增加些武器，这就是去增强自己肉体的魅力。

毋庸置疑，两性关系上存在着混乱，也存在着严重的不满。离婚率高，孩子跟单亲过的比例也高，不生育孩子的夫妻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数千年来一直起作用的人的各种本能很难被连根拔除，男人下意识里渴望看见和占有年轻女性的美，而女人又被身材高大、胸膛宽阔、脸部棱角如斧凿般分明而且腰缠万贯的男人所吸引。这种现象不会很快成为过去。需要

申明的是，我们需要更加明了我们所做的选择和推动我们行动的力量究竟是来自哪里，以便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去工作，而不只为遗传基因的利益去工作。基因并不关心人类是否幸福，而我们却在乎，最可能生出我们基因特质的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乐意成天与之呆在一起的人。

金钱

美的优势不仅表现在卧室里，而且也表现在谈判桌上。视觉主义虽然在表现程度上不及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那么明显，但它在工作场所也显示出歧视的意向，并且还让人不知不觉。没人认为自己是因为个头矮小而比别人薪水低，可漂亮男人比丑陋男人被录用的可能性更大，薪水也更高，晋升得也更快。

对女人来说，相貌漂亮与否与工作成功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截了当。漂亮女人，像漂亮男人一样，更有可能被录用，拿到的薪水也更高。但是情况并非总是这样。有几次研究显示，漂亮女人事实上没有相貌平平的女人过得好。女人的漂亮有时会“产生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一项研究表明，漂亮女人在法律工作中与其他人结成伙伴的可能性要小。另一项研究发现，漂亮女人被聘用到经理位置上的可能性很小。对此，有人做出解释说，漂亮男女都容易被人弄成“性别特型”：即漂亮男人都是有男子气概的，而漂亮女人都是温柔娇弱的（指容貌和身体，不一定

指衣着和风度)。这种看法对男人很有利，他被假定为强大有力、聪明睿智、独立性强的人；但对于女人，这却是有害的。女人的容貌让人毫无根据地认为，女人是柔弱的，过于性感，缺少坚强和果敢精神。女人的相貌仅是一种视觉审美的东西，它并不同时昭示出那种为管理层人员所需要的品质。

1979年，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小组做了一次著名的调查研究，研究人员马德琳·海尔曼(Madeline Heilman)和洛伊丝·萨鲁华塔里(Lois Saruwatari)发现，姣好的容貌有助于妇女找到办公室职员的工作，而且薪水还不低，但是却妨碍她们进入更高类型的职业。后来的研究还发现，凡是需要待人接物技巧的工作，如果由美丽的女性去做定会得到很高的报酬；但是如果是需要顶着压力去做的工作、需要具备迅速的判断能力的工作或者激励他人的工作，漂亮的女人去做不仅得不到高报酬，而且甚至可能陷于极端不利的处境。海尔曼和萨鲁华塔里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个发现令人遗憾地暗示出，如果女人要在职业生涯中成功地进入到权力阶层，那她就要尽可能地做得不惹人注意，尽可能地显示出男子气概来。但是，女人在组织机构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先决条件不应该是放弃自己的女性身份。”

同样，在70年代，约翰·莫洛伊(John Molloy)出版了他最畅销的书《为成功而打扮》。书中断言，生意上的成功与装束上的性吸引力几乎是不相容的。该书的女士版连续5个月都位于畅销书之列。然而，1987年，《小姐》

(Mademoiselle) 杂志报道说，此书的影响已经式微。由于妇女要求收回权力，即要求在工作上做个真正的女人，而不是成为男人的模仿者，使得两性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漂亮女人最易受到男同事的骚扰，这些男人恐怕没有想到，对女人进行性侵犯在女人来说是最不愿意的。譬如一个试验问，当一个人知道有同事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时，她（他）会做何感想呢？64%的女性回答说，她们“感到受了侮辱”；67%的男性则回答说，“那是抬举我。”下一章我们将看到，男人比女人更有可能把友好的表示理解为性诱惑，而当这种友好表示来自一个漂亮的女人时，尤其如此。

作为一个女人，其经济状况永远不会太好。具有较高事业追求的漂亮女性会因其相貌而陷入不利处境，因为她们被视为“太女人气”，不能在权力位置上做出成效来。她可能受到男人的性骚扰，受到其他女人的嫉妒和冷落等等。但是真正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是那些长得不好看的妇女，她们被雇用的机会较小，干竞争性工作挣钱的可能性也小，嫁人的机会仍然小，如果真嫁人，则嫁一个有实力的男人的可能性还是小。仅仅凭这些就足以驱动美容产品的高消费。看上去很美未必总有好处，但看上去不错总是有好处的。

幸福

通过前两章的讨论，你可能会觉得，漂亮的人比不漂

亮的人幸福。本·弗兰克林（Ben Franklin）说：“人类的幸福，产生于千载难逢的好运气的时候少，而产生于天天都有的小益处的时候多。”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见出，非常漂亮的人一生都能得到那些小的益处，所以他们肯定要更幸福些。

事实上，美并不能带来多少额外的幸福。心理学家伊德·迪埃纳（Ed Diener）和大卫·迈耶斯（David Myers）花了很长时间试图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感到幸福？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主观的幸福”，这是一种表现为内心状态的幸福，在此种状态下，人的精神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感觉生活总体上令人满意。伊德·迪埃纳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英俊男人比其他男人有更大的幸福感，也觉得自己更快乐一些。女性的美有时使她觉得比其他女人更幸福些，但有时也让女人觉得更加不幸。美对于男女两性总的效果是次要的，最大的效果表现在对自己罗曼蒂克的生活感到满意上。在这一类艳遇上，漂亮的人要更幸福些，但是这并不一定让人觉得整个生活是令人满意的。

美能带来那么多好处，却为何惟独不能带来总体的幸福感呢？迪埃纳和迈耶斯相信，幸福更多地关乎个人品质，诸如乐观、自我控制感、自尊、承受挫折的能力、与他人相处的和谐以及对人的爱心等等，而非仅仅关乎长相和金钱。他们注意到，根据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人的期待视野，这是人的天性。所得越多，所欲越多，因为我们总是将自己与更富有的人进行比较。蒂莫西·米勒（Timothy Miller）评论说，“人的本能不会对我们说，你已经积聚了

足够的社会地位、财富或爱情……相反，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本能机制的话，那它与进化论的基本原则是相抵触的。”漂亮者与更漂亮者攀比，富有者与更富有者争胜，下意识地要去追逐自己所没有的一切，这会让你具有凌厉的竞争锋芒，但若是走向极端，也会造成弊端：不能自我接受，以致落落寡欢。幸福的关键在于能够不时超越那种得到越多就越好的态度，而对自己现已拥有的一切持一种感激的心情。

欲望是压制不住的。心理分析学家埃迪斯·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曾撰文写到那些由于美貌而被孤立的女病人。因为生活中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使她们确信，她们能得到所有欲求之物、欲求之人，这种态度注定了她们每遭一次拒绝或每受一次怠慢都会感到挫折。伯特兰·罗素写道：“这种人忘记了，有些东西想要得到却没有得到，这正是幸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双胞胎的研究显示，幸福感也许部分地受制于遗传基因。行为主义遗传学者大卫·利肯（David Lykken）研究了1500对双胞胎，比较了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与基因差异很大的异卵双胞胎。利肯与他的合作者奥克·特里根（Auke Tellegen）的结论是，人天生就有一个感觉幸福的“分界点”，这是一个平衡点，人们的情绪在经过短暂的波动后又会回到这个点上来。换言之，有的人生来就倾向于忧郁或沮丧，而有的人则乐观自信。在最近的查里·罗斯（Charlie Rose）演唱会上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主持人责怪演员里安·尼森（Liam Neeson）还没有“达到生活

的最高境界”，责问他说：“假如你事业成功、婚姻美满、生活如意，你为何还不迷醉般地快乐呢？”尼森并未说他不幸福，而只是说他是个忧天派，他生活中发生的许多愉快的事情都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忧天性格。

自尊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自尊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紧密相关，而并不关系到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埃莉诺·罗斯福说：“没有你自己的同意，谁也不能让你觉得低人一等。”别人对我们美不美的评判，只会影响到我们在社交场合上是否放松自然，而与我们的自我评价毫无关系。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与更美的人相比，那么，即使别人认为我们美，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美了。所以，只有我们自己认为美或不美，才与自尊密切关联着。埃德·迪埃纳（Ed Diener）在文章中写道：“一个乐天的人更倾向于觉得自己很有吸引力，即使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幸福的人比不幸福的人更爱装扮自己，他们衣着得体、经常化妆、喜欢佩带珠宝等，这样，无形中将自己的资产扩大到了最大限度。

美也有其负面。人们总认为，漂亮的人交不到真诚的朋友，并更有可能寻机离婚。靓女被认为不大可能做个好母亲，帅男则不论喜欢什么，人们都会对他们的选择抱以怀疑。美被人诅咒为平静的扰乱者。威廉·巴特勒·叶芝向安妮·格雷高里（Anne Gregory）谢罪说：“亲爱的，只有上帝才会只爱你本身，而不爱你的一头金发。”

当人们以容貌来判断一个人的正直、敏锐、关心他人这些品质时，美是不占优势的。一张流露出善良与同情的

脸庞也许并不美丽，而美丽的脸可能显得孤高、冷漠、傲慢或自私，但仍不失其美。蒙田（Montaigne）说：“有的面孔是慈善的。在一群素不相识的敌人面前，你能在顷刻之间挑中其中一个人而不是他人，向他投降，将生命托付于他，在这里是完全不考虑这个人是长得美还是不美的。”但是，就是蒙田也得出结论说：“面孔是蹩脚的保证书；但尽管如此，它也是值得考虑一下的。”美能带来一些小益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可是，美的负面作用并非无足轻重，尤其对一个女人来说。她可以在一百万个小的方面受惠于美，但是在对她至关重要的方面——如被看作合格的母亲、取得高水平的职业、用善良正直获得他人的尊敬等等上，美要么与之毫不相干，要么甚至妨碍人们把她看成她真实的样子或她所希冀的样子。美并不是通向幸福的可靠途径。

尽管这样，若有机会变得更美，谁也是不会拒绝的。正如马戏明星索菲·图克尔（Sophie Tucker）说的：“我曾贫穷，我也曾富有，而富有总比贫穷好。”



4 . 论装饰

我熟悉那胳膊，两只都熟悉
那上面带着手镯，白白的，光光的
（但在灯光下，倒伏着闪亮的金色汗毛）
——T·S·艾略特

衣服是社会的装饰，而化妆则更近于表现我们个人的希望和恐惧。
——肯尼迪·弗雷泽

在洗涤间里，你会看到那些没有化妆的妇女，一袭家常服，一双拖鞋和卷满发卷、适于参加总统就职仪式的头发。
——约翰·瓦特斯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视觉最终来自于触觉。”这句话用在人体上再恰当不过了。在一次社交晚会上，新闻记者肯尼迪·弗雷泽（Kennedy Fraser）曾见到一位女士的

手臂上戴着长长的丝质手套，看起来“具有压路机般的滚圆特质”——那效果看上去光滑而又强韧，是对完美皮肤的一种模仿，但是这种模仿所带来的美感比起我们见到真实胳膊时所产生的快感就逊色多了。诚如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所说，完美无瑕的皮肤是人之所共求，其次则是有一头飘逸、健康的好头发。

皮肤是人体最具美感的器官，它在身体上分布得也最广。在人的脚后跟那儿皮肤最厚，而在眼睑那儿最薄。它的总重量只有6磅，而分布面积可达到20平方英尺（按平均数计算）。在它的每一英寸范围内，分布有丰富的汗腺、油腺、汗毛、血管和神经末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才能打颤、耸肩、流汗、脸红和抽搐。分布于皮肤表面的，是克勒丁（keratin），它是一种蛋白质，犀牛的角和动物的脚爪都由它组成，人体上的毛发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特殊皮肤。

皮肤与毛发，在人健康时是如此的性感和光亮，而在不健康时却是令人厌恶的。在《论恶心》一文中，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这样写道：“找不到语言可用来形容皮肤变坏的时候，事实上那是皮肤的毁灭，其中充满了丑陋、恶心的东西。感染、疮毒、皮肤创伤等等，在中世纪的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是麻风病人和梅毒病人社会地位骤然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它们在西方社会绝迹，也只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毛发是有吸引作用的，但只有长在头上的时候。我们不愿看到一颗痣的中心正好长出一根毛来，也不喜欢在女

人的下巴上或一杯水里面看到。据说，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在他的婚姻生活中从未达到过高潮。当他发现妻子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希腊式的美女、而是在两腿之间长满了汗毛时，他真是吓坏了。对有些人，毛茸茸的腋窝和隐私处的汗毛——它们生长于青春期，并带着一股异常的气味——是令人难堪的；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它们则令人激动。卡罗琳·兰姆（Caroline Lamb），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的妻子，在与拜伦勋爵（Lord Byron）热烈的情事中，曾铍下一束阴毛送给拜伦。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崇敬阴毛不仅因为它长的样子和它给人的感觉，而且还因为它的气味。“脚和汗毛都是气味强烈的东西，在人的嗅觉变得不愉快和讨厌它们之后，它们便上升为了受崇敬的东西。”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真正遭人厌弃的是“恋污癖”。换个方式来说，我们对身体气味的喜爱，经过了从清洗梳理到讲究服饰再到盛行假发等阶段的转变。皮肤和毛发触动着人的视觉、触觉和嗅觉，也触动人对这些感觉的记忆，它们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同时也是不可替代的。

裸体之躯

德斯蒙德·莫里斯把人叫做“赤裸的猿猴”，在“193种现存的猿猴中”是惟一没有毛发覆盖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是光裸的呢？事实上，我

们并不是全然赤裸的，在我们成人的身体上生长有500万根毛发和与猿猴一样数量的毛囊。但是我们身上的大部分毛发都极细，使得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光裸的一样。为了保暖，我们从羊身上剪下羊毛和剥取羊皮，也从其他动物身上剥下毛皮，再把皮子制成革做成衣——就是说，我们发明了衣服。我们皮下也有一层厚厚的脂肪，像鲸鱼身上的油脂一样，是用来帮我们抵御冬天的寒冷的。

我们的制冷系统同样也很特别。大部分动物热的时候，就会喘气，会在没有毛发的地方如脚掌下面出一些汗，会抖动身上的毛发。而人的出汗方式则是全身性的。成百万根汗腺分布在皮肤之中，当身体发热时，它们就会像一眼眼的喷泉一样从体内排出汗液。当干燥的空气越过潮湿的皮肤表面，汗水就会蒸发，毛细血管内的血液温度便逐渐冷却下来。这一蒸发式制冷系统是人类在非洲大草原上生活时进化而来的，那儿温度很高，空气干燥，广阔的草原上到处是一眼眼的水泉。

因为身上的毛发极细，我们的身体就成了跳蚤、虱子、蚁螨和其它害虫不爱呆的地方。我们的狗啊、猫啊天热时需要带上防止跳蚤和扁虫的领圈，而我们就不必。赤裸不仅让我们免遭害虫之扰，而且还让我们具备性的优势。毛发可提供衬垫和保护，将它们去掉后，皮肤就会更加敏感、更具反应力。在一些密布着神经末梢的地方，如嘴唇、手心、脚后跟、乳头以及生殖器等地方，就没有一根毛发。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提出假设说，

人类的赤裸发生在我们的祖先开始用两腿站立并长距离奔跑之时。人类仅凭速度生存下去是不够的，它还得凭耐力。我们那些最具天才的运动员状态好时，短跑速度可与野火鸡媲美，每小时大约26英里。可拿这个速度与纯种马、鬣狗每小时跑40英里、猎豹一小时70英里比较起来，就差得太远了。然而，人类在速度方面缺乏的，却在耐力方面获得了补偿。我们的祖先就是凭着耐力成功地赢得猎战的，他们所跑的距离远胜于猎物，直到把它们的力气耗尽。光裸的皮肤因为成百万根汗腺的分泌而排泄了热量，使得他们在太阳下长时间的奔跑中始终保持清凉。

我们的皮肤状态正好反应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从炎热气候中的奔跑者进化而来的。我们身上皮肤的多少——相对于我们的整个身量大小来说——标明了我们与所由来的环境脱离得有多远。在地球的某些地方，人大多身材短小且呈圆球形，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人大多高挑且呈圆柱形。相对于我们的体形大小，我们所有的皮肤越多，则凉下来的速度就越快。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我们个大还是个小，天冷的时候我们就把身体卷起来，天热的时候就把它伸展开的原因。生活在炎热而干燥的地带，如苏丹的廷卡这个地方，人大多长得细瘦，躯干窄窄的，而四肢却很长，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对于整个身体而言拥有更多的表面积，以便快速地排出体内的热量。厄丽克·韦科（Alek Wek）就出生在廷卡，她具有典型的苏丹土著的窄躯干。她身長5英尺11寸，两腿修长无比。作为名模，她现在是举世皆知的封面女郎，她的体形正符合今天那种以高

挑、修长为美的理想。

一些北方民族，如格陵兰的伊纽特人敦实、五短的体形好像是更近些的变种，他们最多出现在几千年以前，并且是由于要适应居住地寒冷的气候所致。这种体形的特点是，块头大而表面积少，便于贮存热量。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年平均气温和人四肢的长度之间存在着一种正比的关系——天气越热且越干的地方，躯干就越瘦，胳膊和腿也越长。

身体的清洁

灵长类动物小心翼翼地彼此从对方的毛皮中检出寄生虫和土坷垃，这种互相清洁的举动，作为一种相互修整和社交联系的功能已经存在有好几百万年了。当一对互相敌对的黑猩猩和解时，他们的嘴里会发出快乐的尖叫，紧紧地互相拥抱，接下来就是以互相捉虱子来表示正式的和好。热塞斯猴要比一般的猴类更近地挤在一起相互修饰。民俗学家弗兰兹·德·瓦尔（Franz de Waal）曾跟踪观察了一只热塞斯小母猴，他把它称作阿扎里亚（Azalea）。她生下来就染色体异常，所患病症类似于人类的唐氏综合症。阿扎里亚生活不能自理，年龄很大了，还要她的姐妹们照顾，但是她每天两次的清洗一次也不少。

许多动物的母亲在婴儿一生下地就为之梳洗和舔吻，这种亲爱的举动会产生终生的影响。神经学家沙尔·山伯格（Sul Schanberg）将幼鼠从它们的母亲身边拿开了短短

的一会儿，幼鼠的生长激素和ODC酶——它主要关系到动物的生物钟和重要的化学变化发生的时间——就分泌得少了许多。那些被剥夺了做母亲权力的老鼠，只是在科学家用刷子敲打它们时，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来。出生头10天内得到母亲更多梳洗的幼鼠比其他幼鼠分泌的抑制性激素少，所以科学家们相信，母亲的亲吻和梳理可以调节幼鼠对恐惧的生物性反应，规范其生理机能和中枢神经系统。

由于刚出生婴儿对关爱有强烈的渴求，所以，人类的早产儿所得到的肌肤相亲相对来说就显得少了。心理学家蒂法妮·菲尔德（Tiffany Field）和她在迈阿密医学院触摸研究所的同事们通过研究发现，对早产婴儿每天进行触摸，对于促进他们的生长发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受过触摸的婴儿比没有受过触摸的婴儿体重增加要快50%，而且显得更加敏捷和健康。早期的触摸和通过触摸、洗浴等等活动给予皮肤的调节，对于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来说，都有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了一整套对自身进行整理梳洗的活动，一个又一个的行业建立起来，帮助我们进行这些活动，如做头发的、修面的、修指甲的、修脚的等等。父母为孩子们梳洗，小女孩为她们的木偶娃娃梳洗。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曾回忆起，她一天中与母亲玛格丽特·米德“最亲密的时候”，就是母亲坐在“她床脚边一个特制的小凳子上”为她梳理那齐腰长的头发的时候。木偶娃娃除非有制造商们所称的“头发游

戏”让女孩子们沉醉其中，否则就不会有好的销路。一直最畅销的木偶娃娃的制造者芭比公司，于1992年创造了一种长着“等身长发”的木偶娃娃，她的头发长到了脚趾，于是成了销量最好的芭比娃娃。

一生当中，人们将大量的精力都花在了皮肤和头发上面。在美国，人们花在个人护肤产品和服务上的钱是书本的两倍。从全世界的情况看，化妆品和洗涤用品的产值每年达到450亿美元，而北美占到整个市场的30%（欧洲为34.9%，日本为18.9%，其它国家为16.2%）。1996年，美国18岁以上的妇女中有88%的人说，在过去6个月里她们使用了美容化妆品。

食物药品管理局将化妆品定义为“一种可以揉擦、冲洗和喷洒的东西，可用来对人体进行清洁、美化，以改善人的面貌、提高人的漂亮程度，但又不会影响人体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我们对这些东西花费如此之多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和金钱过多了呢，还是由于媒介和广告利用了人的不安全感呢？两者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至少还应追溯到4万年前。

化妆品

在南非的克拉西斯河口和周围的边界地区，人类学家发现了由红色铁矿土做成的条状物，年代大约已有4万年之久。这些条状物是经过人工磨制的粉状物做成的，里面掺和有氧化铁、动物油脂或植物油脂，做成后还经过加

热，以强化其颜色。目前还不清楚人们拿这些红色矿土干什么用，而人类学家斯蒂文·米顿（Steven Mithen）相信，这些颜料是用来描绘脸和身体的，因为至今在南非还没有发现形成于3万年以前的绘画作品。

化妆在古埃及当时还是一种先进的技术。当人类学家打开国王图坦克哈门（King Tutankhaman）的墓冢，发现里面埋着一罐3000年前的润肤剂，是用动物的油脂和香树脂制成的。在大英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个妇女用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也是来自古埃及，其使用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1400年。化妆盒里有象牙梳、火山石、用来盛化妆品的小罐、润肤膏等，还有一双皮拖鞋和一方小红垫。公元前2000年的刮胡用具也已被发现，里面包括铜刀片和夹子。古埃及人将用动物油脂、橄榄油、坚果油、种子和花瓣等东西制成的润肤品贮藏在石英、石膏罐里，他们的医生自有一套用来防止皮肤变皱和变黑的秘方，男男女女都用火山石刮擦自己的身体。他们还戴假发，有时也将它们与自己的头发混在一起（这一化妆方法后来为安迪·沃霍尔所采用）。事实上，古埃及人已有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大多数化妆品。这说明化妆行业并不是现代的发明，也不是人们对现代文明压力的反应。

刮去体毛

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脸，而对自己的皮肤则相对注意不够，但不论脸多么重要，有一件事是我们不会忘记

做的，这就是去掉体毛。妇女比男人的体毛少得多，但是在许多文化传统中，她们却都是要去掉体毛的人，因为这样做，可以强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同，增强女人对男人的吸引力。罗马诗人奥维德曾劝告女人说：“不要让你的腋下长出山羊般的汗毛，不要让你的腿上盛行黑黝黝的胡须。”超级名模腿上有毛是不能走到舞台上去的，她们的皮肤必须显得像塑料娃娃般光滑而结实。

虽然伟大的自然主义艺术将女性人体像广泛地表现在各种层次的艺术品中，或高雅，或低级，但体毛的表现仍然最多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事。《花花公子》杂志上的模特儿常常要将她们隐私处的毛遮藏起来或者干脆剃掉。只在最近的几期中，模特儿才偶尔会露出些许阴部的体毛。波提切利在描绘妇女形象时，从来不画体毛；几个世纪之后，德加（Degas）、马蒂斯（Matisse）、毕加索（Picasso）笔下的女人仍然是没有体毛的。在纽约时髦的弗德里德克·费凯（Frederic Fekkai）沙龙里，数以百计的妇女要求去掉她们身上的全部体毛，包括阴部的——它们或被修成三角形，或修成条形，或者一根也不保留。最先兴起这一做法的是比基尼运动，穿比基尼的妇女们要将露在泳服之外的体毛统统去掉，后来这种做法就渐渐形成了时尚。

妇女什么时候新露出身体的一块地方，这个地方的体毛就成了被驱除的对象。14、15世纪的时候，欧洲一些妇女时兴将头发和耳朵用头巾包起来，稍微一点露在头巾外的头发都一律要拔掉，这样渐渐地，越拔越多，结果导致了高而宽阔的额头的兴起。人们崇尚那种褪后很多的发

际线和修过的眉毛，这一点，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简·凡·爱克（Jan Van Eyck）和罗杰·凡·德·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肖像画中可以看出。

西方文化中，男人更喜欢将他们的身体藏在衣服下面。即使他们裸露出胸部，注意力也一般放在它们的形状和皮肤的感觉上。形体健美者给身体涂上比赛用的颜色（浅棕色）和体油。他们也修除胸膛上的毛，以防它们阻碍那形状分明的肌肉的展露。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曾这样形容一个形体健美者的躯干，说它就像“一个撑满了橡实的橡皮套”。在所有影视名模中只有一个人是胸部上留着胸毛的，这就是迈克·亨利（Mike Henry）。超级模特儿马库斯·曾肯伯格（Marcuss Chenkenberg）那富于男性魅力的、深棕色而没有汗毛的胸部曾使得他所做的男人服装广告风靡了全世界。有些同性恋男人也将体毛删除，好让自己的身体符合米开朗基罗·西格洛莱尔（Michelangelo Signorile）所形容的那种“刮过了的男性胴体的美”。正如《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杜波瓦（Blanche Dubois）所喃喃低语的，“我喜欢我的男人是光滑而没有汗毛的。”

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模仿和追随女人。不管一个男人怎样修饰自己的身体，他都不会对脸上的须毛大动干戈。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形象，没有穿衬衫的男人双手交叉着搁在往下搭拉的裤子上，或者是故意将裤子穿得宽宽大大，让它整个往下松垂着。暴露于外的肚脐下面的那部分皮肤是从来不会去刮的，胳膊和腿也一样。而之

所以将胸脯上的汗毛都拔了，则主要是为了显出身体的强壮。皮肤就是斗士的衣服，而胸部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汗毛只会破坏整个效果。

装饰

经过装饰的身体现在是一种时髦，可是就在不久以前，人体艺术在西方还是不可多见的景观。在1990年所做的一次非正式调查中，人们发现只有3%的美国人纹过身，而且他们之中大部分是男性。衣服脱下了，大型广告牌上尽是男性强壮有力的光胸脯，统治舞台的是越来越少的穿着，越来越暴露的肉体。当这股崇尚裸体之风过去后，身体的装饰之风又兴盛起来，并由那些虔信的西方人带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

纹身（Tattooing）据说兴起于公元前4世纪的纽比亚。这一名词来自塔希提语，意思是敲打（strike）。纹身一般是用野猪的牙齿、海龟的壳或极细的针来进行的，首先是刺开皮肤，然后再染上颜色。19世纪时，达尔文发现纹身盛行于“从北部极地到南部新西兰的广泛地区”。

身体瘢痕或印记（cicatrition, scarring）产生自用刀或别的器具在皮肤上雕刻出的各种形状。在世界的不少地方，因为人的皮肤黑，所以这些印记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对身体进行穿刺（piercing）的做法在各地都很普遍，人们发现木乃伊的耳垂拉得很长，而且其中一只还有两个小眼，显然曾有重物在上面悬挂过。综观整个人类历史，人

们曾将各种各样的装饰物——贝壳、骨头、羽毛和金属制品等等——从自己的耳朵、鼻子上穿过去。他们穿过或装饰过的范围几乎涉及到脸部的每一个地方：耳朵、鼻子、嘴唇、额头、舌头，和身体的全部性感区域：肚脐、乳头和阴部。对这些神经末梢丰富地区的穿刺可激起人持久的感觉，观看者只要看到这些穿刺，也禁不住要想象这种感觉是怎样的。

18、19世纪，当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闯入到世界各地的時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并非各处的人们都跟他们一样讲究衣服的穿着。人们不仅有赤裸着身体的，而且还有往身体上绘画、做标记、刺花纹的。尽管这些装饰方法各各有别，但它们的实际功用却和西方的服装是同等的。艺术史家安妮·霍尔兰德（Anne Hollander）就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总结说：“‘着装’的定义有时是很有弹性的，以至这其中的差别是如此地相异于我们通常之所见……那些不穿衣服的人仍发展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装点习惯，像西方人的服装所表现的功能那样，这种装点习惯亦成了一种完全人性的必要标志；就身体本身的完整意义来说，它们就是某种形式的服装。”

就像服装一样，纹身、刻记、刺字在他们自己人看来是非常漂亮的，然而，这些做法的主要目的似乎不仅是美，它们还是将人们区分出来的标志。人们可以凭此识别一个人的等级、身份、性别、年龄以及成就等等，事实上就跟服装所表现的功能一样。在许多文化中，纹身和刻记标明了青春期的成熟、婚姻的状态、第一次成功的打猎等

等情况，它们依各部落规定的不同而不同。

纹身和刻记就像衣服，也可以表现个性特征或特殊意义，特别是用在西方文化中的时候。恋人将所爱人的名字刻在自己的胳膊上，就像刻在树干上一样。但是纹身、刻记和穿刺还带有别的、更重要的信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纹身和刻记是举行成人仪式的一部分。如同抽烟、喝酒和其他形式的技能一样，纹身、刻记和穿刺在西方年青人那里具有着同样的功能。纹身和刻记不仅疼痛而且有感染的危险，因而也就昭示了一种力量和意志。猎人和武士都以身体的伤疤为骄傲，那些纹身、刻记和穿刺的人们也表现了一种挑战肉体痛苦的勇气。身体艺术是痛苦的。

美容之术

对身体施行艺术装饰的现象在两性中都存在，然而至少在西方，主要还是盛行于男性之中。但是，如果说到对脸的修饰，则主要属于妇女。胭脂和脂粉可能有时会施于男性，但唇膏和眼线如用在男性身上则肯定有损男性的形象。男性美容业最近几年有所增长，但有一个方面是例外，这就是男子化妆品市场。

妇女们对自己涂脂抹粉、装俏扮靓，不亦乐乎。她们将有毒的铅和水银与蛋清、柠檬、牛奶、醋相混合，然后涂在脸上。她们还用水蛭来吸血和吞咽砒霜。她们也学古希腊人、罗马人或更晚些的伊丽莎白一世，在乳房和额头上绘上蓝茵茵的血管。2000多年来，欧洲人用于脸上的

化妆品都是由铅粉制成的，它一般与白垩相配，或者也与酸醋、蛋清相混，调制成糊状后，再厚厚地被涂抹在脸上，令面部的皮肤与其天然的色彩尽失。教皇朱利亚斯三世（Pope Julius III）的西班牙籍医生安德里斯·德拉古那（Andreas de Laguna）曾抱怨说：他简直都可以“从她们两边的脸颊上削下厚厚的一层脂粉来”。当时妇女的化妆就是如此这般的浓涂厚抹。

在中国与日本，妇女的化妆方式也是一样，在涂得白白的脸上，擦上一层红红的胭脂，再配以染了色的指甲。在古代的日本，大约从公元9世纪到12世纪的时候，妇女们常在脸上施以厚重的白粉，它是由大米粉（后来改为白色铅粉）加上从藏红花中提取的物质制成的。日本妇女对皮肤的白皙非常注重，有人在日本的医药柜台前发现，增白剂与用于清洁的化妆品和唇膏一样地好卖。正如日本的医药品牌经理所解释的：“日本妇女相信，美好的皮肤绝对应该是白皙而又统一的。她们讨厌雀斑。”

一直以来，将脸涂成略带粉红的浅白色的化妆方式都为美国人所喜好。化妆师科文·奥可英（Kevyn Aucoin）述及1967年他还是一年级大学生的时候，如何把商店店员脸上的化妆品当成了药膏。他对她与他一样也遭受了蚊虫的叮咬表示同情，但是他得到的却是对方令人感到尴尬的沉默。回家的路上，他母亲对他解释说，那种涂在脸上的白粉实际上是一种化妆品。

在这种白色的底子上，妇女们毫不犹豫地采用了红色，将它大胆地涂抹在嘴唇和脸颊上。红色，是血液的颜

色，也是脸羞红时的颜色，还是乳房、嘴唇和性器官的颜色，在性爱的过程中，它是最醒目的。这种颜色远远地就可瞧见，并且容易激起人的感情。同样的原因，红色被用作停止的标志、铁路的信号和消防车的颜色。早在公元前5000年，红色颜料就被用在人的嘴唇上；1910年，它被制成口红形式，在巴黎包装上市。截止到1930年，这种管装的东西销售量是如此之大，以至遍布从芝加哥到旧金山的广泛地区。服装设计师贝翠·约翰生（Betsey Johnson）曾经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口涂口红躺在医院里。”许多妇女都有着与贝翠一样的感受。人们在古苏丹和埃及的墓石里就曾发现了好些罐红色氧化铁，显然，希望死后还能享用口红是古今都有的愿望。

秘密与谎言

历史地看，女性使用脸部化妆品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男性的赞许，但是她们也一直在坚持不懈地使用。古罗马诗人马提尔（Martial）对女人的此等做法提出谴责说：“你只是一个谎言的组合。你人在罗马，而你的头发却长在莱茵河畔；夜晚，你将丝质的睡袍搁在一边时，你也将牙齿搁在一边；为了过夜，你将整个人的2/3都锁在盒子里……这样就没有一个男人会说，我爱你，因为你不是他所爱的那种人，也没人爱你的那个样子。”奥维德警告女人道：“你的矫饰毫无疑问该让它终止。看到你脸上流下的那一串串浓腻的脂粉，谁能不感到恶心？我为什么要知

道那给你的皮肤带来白皙的东西都是些什么？”

教会人士对此更是义愤填膺。圣杰罗米写道：“缘何一个基督教妇女要将这种花花绿绿的东西涂在自己脸上呢？这种春情的催发剂、欲望的激发器和不贞洁灵魂的象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宣布说，一个戴假发的人将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祝福留在了发上，没有达至本人。

“教士把他祝福的手搁在了哪里？他是在为谁祝福？不是这个衣冠楚楚的妇人，而是另一个人的头发，头发下面的另一个脑袋。”

18世纪晚期，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欲判定施行化妆的妇女是在实行巫术，那些因这种虚假装饰的诱惑而与一个女人结合的男人可以凭此控告而获得自由。“从本法案实施之日起及其以后，所有的妇女如果有利用香水、颜料、化妆品、假牙、假发、铁夹背、裙箍、高跟鞋和撑背等等引诱他人与之结合而成为夫妻者，将适用此项法律，她们将被分别判定为行使巫术罪和用意不良罪，由此结成的婚姻也将无效和取消。”这个法律后来没有实行。

1711年，英国杂志《观察家》发表了一封从一个精神上受到折磨的丈夫那里写来的信，信中这样写道：“先生……我有极强的欲望想废掉我的妻子，并且希望，在考虑到我目前处境的情况下，你们与我保持一致的意见：向她提出离婚。我曾是这样地喜爱她所有的一切，她那光洁的前额、脖颈、还有胳膊，她的头发放着闪闪的金黄色光芒。然而令我深感惊异的是它们全是假的，全是装饰的结果。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她的皮肤已经变得黯淡无光，以

致她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那苍老的容颜就像是我昨天晚上与之同床的那个女人的母亲。我应有充分的自由与她分手，除非她的父亲能使她的财产与她那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容颜相配。”

过去国王常常差遣画家去见他未来的新娘，并要求给他带回来一张她的肖像。尽管这种婚姻常常以巩固政治地位为原则（或扩大领土，或增强家族势力），但新娘的容貌始终是很重要的。英王亨利七世（Henry ）的做法就可以使我们一窥那些做国王的在此事上的态度。除了要求交给他一张正式的画像之外，他还向将要旅行的特使提出了一长串的问题，包括指示他们要“注意她的容貌如何”，“她是化过妆的还是没有化过妆”等等。

人们希望王室女性和女贵族对她们未来丈夫的容貌不要太看重，但她们常常会要求而且也会得到一张他们的画像。伊丽莎白女王不愿意与任何她没见过面的男人结婚，结果她拒绝了所有的人，死时仍为处女。她乐意与她的那些追求者们调情，直到晚年，她脸上还擦着白粉，腮上涂着胭脂，头上戴着一顶用金红色发卷装饰的假发。也许不能确定这样做的效果，所以最后20年里，她从不照镜子。

梦露与“猫王”

白皙、红润的肤色代表青春、代表女性——从来没有生育过的女性。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年龄段的妇女都要竭尽全力保持这种肤色的原因。她们试图模仿那些刚刚成年的

少女的美，普遍地希望自己的皮肤光洁润泽，并采取各种办法来达到它。现在不光有古老的脸部化妆方法，还有不断提出来的、新的脸部整形要求，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保住青春的丰采和倩丽。

文化的多样化使得我们将肤色与种族相联，然而肤色不光因人种而不同，也与性别和年龄有关。事实上，在一个同种族的小社会里，影响皮肤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性别，而与是否过多的暴露于阳光中毫无关系——这可以从我们身体上那些没有暴露在阳光中的部分而得知，也可以从某些社会环境中那些与男人一样多地劳作在户外的妇女身上了解到。同种族中男女肤色差异的规律是，女人一般比男人要白皙一些，因为妇女血液里更少血红素，皮肤中更少色素沉着。古埃及、克里特和日本的艺术家的都曾人物画用不同的颜色来强调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别，他们用白色、黄色或金色来表现女人，而用桔黄、红色或棕色表现男人。一千年后，浅棕色头发的“猫王”爱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将自己的头发染成蓝黑色，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还不断地用手向后捋他那蓝黑色的头发。玛丽莲·梦露本是一个肤色中等、脸有雀斑的女人，但她将脸色涂得雪白雪白，头发也染成了金黄色。为了增强性别感召力，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改变皮肤和头发的颜色来强调自己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

婴儿的皮肤和头发远比他们的父母白皙、娇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会渐渐失去原先具有的这种白皙和光亮。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一般人的头发在过了早年的

孩童期后很少还能保持亚麻色。人类学家皮特·弗罗斯特指出，妇女的白皮肤与婴儿的白皮肤一样是有其作用的，即阻止他人的攻击和显示青春亮丽。

但是他同时也指出，男人与女人间肤色的差异是性激素作用的结果，它直接预示着一个女人是否丰产。小女孩和小男孩在皮肤色泽上是没有明显差别的，他们的差异要在青春期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这时，男孩会变得黑一些，女孩则变得白一些。以后，妇女在每月的排卵期肤色会白一些，而在其他的时候黑一些。怀孕和服药会使她们的皮肤变得比平时要黑。怀孕的变化不仅通过体形表现出来，而且也通过皮肤的颜色表现出来，如脸上的孕斑和乳头颜色的加深等等。尽管这些现象大部分在生过孩子之后会自然消失，但一个女人的头发和皮肤在生过孩子之后要比以前黑下来许多，而那种只有年轻女孩才有的青春色泽基本上就永远消失了。这样，一个妇女皮肤颜色的相对变化，就是她的荷尔蒙分泌情况的直接反映。

神经学家V·S·拉马钱德兰（V·S·Ramachandran）提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生存选择的压力更多地偏向那些皮肤白皙的女人。白皮肤比黑皮肤更像一扇透明的窗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年龄状况和性感。“为什么男士更偏爱金发碧眼的女人呢？”他回答说，金发碧眼者受到宠爱主要是因为她们的皮肤而不是头发，虽然好像肤色是为头发做陪衬的。依照拉马钱德兰的说法，从白皮肤上容易反映出一个人患过的疾病（如贫血、黄疸、感染等等），还有他（她）的性感和性冲动（是否容易脸红），他

（她）的年龄。尽管男女双方都比较看重对方的健康状况，但对一个男人来说，女人的年轻更重要，而性感在女性身上比较难看出，因为她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含蓄。所以，拉马钱德兰认为，女性皮肤白是性选择的结果，因为白皮肤的女人是最少可能欺骗他们的女人。生物上的优势就这样变成了美学上的优势。

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琼斯（Douglas Jones）则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男性偏向选择浅肤色的女性作性伙伴，是普遍或接近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文化中的现象。《卡玛·苏特拉》一书写成于公元1—4世纪之间，其中塑造了一个理想妇女的形象，其皮肤就被描写得“细腻、透明、白皙，看起来像黄灿灿的莲花”。社会学家Hiroshi Wagatsuma注意到日本男人将“皮肤的白皙看成是日本女性美的一部分”。而日本妇女则更喜欢“带点浅棕色色调的男人”。……许多妇女在漂亮男人和有魅力的男人之间都有区别，一个漂亮男人的皮肤可以是浅白细腻的，如同演员一样。这种男人尽管很悦目，很受人欣赏和喜欢，但他同时也被认为太‘女性化’，不适于做女人的依靠。相反，一个皮肤微黑的男人则是有魅力的，他显得充满活力，富于男子气概，叫人信赖”。在美国怀俄明州，科卡西恩学院对学生们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男生们说他们喜欢寻找那些有浅色眼睛、浅色头发、中等白皮肤的女孩子，并与她们约会。而女生说，她们更喜欢男方有一双黑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而不喜欢男人的肤色过于白皙。

这种调查研究的结论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

一个多文化的社会里，对浅肤色女人的喜爱本身并不表明什么。种族差别将淹没一切由年龄、生殖力和是否生过孩子所产生的细微的肤色差别。所以在一个多文化的社会中，男人对浅肤色女人的喜爱和要求可能与他的美感毫不相干，而更多地与他所追求的社会地位和内心的种族意识有联系。70年代，南非的黑人妇女因为过度地对皮肤进行漂白而感染了一种严重的皮肤疾病（Ochrnosis），这决不是因为她们要追求一种青春亮丽的形象，而是因为她们希望一种社会地位的变化，因为这是一个各种权利和特许都与肤色息息相关的国家。

羞红的新娘

查尔斯·达尔文曾经观察到：“脸色变红，这是最最特别、也最最富于人性意味的表情。猴子也会因为激动而脸红，但是如要证明所有的动物都会脸红，则还需要提出比这多得多的证据。”脸红，如怕痒痒一样，是青年人身上特有的，成年之后就会消失。小孩子和青年比成年人容易脸红，女孩子比男孩子容易脸红。脸红局限在一个可视的区域内，如脸上、脖颈处或有时在胸前。科学记者罗杰·宾汉姆（Rogr Bingham）说脸红是青春期诚实的标志——如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青年，有性想象力、性前途，但是还没有性经历。尽管脸红显露了他痛苦的自我意识，但它更多伴随的是年青人的爱情。正如达尔文所说的：“没有哪一对年青的恋人——他们把对方的敬慕与爱看得高于——

切——会彼此不常常脸红地互相追求。”

V. S. 拉马钱德兰指出，脸红或害羞意味着性激动。脸上颜色变得楚楚动人时，皮肤同时也会湿润，嘴唇将充血，这时的肤色一般寓意着“你的求爱将得到对方友好的回应，求爱有可能成功”。健康的标志是红润而非苍白的嘴唇和雪白的面颊。缺铁性贫血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常见病，它外在的标志就是苍白。如今，许多妇女都因为长期的经期失血而表现为贫血，但是在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却很少这样。妇女不是怀孕就是哺乳，这样失血的机会就很少。那时候，如果出现贫血，则原因可能有两个：或者是饮食中缺铁，或者是受到了细菌感染（感染时，体内的铁要聚集起来对付病菌）。

大多数妇女不加思索地每天使用胭脂和口红，许多还敷上一层粉底，这使她们比自然的颜色要显得白一些。她们借助白色的粉底、润泽的胭脂和鲜艳欲滴的口红模仿没有生过孩子的少女的模样，使自己也具有青春少女一样的性吸引力和生命活力。

妇女常常谈论化妆术，甘愿让那些出自生产商之手的化妆品遮掩自己天然的肤色，并坚持只使用特定的品牌。诚如人类学家玛丽琳·斯特拉顿（Marilyn Strathern）所写的，“皮肤是身体最外在的部分，从这种意义上看，它与具有完整意义的内在人格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妇女在脸上涂化妆品，就是重塑自己的形象，使之最大程度地接近心中的理想，这实际上也就是用一种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理想化特征取代她本身独具的特征。哲学家斯坦利·

卡维尔（Stanley Cavell）把现代女演员比做理发店发型展示图上的女模特，要经历各种发型的变化。“新时代的女演员都是化妆师。”在显示自己外貌的独特性和“美”之间，人们大都宁愿放弃前者来赢得后者，并且这种心态还走到了这样一种极端，即许多人觉得暂时性地化化妆还不够，还应该通过手术来对脸型或肤色做一种永久性的改变。

让皮肤紧些

要仿造出青年人才有的那种鲜嫩光滑的皮肤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这并没有使人们望而却步。年轻人的皮肤之所以清新亮丽，是因为每隔两周它就会自动换一层新的细胞，这样，皮肤的颜色就好像永远是新鲜的。随着皮肤的老化，这个过程会慢慢减缓，表皮细胞将变得暗黄、发黑，油脂分泌腺则越来越缺少活力，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因素不断减弱，这样就使得皮肤发干并不再柔软有弹性。过去一闪即逝的表情皱纹渐渐地永驻在脸上，随着脸部皮肤下面脂肪的逐渐减少，青年人特有的圆形脸变成了三角脸，皮肤开始下垂。

如果有幸活足天年，我们将会看到皮肤渐渐变老的过程。原先皮肤鲜亮的白种妇女会比非洲裔的美国妇女早10到20年出现皱纹，而男人出现皱纹的时间又比女人要晚。皮肤的老化并不仅仅是基因时间表上的事情，其中健康因素和生活习惯也起着重要的作用。19世纪白皮肤的

美人将她们的脸藏在遮阳伞下边，为的是让它们变得更白。20世纪的美人则嘲笑这些过去的美人代表的不过是虚弱和受压迫者的角色。从20世纪20年代起，褐色皮肤成了一种时尚，它象征着富裕与健康，象征着一个人在大自然与公共社会度过的时间多于拘禁在阴暗的房间内的时间。具有深色皮肤者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升了上去。

艺术家南茜·伯森（Nancy Burson）和计算机专家大卫·克莱姆利奇（David Kramlich）合作，研制了一台加龄机。这部机器可以把你的脸录像下来，然后用计算机程序使之老化。1990年，机器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艺术展览中心展览时我见过一眼，它会得出两个对未来人像的模拟结果——一个是经过精心照料后的脸部形象，一个是老晒太阳和老抽烟后的形象。约翰逊（Johnson）聪明地将它弄到了商场里，用来为他的防晒膏和保湿剂做广告。任何东西只要能促进产品的销售，就是好的。

“抽烟会使你变老和变丑吗？”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标题，德波拉·格拉第（Deborah Grady）和维吉尼亚·厄恩斯特（Virginia Ernster）1995年在《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的就是这个标题。文章中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得出来的结论是“会的”。抽烟多的人比不抽烟的人要生出更多的皱纹，当然这主要是在40岁以后；他们的头发也更容易过早地变白，并有秃头的危险。抽烟从许多方面来讲对皮肤是有害的，尼古丁会使血管收缩，阻止血液流到皮肤里去，使面色看上去就像刚抽过烟的嘴似地发出一种死灰色。频繁的眯眼和斜视，吸入烟气和喷出

烟气，还有用嘴抽烟的动作都可能对皮肤留下永久的印迹。谁都知道抽烟会损害肺部的胶原质和胶原蛋白，所以，它们也极有可能对皮肤中的这些物质产生直接得多的影响。

褐色皮肤看起来闪耀着一种健康的光芒，温暖而光亮，但是发着烧的皮肤也会这样的。太阳晒出来的褐色是皮肤受到损害的表现，它们过多地受到了紫外线的照射，受到照射时，皮肤会分泌出比平时多的黑色素来保护自己。但是只有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损害才表现出来，到了晚年，这种人脸上会生出更多的皱纹、棕褐色斑块和罹患皮肤癌。只有数目自然的黑色素能够保护皮肤免受伤害，这就是为什么非洲裔美国妇女得癌症的人数，只是除希伯莱裔以外白种妇女中患癌症人数的1/14的缘故。

因为阳光和抽烟对皮肤的损害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出来，所以，许多健康的追求者、美的热爱者对日光浴和抽烟一直爱不释手。好处几乎是立即的，尼古丁直接引起大脑神经中枢的兴奋，而褐色皮肤则暗示青年人有过沙滩冒险的经历，于是换来人们的交口赞扬。或许有些人明明知道存在着危害，但是仍然又是抽烟又是晒太阳，欲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健康是实实在在的。那些进行日光浴和抽烟的人就像穿刺和纹身者一样，会对人夸口说：“我呀，健康得很，什么事都能做。你看我，形体一点都没变，脸上什么事都没有，还是那么好看。”然而再过20年，那曾经夸下的海口一定会反过来惩罚他，尽管年轻的时候他可以毫不在乎。

为了抵消年龄的肆虐和坏习惯的侵蚀，妇女们要借助化妆品来保护她们的面庞。从远古的时候起，人们就把注意力放在预防衰老上，而不仅仅是掩饰它。这可能反映了我们对年龄无情的认识，但是今天，我们不再满足于仅让皮肤保持湿润、光泽，这种防护性保养方式我们认为已经过时。今天，我们都喜欢将水果或甘蔗中的酸提取出来，将它们涂抹在脸上，以除掉表面的那层皮肤；或者使用从维生素A类物质中提制出来的太阳防护剂，用它来加快皮肤的更换过程。对于那些希望效果更长久些（譬如说10年）的人来说，以酸换肤的方法就只得让位给手术刀和激光束了。

全世界几乎一半的美容手术是在美国进行的，而美国手术的1/3又是在加利福尼亚完成的。在美容手术中整形手术是目前的主流。在美容病人中，71%每年所挣的钱不到5万美元，30%不到2.5美金。在1993年《健康》杂志所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有一多半以上的人同意美容手术“总有一天将会如染发一样平常”。海伦·布兰斯福德（Helen Bransford）曾不止一次听她丈夫、作家杰·麦克伊勒瑞（Jay McInerney）说起一个年青漂亮的女演员，于是她去做面部拉皮术。她做出预言说：“公元2000年的时候，整容手术最多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技术化了的化妆术。”末了，她又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说明，说：“如果当时有麻醉药，克莉奥佩特拉（Cleopatra）就成了她那千年里的美容之星。”

据“美国整形暨恢复协会”说，仅1996年一年，就

有60多万例整容手术在美国施行，其中大多数是为30、40和50岁的白人妇女施行的。有色人种妇女施行手术的大约占20%。男人与女人一样需要将他们那生得有些高的耳朵贴伏下去，而许许多多男士都希望将鼻子重新再造一下（鼻子整容术中，男人手术的比例为24%），但一旦涉及到改换老化皮肤的问题，则妇女的人数就远远地超过了男性。

据“美国面部整形与康复研究院”1993年的报告，74%的整容手术是为女性做的，而“美国整形暨康复协会”在1996年的报道是89%。尽管割眼袋和拉皮手术位于5项男性最喜欢做的整容手术之列，但85%的割眼袋和91%的拉皮手术仍然是在妇女中间进行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年龄在一个男人的择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多数人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双方的相貌水平都会下降，研究结论对此也是支持的。但一般认为，女人容貌下降的速度比男人要快得多，特别是当男人对着一个女人的照片品头论足的时候。所以，女性们都热衷于掩饰她们的年龄，这是毫不奇怪的。

性激素缺乏在皮肤老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妇女，对这种东西的缺少表现得更加敏感。更年期妇女性激素缺乏往往伴随着胶原蛋白的减少，皮肤脂肪也会跟着减少，皮肤变得干燥，皱纹出现也就是很正常的了。女性病专家拉道尔夫·马霍克斯（Rodolphe Maheux）曾经在魁北克城的世界修女大会上给60名修女开出了性激素补充剂，她们都是很少晒太阳和没有抽烟历史的。他发现一年之内

这些妇女的皮肤下面就新长出了12%的肉。别的实验还发现，荷尔蒙替代疗法可以使更年期后的妇女减轻皱纹深度、缩小毛孔直径、增强皮肤湿度和提高胶原蛋白的数量。这里不是说荷尔蒙替代疗法就是一种美容方法（特别是它还可能引起皮肤的破坏和疾病），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性激素在保持皮肤的年轻和滋润上有着重要作用。

未来，我们可能会失去对于年龄的感觉。为了让年龄不再随意变老，人们现在是一发现有衰老的迹象就开始采取行动。目前最新潮的作法是“年龄促降法”，即人们在30岁的时候就开始美容，而不是像以往要等到50岁以后才去美容。这种作法的结果就是让衰老永远不再出现，而这又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笔下的道林·格雷（Dorian Gray）有着显著的区别，在我们的阁楼里不会藏有一张自个的画像，将我们衰老的过程一一记录在案。衰老的证据是不会存在的。

洁白无瑕

看看粉刺霜广告和皮肤科医生的门诊室，人们都会以为长粉刺仅仅是女性的事情。女人比男人更愿意就皮肤分泌的问题去求医问药，也比男人更喜欢使用遮盖性产品。而事实上呢，更容易得粉刺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原因很简单，导致粉刺产生的分泌过盛现象是由汉觉精（androgens）即雄性激素引起的。尽管汉觉精被称为雄性激素，但它事实上可以从男女双方的肾上腺中产生出来。女性是

在卵巢中分泌出少量的雄性荷尔蒙，而男性则在睾丸中产生，他们的分泌量是女性的10倍。

所有的青年都会得粉刺，他们希望这只是伴随青春期的到来而到来的事情，与突然而至的长高、嗓音变重变粗和情绪的不稳定是一回事。但是粉刺的生长期会持续到青春期之后。如果女性脸上长得过多，则可能意味着体内的雄性荷尔蒙分泌过于旺盛，或皮肤对雄性荷尔蒙过敏。曾有一次测验表明，在为粉刺而求医的年青女子中有90%是体内的睾丸激素（testosterone）高出平均水平，而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患有卵巢功能不良症。许多粉刺患者也更易在脸上或身体的别的部位长出过多的汗毛。而如果她的停经期提前了，老长粉刺则可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体内的雌性激素过低，以至无法抵消体内雄性激素的影响。

女人比男人长的粉刺越少，越是为每一个瘢痕而着急担心。粉刺在光滑的脸上显得太扎眼，因而也就被小心谨慎地掩盖起来，因为它们与身体内的雄性激素相关。而在妇女身上，任何与雄性激素相关的标志都是与生殖意义相反的。这不是说粉刺是男女双方所喜欢的东西，它们并不受到欢迎，因为它们常常意味着感染（粉刺是由细菌引起的），意味着更加厉害的病症（如麻疹呀什么的），或者皮肤上生有寄生虫。

无表情的魅力

面部皮肤之下即是脸部肌肉群，这一肌肉群有着重要

的进化论目的：让脸部微妙微肖地表现各种各样的感情意义。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面部肌肉群与身体别的部分的肌肉群不一样，它直接位于面部皮肤之下。但是，经过多年重复不止的牵拉和褶皱，这些表现感情的纹路越来越长久地逗留下来。妇女的脸比男性的要生动，皮肤也更加精致娇嫩，所以这些纹路的形成并不会让人感到很舒服。

很多妇女都感到苦恼，因为随着年龄的变大，她们的脸不但显得疲惫，而且还显出有些生气的样子。一个妇女说，“如果是笑的样子，倒还不那么坏。”为什么对一桩她本人并不感到生气的事，她的脸会显出生气的样子呢？当年龄变大的时候，我们的嘴唇也会变薄，前额跟着耷拉下来。这一切都十分类似我们生气的时候面部肌肉可能会有的表情：额头压得低低的，上下唇紧紧地绷在一起。如果出现紧张和担心，我们喜欢把额头蹙在一起，拧成一个结，而当我们年龄变大的时候，两眉间便出现了一些垂直皱纹，而那些横亘在我们额头上的水平线也留下了我们以往感情的微妙的回响。

一种最新的整容方法是将微量的神经毒注入到两眉之间，这种神经毒可引起麻痹现象，所以注入以后将对两眉间的皱纹肌——即把两眉凝结在一起的肌肉——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在这种“毒化麻痹”之后，两眉间的垂直纹路就会消失，以后不管有多么忧虑焦心的事，都不会再起这种皱纹。当然更长久的办法是做手术消除这种皱纹肌。但是面部肌肉麻醉之后，一个人如何准确地表达他的感情呢？一般，当我们听到不愉快的声音、看到厌恶的事物或

受到惊吓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他人将皱纹肌皱起来的时候，这种皱纹肌就会自动地皱拢，以此传达出我们内在的情感。我们与他人交流思想感情的方法之一就是面部模仿，即无意识地追摹他人的面部表情。脸上肌肉的活动与我们的感情活动是如此地密切相关，以至我们可以从上面读出全部的内在感觉。

在整容方法中，“毒化麻痹”法和其他的麻醉方法不是对我们的面部表情形成破坏作用的惟一方法。额部拉平术也可能无意中会产生一个人永远在睁大眼睛表示惊奇的神情。一项研究把根据整形外科医生的意见将额部拉平后眉毛所在的位置与美容师所认为的理想眉毛的位置进行了比较。实验者让他们观看了由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具有不同眉毛高度和形状的脸形，然后请他们表达各自的看法。结果两组人都喜欢那种眉毛高度与外耳廓最上端平齐或在外耳廓之下的脸部形象，而不喜欢眉毛长在外耳廓之上的形象。选自被人反复引述的16篇有关拉皮术的文章的100多张术后照片，都是眉毛长在外耳廓之上的，这就使得这些妇女的脸永远带着一副惊异的神情。

我们在第5章中还会更多地谈到关于改变面部特征的问题。对皮肤施行的外科手术会消除坏习惯所留下的影响，恢复年轻的形象，但是就妇女们而言，对脸部1/3部分所做的修改，会带来神情更天真、眼睛睁得更大、既没有担忧又不觉愤怒的效果。拉过皮的脸看起来更有活力，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更缺少表情控制。现在流行的面部表情是没有表情，那些在舞台上走来走去的模特儿都是一副冷

面孔。狄德罗（Diderot）说，一个女人的美在于表情为零，“一个青春型的女孩……是纯洁的、天真的，同时也是没有表情的。”难道这就是一个女人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所要向人展示的形象吗？

保罗·埃克曼是世界级的面部表情研究专家，他认为，跟我们鼻子的形状和嘴唇的线条一样，微妙的感情表达也是受到基因控制的；我们改变表情，也就是改变一个家族的形象，这种形象标志与我们说话的声音和笑的方式一样，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肤色与美

美和种族，这两个话题搁在一起是绝对危险的，这等于将两颗炸弹绑在了一起。但是从全世界各种时装杂志所刊登的大幅白人模特玉照来看，这又是两个不可避免的话题。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杂志《她》（Elle）也同时在中国包括西藏地区（有8个订购者）发行，里面也刊发了一些亚裔模特儿的形象，但每一次出现在封面上的总是白人模特儿。正如最近一期《纽约时报》上所说的，一个通过巴西杂志了解巴西的外国人一定“会以为这个国家的主要人种都是北欧人的后裔，因为高挑标致的金发女郎从封面上对你微笑着，白皙的面庞占据了除体育版以外的所有版面”。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人原来的肤色是个什么样子，只是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皮肤都呈现棕色，所以，大概1万

年以前，人都是棕色的。皮肤中色素的含量可帮助人们避免太阳的伤害。在赤道国家扎伊尔，黑皮肤的土著人很少罹患癌症，而在澳大利亚，由于所居居民大多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所以皮肤癌的发病率就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浅色皮肤是适应低阳光照射水平而出现的。因为身体需要将照射在皮肤上的阳光转化成维生素D，维生素D再转化成钙，所以，浅色皮肤在阳光少的地方具有生存优势，它可以让最大数量的阳光穿过皮肤。在饮食富含维生素D的地区，比如说生活在极地地区的伊纽特人中，由于他们的食物以富含维生素D的鱼和鱼油为主，他们的皮肤就不是白的。

白种人并非天生就比别人更美，事实上，浅色皮肤与其他肤色的人相比具有很多的缺点。它出现皱纹的时间最早，脸上易生斑点，比亚裔人 and 非裔人更容易长粉刺和罹患癌症。白种人的头发还容易早早地变灰变白，秃顶的人也比别的人种多。除了日本北部的爱努斯人之外，白种人身上还长有比其他任何民族更多的体毛。

像杰里德·戴尔芒（Jared Diamond）这样的许多科学家都相信，皮肤颜色和其他身体特征所表现的地区性差异不仅是物竞天择（譬如对天气和环境的适应）的结果，而且也是性对象选择的结果。我们的祖先是在一种彼此隔绝的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他们囿于一方，养成了种种占统治地位的性情偏好，这必然使得他们孕育出来的后代在体貌特征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而这是自然环境的塑造力量所无法

达成的。

不管性对象的选择在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皮肤差异上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这就是皮肤的颜色不反应皮肤下面所具有的内容。诚如基因学家路易吉·斯福扎（Luigi Luca Cavalli Sforza）所写的：“正因为它们裸露于外，所以肤色的巨大差异才给我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使得我们自然而然地以为，在我们身体其他的基因构成中，也如表面这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事实并非是这样的，我们不同肤色人种间的其他基因构成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人类学家阿兰·古德曼（Alan Goodman）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他的敏锐，他看到了科学和人类思想偏见之间的分别，他说：“本性劣质的生物体与作为社会生活经验的生物体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的种族分别虽然不存在，但种族主义却可能存在。”

美丑判断是社会地位高下最灵敏的感测计。在无论什么国家，都是经济上据统治地位的群体将他们的体貌特征作为审美判断的标准，而其他的群体也都急于去模仿这些据统治地位的美的标准。基于人性的普遍爱好是存在的——如对光洁的皮肤、油亮的头发和饱满的嘴唇的喜爱，但具体如何体现这些标准或喜好，则因为执掌缰辔者的不同而不同。60年代，社会学家哈里·霍廷克（Harry Hoetink）在西印度群岛进行了一次关于种族关系的研究，在研究中他观察到，一个人体貌上是否吸引人，其标准绝对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族类的外貌特征决定的。那些能够通过标准检验而进入到统治集团的人，其社会地位有可能

获得不断升迁，并会被人看作是“有吸引力的”人。

为什么巴西的杂志封面都由白人妇女统治着呢？与美国一样，这一现象可追溯到存在于葡萄牙人与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之间社会地位上的极大不平等。葡萄牙人1500年来到巴西，到来后，就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并把从非洲劫掠来的黑奴当做他们甘蔗种植园的奴隶。直到4个世纪以后，白人人口仍只占到巴西总人口的40%，但他们却据有着大部分财富和权力。1996年，一本名为《巴西种族》的杂志出版了，并宣称它的创刊是为了“9000万不被看见的人们”——即那些非白种人，因为他们在媒体中几乎是不被人看见的。这份杂志一出版，一星期内就卖出了20万份。这一旺销势头，使得它的总编辑阿诺尔多·马塞多（Aroldo Macedo）激动地说：杂志以其一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神话：即用黑人作封面的杂志是永远卖不出去的。

美国的审美标准不仅是白种人的，而且还是按第一轮移民到美国的白种人的体貌特征确定的。这些人来自北欧和西欧，他们到达后就追杀了大部分当地土著的印第安人，并把从非洲带来的黑人作为供他们役使的奴隶，确立起了以种族为基础的权力精英制度。20世纪初期，新一轮移民浪潮中的移民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如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等国。而今天不断移民到美国的人种则主要是亚洲人、中南美洲人和非洲人。所以美国的审美标准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北欧和西欧的移民到得最早，因而首先在美国确立起了一整套以自己为精英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观

念。理想的美人不仅应该是白种人，而且应该是WASP。1921年，第一位美国小姐选出，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戈曼（Margaret Gorman），是一位年仅15岁的眼睛碧蓝、头发金黄的高中学生。1945年，美国选出了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犹太籍美国小姐，贝茜·密尔森（Bess Myerson）。1984年，美国小姐的桂冠终于戴到了一位非洲裔女孩的头上，她就是瓦莱莎·威廉姆斯（Vanessa Williams），虽然她具有的仍然是一身浅色的皮肤和一双栗色的眼睛。

文化评论员M.G.罗德（M.G. Lord）把芭比娃娃称作“太空时代多产的偶像”。它“不仅代表了美国或消费社会的妇女形象，而且代表了一种超国界、超伦理、超地区的女性准则”。然而，从1959年一直到1980年，这个女性准则都是由金发碧眼美人来代表的。直到20年以后，玛特尔（Mattel）开发了第一个黑人芭比娃娃和亚裔芭比娃娃，这一标准才被打破。十分凑巧，这一年也刚好是第一个非洲裔美国妇女被评选为《花花公子》杂志的“玩乐之星”的一年。

1969年，有人问一家纽约模特儿公司的经理维勒米娜（Wilhelmina），她曾把最早的黑人女模特之一纳奥米·希姆丝（Naomi Sims）推上杂志封面，是否非洲裔模特儿只是一种“潮流”，她愤怒地回答说：“不，黑人不是一个暂时的代替物。”但是20年后，有色人种妇女仍然很难从模特儿群中找到与她们的肤色与特征长得相似的人。1991年，纽约消费者事务部发表了一篇题为《看不见的人》的报道，报告说他们对27种全国性杂志社的1.1万多一份广

告和157份时装目录单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其中96%的模特儿是白人。在美国，尽管有11%的刊物读者是非裔美国人，可是在美国广告中却只有3%的模特儿属于非裔，在编辑出版物中是5%，至于亚裔人种模特儿，那就更少了，只有1%。

1994年，由贝蒂·弗里坦（Betty Friedan）和南希·伍德哈尔（Nancy Woodhull）发起成立的“媒体女性”组织对媒体中的性别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查找了下面9种妇女杂志在10月号上刊登的所有模特照片：《诱惑》、《她》、《都市人》、《精英》、《魅力》、《哈珀荟萃》、《奇妙者》、《时尚》、《女士之家》。这一次真是使他们对那些瘦削高挑的白人妇女形象大大地饱了一次眼福，他们共查到了205个女模特儿形象，而其中属于非裔的只有10个，属于亚裔的则仅为6个。

然而，欧洲血统的人在美国是不可能永远处于统治地位的，他们很快就会被取代和超越。《每周消息》报最近有一篇文章预计，到2050年，非希伯莱裔的白人将从目前占统治地位的74%（1995年统计资料）的绝对多数降下来，降到只占53%的微弱多数，随之兴起的将是混血人种的数量。1990年，亚裔美国人中20多岁的青年有67%是与他们族外的人完婚的。1996年，非裔美国人的总收入是3.67亿美元，他们平均每人花在化妆品、洗涤用品和装饰品上的费用是其他消费群体的3倍。1992年，非裔美国人购买的护发类产品占全美购买量的34%。但是尽管非裔美国人花在杂志上的费用达到了1.75亿美元

之巨，广告商仍然声称如用黑人妇女做杂志的封面，定会减少杂志的发行量。像《紫檀女》和《紫檀公》杂志，本就是以黑人读者为对象的，但是它们仍然不得不靠从高档时装企业招揽广告来维持发行量。

正如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琼斯所说：“只要社会中还存在着等级划分，只要人的身体特征还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那么体貌上的标准对人的审美观念就会产生影响。个人和族群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他们在婚姻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条件——不仅仅依赖于他们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而且也依赖于他们身体特征上与占主导地位的人们的距离。”我们正朝着新的世纪迈进，美国人的审美观念也日益丰富多彩，那种西北欧人金发碧眼的美人模式将让位给新的审美需求——那种以丰富多彩为美的要求，封面女郎必以白人女孩为美的固有观念将一去不复返。

头发

一个人全部的头发加起来大概有10多万根，每根头发一年长6英寸，最终则会长到2—3英尺。头发就像一个衬垫，让我们的头部得到保护，但是难道我们需要有3尺长的头发吗？眼睫毛只长到适宜的长度便停止了，保护我们的眼睛受不到光线和灰尘的伤害。覆盖在眼睛上的眉毛可以为我们阻挡汗水和阳光，但它演变至此的部分原因还可能是为了帮助完成面部的感情表达。身体上的汗毛标志着身体发育的成熟。头皮上的毛发则一无这些功能，除

非是为了吸引配偶。

当一个女人开始以她的头发为玩弄的对象，时而甩一甩、时而扬一扬的时候，可以肯定她是在传递求爱的信息。社会学家注意到，觊觎中的女孩子一般少不了要表现这样三个挑逗性的动作——抿嘴唇、歪脑袋和甩头发。头发的种种特性组成了一套完整的视觉效果：它有颜色、光泽、质地、香味和流动的感觉。

1548年，意大利教士阿格诺罗·弗伦左拉（Agnolo Firenzuola）在《关于妇女美的谈话》一书中写道：“一个女人不论长得多么出色，如果没有一头好的头发，她全部的美和光彩便丧失殆尽。”普遍认为光洁得没有一丝瑕疵的皮肤是一个女人最最迷人的特征，而头发的价值则仅居其次。1993年，《魅力》杂志社举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回答问卷的妇女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我的头发不错，那么不管我穿着如何或外表显得如何，我都会觉得自己很迷人。”“如果我没有一头好头发，那么，无论怎样我都会觉得自己不行。”

在许多文化中，妇女的头发都被认为是具有性感的東西，以至于在结婚之后，它们就要被遮掩起来，为的是避免引起他人不可遏制的欲望。公元1世纪的时候，一个结过婚的罗马妇女可能会因为取下头巾而被遗弃。特尔玛德说，一个妇女如果出门时将头发露在外面不加遮掩，可能会拿不到一点婚姻损失费就被离弃掉。直到今天，正统的犹太妇女一旦结婚，就得用领巾或披肩将自己的头发蒙住，要么就戴上假发。修女是嫁给了基督的人，她们就是

用头巾将自己的头发遮盖起来的。多里克时期的古希腊妇女在结婚之日要将头发剪短。16世纪，意大利的妇女结婚前都让自己的头发自由披散着，但到了结婚之日以后，她们得戴上面巾和披肩，或者将头发笼在网线和帽子里面。

男人与他们的头发也有着复杂的关系。参孙（Samson）以一头拖地长发而著称，这头发是他力量的源泉，他被敌人剪去了头发，也就等于失去了力量。1990年，心理学家托马斯·凯西（Thomas Cash）研究了人们对长有满头头发的男人和秃头男人的感觉，结果发现，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认为光头的男人体质更虚弱，也缺少吸引力。凯西在另一次实验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这次他是与那些秃头的男人亲自接触，了解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结果，75%的人对他们的光头感觉害羞，而40%的人想法用东西把它遮盖起来。拿破仑的男侍叙述说，1812年，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会面讨论欧洲的前途，两个男人结束时，都关切地聊起了如何治疗秃顶的问题。

头发的梳理

人类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对自然生长的头发大做文章上。在新几内亚的高地地区，各部落都认为祖先的灵魂盘踞在人的头发里，一个人如果没有头发，即意味着被祖先抛弃了。在向妇女求婚时，高地人都要用泥巴将头发做成一个庞然的形状，然后，将它与一个管状的东西缝

合，用蜡液固定下来，上面再绘以各种各样的形状：血管、金甲虫、耳旁发卷和小细毛。

“大人物”（bigwig）这个词来自古典时期的欧洲，那时的男性贵族时兴头戴一个大大的假发套。17世纪末18世纪初，男人的假发都从中间分开，一边带一个隆起的小包，从上面垂下来一串串发卷，瀑布般地披落在肩上、身后。曾有一个讽刺作家对这种装饰的效果进行描绘说：“那张包在巨大的假发丛中的脸儿，像湛蓝海水中的一汪小黄水洼。”

当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为星期六晚上的“狂热今宵”迪斯科演出做准备时，他叮嘱父亲的是“不要碰我的头发”。如果没有耸人听闻的发型，摇滚乐队看来是没法成功的。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叙及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头发做得那么高时说：“我告诉他们，这样人们就不会说这人怎样怎样了，他就是这个样。”而甲壳虫乐队第一次登台亮相，就是以他们那一头长及肩部的蓬头乱发著称的。自此以后，长头发成了男性反抗社会的象征，它意味着对主流文化的反动。

在约翰·瓦特斯（John Waters）那本令人捧腹的著作《飞扬的头发》中，60年代各种奇异的发型都拥有一个画像。德比·哈利（Debbie Harry）的头发是如此之盛，以至于都可以在其中藏下一颗炸弹。过去的历史中，妇女们几乎将她们的头发向任何方向梳理过。17世纪中叶，英芳塔·玛丽亚·特丽莎（Infanta Maria Theresa）到达法国，与法王路易十四（Louis ）成亲，她所梳理的发型是人们要

到迭戈·委拉斯凯兹（Diego Velasquez）的油画中才可以找见的。3个世纪之后，即20世纪的50年代，一些美国青年头发蓬松的宽度据说有14英寸。这种宽式发型比起飘飘坠坠的长发型和一直向上的冲天型来说，算不上是最流行的。历史上最高的发型是由18世纪的欧洲贵族们创下的。当时在贵族妇女中间，头发的梳理成了一种艺术，它们要先用羊毛、马棕或细铁丝填充起来，再用发乳和面粉固定住，最后装饰上一些绘有山川湖泊和战场图景的小装饰品。1780年，圣保罗大教堂的门厅不得不往上升高了4英尺，为的是便于那些发髻高耸、浓妆盛服的贵妇人通过。乘坐马车时，妇女们也不得不蜷缩起她们那娇弱尊贵的身子，否则有那高高的发髻挡着，她们是决计坐不进车里的。而为了不损害发型，她们的睡姿也不得不做一些适当的改变。

让你的头发飘起来

我们的头发一个月能长半英寸，在人的青春时期，头发的增长速度最快。女孩子长得最快的时候是16岁到24岁，这以后就会慢下来。如果不剪断它，让它自然生长，它会一直长到2—3英尺才开始脱落。据1949年的《多伦多之星》报道，世界上最长的头发是由一位印度僧人创下的，这个僧人的名字叫斯瓦米·潘德拉沙纳迪（Swami Pandarassannadhi），他的头发长度为26英尺——相当于一个年届50而从未剪过也从未自然脱落过的人的头发。

大部分男人都喜欢女人的头发长长的、飘飘的，许多浪漫的男明星譬如法比欧、雅尼（Yanni）、迈克尔·鲍尔顿（Michael Bolton）（他的头发最近才剪），以及一些浪漫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等等都有一头飞扬流动的长发。早在19世纪初期，波斯的发型师克洛伊塞特（Croisat）就说：“你从来见不到夏娃、维纳斯和格雷丝的头上是生着一头短发的。”弥尔顿（Milton）在《失乐园》里描写夏娃的头发金黄发亮，一绺一绺地散披在身上；波提切利和提香笔下的裸体女性都长着一头飞瀑；而在古代德国那个广为人知的传说中，罗累莱（Lorelei）是披着一头金色的长发、坐在莱茵河的岩石上唱歌的，她头发上闪烁的金色引诱着那些抬头注视她的水手们走向死亡。

我们之所以喜欢长发，原因之一就是它最能反映出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头发当然地反应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关系、自信、趣味、性别、年龄等等，但它还是一段时期中我们身体状况的活生生的标本。每到一个月，你的表层皮肤就脱落一次，但是如果你的头发长到了肩膀之下，则可以肯定它在你头上生长的时间已经有两年了。除非我们将头发剪短或经常剃头，否则它就能告诉他人我们经常的饮食习惯、我们所服用的药物，从而提供一些关于这一时期我们健康状态的信息。这确实有点尴尬，但是长头发迷人的部分原因也就在于它是一件历史的东西——有关我们的历史，就写在上面。

头发长得越长，揭示的秘密就越多。在济慈（John Keats）逝世166年之后，温纳·波门加特纳（Werner Baum-

gartner) 医生对他的头发进行了分析。他发现济慈的头发中含有鸦片酊的成份。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有其自身的血液供输系统，它反应着我们体内正在进行的生理过程，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从阿斯匹林到抗血栓到甲状腺素片都可能影响到头发的质量，也说明了为什么现在的药检公司一般更多地使用头发来分析一个人的药物服用情况而不是用尿液。

头发的脱落

妇女变成秃子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且她们中的大部分都不会。但是随着年龄的逐渐衰老，每个人的头发都会变得稀少起来，这既指每根头发的直径会变小，也指整个头发的数量会减少。男人秃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大部分妇女的头发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稀少了。生活节奏的加快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紧张的生活方式使得肾上腺素分泌过盛，从而导致胆固醇的产生和雄性激素的增多。头发脱落的现象在妇女停经以后表现得更为显著。

在人的各个年龄段，头发的好坏是受到健康因素和饮食情况影响的。牧草不丰的季节，动物身上的毛就长得少。在牧草丰盛和牧草不够的季节之间，美利奴羊的羊毛产量可以达到400%的差距。当然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基因，不论你吃得多好，都不可能超越基因的极限，但是在基因限定范围内的理想模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空间。厌食症患者可以发现数量惊人的头发脱落现象，缺少

铜、锌、铁、维生素A、E以及其他营养物质可能导致头发变稀和发质受损。有病的身体可能需要隔绝营养物质。因为头发对人的身体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譬如说当与骨髓比较的时候），所以缺铁或缺蛋白质首先就会从头发上反应出来。头发受到荷尔蒙分泌的微妙控制，由此而产生了男人的胡须、胸毛和男人特有的无头发区，而这是妇女们所没有的。听起来有些互相矛盾，没有头发和体毛过多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原因：雄性激素分泌过多，一个青春期前就去势的男人（如太监）是永远不会秃头的。所以这不能给一个秃头者以安慰。

不管一个人的肾上腺素分泌水平有多高，如果他本身的基因中没有这样的倾向，他也是不会光头的。约有1/5的男人30岁以前就秃了头，另有1/5的男人60岁以后仍然有一满头好头发。其余的则呈现逐年稀少的趋势。尽管目前还缺少有效的方法治愈光头，但这是一个倍受人关注的领域。1988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同意用米诺克西底尔（Minoxidil）治疗脱发现象，它被吹捧为是可以变棉线为金丝的治疗脱发的良药。起初，它是作为抑制高血压的口服药物而使用的，可是服用以后，它使得人的前额及鼻梁上都长满了毛发。大约有25%的人在服用罗根（Rogaine，含有米诺克西底尔）后又生出了中等数量的头发（但停药之后头发又脱落了）。还有一种新药叫普罗珀西尔（Propecia），它对荷尔蒙可产生直接影响，据称是世上使头发不再脱落的第一药。

罗根的制造者注意到一份报道，是关于在米诺克西底

尔服用者中间发作心脏病的，于是它出资资助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中的实验对象有600人之多，他们都是年龄55岁、犯有非致命性心脏病的人，分别住在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的医院里。实验中研究者发现，秃顶的形式与心脏病的发作率有着相当的关系，尽管前额秃顶有碍观瞻，为男士们所苦恼，但真正有危险的秃头是顶秃，顶秃的人十分容易突发心脏病。研究结果的报告者还指出：引起顶秃和心脏病的共同原因可能是雄性激素的非正常分泌。在着手对秃头进行治疗之前，人们应当对两者间的关系给予注意。

迄今为止，人类秃头的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公元前4000年时，埃及有一种治疗方法，是用狗爪、红枣和驴蹄摩擦头顶，这些东西收集齐后，把它们用油烹制一下再用。如今人们使用罗根药品、头发再植术或“头发替代工程”来治疗秃头问题。他们要么用上梳法，要么用前梳法，或者其他的种种技术，总之得想法将秃头的地方遮盖起来才行。在美国，头发脱落的男人将近4000万，所以头发再造在美国美容业中兴盛无比，这也就毫不奇怪了。

现在一个流行的趋势是，男人要么都剃光头，要么把头发剪得不可能再短。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例子，还有许多其他的运动员和演员，也都这样处理了他们的头发。这种发型将所有有关头发的证据都从头顶上除掉了，所以人们再不可能知道它是稀还是厚，是金是黑还是白，也使人不明瞭原有的发际线在哪里。头上再不会发生花一块、白一块的现象，只

有一个统一的内容展现给人们，这就是光秃秃的球面。男人特有的秃顶指的是他们的发际线不断地从前额往后面退却，这种退却的发际线告诉人们他们头发曾经生长的位置，可是现在随着光头的出现，要了解这一点也不可能了。我们总是下意识地试图弄清楚一个人头发满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头发一下子统统剪掉了，我们便只好将此时的发型作为它本来的样子想象了，有谁还记得迈克尔·乔丹或玉儿·尤里纳（Yul Brynner）满头头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剃掉头发是一个先发制人的举动，是消灭年龄迹象的一个大胆举措。让头上光着还是一种夸大白个力量的办法。头越小，则脖子显得越粗，身体显得越壮。正在长身体的人常常剃光自己的头发或者将它剪得很短，头、颈、肩膀之间的的大小对比将使一个人的胸部显得更加宽阔。

金发热

在头发染料制造业中，有多达500种深浅各不相同的金色染发剂，从稻草黄到白金黄应有尽有。这些企业估算，在美国，大约有40%的妇女在使用这些金色染发剂。社会学家格兰特·麦克勒肯（Grant McCracken）这样写道：“这一文化已将金发形象变成了一种信号，将之输入到了男士们的导航器里。”金发在自然里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头发颜色，虽然在孩子们中间比较常见。一般，金发要比浅黑色头发和红发的数量多，发质也更为精细。一头金发的

数量一般为14万根左右，而浅黑头发是10.8万，红发则只有9万根。

弥尔顿笔下的夏娃和但丁笔下的贝亚特丽齐都是金色头发，位于北非的埃及人从古时候就开始戴用金色假发，古希腊和罗马妇女对她们见到的北方戈尔思人的浅黄色头发产生了喜爱之情，纷纷参与到金发的披戴中。金发是贵族的头发，但在有的时候，它又是妓女的象征。童话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站在婚礼圣坛前的新娘、还有圣母玛丽亚的画像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头发全是金色的。

当科学技术使得金发对每个人都成为可能的时候，金发热就产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商业性染发运动发生在1930年。1931年，简·哈罗（Jean Harlow）将白金色用在好莱坞的地图上，跟着，好莱坞就推出了一系列以金发美女为题材拍摄的电影，如《金色头发的维纳斯》、《金发热》、《金发之恋》、《白金发女》和《金发女的困惑》等等。1953年拍摄的《绅士与金发女郎》则是最有名的以金发女郎为题材的影片。商业公司在利用金发唤起人的感召力方面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打出的宣传口号是：“如果我只有一世好活的话，那么让我活得像金发女郎一样吧。”“金发女郎意趣多多。”

V.S.拉马钱德兰说，金发是与浅色皮肤相伴而生的，因为人都喜欢皮肤白皙的人，所以他们也就钟爱金发女郎。另有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说人之所悦的真正原因是在头发本身。与白色皮肤一样，浅颜色头发给人以纯洁、年青的感觉。直到好莱坞把金发女性塑造成性感和危险的象

征之前，金色头发的女主人公一直都是与甜美、快乐紧密相连的，而那种黑色头发的女子才是工于心计、充满危险性的人物。在阿凯（Archie）喜剧片中，可爱的贝蒂是金色头发，而精明的维罗尼卡是黑色头发；《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长着一头黑发，美兰妮（Melanie）则生着一头金发；迪斯尼乐园的《辛德瑞拉》中，善良可爱的辛德瑞拉（Cinderella）的头发是金色的，而她那险恶的继母和继母的女儿的头发都是黑色的或红色的。还有拉朋泽尔（Rapunzel）、科迪洛克（Goldilocks）等等童话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等，她们都是金发碧眼的女人。只有惟一的一个例外，这就是白雪公主，她长着一头黑色头发，因为她的母亲曾经祈祷自己有这样一个孩子，她生有“白如冬雪的皮肤，红如血液的嘴唇，黑如窗框乌木一样的头发”。

一组人在一次测试中被要求给照片上的一些各具不同特征的人打分。他们大多得出的结论是，金色头发的人更加软弱、顺从和没有主见。难道这是因为媒体反复宣传金发人所具特征的结果吗？在一组研究婴儿和小孩性情差异的极其有趣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杰罗米·加肯（Jerome Kagan）发现，那些生着浅色皮肤、特别是还同时长有一双淡蓝色眼睛的孩子比黑眼睛的孩子要羞怯、内向得多。他们更有可能害怕陌生的环境、不好意思接近人、与生人呆在一起不爱说话、并总喜欢紧挨着母亲等等，而棕褐色眼睛的孩子则表现得要大胆些。加肯推测说，害怕陌生事物的心理与眼睛、皮肤的色泽（受黑色素、皮质甾类作用），

可能是来自同一种基因作用的结果。

加肯的理论是带有推测性的。他说当人们从南方向北部欧洲迁徙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持身体具有在南部环境中习惯了的温度。一次突变增强了交感神经系统的效能，提高了去甲肾上腺素（一种主要的神经传递素之一）的水平，因而也升高了身体温度，增加了人们在北部环境中生存下去的机会。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突变也给人们留下了一副过于敏感的神经系统和一种更加胆怯的性格。那么颜色又是如何得来的呢？高浓度的去甲肾上腺素可导致虹膜中黑色素分泌的下降，同时提高葡萄糖循环酶的水平，这东西又反过来再次引起黑色素含量的降低。所以金发、碧眼、羞怯可能是由同一种生物现象产生的相关特征。这一理论可以用来帮助解释为什么金发碧眼者的形象大都是纯洁、善良和单纯的，这是否也真正解答了金发碧眼女性对男性魅力的由来呢？我们这里仅只是做个推测。

好头发坏头发

非裔美国模特儿和非裔娱乐业演员，如纳奥米·坎贝尔、蒂娜·特纳（Tina Turner）等用金色假发装饰自己的行为，遭到了人们的批评。有人说她们想通过让自己成为白种人而获得成功，有的人则说她们将白人的审美标准内在化了。拉索舞后鲁珀尔（RuPaul）将这些指责统统划拉到一边，说：“我戴金色假发套，并不是为了出售我的这身

黑皮肤。戴金色发套并没有使我变成白人，我不会以白人的身份来追求成功，我也从没想这样做。我戴金色发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是一种时髦。我要产生一种惊人的效果，金色头发配上深棕色皮肤就会产生这样一种令人惊倒的审美效果。”当篮球明星丹尼斯·罗德曼与他的前女友麦当娜不约而同地将黑头发染成了金色时，他的意大利裔女友不过是想去掉某些表现自己种族的特征，而罗德曼的做法不比她更出格些。

但是头发问题在美国是个政治问题，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是决定让头发按自然的样子生长，即让它像刨花一样地自然卷曲，还是把它拉直，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直到60年代，大多数非裔美国人都坚持弄直他们的头发，如今仍有75%的非裔美国妇女在用拉直器具和化学药水将头发弄成直式的。

只是到了最近，非裔美国妇女为了让头发长长，才开始选择自然发型。非裔人特有的卷曲式发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了，但是如今它们又盛行开来，以至白人金发妇女都学着样，也将她们的头发卷起来。接受信托基金的白人青年也是一人一头非洲式卷发。他们在科罗拉多州的滑雪小镇里消磨光景，人们都称他们为“信托卷发郎”。

据心理学家夏勒特·哈里斯（Shanette Harris）说，在长头发的非裔美国妇女中，只有中产阶级的黑人妇女才留着一头弯曲的或非洲式的头发。这就是说，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妇女们愈加趋向于让头发自然生长。在拉直头发的人们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与身份保持一致或希望

上升到中产阶级的地位中去。关于头发的争议盛行于非裔美国人社区，可接受的头发问题完全可以与白人社区中所盛行的可接受的体重问题相媲美。头发是负载有意义的。



5 .

特 征 表 现

我很高兴人们觉得我富有魅力，其实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存在于两眼和下巴之间距离的细微差别。

——波莉娜·波瑞兹科娃

人类的面孔十分像一位东方神明：在不同方向上长有不同的脸孔，不可能同时被看见。

——马赛尔·普鲁斯特

1574年，霍坦西娅·博罗米欧（Hortensia Borromeo）接到离家远游的丈夫寄来的一张肖像画。在回信中，她写到：“当我看见这张肖像画时，我深深地感受到甜蜜的感情……太让人惊讶了，一遍又一遍，我看着这张英俊的面孔，我……一下子忘掉了世间所有其他的事情。”众所周知，维多利亚女王戴着一只图章戒指，上面有她全家的5张小肖像照，并镶嵌着一颗用来放大的宝石界面。没有什么事物像人类的面孔一样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也没有什

么在交际能力方面比面孔更胜一筹。

我们由于遗传因素继承来祖先的面部特征，如鼻子、眼睛的形状和下巴的角度。人类学家麦尔文·考纳（Melvin Konner）认为我们最初对容貌发生兴趣是基于弄清血缘关系的想法。他称之为“你是否与这样那样的影响有关”。我们集遗传特征于一身，正如小说结构的构成，然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印迹。年龄、健康状况和习惯深深地印在情节主线中，而短暂的欢乐和恐惧在其表面掀起淡淡微澜。我们擅长找出区分面孔的不同的曲线和角度，也擅长精确地判定表明情绪变化的眉毛和嘴唇，哪怕是1/4英寸的运动。正如科学家弗朗西斯·盖尔顿（Francis Galton）1883年所说的：“人们必须精确地测算人类面容的差异。因为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差异微小得难以测量，但它们使我们能够在上万个陌生人当中辨别出一张熟悉的面孔。一张脸上的全部表情是众多细节的总和。它们以如此快的速度连续展现，以至在我们看来，全部细节变化好像只用了一眨眼的工夫。”

我们可以很快并且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一张美丽的脸。唐纳德·吉顿（Donald Giddon），哈佛牙医学院的讲师，设计出一个计算机程序，可以展示脸的侧面轮廓并且可让用户进行修改。用户启动计算机仿真动画，缩进的颞开始向前移动。当用户侧像看上去可以接受时，点击鼠标；当处于最佳点时，再点击鼠标，当变得难以接受时释放鼠标。吉顿发现人们对面部吸引力的感知随着细小特征的更换而发生巨大变化。一个特征哪怕挪动1/25英寸（1毫米）也

可能会使大脑做出从赏心悦目到无法接受的不同判断。

这些表明个体和祖系的特征部分是为了适应气候条件而得到发展，正如体形和皮肤的弹性那样。鼻子要把空气输送到肺部，因此在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下鼻子发展成了窄长形状，以便空气到达肺部之前变得温暖湿润。北欧人和中东人的后代大多有鼻孔很窄的长鼻子（阻止气流的完美形状）。在亚洲和非洲潮湿的地理环境中，人们普遍长着宽而短的鼻子则更为胜任。

在寒冷、日照充足、雪地上反射着耀眼强光的气候区，眼睛需要特殊保护。周围长有一圈脂肪垫的狭长眼睛生来就顶着遮阳伞，在北亚血统的人们中很常见。其他面貌特征随人种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变化。至于眼睛的颜色，好像并没有任何生物功能，或许反映出我们祖先随意的婚配优先选择权或者历史突发事件。例如，在一些小型封闭的社区，创建社区的少数几个人的面部轮廓在子孙后代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生物学家称之为“创业者效应”。

当欧洲人开始接触到亚洲、非洲和南太平洋居民时，所有人都对脸部形态的差异目瞪口呆，他们的反映让大多数人感到不快。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描述了一个塔希提人，此人说：“英国人的母亲这么用力拽他们的鼻子以致于变得长得可怕，这太遗憾了。”达尔文的同事告诉他说中国人认为西方人的鼻子很丑陋，同时欧洲人发现中国人的鼻子非常宽。达尔文的同事们在报告上说霍顿督人、马来人、巴西人和塔希提人“为了追求美用力压孩子们的鼻子和前额”。

眼睛同样引起争论。当日本在250多年的闭关自守后打开国门时，1860年，首批被派往美国的武士代表团报告说西方女子的眼睛看起来像“狗眼”，让人“望而生畏”。同时西方人也对这样的事实感到惊异：一半亚洲人缺少上眼睑，一些人还长有内眦赘皮——一小块部分遮住内眼角的皮肤。西方人习惯于随不同感情变换形状的眼睑，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亚洲人的眼睛缺少表情。这种稍窄的形状也使双眼显得困倦、细小。

皮肤颜色或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差异。在非洲许多地方，欧洲人第一次被见到时常被认为是鬼魂或者是死后复活的先人。当澳大利亚人迈克·利（Michael Leahy）在1930年勘察新几内亚岛的山区时，他遇到了部落族人，他们“完全被我们的模样吓呆了……一个老家伙张着嘴，蹑手蹑脚地走上来，碰了碰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实的。然后他跪倒在地，用双手摩挲着我露在外面的腿，可能想弄清它们是不是染上了油漆。”由于不相信这些苍白病态的入侵者是人，他们进行监视，看白人是否也排泄粪便。当白人确实如此时，侦察员捎回这样的口信，“他们的皮肤或许不一样，但是他们拉的屎闻起来和我们一样臭。”达尔文在报告中写到，“当看到白皮肤时，这些非洲摩尔人……皱着眉头好像在颤抖”，在这儿人们相信白皮肤只会长在魔鬼或者幽灵身上。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欧洲人和他们的美洲后裔自认为是美貌、优越的种族。事实上，达尔文发现有必要告诉他的读者“野蛮人”非常崇拜他们的女人的美貌：“我

听说人们一直认为这些野蛮人对女人们的美丝毫不感兴趣……，这个结论根本不符合这些女人们在装饰自己方面的精心和虚荣。”他又解释说，比起欧洲人的相貌，受某种文化影响的人们都更喜欢自己的相貌。正如一名提供消息者告诉他的那样，“或许仅就外表来说，比起一个好看的黑人女子，黑人不会更喜欢一位欧洲最美丽的女子。”另一位则告诉他，“泰国女子长着鼻梁窄小而鼻翼宽的鼻子，大嘴，厚嘴唇，引人注目的大脸庞……然而她们自己认为泰国女子比欧洲女子漂亮得多。”

人们喜欢自己的种族特征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缘由是种族主义。另外也因为一个种族的典型特征在另一个种族中却可能代表着病态和畸形。黑人长白皮肤或者欧洲人长有内眦赘皮极为罕见，人们把它与像白化病这样的遗传条件联系在一起。一个种族的典型特征单单以正常情况下所见到的尺寸和形状来衡量或许显得过分悬殊，因而看上去有些古怪。如果我们对长着又短又扁鼻子的脸看得习惯了，又细又长的鼻子因为稀罕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第一次遇到其他种族的人们时，他们看起来都一个模样——不是因为他们长相相同，而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地方与众不同。伦敦的国家肖像画廊有一间屋子放满了18世纪基特—卡特俱乐部的成员肖像。所有的人都戴同样引人注目的白色假发。——辨别这些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屋子里站得时间足够长的话，你会发现不再是整齐划一的戴假发的辉格党成员，而是形状各异的个人。眼睛经过调节开始像往常一样区分事物。这也许与

第一次看到陌生种族的一张脸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同。

大多数人发现辨认自己种族成员比辨认其他种族成员容易。这是在目击者证词的研究中经过验证的一项发现。我们倾向于对其他种族的人们做出“错误的积极”（false positive）判断，认为某人看起来很熟，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甚至难以分辨其他种族的男人和女人的脸。这并不是在于我们的种族态度，而在于我们与其他种族的成员接触的程度。它源于见识。这是一个过程，逐渐使人成为识别脸部特征、头发颜色和皮肤肌理的专家。

共性美

尽管存在种族主义，错误的观念和误解，人们还是一直被其他种族的人们吸引。现今，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国际选美大赛赛事不断（尽管许多人抱怨说这些比赛倾向于西方人的审美观），肯定存在着一些对美的共识，然而界定很模糊。因为甚至3个月大的婴儿也更喜欢注视大人们觉得有吸引力的面孔，包括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种族的面孔。近些年来科学家已经对美丽的普遍性发展发生很浓厚的兴趣。

结果证明受同一种文化影响的人们在谁长得美或者不美的问题上见解非常一致。1960年，伦敦一家报纸刊登了12张年轻女子的照片，让读者评价她们的美并且打分。共收集到4000多份答卷。这些答卷来自英国各地，答卷人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其年龄阶段从11岁到80岁不等。

如此相差悬殊的读者群却有着惊人相似的评定结果。5年后，在美国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1万名答卷人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出了一致的评判。在心理学实验室较严格的条件下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因为人们坚信观者眼中出美景，于是他们很快得出相似的判断。

年龄和性别对审美观点没有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3个月的婴儿也会长时间地盯着成年人觉得有魅力的面孔。7岁、12岁、17岁以及成年人在评判孩童和成年人长得是否有吸引力的问题上没有大的分歧。关于哪个女人漂亮，女人们和男人们往往持相同的看法。尽管男人认为他们无法评价同性的美，但是关于哪些男人最英俊，男人与男人之间或者男人与女人之间意见是一致的。

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媒体成功地传播了特定的审美观。尽管同一种文化内部的高度共识反映出这种影响力，但跨文化研究表明共同观念的形成并非依赖媒体的影响。关于种族和文化对审美评判的影响，研究最深入的或许要算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琼斯和基姆·希尔（Kim Hill）两人。他们访问过两个相对与世隔绝的部落——委内瑞拉的黑威（Hiwi）印第安人和巴拉圭的艾克（Ache）印第安人——并将其与其他3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们放在一起比较。艾克人和黑威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以打猎和收割庄稼为生。他们见到过的外部世界的人仅限于几个西方传教士和人类学家。两个部落都不看电视，也不相往来：两种文化已经独立发展了几千年。琼斯和希尔发现所有5种文化都很容易形成各自的审美标准。一位黑威部落族人很可能

与另一位族人有着共同的审美观，正像两个美国大学生之间很容易持有相同的审美观点。因此，一种文化内部的共识绝不会依赖于媒体的传播。

跨文化研究人员测试了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英国、中国、印度、日本、朝鲜以及美国的人们。所有的结果都证明：属于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们在判断漂亮的脸孔时有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

在琼斯和希尔的研究中，来自巴西、美国、俄罗斯的人们和黑威、艾克印第安人被展示了一组属于多种族、多文化的面孔（如印度人、美国的非洲后裔、高加索人、亚裔美国人、欧洲人、巴西混血等）。这5种不同的文化在对美的评判标准上有很重要的相同之处。例如，黑威人和艾克人比起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们更易彼此形成共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共属同一种文化——他们并非如此——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面部特征，并且他们对自己脸部特征和照片上人们的特征的相似程度非常敏感。例如，尽管艾克人从未遇见过亚洲人，他们对亚裔美国人的面孔很好奇，深深地被这些面孔所吸引，他们意识到这些面孔与他们有相似处。艾克人总的来说不太喜欢美国非洲后裔的长相，并且他们在背后管这些欧洲的人类学家们叫“皮塔·扑库”（Pyta Puku），意思是“食蚁兽”。

因为黑威和艾克人从未遇见过亚洲人和非洲人，欧洲人也只见过几个，他们也并不习惯使用科学家的评分标准，所以他们的文化竟然与西方文化有如此多的一致，这一点让人感到好奇。琼斯发现了很多共识之处。所有5种

文化影响下的人们都被有相似几何比例的脸所吸引。他们喜欢颧骨和下巴小巧精致、眼睛与脸的长度相比较大的女性面孔，琼斯把这些特征称为“夸张了的年轻标志”，这与提到过的其他跨文化审美研究中的特征相似。例如，心理学家米歇尔·卡宁海姆（Michael Cunningham）发现漂亮的亚洲女子、西班牙裔美国女子、加勒比黑人女子和欧洲女子具有共同的特征：眼睛大、颧骨高、下巴小巧和双唇丰满。

关于哪些面孔漂亮，人们的意见倾向一致。人们在不同人种的不同面孔里找到了吸引人的相似特征。个人品味比民间的至理名言重要得多，更让我们信服。尽管进化心理学还确定不了美丽容貌确切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将要进行的研究表明：美或许要适应观者，这正符合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提出的观点。

几千年以来关于什么构成美的答案一直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正如我们看到的，数学的审美观可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丢勒、达·芬奇以及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古典美以完整和秩序为核心。维特鲁威（Vitruvian）在所著的《结构》中描述了被他称作“良好形体的男人”，这个男人的脸被平均分成三份，头颅的长度是身高的 $\frac{1}{8}$ 。16世纪，方济各会（托钵修会）的修士卢卡·帕西奥里（Luca Pacioli）在其专著《分割比例》里提出，从微观上讲，人体包含了世界万物之美的公式：“所有度量及其单位都可以在人体找到根源，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上帝用来揭示自然界内在奥妙的比率和比例。”莱昂纳多·达·芬奇

给这本书画了著名插图。他以维特鲁威的标准做为绘画的理想模式，画中人物的胳膊和腿被拉长了，身体被容纳在一个完美的正方形和圆形中。

如果受达·芬奇和丢勒的美之公式的启发，整形外科医生有可能做出完美的缝合整形手术。他们最终在实验室中验证了这些设想。当他们承接了面部重构以及美容的手术任务时，什么将给他们提供指导呢？正如一个整形外科医学院的人士说：“当我构思出一个脸部整容计划后，经常几天内都陷入痛苦中，因为我不能确信这样做是否会使容貌看上去更好一些。”

正像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准，按照人体测量学家莱斯利·法卡斯（Leslie Farkas）的说法，证明不是完全现实的。在对9个标准进行彻底研究的过程中，法卡斯测量了成百上千个女人的面孔，看它们是否在特定界点平分成3等份或者4等份。他测量了脸部各特征之间的关系，看是否鼻子的宽度等于两眼间距，以及两眼间距是否等于每只眼的长度。他还检验了嘴的宽度是否是鼻子宽度的1.5倍，而且鼻子的宽度是否是整个脸宽度的1/4。这些标准还预示了耳朵和鼻子的高度和倾斜度是相等的。

其中的一些比例在任何人身上都找不到，或者极为罕见。一些比例并不使面孔赏心悦目。另外，一些无法区分女人的面孔是否有魅力。法卡斯测量研究的范围仅仅限于欧洲女子的面孔。整形外科医生小厄尔·梅特瑞（W. Earle Matory, Jr.）测量了400个来自不同人种和种族的群体中

有吸引力的面孔。他发现仅有少数几个面部狭长的欧洲人有适合古典标准的鼻子形状（鼻子的宽度等于两眼的间距）。这样狭窄的鼻子实际上在漂亮的亚洲人、非洲后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的脸上根本看不到。亚洲人和非洲人的鼻子通常较宽，鼻尖比典型的欧洲人宽平，鼻子突出的角度也稍有不同。整形外科医生过去常常付出太多的努力使鼻子变窄，以致于结果出现了三角形的、带小褶或者刻痕的鼻尖。

人们评价美的热情仍然很高，并且难以平抑。现在兴趣的焦点集中在一个特殊的数学比率：“菲”（Phi），或者称为黄金分割（也称为黄金比例或者神的比例）。“菲”以希腊雕刻师菲迪亚斯（Phidias）的名字命名，它表明对一条线段或者一个数字的分割，其较小的部分和较大部分之比等于较大部分和整体的比率（近似等于1:1.618）。人们认为这个分割点是分割线段时就审美观点而言最令人赏心悦目的点。短、长边之比符合这个比率的长方形被称作黄金矩形。人们相信它是所有四边形中最富美感的。

在生物学界，这个比率以各种形式得到体现。我们只需看看我们的手就会找到：人类每一根手指的三个接合点彼此都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每一节大致是下一节长度的1.6倍，从距掌心的最近点到最末梢皆是如此）。一旦某个好事者带上测径仪和量角仪，从贝壳、花瓣到建筑设计的形式和外貌，他们好像在哪儿都能找到这种比率。五角星，毕达哥拉斯式兄弟会的象征，其组成线段和相邻短线段的比符合黄金分割比率。黄金分割在优美的音乐和诗歌

中同样可以找到，包括巴赫的《神游》D小调中7对间奏和沃兹涅先斯基（Voznesensky）的诗《戈雅》中的叠句。

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把黄金矩形当成科学心理学这个新领域中首批研究的对象之一。1876年，他把10个不同比例的白色矩形摆放在一张黑色的桌子上，问受试者哪一个从美学角度讲看起来最让人舒服。35%的人们表示更喜欢符合黄金分割比率的矩形。40%的人选择了接近这个比率的矩形。没人把黄金分割比率当成是最不喜欢的比率。之后，费希纳测量了22家博物馆和艺术长廊的2万张画，在此基础上收集数据，看伟大的艺术作品的矩形装饰框是否都有黄金分割比率的倾向。但是结果发现，黄金分割比率并不是这些名画高和宽关系的必要特征。费希纳实验后的150年里，没有人能赞同黄金矩形是更好看的矩形这一观点，也没有人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解释为什么它更好。许多人摒弃菲迪亚斯的美学理论，认为这是命数的幻想。而同时另外一些人坚持认为尽管他的理论没有足够的证据，但它确实体现了真实存在的现象。

如果了解检测矩形的难度，就能想象出证明人体复杂结构是否符合黄金分割的难度有多大。艺术历史学家凯耐斯·克拉克曾不无遗憾地说：符合维特鲁威构想的人的比例并不能保证身体形状一定是漂亮悦人的。正如他所说的：“严格从几何学角度讲，当黑猩猩匀称的四肢被容纳在同一个圆和正方形中时，它的结构可能比人体更令人满意。”

人们还试图验证一张漂亮的面孔是否以黄金分割为特

征。整牙医生罗伯特·瑞凯兹 (Robert Ricketts) 做了各方面广泛的测量工作，他仔细察看了10位模特颇具魅力的脸。他在水平、垂直和深度的测量值中，以及在测定X光下照出的骨架的时候发现了黄金分割。他甚至深入到牙齿的形状和大小中去寻找。这样看上去脸便有了一种独特抽象的美，好像蜂巢一样匀称和协调。整形外科医生小厄尔·梅特瑞也在富有吸引力的亚洲人、非裔美国人和中东人的相貌中找到了黄金分割的许多例子。

迄今为止，对黄金分割的研究仅限于测量漂亮的模特。还没有人把漂亮的脸与不漂亮的脸进行测量比较。有可能1：1.6的比率是正常人的脸上某些特征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能帮助我们区分美与一般，甚至美与丑。在人的面孔上，从发际到眉毛、眼睛、颧骨、鼻孔、嘴唇、下巴等等有许多测量点。有些距离符合黄金分割，但是有些距离却不符合。我们可能从脸上找出上百个指标，很自然有些与这个比率一致，有些则不一致，尤其是“菲”通常是个近似值。没有人因为脸是一个整体就自成体系。“菲”为某些悦人的面部比例提供了最佳设想，这对于外科医生来说或许有用（这一点要到他们比较吸引人和不吸引人的面孔后才会澄清）。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数学公式能在整体上捕捉人类面孔的美。本世纪之前的科学家力图在数学中捕捉美的公式，而本世纪的科学家在生物学中发现了人类理解美的钥匙。

平均之美

生物学对美的研究是从查尔斯·达尔文的表亲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的调查开始的。高尔顿发明了提取指纹的方法、相关统计法，还发明了超声波的高尔顿笛。他还是一位探险家和优生学家。19世纪70年代末，当古斯塔夫·费希纳在德国把一些矩形摆放在桌子上时，高尔顿在英国正在做一些罪犯的合成照片。费希纳到处寻找审美意义上的最赏心悦目的形状，而高尔顿的研究活动几乎与此没有相似之处，但是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对美的研究。当时除了高尔顿本人以外，这一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高尔顿收集了犯有谋杀、过失杀人和暴力抢劫罪的罪犯们的照片。他根据瞳孔的位置进行调整，把照片叠放在一起，并合成出一张稍微模糊的照片。对于高尔顿来说，一张张个人的脸代表了单一主题曲下的多个变奏曲，或者单一直观类型的多个范例。他相信我们的思维“在混合记忆的基础上”形成总体印象，并认为合成照片是我们头脑中的形象的复制品。

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合成照片结果比单个人的脸更好看。事实上，合成照片颇具吸引力。高尔顿仔细分析了合成照片虚拟出的“典型罪犯”和单个罪犯的脸，他看到“后者脸上特殊的、邪恶的不合常人的特征已经消失了……因为众人的平均相片已经抵消了损害单个人相貌的个

别特征”。

高尔顿没有深入探究其根源，或许因为罪犯的面孔是否有吸引力对他的研究没有任何价值。他在衣袋里装着一张地图和一些大头针，乘坐火车到处旅行，想描绘一张联合王国的“美人图”。每次他看见一个好看的人，就用大头针在地图上戳出一个小孔做记号。结果，伦敦变成一个插缝纫针的针垫儿，而阿伯丁、苏格兰这些地方却没有戳洞。这张地图并没有带来进一步的科学发现。

高尔顿引入的合成照片却保存了下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在大学各届的班级、家庭和朋友圈子里非常流行。他们把自己圈子中的人的照片合成起来，并把欣赏它作为乐趣。正如一个女人在看一张合成相片时说：“欣赏某人所有的亲密朋友在瞬间被合成另外一个人，真让人吃惊、着迷。”我们现在研究这些合成照片是为了找出共性、区分个性并且在对相貌同一性的分析中得到乐趣。如果高尔顿是正确的，我们也会为之着迷，因为合成图像是我们在精神生活中窥视到的情景，是看不见的精神形象的流露。

科学家现在能够在计算机上合成成百上千个数字化图像。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实验室里，他们正在使用数字化合成图像来测试平均化的美。参加这些研究的许多人同意高尔顿的观点：平均化的面孔通常比个人一张张的面孔更有吸引力。把两张或者四张面孔组合在一起只有小的改进，而把32张面孔组合起来做出的合成面孔比单个面孔漂亮得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比合成图像更具有吸引力

（虽然有一些会这样，我们将会在后边回过头看看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少数人）。

大多数人看见娇美容貌时不会想到“平均”这个词。在本书上下文中，平均指平均外形而不是平均美。这个世界上既有短鼻子也有长鼻子，有狭长上斜的眼睛也有圆眼睛，有椭圆形脸也有圆脸，有厚嘴唇也有薄嘴唇，有覆咬合的牙齿也有反齿合的牙齿。人的眼睛对所有这些做出统计数字，求总和再被总数一除，最后得到一个平均值。这些平均数字表现的美可以反映出我们对大自然最佳设计的敏感性。

在大自然中，平均比例经常体现出良好的健康和优秀的形体设计。人们对暴风雨中死亡的鸟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它们当中大部分的羽翼特别长或特别短；而暴风雨中的幸存者都符合平均翼展，这样它们才有最佳的起飞状态和飞翔控制。对人类来说如果婴儿出生超出或者不足一般重量（大约8英磅），他们的存活率比较低。自然界中平均状态和健康如此等同以致于生理学家乔汉·考埃斯莱格（Johan Koeslag）相信在动物交配中也表现出对平均的偏好。他称之为“Koinophilia”。它来自于希腊语中的两个单词：“Koinos”（意思是通常，平均）和另一单词“Philos”（意思是爱）。

1979年，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提出一种基本思想：美即平均。所有人的平均数很可能反映出最佳的身体结构，物种选择的压力使人类大脑布满线路，用来计算各种平均值，大脑也显出对平均值的偏好。西蒙斯把大脑这

种机制称为一个“求脸部平均值装置”。他相信它的功能与合成相片相似。它收集对多个面孔的不同印象，把它们变成合成图像，从而成为美的评判标准。然后我们的大脑以这张合成图像为标准，来评价所见的每个陌生人的相貌。由于我们在进化过程中都是以小群体方式孤立地进行，所以，每个人头脑中的合成图像几乎是相似的。而如今小群体的方式被打破，每个人头脑中的肖像储存库彼此有所不同，这就使人们在评价美时难以一致。

西蒙斯在进化生物学和以上原理的基础上预言：进化压力对群体中的极端的个体不利。如果这个均衡性选择原则起作用，而且具有平均身体特征的人们生存机会最大的话，那么都具有平均特征的人们相互吸引，会使这种生存适应力增至最大限度。

如果说美即平均，那么美不可能是深深植根于大脑的、生来具有的固定观念。人生来具有贮存脸孔和求平均值的机制，这一点具有普遍性，但是以这种机制合成的图像要依靠所见过的面孔。它意味着在一个多文化世界里，人们内在的平均值（存在于头脑中）已经反映出这张具有普遍意义的面孔——一个囊括所有种族特征的合成图像。

有趣的是，美国脸部塑造和整形外科学会已经用图表显示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整形外科手术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了一个眼睑逐渐变窄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眼睑过分夸大（称为过度西方化的）到70年代和90年代眼睑越来越小。50年代，人们崇尚朝上翘的窄鼻子，并且有一个雕塑般的鼻尖。到了90年代，长

有宽鼻梁和圆鼻头的鼻子更受欢迎。化妆风格也处处体现出这些变化。在30年代走红的著名演员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和当时其他影星脸上，我们常可以看到用夸张手法描画的黑重的眼睑，而如今已极为少见。那些浅色调也不再是人们偏爱的皮肤颜色。丰满的双唇一直深受人们喜爱，现在变得更为丰满。所有这些变化都体现了一个内在平均值。而在求这个平均值的过程中，亚洲人、非洲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特征一直帮助我们调整标准，重新想象美。

相似的家庭成员

长相接近平均值表明这是一个身体健康、可以结为伴侣的同伴。然而，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有一些特定面孔比其他任何面孔所起的作用都大。那就是家庭成员的面孔。这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常被那些与自己长相有惊人相似之处的面孔所吸引。在这个问题上，弗朗西斯·高尔顿又在照片上寻求答案。他仔细观察了地方报纸上的订婚照片，结果发现订婚双方常常外表相似。不仅是他们的吸引力，而且包括头发颜色和个人面部特征均处于同一水准。后来进行的对订婚双方和已婚夫妇的研究证实了高尔顿的观察结果：伴侣的长相一样确实是常有的事。因为有相似的健康状况和日常饮食习惯，彼此下意识地模仿对方的面部表情，相互借鉴对流行时尚的品味，所以夫妇之间可能长得越来越像。其实，探其根源，从一开始就存在这

种丝丝缕缕的貌合之处。

大多数夫妇在许多方面很相似：他们来自相同的宗教和种族背景，智力水平旗鼓相当，个性特点也极为相近（例如两人都属于外向型的性格）。伴侣的相对身高、体重、头发颜色，甚至在诸如耳垂长度和眼距等地方的细微特征上也彼此相像。话说回来，并非所有夫妇都般配，而且处处相配的夫妇也很少见。

被长得像自己的人吸引，人类管这叫做“般配”。无独有偶，在动物界也是一样的情形。经典的研究要属科学家派屈克·贝特森（Parick Bateson）用日本鹌鹑做的实验。先是把鹌鹑同兄弟姐妹在一起混合饲养一个月，然后把它们隔离开直到性成熟。为检查它们交配的优选情况，贝特森把鹌鹑放在一个装有几排笼子，中间有个小过道的平台上。笼子里是彼此间不熟悉的鹌鹑（或是堂兄弟姐妹或是没有亲缘关系的鹌鹑）或者是相互熟识的鹌鹑（一块养大的兄弟姐妹）。他允许这些鹌鹑沿着过道来回遛达，也允许它们向各个笼子里窥视（贝特森给这个平台起了个绰号叫做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结果雄鸟和雌鸟都用比看其他鸟更长的时间盯着它们的堂兄弟姐妹。

当贝特森把鸟儿成对地放在一起时，堂表关系的对鸟比陌生的对鸟和亲兄弟或者亲姐妹关系的对鸟早3—5天产蛋（其他对鸟最后也产了蛋）。贝特森把鹌鹑的交配选择情形解释为：优先选择那些似曾相识却又略感新鲜的配偶。他相信这种择偶标准在我们人类中也真实存在。正如他所写的：“人类或许在近亲结婚的代价和远亲结婚的优

越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样做也许依赖于早期同鹌鹑相似的经历。许多源于文化和个人经历的因素会对人类择偶标准造成影响，但是其中一个影响是：人们往往迷上一位与亲密熟悉的自家人不同，但又并非与他们大相径庭的异性同伴。”

不管是不是最合适的远亲结婚的对象，人们总是被那些像自己家庭成员的异性吸引。产生这种偏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面孔符合他们内在的平均标准。家庭成员是人们脑中优秀外形设计的模板。他们的外貌与我们所继承的特征之间有无法改变的联系，而且他们也是我们最初投入亲情的对象。无论是哪种原因，当我们看到与自己相像的面孔时，确实会感到眼前一亮。在希区柯克（Hitchcock）执导的《爱德华大夫》中，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扮演了一位精神病医生的角色。她对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讲的话解释了以上全部内容。她抱怨说诗人“总是让人们头脑里充满各种错觉。他们娓娓道来爱情故事，仿佛爱情是一首管弦乐团的合奏曲，要么就是众天使在凌空飞翔。”“难道不是吗？”派克反驳说。“当然不是，人们按照自己所设定的爱去爱，因为他们对某种使他们想起自己父母的、熟悉的头发颜色、声调或者行为举止反应敏感，或者有时候……干脆没有原因。”

人们还发现画家的肖像作品有时带有与他本人脸部相似的特征。或许画家不由自主地听从了潜意识的流动，毕竟家人的音容笑貌是他头脑中的美丽风景线的一部分。据说丢勒在1518年为皇帝马克西米安一世绘制的肖像画中

有这位画家1498年自画像的影子。又有人提出名画《蒙娜丽莎》初始意图是勾绘阿拉贡女公爵伊莎贝拉的秀貌，最终却以莱昂纳多·达·芬奇本人的相貌特征为基础创作而成。上乘佳作必须突出被画人的典型特征以求得形似。不幸的是，不论是介入个人感情因素还是夸大典型特征都不能让被画人满意，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更漂亮一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画家常比被画人对画更满意的原因。

女人味儿十足的女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勾勒出一张漂亮的面孔。它看上去符合大众的平均标准，并且带有很多家庭成员的代表性特征。然而，如果按照美即平均的定义我们会得出这样的推论：美无区分性。事实上，一张面孔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必须有罕见或不同一般的形状或大小。即使不为容貌增色，这样的特点也会引得行人用目光追随、让人过目难忘。请注意一下漫画作家是如何夸大每张脸的显著特点的，然而通过漫画，人们通常会更快、更准确地辨认面孔，甚至超过没有经过变形的真实形象。漫画像常常更像本人。但是漫画像也常常使脸变得缺乏吸引力。

如果你坚持认为一张有魅力的面孔因为风姿卓绝不大可能融入众人之中，那就想一想限于一般标准的模特——并不是超级模特，这里指的是在日报上做商品广告的人。尽管你看了很多次广告，你却不太可能在大街上辨认出这张脸。同样，在华丽盛大的选美大赛上，桂冠得主常常显

得貌如常人——极具韵味却毫不惊艳。看上去这张面孔好像是熟悉的，它挺好看，与我们见到的其他面孔相比是张很少出格的翻版。这正是夺冠者洋溢出的感染力的一部分。人类生来喜爱平均，人类面孔正是经过日积月累的平均逐渐进化来的，而这一特点同时也保证是现在的人类面孔而不是其他模样吸引注意力。也正是为了适应人类的发展，婴儿尤其被具有平均特征的面孔吸引。

但是又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一张美丽的面孔的确是风姿超群、卓然于世。因此，一些独具韵味、出类超群的面孔反而显得很美。超级模特符合T型台和电影屏幕上要求的标准，并非合乎大众标准。纳奥米·坎贝尔和克里斯蒂·特林顿的嘴唇没有遵照大众平均值，凯特·莫丝突出的颧骨以及精巧的下颌曲线同样不合一般。正如我们所怀疑的，符合平均标准的大众型脸孔得分在3和4分之间，达不到美的极限——5分。大众型脸孔虽然富于吸引力，但通常却不是最美丽的。

平均不必是自然选择中美的惟一评判标准。当追求配偶出现竞争时——达尔文提出的异性选择的前提——那些具有某种极端特征的动物常常成为首选目标。最有名的例子是孔雀的尾巴，有类似这样的极端性特征意味着动物对疾病和寄生虫天生就有抵抗力或者是公开展示它能积聚充足能量所以“长得起”这样光彩华丽的独特的东西。极端性特征使动物充满诱惑力，吸引其他成熟异性，这一有利影响抵消了它们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

漂亮的容貌的确具有极端性特征吗？心理学家大卫·

皮瑞特（David Perrett）收集了大量脸部图像，让人们依据吸引力打分，然后他把最英俊的男人和最漂亮的女子的图像重叠起来，并且同全组的合成图像相比较。他发现前者的合成图像比后者的合成图像更有吸引力。进一步说，如果他通过漫画夸张的形式夸大这些漂亮面孔与普通面孔相异的地方，它们甚至变得更漂亮了。再加上一句，这仅适用于女性面孔而不适用于男性面孔。

然而夸大所有特征却不会使脸孔看上去更美。在皮瑞特的研究中，最富于魅力的女人仅仅在少数几个地方与其他女人不同。她们长着比较细致的下颌骨，有一双相对脸的长度较大的眼睛，嘴和下巴之间的距离较短。所有这些特征夸大了成年女子与成年男子相貌不同的地方，并且也夸大了脸部的年轻特征。使用截然不同的方法进行的其他几项研究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心理学家维克多·约翰逊（Victor Johnston）在自己的网站<http://www.psych.nmsu.edu/vic/faceprints/>上装有一个叫遗产算法的计算机程序。操作者在这里可以拟造出漂亮的网上后代。开始先给随意抽取的30张面部图像打分，然后程序把得分最高的图像与另外一张图像合成，塑造出来的新图像替换掉评分最低的图像。在评选数轮图像后，观众创造出一组越来越漂亮的人物图像。按照约翰逊的观点，一开始展示的30张面孔代表了“面部空间”中的170亿个点（用以区别不同脸孔的假设出来的点）。成千上万的人们切换着这170亿个点，最终他们合成了一张女人的面孔：嘴唇较丰满，下颌骨比较小巧，比起普通人来长有一

个更小的鼻子和下巴。在一项研究中，这个图像的估算年龄是24岁，比经过合成塑造出她的前一批人要年轻2岁。然而在她消瘦的脸上甚至有使她看上去更为年轻的比例。她长有一个14岁女孩的双唇，眼睛到下巴的距离是属于一个典型的11岁女孩的。

《时尚》和《世界公民》（Cosmopolitan）杂志的封面女郎也长着比一般“漂亮”的年轻女子更大的眼睛，更小的鼻子和更丰满的嘴唇。当把她们的脸部比例输入计算机时，计算机猜测她们的年龄在6岁到11岁之间。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模特事实上看上去像把7岁孩子的头接在成人的身体上，也不是说她们脸部各种特征的几何构造使她们显得如此年轻以致即使是做了最精密的推断的计算机也大大低估了她们的实际年龄。这项研究的创始者道格拉斯·琼斯把她们称为“超常刺激体”，指这些女子令人着迷的特征被夸张地表现出来，超出了在自然界中的常见的比例（至少在成年人中）。

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为刺鱼做了一个超常刺激体——他称之为“性炸弹”，当成熟的雌刺鱼产卵时，腹部鼓胀。使用一支模仿雌鱼身体形状的仪器——大致细长，呈银白色并带有一个圆圆的“肚子”——常会激起雄鱼的交配行为。而当道金斯把这个模仿器做得更圆，形状更像鱼时，更大的性欲被激发出来。夸大显著特征比描绘现实更起作用。整形外科医生让女人们的嘴唇变大，眉毛高挑，鼻子瘦长，结果便塑造出人类的“性炸弹”。

婴儿的脸几乎显示不出性别。人们难以分开男婴和女婴，许多并无恶意的陌生人常把它们认错。到了发育期，性别差异完全显露出来。在青春期，睾酮塑造了男孩子的颧、下巴和眉峰。男性面孔一般比女性面孔大，尤其当男人长有一张低陷的面孔。他们的脸较方，因为长有突出的眉骨和宽阔的颧，因而显得缺少柔和的曲线。高悬的眉毛使他们的眼睛看上去比女性眼睛陷得深，也更小一些。因为男性的鼻子常比女性的鼻子形状突出，所以眼睛显得比女性的眼睛距离近（一只小鼻子，尤其是塌鼻梁的鼻子，给人一种眼距较宽的错觉）。男人的鼻子和嘴比女人宽。有人提出男性宽阔的鼻子和嘴发展成形是由于它们能够更有效地把空气吸入到肺部，从而为维持男性较高的新陈代谢和血红蛋白数量提供充足的氧气供应。

女性则保持了童年时代光滑的前额和纤巧的鼻子。因为女子的额头光滑，睫毛长而粗硬，眼眉不仅细而且与眼睛的距离较远，所以她们的眼睛好像更大一些。再者因为女性的脸较平，鼻子小巧，颧骨不太发达使得脸部上宽下窄呈锥形，所以她们的颧骨好像更为突出。一位年轻女子鲜红的双唇轮廓线和周围的皮肤由于脂肪而显得丰满润泽。在发育早期，脂肪在年轻女孩身体中的分布发生了改变，14岁时，女孩的嘴唇达到最丰满的程度。与男子的嘴唇相比，她们的上唇从侧面看曲线精巧而外翘。

大眼睛、高颧骨、丰满的嘴唇、瘦小的脸庞、纤巧的颧，处处夸张地体现了女子的娇柔。维克多·约翰逊相信漂亮女人独有的瘦脸、丰唇、小颧和小下巴正是女性体内

雄激素少而雌激素多的体现。有些女子在发育期内，体内男性荷尔蒙达到最小值（因此脸部小而且颜面低），而像雌激素这类的女性荷尔蒙达到最大值（因此嘴唇丰满）。

当女人们使用化妆品增加自己的美感时，她们也正在突出这些女性标志。她们用镊子拔眉毛，使眉毛变轻。这样看上去好像更细一些，离眼睛的距离也更远（拔眉毛总是从眉毛的底部拔起，目的是不仅要达到细眉的效果而且眉毛要离眼睛远）。在葛丽泰·嘉宝时代，眉毛被描得非常重。正如化妆艺术家凯瑞恩·阿科茵（Keryn Aucoin）指出的：“正确地拔除眉毛会使眼睛显得大得多，并且整张脸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染睫毛膏强调了女性原本就长而粗硬的眼睫毛，画眼线和彩妆强调了眼睛周围整个区域。

女人们通过涂腮红突出颧骨。有关上妆方面的指导告诉她们要把腮红涂在面颊上的“苹果”上（指微笑时面颊鼓起来像苹果的部位）。这个部位并不是平常自然情况下脸颊浮起红晕的地方，而是能完美地突出颧骨的位置。双唇也要突出，有时用唇膏（通常为红色）改变其形状。现在的化妆程序之繁复不亚于一个完善的武器库，它能够使嘴唇增大，包括隆唇、皮下注射脂肪或胶原蛋白以及嵌入V型狭条状填充物。20世纪早期，在使用胶原蛋白之前，妇女们通过重复一系列由字母“P”开头的单词的方法使嘴唇变圆，向外噘起。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曾说过她不会把女权主义文学作品送给那些表情矫揉造作的女子。在她1963年创作的作品《海滩之

书》（Beach Book）中，年轻的格劳瑞·斯泰尼（Gloria Steinem）承认她常吸吮手掌根：“它使单薄的嘴唇变得丰满，丰满的嘴唇变得坚挺，同时也会使胖脸颊变瘦。”

高衣领和高发型会使一张小而且颜面低的面孔显得更小一些。高发型在女人中更流行（如果男人头发长了，他们会把头发向下梳，让它向下长）。因为高发型会改变整个面部的比例，使重心向头顶移动，增加女性气质。同样高衣领也会缩短颜面低的脸。女人们还通过把头部各部位摆成特定的姿势以夸大某些面部比例。戴安娜王妃著名的羞涩一笑使下巴下拉而眼睛上挑，突出了眼睛，使它们显得更大，同时使她的下巴和颞尽可能小一些。一位同事告诉我如果给一位日本女子拍照，她会自动采取这种姿势，使用别的姿势是绝不可能的。

女性的脸看上去更像孩童的脸是因为她们保持了孩子柔和的面部轮廓和基本几何特征。心理学家山口先生（Masami Yamaguchi）请人们使用特殊设计的软件分别拟造一个孩子、成年人、男人和女人的普通形象。结果人们塑造出非常相似的女性和孩子的形象，以及非常相似的男性和成年人的形象。

有些人提出人们，尤其是男人，对女人身上具有的“neotenous”特征（即幼儿特征）反应敏感。幼儿特征会自动激起人们心中希望能照顾哺育的天性，而男人通常被认为喜欢弱小有依赖性的面孔。然而，在成年女性的面孔中，真正幼儿般的面孔并不如富有女性气质和青春期的朝气蓬勃的面孔那样受欢迎。心理学家莱斯莉·赞伯劳维兹

(Leslie Zebrowitz)对“娃娃脸的”孩童和前额过于饱满，而且长着细长高挑的眼眉，大眼睛和小鼻子的成年人做了研究。人们倾向于把这些成年人当成天真、幼稚、弱小——一句话，孩子气的人。人们认为同样是长着幼儿般的面孔，女人要比男人更具有吸引力。虽然如此，一般说来，仅仅是对于处于幼儿期的孩童，人们才认为他们的孩子气实在可爱可亲、富有吸引力。妩媚迷人的女子或许长着一张像孩子一样的面孔，但远不像婴儿的脸那样极端，因为它同时也倾向于有类似高颧骨这样极具魅力的成熟特征。科学家克劳斯·阿兹旺格(Klaus Atzwanger)和卡尔·格莱玛(Karl Grammar)曾经请男士评价一些女子照片。结果证明，受测者并不认为越吸引人的女子越孩子气。

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会变长——向男性方向发展。消瘦的脸变得更长，眼眉耷拉下来离眼睛更近，耳朵和鼻子里面的软骨组织使它们显得比以往还长，而且上嘴唇因为缺失皮下脂肪从侧面看变得扁平。年少时曲线分明、凹凸有致的嘴唇变直成为一条平宽的线。尤其男人的眉毛本来就离眼睛近，鼻子大，嘴唇厚，消瘦的脸也比女子的脸长，所以上了年纪的男性的面孔看起来越来越男性化。处于任何年龄阶段的女子，如果她长有一双小眼睛、相对大的鼻子、宽而薄的嘴唇，她看上去更显老，更男性化，缺少吸引力。看上去富于女性的娇柔就是看着年轻。一些科学家相信我们对美的测评事实上是对年轻与女性化特征结合程度的测评。

神秘的男性

围绕女性面孔谈一谈要比聊聊男性面孔容易得多。这是因为我们对女性美的情况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当人们看见一位英俊男子的时候，差不多很容易达成共识，但是要想描绘他，结果证明是难了一些。

社会学家艾伦·玛泽（Allan Mazur）一直在进行一项研究。他研究的课题不是什么使男人本身具有吸引力，而是是什么使男人看上去具有统治他人的夺人气势。他描绘了一个对别人有控制力的男人的统治型面孔，并且拿它和一个易受人控制的男人的屈从型面孔做比较。玛泽还进行了一项实验：请人们确定一下西点军校1950年那届男学员的脸从表面上看是屈从型的还是统治型的。这项试验事先没有给人们任何脸和内在气质之间关系的指导。结果证明做出判断是很容易的，而且得出的判断基本一致。统治型面孔的形状呈椭圆形或长方形，眉脊粗重，眼窝深陷，下巴棱角分明。玛泽把这些特点称为“成熟特征”。人们通常也会认为他们的模样挺俊朗。长有屈从型面孔的人脸型倾向于圆形或者呈狭窄的形状，大多长着一副支楞出来的耳朵。玛泽发现长有统治型脸的学员们在三四年级和后来的军旅生涯中往往赢得了更高的军衔。

长有统治型相貌的男人不仅在战斗中是成功的，在床上也是如此。对读高中年龄的男孩子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男孩子的相貌越具有统治性，他的性欲越旺盛。

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长有统治型面孔的男人，其行为表达（例如姿势、体位和与消极相反的积极行为）所体现出的性魅力受到女人们的高度评价，尽管她们并未因此觉得对方的外表更惹人爱慕。男性特征不仅体现在面部骨骼结构上，而且也体现在身体肌肉形状上。为男性增添魅力的一个特征就是长有一副强健有力的咀嚼肌。想一想布拉德·彼特（Brad Pitt）和罗伯特·德雷福（Robert Redford）两人肌肉发达的下颚，那便是一个好的证明。咀嚼肌是长在面颊上的一块短小而有力的肌肉。当我们咬紧牙关，上下齿相叩或者磨牙时，就是在使用这块肌肉。这块肌肉使下颚外表呈方形，过度使用会使咀嚼肌变得肥大。这是一种临床病，后来通常出现在那些花大量时间咬紧牙关并且爱嚼口香糖的青年男子身上。两位牙医称之为“获得性咀嚼肌相貌”，并且说这使病人的脸看上去颇具吸引力（当然是在不嚼口香糖的时候了）。

因为脸发只在度过发育期后才长出，所以颜面上的胡子、短髭、连鬓胡和山羊胡会使一张脸孔显得更为成熟；而且因为只有男性的脸发才长得茂密，这也就突出了男性特征。心理学家迈克尔·卡宁汉姆认为蓄胡子会使那些长着娃娃脸的男子看上去更具有吸引力，显得更强健有力。秃发男子常常是自己的娃娃脸影响下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向后退延的发际使他们看起来像个长着大脑门的娃娃，脸上的男性特征变得不怎么突出了。

本世纪的男子蓄的颊须比以前几个世纪稀疏（除去本世纪60年代以外）。部分原因是由于医学上不赞成留浓密

的颊须。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细菌在传播疾病中的作用，胡子被看成是贮藏细菌的场所。早先医生建议人们蓄胡子用来保护喉咙，阻止不洁空气吸入肺部。但是到了1907年，一项实验否定了以前的结论。当时，一位法国科学家和两名男子在巴黎市中心漫步，这两名男子一个蓄胡子，一个不蓄胡子，目的是检验第一名男子是否有健康危险。他们穿过罗浮宫和其他遗址后，每人各自吻了一个嘴唇经过消毒的女子。残留物被刮下来并浸泡在一瓶无菌溶液中。4天后，那名脸颊刮得干干净净的男子的残留物只产生了无害的酵母菌，而蓄胡子男子的残留物中“充满有害的细菌……白喉病菌、引起腐烂的病菌、食物微粒、蜘蛛腿上的毛和其他杂物。”

颊须没有再兴起来。在《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190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一位专栏作家惋惜地说，看到每一张男人面孔刮得干干净净，大大影响了审美效果：“暴露有时是可怕的。后缩的下巴、肥厚的嘴唇、愚蠢的嘴、野蛮的颚、肥软松弛的脖颈，原先隐藏在胡须下不为人怀疑的部位现在全部暴露在眼前……天啊！他问自己，那就是时髦人士一贯的形象吗？”1982年，专栏作家奥托·弗莱瑞克（Otto Fredrick）刮掉了嘴唇上的短髭。“令我惊慌的是，我在镜子里看到一张10多年来不曾相见的脸，我几乎认不出自己了。我的两个嘴角怎么刻了那么多现出不满神色的深深的竖纹？”男人蓄胡须和短髭很像女人们使用化妆品来掩饰缺点，遮盖岁月的留痕。修剪得很好的短髭能使不对称的鼻子或者嘴看起来更对称。颚胡和山羊

胡能改变下巴的表面形状和颞的曲线。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表明：颞胡在脸孔识别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突出男性所有的有代表性的特征或许会使男人更加漂亮。如果看杂志上刊登的广告，我们会发现从广告上注视着我们的是一张张轮廓分明，眉骨、下颞突出，目光锐利，眼缝窄长的脸。在波提切利15世纪80年代绘制的《年轻人》一画中，他通过从不同角度描画脸部的不同部分夸大了这个年轻男子英俊容貌中的男性特征。这位艺术家似乎在正面看着男孩的眼睛和下唇，但是从下面观察他的下巴、鼻子和眉脊。

一些心理学家提出男子汉面孔上刚强硬朗的气度或许有某些限度，过或不及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心理学家迈克尔·卡宁汉姆认为女性在寻找配偶时有“多重动机”。她既希望证明他是勇敢机智的人，又希望他能把这些优秀的才智投入到照顾她和可能出生的孩子上。然而一张传达出统治意志的面孔使她觉得没法依靠，担心对方不愿意投入。卡宁汉姆的研究发现，女人常被一些具有非典型特征的典型男性面孔所吸引。例如，女人喜欢大眼睛的和笑容可掬的男人（微笑这个动作本质上并不会增加一个人的魅力，但是某些笑容却是非常吸引人的）。卡宁汉姆解释说大眼睛是与婴儿相关的特征，它激发了女人心中的母爱。然而，他发现，一般说来，男人的脸看上去越强悍有力，女人就越认为他是一位令人向往的、充满魅力的友伴或者配偶。女人们认为长着娃娃脸的男人不是让人十分渴望的婚姻伴侣，因为这种相貌缺乏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因此也

缺少吸引力。

我们已经看到夸大了阴柔之美的女性面孔更显得迷人。然而，夸大了阳刚之气的男性面孔可能会因此减少吸引力。心理学家广川（Tatsu Hirukawa）和山口（Masami Yamaguchi）拟造出夸大了男女彼此不同特征的“超”男性化和“超”女性化的面孔。他们发现女人们把符合平均标准的女性面孔评为最具吸引力的面孔，而男人们更喜欢超女性化的面孔。两者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发现超男性化的面孔缺乏吸引力。大卫·皮瑞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日本和苏格兰，男人和女人都认为“超”女性化的女人面孔更加迷人，“超”男性化的男人面孔极其缺乏吸引力。他们的的确确发现最具魅力的男性脸形是那些略微有点女性化了的或者是“软化”了的脸。

超男性化的面孔表达的某些个性特征让人敬而远之。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一个体内睾酮分泌旺盛的男人，他的脸被认为不管有什么表情，都比其他男人的脸更具有力量和统治性，但是却缺少善意或友好的表示。这些男人没有爽朗的笑容，笑得比较拘谨。在皮瑞特所做的研究中，一张超男性化的脸孔同样被认为具有统治性，肌肉发达，但是缺少温暖、诚实，显得难以合作，缺少为人父母的潜质。

外科医生保罗·莫赛莉（Paolo Morselli）报告了意大利的一个有趣的病例。一位38岁的男子，无精神病史，脸长得如此凶恶和带有攻击性，以致于在与人交往上，给他带来严重的问题。莫赛莉把这个问题诙谐地称为“米诺托

（Minotaur）综合症”，这种希腊神话中半兽半人的怪物，曾是但丁笔下凶残的象征。这位男子接受了整形外科手术，想把“一张危险的脸变成一张不冒犯他人的脸”。他的颧和眉骨都变小了，并且据他说从那以后人们对待他比以往更友善，他感到了更真实的自我。

皮瑞特的实验只证明了一点：一定程度的女性化特征如果表现在男人的脸上会更具有吸引力。而其他研究均表明，对于男人来说关键是看上去要有男性气质，而不是过分的男性化。过于男性化使人像“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一样外表冷酷、残忍。迈克尔·索斯盖特（Michael Sonthgate）帮人做塑料人体模特，他说男模特总是比较难卖。“你可以一下子卖给一家商店500个女模特，一点问题都没有。然而，如果你送10个男模特，你会发现每个人，上至总裁下至电梯操作员都会对其品头论足：“这个看着像个强奸犯。那个是一个杀人犯。这一个该是同性恋者。”假如一个人体模特的脸有点女性化，生产厂商认为男女顾客都会喜欢。如果它太男性化，看上去就像个罪犯。

在一项实验中，当被问及喜欢怎样描述照片上的特征时，许多男人和女人不经思考地提出这样的组合：漂亮—英俊—迷人—友好—善良—好。女人比男人更容易作出这样的组合。

转瞬即逝的诱惑

脸孔也有它瞬间闪现的信号——微笑、皱眉头、邀请和拒绝。“当你微笑时我仿佛置身于天堂”，凡·莫里森（Van Morrison）在歌词中这样唱道，这种感觉是因为快乐富有感染力。但是微笑不一定使人看上去更好看。一位女子笑唇微启会稍稍为她增添靓色，尤其她若露出整齐的明牙皓齿。而睾酮分泌旺盛的男子似乎不笑时会好看一点，因为他们的微笑不讨人喜爱，或许正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这样的面无表情的动作英雄原型。而男演员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和马特·达蒙（Matt Damon）爽朗的大笑颇能展现他们的魅力。

接受某种事物时的表情影响美。除了遇到光线外，我们在兴奋时，瞳孔会自动放大。当摄影师通过修饰描画增大照片上的女子的瞳孔时，男人们认为她看上去更迷人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瞳孔放大才使他们做出这样的反应（他们认为这位女子看上去更有女人味儿、更漂亮，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她的瞳孔变大了）。当女人们看男子的照片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她们也觉得瞳孔变大的男子更具魅力。在一项心理测试中，当异性的眼睛通过药理学方法增大时，男人们更乐于自告奋勇地与这位女子结成伙伴，并且女人们也乐于自愿与这位男子结伴。人的眼睛像照相机镜头的孔径，睁大双眼会使更多的光线进来，但是视野的深度值缩小。睁大的眼睛给我们一种类似在模糊焦

点相机里看到的柔和的、笼罩了一层薄纱似的景象。

当我们产生性兴奋时，我们嘴唇就像乳头一样变红、膨胀、更为凸起。戴斯蒙德·莫里斯相信双唇之所以进化成现在的形状是为了突出这种特征，同时女士化妆品也用来夸张这种特征。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嘴唇也能噉起并会在瞬间缩回，但是只有人类的嘴唇长时间地露出粉红色的唇黏膜。在动物界存在许多这样的动物：它们的上体特征模拟了它们的生殖器官（例如，雄性山魈长着红色的脸，蓝色的面颊，恰恰是模仿了它们红色的阴茎和蓝色的阴囊）。戴斯蒙德·莫里斯提出女人的嘴唇“模仿了唇状生殖器”。

尽管脸孔可能不完全是出于对性器官的模仿，但是作为表达性兴趣的信号，它自身的魅力增加了。照片刊登在女士时尚杂志上的时装女子或含或露挑逗性的表情，使她们的美貌更加迷人。正如亚历山大·利勃曼（Aleander Liberman）以前谈到《时尚》杂志时说过：“优秀的模特……注意挑逗摄影师——用动作、神情和姿态——使摄影师瞬间沉醉在爱河，急切捕捉这一转瞬即逝的美的诱惑。”

对 称

当摄影师安卓·葛泰兹（Andre Kertesz）在摄影室给蒙德里安（Mondrian）拍照时，发现这位伟大的造型画家修剪了短髭，这使他的脸显得对称一些。像蒙德里安一样，大多数脸孔都有一些造成不对称的小起伏。这就是为什么

人们通常为了掩饰某一面“瑕疵”，喜欢从一侧或另一侧被拍照的原因。玛丽莲·梦露总是要求从右侧拍照。据说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后来的温莎公爵）对展示左侧脸有强烈的偏好，为此他否决了展示其右侧脸的硬币设计。

不对称是偏离完美对称的随意波动，不对称的平均值为零。例如，我们设定左右眼、手腕和乳房的尺寸是一样的，而事实上它们因人而异、变化多端。造成特征偏离完美对称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身体发育过程中暴露于受到污染的、有寄生虫的环境，营养不良或者疾病。脸部的不对称会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生物学家兰迪·硕恩希尔（Randy Thornhill）和安德斯·穆勒（Anders Møller）发现在许多物种中，身体不对称的动物的生存和成长概率较低，生殖能力也较弱。

如果对称像平均一样是健康良好、适应力强的外在表现，那么对称也应该是吸引我们的特征。但事实上因为符合平均标准的面孔往往又是对称的，所以很难辨别这两种影响。不管男人、女人，长有对称的面孔确实显得有魅力。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能证实这一点：有些研究则帮助我们认识到定向不对称的价值，并证明它们反而是自然、漂亮的。

在所有物种中，定向不对称并非漫无方向、波动不定，而是有明显标志的：偏手倾向就是定向不对称的一个例子。我们的右脑控制大部分面部表情，所以左半脸的表情，尤其是那些有意的、自控的表情显得比右半脸夸张。我们的左脑控制语言思维，所以当我们讲话时，往往更多

地移动嘴的右半部分。

科学家通过镜子影像对左—左脸或右—右脸进行合成，塑造出对称的面孔。但是这些面孔的表情显得不自然。例如，某一个对称合成像看上去面无表情，另一个表情却紧张、不自然。如果脸的结构中线稍有偏离，会使每张合成图像的面部特征发生错误的变形。所以要检验对称的脸是否具有吸引力，惟一的途径是制作合成整张脸孔的、不带表情的镜像照片（即每半边脸都由左右两边脸合成）。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得出结论：对称的脸更迷人。当然，一张对称的脸并不见得漂亮。如果使用从1到10的评分标准，对称的面孔往往得6—8分，而不是满分10分。可见对称和平均一样只是容貌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它们无法担保面孔美艳惊人、卓越超群。

其他

婴儿和成年人都会自动认出美丽的面孔。人们总是很快对外表作出判断。对于哪个人长得漂亮，他们常常有一致评价。他们很容易依据女子容貌的对称、平均以及夸张的女性特征机械地作出判断。这表明使一张面孔产生美感的几何特征具有普遍性。人脑对这些特征的感性认识取决于由自然选择长期形成的脑神经路径。

新墨西哥大学的心理学家维克多·约翰逊（Victor Johnston）做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他在受测者头皮上放置电极，观察当他们看见一些面孔时，大脑的电生理会发

生什么变化。约翰逊发现LPC（与事物相关电势的后正极分力）与超凡美貌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正常情况下，LPC对有“情感价值”的刺激作出反映，从而被激起，换句话说，它命令注意力集中，产生一次情感冲击。当人们注视着美丽脱俗女子的秀貌时，电生理信号显示出较大的振幅。他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美对人们产生的震撼在大脑中有所显示，也就是说当我们盯着一位漂亮女子时，电生理学方法测出大脑正处于兴奋和注意力集中的状态。

我们也知道在右半脑某些特殊区域（颞叶和枕叶）能更快和更准确地识别面孔。在对右半脑或左半脑受过创损的病人进行的调查中，我发现只是那些右脑损伤的病人在识别面孔和面部表情时表现出明显的困难。大脑在识别面孔时的不对称性还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例如，右侧脸仿佛比左侧脸更“像”整张脸。如果我们做镜像合成图像，合成右侧脸的图像更能抓住与整个脸相似的特征。这种现象引起了众人的猜想。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右半脸表现的是一个面对公众的自我，而左半脸暴露出一个隐蔽的自我。一些心理学家还提出脸部不对称揭示了个人在公开的自我和隐蔽的自我之间精神冲突的程度！

这种解释建立在感知神经的基础上。视觉神经系统在大脑中是交叉的，所以我们左面视野内看到的事物最先到达右半脑。当我们与一个人正面相对时，他右面颊的影像直接投射到我们的右半脑，而其左面颊的影像因为路径稍有些绕远所以后到达我们的右半脑。大脑首先对我们所接受的右面颊的特征信息进行加工，这使得右面颊的特征在

我们大脑中占据优势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两个右半脸合起来看与整个脸更相似。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更喜欢周围人为自己所熟悉的一面的原因。对个人而言，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反像，因为他们已经看惯了镜子里反映的自我形象。他们的朋友也比较喜欢他们照片上的形象。

投射到我们右半脑的影像，对于判断容貌是否具有吸引力起决定作用。心理学家大卫·皮瑞特、D·马歇尔·勃特（D. Michael Burt）和同事们把不同人的、漂亮程度也不同的半边脸合并在一起塑造出合成面孔。结果发现当较有吸引力的那半边脸把影像投映到观者右半脑时，他们感觉到整张脸都具有吸引力。

我在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里研究了大脑如何识别以及如何对美作出反应这一领域。我和同事们一直在寻找用来识别面孔和区分不同面部表情的神经系统路径。我们把重点放在研究大脑中用于高层视觉和情感习得的区域，尤其注意研究右颞叶和一个称为扁桃核的底层皮质下的结构。我们已经证实：存在用于识别面孔和识别类似恐惧等表情的大脑神经系统，而且它与大脑的其他部分相分离，自成一统。

在与之相关的一项工作中，我的同事汉斯·勃瑞特（Hans Breiter）、斯蒂文·海曼（Steve Hyman）和布鲁斯·罗森（Bruce Rosen）一直在绘制大脑神经网络的路径图，试图记录人们感受喜悦、受到奖赏或渴望奖励的心情。我们付出努力，目的是寻找一个框架。当人们看到美貌佳人不禁作出愉快反应时，我们可以用这个框架预测此时人们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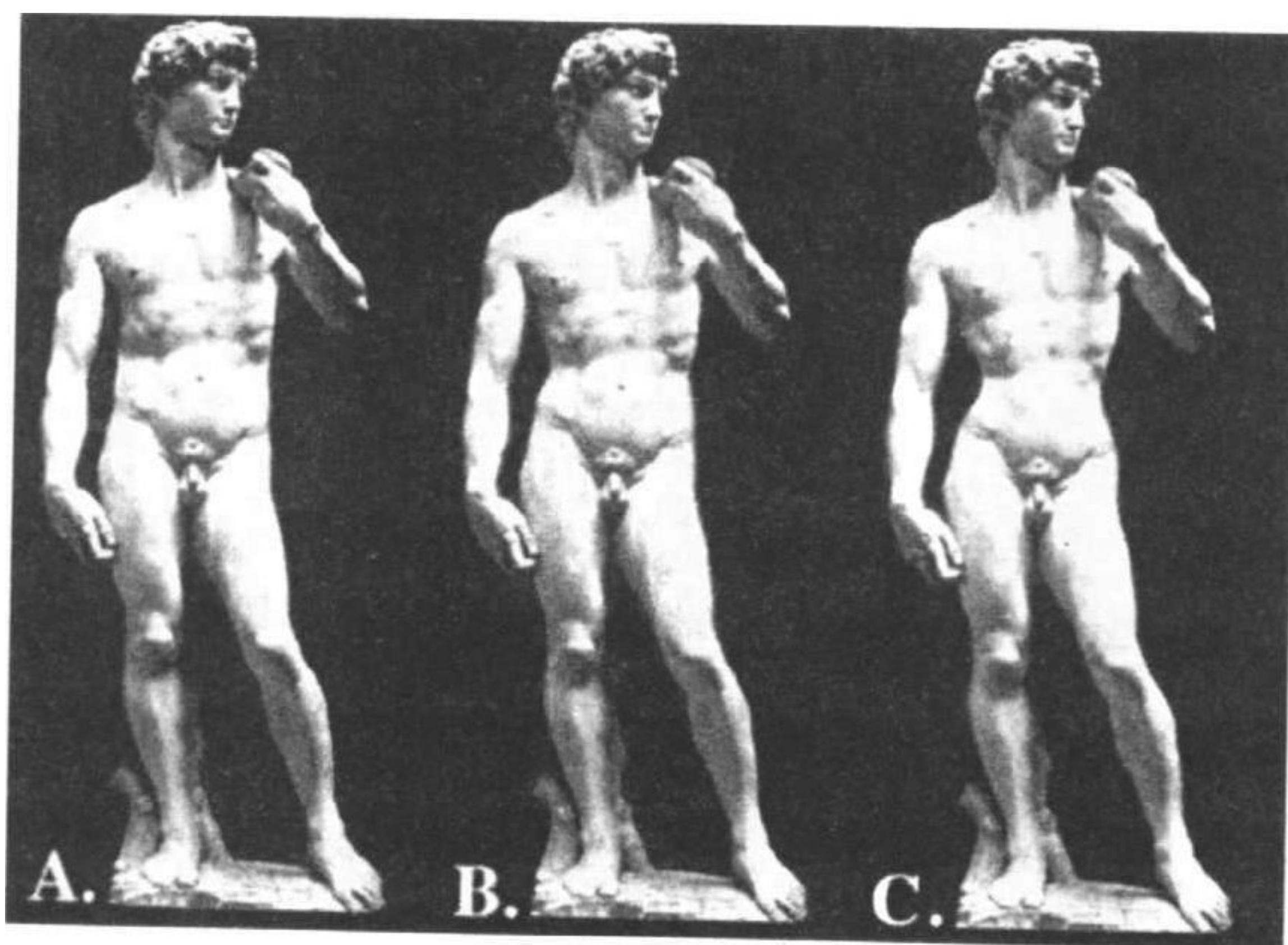
脑的神经系统路径。因为自然选择确定了大脑的神经路径，人们天生对美的感受力好比是硬件设备，所以我们应该能够揭示大脑的不同路径。现在我们运用大脑仿真技术可以直观地看见当人们在注视他人面孔时大脑的内部情况。我们研究的对象包括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男性和女性，给他们看的要么是魅力惊人，要么是相貌平平或者不及平均水准以下的其他男女面孔。这项研究仍在继续，现在公布结果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确实从相关研究中找到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证明材料告诉大家。

右半脑在许多脸部技巧方面呈现出的优势似乎表明，我们的右半脑分析器在辨别一张面孔的吸引力时履行双重职责，但事实上这未必是真的。在过去的10年中，我一直在细致地研究一位男病例。这位男子45岁左右，患有一种叫做prosopagnosia的罕见的综合症。患有这种病的病人无法识别他人的面孔，包括自己的孩子和镜子中自己的脸。当他和妻子参加公众活动时，他的妻子得戴上一个特殊的装饰品——某种颜色的发带或是特殊的发夹——以便她的丈夫能够找到她。一次当我开车送他回家时，我在他家汽车道上看见两个孩子。我问他那是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他回答说：“一定是的，因为他们呆在我的汽车道上。”

这位男子可以辨别不同人的声音、香水味、甚至走路的姿势，却无法识别不同的面孔。这是因为他在大学一年级时头部受伤，严重地损伤了部分右脑。尽管他能够从哈佛毕业，获得两个硕士学位，结婚生子，并成为一位全职

的专业人员，但他的确从未恢复辨别脸孔、哪怕是一张脸孔的能力。除了在辨别一些四肢动物和一些面部表情上也有困难外，他几乎能够识别其他任何东西。他仅在区分面孔方面存在缺陷。

我饶有兴趣地听说此人能评述某些人的吸引力，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和别人眼中看见的一样。在进行的一组测试中，他评价吸引力的方式和其他每个人都非常接近。他对脸部对称、细微的夸张效果（夸大美丽的和较平常的脸之间的区别）以及对女性娇柔的强调同样很敏感。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人不仅对脸部的细枝末节而且对总体外形特征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或许他可能不知道眼前这人是谁，但是他知道谁具有吸引力。自然选择使得这两种判断神经路径彼此分离（至少是部分分离）。毕竟，美可以在它自己的道路上畅行无阻。



6 .

与尺寸有关

人类崇拜并且经常试图夸大自然赋予他的种种特征。

——查尔斯·达尔文

我在维也纳同弗洛伊德一起工作过……我们在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概念上产生了分歧。弗洛伊德认为它应当仅限于女性。

——伍迪·艾伦

好的东西经过夸张渲染会异常精采。

——曼·韦斯特

雄性动物要追求雌性动物，这种需要决定了雄性动物的身体形状。

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它长出犬牙、茸角，或者个儿长得很庞大；而为了吸引雌性，它竭力展露自己的美。鸟类之间亲善和睦，不像兽类动物骁勇好战。它们被“各种各

样的鸟冠、肉垂、凸起、角、气囊、羽毛、裸露的羽干、鸟翎以及从身体各处长出的优雅、长长的羽毛装饰起来。位于头部的鸟喙、裸露的表皮和身上的羽毛常常华美艳丽、五彩斑斓”。这一段是达尔文的描述。他对这些长着华丽羽毛的朋友们赞叹不已，而且推测雌鸟也和雄鸟一样。他还写道：“强烈的爱慕之情、敏锐的觉察力和对美的品味”并非与“低级的理性思维能力”毫不兼容。

美不是生殖繁衍的基础，但它有助于生殖繁衍。达尔文说：“在力求生存和留下大量后代的战斗中，如果遗传素质更好的雄性动物不在场的话，那些没有攻击武器、没有装饰或者没有诱惑力的雄性动物同样会大获全胜。”但是如果前者在场，它们会不费吹灰之力除掉对手。

比起边边角角的补饰来，雌性动物更喜欢浮艳、华丽之装。雌剑尾鱼喜欢剑尾长的雄鱼（剑尾指颜色各异的长尾鳍）；雌燕和雌寡妇鸟更喜欢长尾雄鸟等等。雄孔雀费力地拖着由150到200根羽毛组成的七彩的、布满眼状斑点的长尾。正如海伦娜·卡罗琳（Helena Cronin）写的：“它不仅要养活妻儿，还要养活一条长尾翼！”这种装饰品不仅容易吸引食肉动物，耗尽了宝贵的新陈代谢能量，还不得不随身携带。

然而，获得雌性的倾慕是这些麻烦的补偿。长着最精致（指眼状斑点最多的）长尾的雄孔雀比其他孔雀交配成功率高。如果把大鹳原本斑驳的白尾羽用白染料刷亮，或在雄燕尾部用胶粘上续接物，它们的交配成功率比其他鸟儿高。这意味着雌鸟更喜欢经过夸张了的、超出自然常规

的特征。

为什么雌性动物喜爱铺张奢华？这成了一道难题。1930年，遗传学家罗纳德·费舍爵士（Sir Ronald Fisher）描述了异性选择中的一种爆炸式的、不断升级的“优胜劣汰”过程，可以解释这一难题。“优胜劣汰”起作用的过程如下。当一种偏好表现出来时，例如，当一只雌鸟喜欢一只长尾雄鸟时，雌鸟与这只尾翼相对长的雄鸟交配，孵出的幼鸟也会长出长尾翼。一旦一种偏好因为某种原因得到发展，就会相应地出现一种选择压力。因为只有这样，雌鸟才会生出将来会被异性偏爱的雄幼鸟。这种模式周而复始，雌鸟不再愿意与小尾翼的雄鸟交配。随着这种偏向性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尾翼也变得越来越长。

夸大和炫耀性的行为是进化过程中优胜劣汰的产物。从前为适应生存采取的行为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最终使动物在竞争中遥遥领先，现在正像畅销书、畅销唱片或流行时尚一样，因为普及而得以保持下来。然而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以生物形式展现的、令人无法抗拒的美表达了比流行时尚更丰富的内涵；他们认为美不是任意变化的，美是一种交流形式。

按照生物学家阿蒙兹·扎哈维（Amotz Zahavi）提出的一项理论，炫耀是一种“设置不利条件阻碍对手”的手段。孔雀拖着一条巨大的尾巴昂然阔步，它是在说：我多么健康强壮，我长得起半径达60英寸的尾羽，能够汲取各种养分保持它华美的外形，而且还不怕自己易受后面的偷袭。只有最优秀的动物才有能力长成并随身携带这样的

炫耀物。它必须有很强的免受寄生虫感染的免疫力才能保持羽毛光泽丰满。因为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华美的羽尾传达的信息才显得真实可信。

雌性动物对体格棒的家伙感兴趣。其动机是希望生下的后代有很强的生存能力。那么有艳丽装饰的雄性动物就会成为最优秀的父亲吗？没有证据能证明它们将给予后代较好的照顾，但是它们似乎的确遗传给后代更为强壮的基因。长有精美尾羽的雄孔雀所生下的后代比尾羽不够艳丽的鸟儿的后代有更好的生存机会。长尾家燕比起短尾家燕，生存机会不仅多，而且其后代寿命也较长。比起土褐色的同伴，红脖子的、带三个刺的刺鱼在面临攻击掠夺时更易守住巢中的卵。红颈对其他雄鱼来说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对雌鱼的诱惑。这证明某些炫耀特征在求爱和战斗中都很奏效。突眼蝇科的苍蝇在羽干上长有眼睛。它们的羽干有时比整个身体还要长。雌蝇喜欢羽干长的雄蝇。经证明，这些雄蝇具有一个隐藏的优势：在整个群体里，雌蝇的数量占绝大多数，而这些雄蝇携带着一个强“Y”染色体，增加了生育雄幼蝇的机会。

在大多数情况下，雄性动物的大型装饰物比小型装饰物更趋于对称，雌性动物也恰恰喜欢对称。对称特征不易形成，尤其当装饰物体积庞大而且还要屈从于性选择的时候就更难了。但是因为大型装饰物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对拥有者优秀遗传素质的可靠宣传，所以对称正好是动物所期待的。长有大型装饰物的动物更有能力缓解成长的压力。因为用以维持第二性别特征的、在体内循环的荷尔蒙

实际对身体的免疫功能起到破坏作用。只有身体最强健的动物才能维持自身生长，并保持免疫活性。

在自然情况下，雄燕的尾羽长度比雌燕长出大约20%。尾巴最长的雄燕比其他雄燕能吸引更多配偶。它们的长尾羽也比短尾燕的尾羽更对称。动物学家安德斯·穆勒（Anders Moller）提出这样的设想：把尾长和对称性分开，看它们是否会独立影响雌性动物的选择。为了弄清楚，他做了小的整形外科手术，剪去雄鸟尾羽并把尾羽粘在其他雄鸟身上，这样使得尾巴或短、或长，有对称的、有不对称的。为了保证胶粘的羽毛不会有什么异样，引得雌燕失去兴趣，穆勒剪去并重新粘好其他雄燕的尾翼，不改变尾翼的大小和对称性。结果证明雌燕同时既在乎大小又在乎对称性：尾巴长但不对称的雄燕，不如尾巴长而对称的雄燕受欢迎。

动物学家爱斯坦·马库森（Eystein Markusson）和爱沃·弗斯泰德（Ivar Folstad）发现处于发情期的驯鹿，个儿头最大的鹿，鹿角也最对称。有趣的是，大小和对称的这种相关并不适用于身体其他部位。马库森和弗斯泰德还提出鹿角的状况清楚地告诉我们驯鹿体内寄生虫的情况。而这一情况无法从身体其他部分得知。性选择中的偏好促进了动物炫耀性特征的发育。因为像鹿角这样的炫耀性特征能清楚地表明动物的身体状况，例如，鹿角明显不对称说明该动物的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

孔雀、燕子、大鹑和驯鹿的择偶倾向性对人类的美有什么启示吗？

能源之塔

在对O.J.辛普森(O.J.Simpson)的审判中,辩护律师F.李贝利(F.Lee Bailey)问他是否能够把一只作为证据的皮手套放进一只塑料袋里。这样做是想演示一个侦探如何能在犯罪现场取走一只手套并藏匿起来。检查官玛卡·克拉克(Marcia Clark)反驳说:真正的手套是一只特大号的,贝利试图用一只不同号码的手套冒充物证。“小尺码,”她挖苦地说,“我猜这是贝利先生自己的吧。”没有比这话更让人羞愧难当的。同样,托尔斯泰曾把拿破仑描述成一位长着一双小手的小个子,以表达对他的轻蔑。

在动物的世界里,称王称霸的动物的个子都是最大的。而在世界各地的村寨里,人们称首领为“大人”,他通常身材魁梧、气宇不凡。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身高6英尺2.5英寸,同辈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继承者们也同样高大(自从1776年以来只有詹姆斯·麦迪逊和本杰明·哈瑞森低于平均身高)。预测美国大选获胜者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个子最高的人身上下赌注:在20世纪的竞选中,你准会找到一连串这样的例子,而且屡试不爽,这种状况直到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打败了对手乔治·麦高文才得以改变。

超过平均身高的男人常比其他男人获得更多的入围机会。在美国,男人平均身高是5英尺9英寸。美国最富有的500家公司里,超过一半的总经理的身高在6英尺或偏

上，仅有3%的人身高等于或低于5英尺7英寸。身高是各公司寻找工作人员时整体要求中未得到公认的部分——他们希望录用的人员不仅能够做这项工作，而且还要符合一种形象，其外表能够使他受到尊敬。在一项调查中，当要求公司招聘者在两个除了身高以外（一个人身高6英尺1英寸，另一个人身高5英尺5英寸）所有资格都相当的申请者中选择一个时，72%的招聘者选择了个儿高的申请人，仅有1个招聘者倾向于个儿低的申请人（其他人没有表示任何倾向性）。

心理学家爱瑞恩·弗瑞兹（Irene Frieze）调查了匹兹堡大学1000名工商管理硕士的就业状况，结果发现身高对底薪和现阶段工资有重要影响。她的研究是在80年代中期进行的，当时调查对象的平均工资是年薪43000美元。但是身高6英尺的人赚的钱比身高5英尺5英寸的人多4000美元。在对各行各业的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身高对男子的影响较大，但是它对女子同样有巨大影响。如果个儿高的人在工作中表现得比个儿矮的人更出色，那么高个儿的优势并不存在歧视问题。但事实上，这些研究对象是职员和经理，而不是篮球运动员，所以身高不会对工作质量造成影响。

矮个儿男子，尤其在童年时代，还要面对社会等级制度进行艰难的较量。作家史蒂芬·霍尔（Stephan Hall）孩提时代个子非常矮，他写道：“在生命中的那段时期里，其他孩子并不认为逻辑性和语言的灵活性是解决冲突的好办法。他们挤我、揍我、撞我、扇我、推我、捶我，把我

打倒在地还嘲笑我，有一些确实是儿时常见的嬉戏打闹，而有一些却卑鄙龌龊，处于食肉动物欺掠成性的边缘上。我不是把这种欺凌同高个儿联系在一起：我说的仅是比我高的人。我们大家都参与着这种一层压一层的彼此折磨的游戏而已。”身材矮小的人的行为一旦强硬有力，他们就会被扣上有“拿破仑情结”的罪名。“拿破仑情结”指一个人有过度的权力欲望以补偿自己身材不足的缺憾。正如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在《金手指》中写的：“邦德一直不信任矮个子男人。他们从童年时代开始心理上就养成低人一等的自卑心态。他们一生中都在努力比那些取笑自己像小孩子的人们高出一等。”当然，凭借年长、幽默、智慧和才能，矮个儿男人可以比高个儿男人更优秀，但是仅凭最初平空猜想，人们往往不这样认为。

难怪人们不管高矮，总是努力造成自己身材更高的错觉。威廉三世在伦敦的汉普顿宫的大门上安装着几只高过水平视线的门环，使来访者感到自己变得矮小（因而认为国王身材高大）。这同样也是为什么讲演者走上讲台，宗教首领在圣坛上讲话，国王和女王登上宝座的原因。约翰·韦恩（John Wayne）身高6英尺4英寸。但是据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说：“他踩着4英寸的鞋跟儿，还顶着一个足有10加仑重量的帽子……他甚至让人把船舱顶板抬高以便他能穿着高跟鞋出入舱门。”如果所有这些方法都行不通，人们会让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他们要高一些：71%的人们往往高估了自己的身高。

在我们的大脑深处，我们下意识地把权力、地位和身

高联系在一起，并且不由自主地推测有权力的人身材都高大。为了验证这一定见，一名男子给学生们举行了一次讲座，他被介绍是某领域的低职人员——学生，经过装扮后又被介绍成权威人物——高级教授。讲座结束后，测试者请学生们猜一猜这位访问学者的身高。尽管事实上两个不同角色是由同一个人扮演的，学生们还是猜测“教授”比“学生”高几英寸。

身高如果不能增加个人魅力，那么它与本文美的主题无关。然而，它确实能为人增添吸引力。我们描绘一位魅力十足的男士时，听见的最熟悉的话是“高身材、皮肤黝黑、面容英俊”。在对个人征婚广告所做的一项调查中，人们发现80%的女士在提及身高时表示希望男士的身高至少是6英尺。高个儿男士往往在征婚广告中得到更多的回复，但是身高不会影响女士在征婚广告中是否受到欢迎。心理学家琳达·杰克逊（Linda Jackson）在对成见的研究中发现：人们总是认为高个儿男子比较健壮，更具有男子汉的体魄和魅力，职务地位也一定比矮个儿男人高。

在理想中的男子到底应该多高的问题上，人们的意见有些分歧。大多数研究发现女人喜欢男人的身高在6英尺—6英尺2英寸之间。这是很多模特的身高。还有一项研究表明女人更喜欢那些身高高出平均值的男人（平均身高是5英尺9英寸—5英尺11英寸）。但是，所有研究结果都赞成身高等于或大于平均身高的男人比低于平均身高的男人更受欢迎。当然，高与矮总是相对地方标准而言的。在西非加纳的海滨城市阿克拉，身高5英尺的人被称

作“大块头”。而最近从内陆乔迁过去的身高6英尺5英寸的移民因为身材高大而受到当地人的嘲笑。

一般说来，各地的男人都比女人高。在婚姻中，高个女人与矮个男人的组合不常见却也不稀罕。在对已婚夫妇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妻子的个子比丈夫高的机率小于1%（确切地说是0.3%，而远低于一个百分比才被认为是偶然的）。人们推断婚姻中“男人高”的规律是由于男人总希望比同伴高，但最终证明男人和女人都关心男人的身高。甚至在医院里，当女人们在很多人的简历中挑选精子捐赠者时竟然倾向于高个儿男人！显然，她们认为身高是遗传给孩子的重要特征。

身高由许多因素决定，包括气候条件、日常饮食和基因。基因决定成长发育的上限，但是能否达到上限则由生活条件决定。由于营养得以改善，本世纪人们的身高有了稳步的增长。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人们，自从18世纪晚期以来，每个世纪都比低层社会的人们长得高。在众人中相对高意味着祖先个子就高。这些祖先获取了大部分资源，当年轻人长身体时能提供给他们充足的食物。矮小身材与饥饿、食物结构单一和疾病有关。一般来说，个子高的人们有更好的婚育史。

虽然身材高大有优势，但是因为高个女子只能在较小范围内选择高于自己的配偶，所以身高以前被认为是她的不利条件。高个女子平时只好穿平跟鞋，走路低头垂肩，尽量不使她们不寻常的身材扎眼。人们可能难以相信：在20世纪40年代，500多名年轻女子从医生那里购买了含

有大量雌性激素的药丸，试图控制自己的生长。1959年，一位心理学家的调查发现，半数女人希望自己能更低一些（而同时进行的调查表明：除了一个男人以外，所有男人都想变得更高一些）。现如今，许多享有盛名的美女身材都很高，她们包括6英尺高的波姬·小丝（Brooke Shields）和乌玛·瑟曼（Uma Thurman），5英尺10英寸的尼科尔·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原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以及5英尺9英寸的卡梅隆·迪亚兹（Cameron Diaz）和格温妮斯·帕特洛（Gwyneth Paltrow）。模特的平均身高为5英尺9英寸多一点。在美国，一位身高5英尺10英寸的女子比50%的男人高，而身高6英尺的女子比82%的男人高。这是不是意味着“男人高”的规律削弱了呢？或许是，但事实上大多数高个女子最终能与高个男子喜结良缘。值得注意的是：个矮的丈夫通常是高官显贵、富甲一方，像亚里士多德·奥那西斯（Aristotle Onassis）、兰尼埃王子（Prince Rainier）、亨利·基辛格、汤姆·克鲁斯便是如此。

没有胸肌就没有性

为大卫·巴顿（David Barton）在纽约的健身房作宣传的海报上写着：没有胸肌，就没有性。它的灵感可能直接来自对尾翼长度和孔雀翎尾的研究。胸部肌肉是男人的鹿角，是他们作战的武器。虽然男人不再通过投掷武器打猎或发起战争，但是宽阔的胸肌仍然与生存技巧相呼应。男人收缩肌肉，用拳头应战而不是长出尖利的牙齿。现代男

子的上半节肢体不再用于狩猎和稼穡，它们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改变。600万人每月阅读《肌肉与健康》杂志。杂志的典型封面是一位肌肉发达的男子（而且旁边经常会有一位女子羡慕地盯着），并附有类似“变强大”这样的标题。

对体重的研究表明：异性恋男子对自己的体重很满意，至少比女子或同性恋男子对自己的体重满意。如果再看形体、高度和肌肉发达程度，满意的人就更少了。许多男人认为自己不够重。但他们也不想变胖，只想肌肉变得更发达一些。男人身体中的脂肪比女人少（女人平均脂肪含量是25%—27%，与之相比，男人的是15%），而且他们对增加脂肪丝毫没有兴趣，但是他们渴望增长肌肉。早期的健康提倡人查尔斯·阿特拉斯（Charles Atlas）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此他许诺说要把瘦弱的人变成“雄健的男子汉”。

一般说来，人们认为最具魅力的男子身体呈V字形，从宽肩到窄腰再到臀部逐渐收缩变细。男人和女人都认为最不喜欢男子有一副肩窄、身体中间和臀部宽出来的梨形身材。在一项研究中，白种人和日本男学生表示除了屁股和腰部周围以外，身体其他各部位都希望能比现在再强壮一些。

成年男子普遍比成年女子拥有更多的肌肉群。在力量上，他们的最大区别主要表现在胳膊、胸部和肩膀上。一般女子能推举起的杠铃是男子推举重量的1/3，她的握力是男子的一半（把它同腿长相比较，一般女子的腿长是一般男子的3/4）。参加健美的男人首要目标一般都是通过发

展上体扩大上体和下体的对比，主要锻炼胸部的胸肌、背部的背阔肌以及胳膊上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据说能把一杯水平稳地放置在他收缩的胸肌上。演员汤姆·汉克斯（Tom Hanks）问过朋友罗伯·瑞纳（Rob Reiner）这些日子女人在追求什么，瑞纳在1993年的影片《西雅图不眠夜》中给出了答案：“发达的胸肌和一个窄小的屁股。”

在伊丽莎白时代，男人向紧身上衣里填塞东西、加垫衬物以获得加文·克莱因（Calvin Klein）广告上的外观效果。这种方式很像罗马武士身穿护身铠甲，也像现在的男士在夹克外套中垫上垫肩。在裤子出现以前，紧身衣使腿形暴露在外，所以如果男人腿细，他们也把紧身衣里填上填充物。18世纪骑士的高靴已经过时了，所以腿细的男人穿上两套紧身衣，里面塞入牛皮垫。

现在的男女时尚倾向于展露身体而不是加上保护伪装。天生条件不佳或者没有时间和兴趣在健身房里花掉几个小时的人采用诸如吸脂术和植入填充物这样的简捷方式。隆胸填充物使胸部看起来更宽阔、肌肉更发达；在腹肌植入填充物使腿部显得结实有力量。吸脂术用来消除腹部和胸部松弛的赘肉，移除男子胸甲般厚实的胸膛上两大处多余的松弛部分。中世纪的男子在身上加穿垫衬物，而现代男士把它们穿在皮肤的里面。

男模的身材几乎和女模一样具有统一的标准。他们的身材高，有6英寸或更高，体形呈V字型（测量胸围通常是40—42英寸，腰围是30—32英寸）。塑料人体模特身

高也是6英尺2英寸，腰围是42英寸。如果从领先时尚转移到虚构小说中，我们会看见人体轮廓被大大夸张了。为浪漫小说装饰封面的范比欧（Fabio）的胸围是44英寸。卡通人物蝙蝠侠的肩膀是身高的1/4或几乎一半。甚至艾尔凯普（Al Capp）的李尔·艾伯纳（Li'l Abner）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弱小的乡村男孩，到了50年代，已经俨然成为一位肱二头肌和肩膀强壮发达的、细腰的小伙子。

男子健美运动员体现出极富男子汉气魄的身体轮廓——脂肪含量减少到8%，肌肉块大、厚实，肩膀几乎是腰的2倍宽（挺像卡通画里有18英寸腰围、36英寸胸围的女子）。阿诺德·施瓦辛格的胸围是57英寸，腰围31英寸，曾是五届“世界健美先生”，另外他的脖子、胳膊和小腿肚大约都是同样大小的尺码（18—20英寸）。西尔维斯特·史泰隆（Sylvester Stallone）曾预言“在90年代，那些有18英寸粗的胳膊、31英寸的腰围、与男模的清俊外形和加文·克莱因的广告形象相吻合的小伙子可以同3E尺码标准的姑娘相媲美。他即将取代50年代金发碧眼的美女”。史泰隆作了很好的总结，指出人们越来越关注男子体格之美的倾向。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如果脂肪是一个女性问题，那么肌肉则是一个男性问题。”

正如一些女性得了一种不健康的对身体脂肪感到厌烦的强迫症，一些男性（以及少数女性）得了一种不健康的对肌肉感到迷恋的强迫症。心理学家哈瑞森·帕普（Harrison Pope）在波士顿和洛杉矶参加健美运动的体育运动员和健美运动员中做了一系列调查。他发现大约9%的受调

查者得了一种“与神经性厌食症相反的病症”，他命名为肌肉病态嗜瘾症（Muscle dysmorphia）。这种综合症的表现特征是：即使患者事实上身材魁梧、肌肉发达，他也有错觉，以为自己的身体弱小。就像厌食者因为害怕变胖才让自己挨饿，患肌肉病态嗜瘾症的病人因为害怕不够健壮就滥用类固醇，还使用各种补品。帕普在研究中所采访的半数人曾使用过促蛋白合成类固醇（这些药品刺激多细胞蛋白质的产生，帮助肌肉生长）。帕普相信肌肉病态嗜瘾症属于一种“情感性幻想紊乱”，症状包括情绪焦虑、沮丧、患有强迫症和饮食失调。人们现在可以轻易地得到类固醇，再加上男人背负着较大的社会压力，希望自己有肌肉发达的身体，所以患这种病的人或许更多了。尽管肌肉病态嗜瘾症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病，但是人们使用类固醇和期望自己身体膨大的现象并不罕见。最近，在高中学生中做的两项研究发现，6%—7%的高中男学生正在使用或以前曾经使用过类固醇。

男性生殖器，威胁还是魅力

现在，让我们回到贝利先生的证据——O. J. 辛普森的手套上。当晚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进行的“激烈交锋”中，巴瑞·塔罗（Barry Tarlow）指责玛卡·克拉克取笑F. 李贝利先生的生殖器的大小尺寸。另外一个直播评论员挺直身子，说：“什么？难道我错过了一次有关生殖器的谈话？”塔罗先生用一种厌世者的语调回答说：“得了，

我认为你没必要这么快地重捡那个话题。在我年轻时，手套的意思是避孕套，所以我觉得它明显另有所指，指性器官的大小。”

美国人一直为性器官困扰——对女人来说是乳房，对男人来说是阴茎。20世纪30年代，人体模特从欧洲引入美国，也引入了小号、中号的服装号码，美国人却用来指生殖器的尺码。但是美国并不是惟一的、喜欢夸张的国度。住在新几内亚岛上的男子，他们的服饰有一部分称做Phallocrypts，是一些盖在阴茎上的衣物，足有2英尺长。

人们认为阴茎是男人勇猛无畏的体现。在大多数研究中，男人似乎感到他们的阴茎不够大。阴茎的大小和尺寸也是患有身体病态嗜瘾症神经病或幻想自己丑陋的男病人产生忧虑的一个根源。正如一位患者说的，它的尺寸让他感到自己是个“半男人”——“我的阴茎看上去并不丑陋，但是却毫不吸引人，没有男子汉的气魄。”

阴茎的大小同身体其他部分的大小丝毫没有关系。一个高大壮硕的男子的阴茎可能会比矮小瘦弱的男子的还小。金西（Kinsey）性研究所收录的数据表明大学男生平均的阴茎长度为：松弛时3—4英寸长；勃起时5—7英寸（阴茎勃起时的长度范围是3.75—9.6英寸）。最近对1000多名年龄在20—69岁之间的男子所做的抽样调查表明：4.5—5.75英寸之间的、较短的勃起长度事实上占有更大的比例，占总数的40%。除此之外，它表明金西的数据基本上是正确的。

人类对阴茎长度的关注颇具讽刺性——与其他大多数

灵长类动物相比，他生下来就已经长着很大的阴茎。统领一群雌性配偶的雄性大猩猩的体重重达450磅，勃起时的阴茎不过1英寸多一点。在所有类人猿中，只有黑猩猩的睾丸按照比例来说比人类的大（但是阴茎也并不如人类的大）。

我们人类能创造和使用超常刺激物。最简单的方法是垫东西。有一部讽刺影片名叫《腰椎穿刺》，它讲述了一个可笑的摇滚乐队的故事：在机场，金属检测器阻止其中的一位低音提琴手进入，因为他在裤子里放了一根箔纸包的黄瓜。如今，1万多名美国人尝试了一种更长久的解决方法：使用外科手术加长或加宽他们的阴茎（在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有男人接受了这种手术）。这种加长方法不使用任何塑料嵌入物或像肉体一样的附加物——外科手术医生剪断连接阴茎和耻骨的两条韧带，这样阴茎能够完全从体内伸出来，使通常隐藏在体内的部分露出体表。正如一个整形外科医生说的，“阴茎暴露”或许是描述这一过程最恰当不过的术语。悬吊着阴茎的韧带被松开后，勃起的角度虽然变大，阴茎的长度却增加了大约1—2英寸。也可以通过注入脂肪使阴茎变宽，但是因为龟头不能变大，这种方法从审美角度上讲不是成功的。它可能使这一器官看起来有点像一只系着结的气球。

那么男人为什么烦恼？一位内科医生在一家医院1000名申请人中选出300名男子进行调查，前提是他们都赞成阴茎增大手术。大多数受测者表现出内科医生斯塔伯斯

(R.H.Stubbs) 所谓的 “ 排斥外人恐惧症 ” ——一种在其他男人面前感到惶恐不安的心理状况。其中近1/3的人是由于性伙伴的抱怨或批评引起的。“排斥外人恐惧症”意味着男人把自己的阴茎看做是同其他男人竞争的手段。

在众多灵长目动物中，雄性动物把展示自己的生殖器作为一种威胁对方和显示支配地位的方式。人种学家伊莱诺斯·艾伯-艾比斯菲德 (Irenaus Eibl-Eibesfeldt) 观察到：当几群黑尾长猴进食时，有几只雄猴背对大伙儿坐着并且展示出它们鲜亮的红、蓝颜色的生殖器。如果有一只不熟悉的动物接近大伙儿，它们的阴茎会立刻勃起，脸上还做出恫吓的表情。受各种亚、非文化影响的人们雕刻出带有威吓表情、阴茎勃起的人物形象，把它们当作保卫家庭的守门神或随身携带的护身符。尽管阴茎大但身体瘦的人并不比阴茎一般或小一些但肌肉发达、身材健美的人更具有威胁性，但是大的阴茎仍然是威胁的表示（例如性心理变态的“露阴者”对人们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把暴露阴茎同暴露身体其他部分相比较，显然前者更具有威胁性）。

也许生殖器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战斗的武器，它还是吸引异性的魅力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正像有吸引力的动物展示给我们的：生殖器越大越好。如今在大多数社会里，女人们并不能直接看到男性生殖器，因此它在求爱中的作用让人怀疑：到大多数女人看见它时，她们已被成功地追求到手了。但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穿着衣服，所以我们有必要琢磨一下阴茎的审美学。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想法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未认为产生强烈性兴趣的生殖器本身真的就漂亮。”不管弗洛伊德是否正确，女人们或是出于节制，或是缺乏美感，事实上还从没有撰写过赞美阴茎的作品。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在《钟形罩》里向情人的生殖器投去有名的一瞥，从而留下难以去除的印象：“像火鸡的脖子和砂囊”。科麦尔·帕哥利尔（Camille Paglia）警告说：“阴茎坚韧地却又犹豫不决地做着可笑的冒险”，但是它们却有女性生殖器所缺少的那种“合理的数学构思以及有条有理的设计”。她甚至对女性生殖器印象不深，她把她们描绘成：“轮廓不规则并且建筑设计松散”。尽管男性生殖器有优越性，但装扮成性感女郎的男人从不被女性观众接受。

视觉效果并不说明一切。大多数对妇女的研究表明：在性接触中，触觉刺激和视觉刺激同等重要。哥斯达黎加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威廉·艾伯哈德（William Eberhard）相信在各式各样的物种中，女性选择压力使男性生殖器发展成为一个“内含着求爱的装置”，它的美更多的在于它所做的，而不是外表。自20世纪60年代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来，在有关性的调查中，人们普遍认为尺寸无关紧要，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观点。当然除去色情作品以外，因为它强调大阴茎并且暗示尺寸至少关系到男子的自尊心和配偶的第一印象。

男性生殖器的大小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性习惯和配偶的倾向性的情况。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睾丸。雄性大猩猩保卫

着它们的雌性伴侣，很少面临外界的竞争，因此雄性大猩猩长有庞大的身躯和一个小阴茎和小睾丸。相反，黑猩猩生活在杂交的群体中，统领模式不稳定，所以雄性黑猩猩只比雌性黑猩猩个头大一点却长着一个很大的睾丸。它们的睾丸并非只是装饰性的。大睾丸每天比小睾丸产生更多的精液，在交配时也会产生更多。如果几只雄性黑猩猩使同一只雌性黑猩猩受精，那么精液最多的雄性黑猩猩占据优势。人类中男子的睾丸按照比例来说比大猩猩的大但比黑猩猩的小。这意味着我们祖先中的男子虽然不像黑猩猩那样杂交，但也不完全是一男一女的单配制（如果男人不曾遇到过精液竞争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像大猩猩一样长有小阴茎）。

尽管在灵长目动物中，人类中男子的阴茎按比例最大，但是威廉·艾伯哈德发现各种雄性动物，从线虫、苍蝇到人类都有被他称做的“生殖器夸张”的特点。许多物种中，雄性的生殖器比雌性的精巧、复杂，而且精巧的程度超过了仅仅用来存放精液的实际用途。正如昆虫学家詹姆斯·洛德（James Lloyd）注意到的，生殖器官配备着“小瓶启、手剪、杠杆和喷射器……放在一起真像是一把精巧的瑞士军刀”。许多昆虫的生殖器非常精致，形状又彼此不同，它们是辨认不同种类的最可靠的办法。

一些科学家相信：物种之间为了阻止杂交，生殖器于是进化成各种精致的外形。同一物种的成员具有相互配套的器官。对于每一个物种，雄、雌两性的生殖器就像锁和钥匙一样相配。其他科学家却已经注意到最精致的雄性生

殖器存在于一只雌性和一只以上雄性交配的物种中，这意味着对手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生殖器夸张”的特点。动物生态学家高冉·阿威斯特（Goran Arnqvist）对只交配一次和有多个交配伙伴的雌昆虫作了研究。他的研究把两种不同的关于“生殖器夸张”的观点——锁一钥匙理论和性选择理论对立起来，使它们彼此相悖。如果锁一钥匙理论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推出：因为雌虫只能和与自己相吻合的那只雄虫相配，和不合适的雄虫相配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与单配制雌虫交配的雄虫应该有最夸张的生殖器。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一个种群中，如果一只雌虫有几只相互竞争的雄虫配偶，雄虫的生殖器反而夸张、多样。

雌性动物的品味决定了一些雄性动物生殖器的形状。在自然选择中，男子的大阴茎逐渐形成并保留下来。因为它能激起异性的兴趣、给予她们刺激，或是因为它能有效地排斥其他男人的精液，使自己占据优势地位。

匀称

然而，研究人员指出，就取悦女性来说，不仅要看大小，还要看对称性。行为生态学家兰迪·硕恩希尔和心理学家斯蒂夫·甘吉斯泰德指出，一个发育对称的男子——即两只脚、脚踝、胳膊、肘、手、手腕和耳朵的宽度相等的人——比不对称的男子更吸引女性，在卧室里表现得也更出色。要记住，在动物中，对称是发育良好、对寄生虫有抵抗力、更易生存和生殖力强的标志，而不是忠诚、效

忠或者献身的表现。

任何人不大会注意到两只手腕之间粗细的差别，也不会有任何女子见到对称的足踝就感到兴奋。但是身体对称的男子倾向于拥有其他吸引人的特征，如长有对称的面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被认为具有魅力），并且比起身体不对称的那些男子来，他们的肌肉更加发达、身体更高大、身体也更重。日本的雌蝎蛉更喜欢长有对称前翅的雄蝎蛉。是什么诱惑着她？是它的信息素：甚至雌虫看不见雄虫时，对称的雄虫也会发出化学信息吸引雌虫。蜜蜂被对称的花朵吸引，是因为这样的花朵上有更多的花蜜。与诱人的气味、花蜜和外貌密切相关，对称是被诱惑者的隐身说客。

对称与美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它是适应生存环境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在对称特征如角、触角、花瓣、尾巴、翅膀、脚踝、脚、脸或整个身体的发展过程中，紧张性刺激，包括近亲交配、寄生虫以及暴露于射线、污染物、极高或极低的温度或沿边地区，都会影响发育设计的简洁表达形式。不对称能迅速反映出在发育过程中身体应付压力的能力。而对称的动物有更高的成活率、生殖力更强并且寿命更长。

动物学家安德斯·莫勒和行为生态学家兰迪·硕恩希尔回顾了对41种动物所做的62项研究后发现：包括人类的78%的物种中，波动不对称与交配成功或性吸引的程度有关。

身体对称的男子报告说：他们比其他男子早3-4年

有性体验，在求爱过程中也较早地经历性体验，并且次数是许多同伴的2-3倍。他们更易取悦情人。硕恩希尔和甘吉斯泰德研究了86对夫妇20多岁时的性生活。据双方称：女人如果有身体对称的伴侣（用卡尺测量他们的肘、脚等部位，看是否对称），她们明显地在性交中有更多的性高潮。

比起夫妻间对爱的感受、双方对这种关系的投入、男方的所得、夫妻性体验的程度或做爱的频率来，波动不对称能更好地预测女性的性高潮。当涉及到性高潮的频率和持续时间时，身体的诱惑力就起主要作用了。对称的男子身体大、个子高、肌肉发达、脸孔也更具魅力，这些同样关系到另一方经历性高潮的可能性。但是对称也有独立的贡献。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女子把性高潮作为选择配偶的一种形式，是她对后代施加影响的方法，那么女子仿佛应该倾向于富有魅力的健美男子——身体健壮、对称，脸英俊、漂亮。然而，由于对称的男子比不对称的男子更不忠诚，在双方关系中投入的也更少，所以实际上她们也喜欢粗俗的男子。当然女子并非在本质上喜欢粗俗的男子，为了避免误解，这里有一个更为简单的解释：因为女子倾向于对称的男子，所以他们比起其他男子来有更多的相互竞争的异性伙伴，会接到更多的结婚要求。

人们也喜欢对称的女子。她们比起不对称的女子来性伙伴多，生育力也强。一项研究发现双乳大而对称的女子，比长得不匀称的女子有更强的生育能力。有趣的是，女子的对称性在月经周期中会发生变化。她们在排卵当天

最为对称（对于她们的性伙伴来说可能最具诱惑力）。生物学家约翰·曼宁（John Manning）测量了年龄在19—44岁之间的30位健康妇女的左、右耳以及每只手第3、4、5根手指的大小，还用腹部超声波确定了受测者的排卵时间。他最终发现不对称在排卵前的24小时里减少了30%。

对胸部的欲望

1947年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写道：“来自其他物种的拜访者可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人类生儿育女的地方在乳房”，因为男人是如此地关注女人的胸部。虽然人类学家宣布在某些文化中，乳房并不被认为是性感的部位，但是至今还不清楚地球上是否有什么地方，男人发现健康、成熟的女孩子的胸部不漂亮。

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人类女性的胸部与众不同。惟有她们在青春期乳房就发育成圆形，并且不管是否出奶都会保持形状。其他哺乳动物的胸部只有在充满乳汁的时候才会鼓胀，喂完奶后就瘪下来。对于其他哺乳动物，胸部不是性的标志。对于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胸部使它们厌烦。

在人类中，乳房的大小与出奶的质量无关。人类学家波比·劳（Bobbi Low）提出：乳房经过进化，结果成了制造假象的标志，它使女性看上去能够给下一代提供良好营养。然而其他人则认为作为奶罐的乳房和激发性欲的乳房不完全一样。男人认为乳房很性感，却不怎么想得起它们

喂奶的作用。还有人认为乳房真实地反映了维持怀孕所需的脂肪储备。

与黑猩猩可伸缩的胸部相反，乳房保持固定不变要付出一些代价。一些女子运动员知道，乳房越大，越妨碍跑、跳以及移动胳膊和上体。在古希腊神话中，亚马逊族强悍的女战士因为右侧乳房妨碍射箭而被割去。如今，目的在于使反弹减至最小、对易受伤部位的保护增至最大的运动胸衣，生意繁荣兴旺。一家日本最大的体育用品厂商最近制作出一种游泳衣，它借鉴了飞行和航海技术，能减少乳房造成的阻力。

那么乳房的优点是什么？男人们认为它们漂亮，许多女人也这样认为。戴斯蒙德·莫里斯提出人类大而圆的乳房是一种把男子的兴趣转向前部的方法，并且鼓励面对面的亲密关系。大多数动物后部颜色明艳、丰满，它们从后面交配。随着人类发展成为面对面的姿势，身体也在男人注意的地方变得引人注目。摩里斯说我们发现那大而上翘的乳房很动人，因为它们模仿了性兴奋：乳房变得坚挺、浑圆，乳头更加突出。

正是为了保持男女在性交中面对面地看着对方而不是从后面看，所以胸部得到发展。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起码有一点是清楚的：乳房的美在于它们的形状，并随着时间而改变。无论人们喜欢什么尺码，激起性欲的乳房总是结实并上翘的。它的形状从不是松弛、下垂拉长或是细管型的（这是一位老年妇女的胸部的形状）。从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中浑圆、被高高地置于胸部、“违背了重力

法则”的乳房，到1949年形状像鱼雷的“年轻女子”胸罩，再到紧身胸衣、“神奇”胸罩和整形手术等塑造出的陡然高耸的球形乳房，我们的结论是：理想的乳房形状自然只会出现在年轻、未生育过的女子身上看到。

也许只有出现在年轻女子身上，乳房才被认为是性感的部位。一旦它们定期用于哺乳，形状发生了改变，那么它们用来激发性欲的价值也减少了。唐纳德·西蒙斯曾经指出：“经过几年哺乳后的乳房形状或许的确损害了乳房的吸引力，因为它清楚地反映出年龄和经产状况。”（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有一次向我解释的：在全世界各种文化中，有三种不同的胸部。他使用手势来说明：把手平放压在胸部；手掌离开胸部，直直地竖起；手掌离开胸部，所指的角度向下。第一个手势指一位尚未发育的小女孩；第二个手势指一位已经发育成熟的姑娘；第三个手势指已经生育过、给孩子喂过奶、或者年龄已经变大了的妇女。

在文艺复兴时期，上流社会的女人曾一度雇佣乳母给她们的婴儿喂奶，所以当时女子的露肩连衣裙成为一种固定的服装款式。玛丽琳·亚罗姆（Marilyn Yalom）指出：在这个时期，90%的人要喂奶，而只有10%的人没有喂奶的负担。雇佣乳母是有地位的象征而哺乳则被认为是与缺钱联系在一起的。在描绘上流社会的油画中，贵族女子高挺、圆鼓的乳房，与农妇或乳母下垂的乳房形成鲜明的对照。上流社会的女式服装把胸部向上挤压，使之从腰间缚紧的紧衣胸衣中耸露出来。她们的紧袖子使胳膊的曲线变得纤细。圆鼓、匀称的双乳从紧紧束缚的上体中突耸出

来。露肩连衣裙被保留下来，至今仍是上流社会正式穿着的一部分。

从1940年到1970年间，由于牛奶替代了母乳以及大力宣传用奶瓶喂奶，使得美国妇女用乳房哺乳的人减少了。这样，人们重新对展示性感的乳房发生了兴趣。1943年，珍妮·罗素（Jane Russell）成为第一批乳胸女王中的一位。她在电影《亡命徒》中穿着其崇拜者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为她设计的一件金属胸罩，炫耀了乳胸。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乳房硕大的女演员成为银幕偶像——包括拉娜·特娜（Lana Turner），戴安娜·道斯（Diana Dors），玛丽莲·梦露，勃瑞吉特·巴道特（Brigitte Bardot），吉娜·洛拉勃瑞吉达（Gina Lollabrigida）和简恩·曼斯菲尔德。妇女不满足于加垫或高耸的胸罩以及胸肌扩张器，她们转向使用能长久改变身体形状的手术方法。到1991年为止，已有200万妇女做过隆胸手术。1992年2月，因为关系到安全问题，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严格限制植入物的使用。但是到了1998年为止，接受该手术的妇女人数回升到12.2万多人。现在的整形手术中虽然禁止使用硅胶，但却不禁用含盐固态硅。隆胸的最新趋势是实施甚至比以往范围更大的植入手术。

我们还无法过早地了解硅植入物的确切危害性，但是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把异物植入易发病的部位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行为。在植入物的周围感到疼痛、麻木、青肿以及形成纤维状肿块的症状并不少见，甚至有时还会出现破裂、植入物渗出的情况。而且某些胸部外科

手术不利于乳房X射线透视和哺乳。另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是：它是否会造成免疫系统的破坏。含盐植入物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仍存在着一些其他问题——感染、疤痕、破裂以及影响乳房X射线透视。

在美国，胸部已经成为人们性兴趣的焦点。这种兴趣与母乳喂养率低、而使用整形手术模仿未生育女子胸部的人数增多的事实相一致。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个极端憎恶脂肪、认为身体其他部分的脂肪是魔鬼附身的社会里，人们仍然非常羡慕并想获得两只浑圆的脂肪容器。

腰际

如果脂肪再向下移动几英寸，减肥机、塑身衣、吸脂术和节食食谱就都统统出现了。尽管脂肪长在胸部受欢迎，但若长在腰部就让人讨厌。细蜂腰的女子同样富于性感——虽然不像胸部那样明显，但是像对称一样，是另一个深深影响外观的隐形说客。

腰是肋骨骨架和髂骨之间长有器官和肌肉的区域。它的形状由脂肪和肌肉（以及内部器官的健康状况）决定。对于更年期前的健康妇女，腰和臀部的比例（简称WHR）为0.67—0.80。这意味着她们的腰是臀部的7/10到8/10。一位健康男子的腰—臀比例为0.85—0.95之间。睾酮的刺激使他在腹部而避免在臀部和腿上贮藏脂肪。这给予他男子的“雄性”体形——倾向于在腹部长脂肪。女子的“雌性”体形呈沙漏形——脂肪在腰部周围积聚。全世界

人们的身高和体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增加适度的体重不会改变男人和女人的基本体形。

在雌性激素的影响下，女子的“雌性”体形早在青春早期就已经形成了。年轻女子在大腿和臀部长有并贮存的脂肪比其他任何部位都多。事实上，大腿占女子体重的1/4。这就是为什么减少腿部脂肪的乳膏在1996年的销售额竟高达9000万美元，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效果。女人们可谓孤注一掷了。节食会使上体和乳房的脂肪先减掉，然后才是大腿和臀部的脂肪。这是因为大腿和臀部的脂肪除了怀孕和哺乳期间以外很少使用，它们贮存在那儿，确保即使在接踵而来的饥荒中，身体也有足够贮存的热量成功地完成妊娠和哺乳。女子的拂柳细腰，位于浑圆的乳房和丰满的臀部之间，具有昙花一现之美。它在妊娠期间变粗，之后便难以恢复原来苗条的形状。到了更年期，许多女性的腰—臀比例更接近于男性，而不是恢复年轻时的样子。腰部是最好的、表明激素功能的显示器之一。患有多囊卵巢疾病（一种由于睾酮含量高而引发的病症）的女性，其腰—臀比例呈现男性化特点。由于体内雄激素过多，她们的身体不是在大腿上而是在腰部开始积存脂肪。

有两项调查面广、论证严谨的生育力方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把腰—臀比例和女人的生育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对500名到荷兰一家医院接受人工授精手术的妇女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事实上，比起年龄和肥胖症来，脂肪分布对妇女怀孕可能性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位腰—臀比例小于

0.8（即小腰，呈沙漏状）的妇女，其怀孕机会几乎是腰—臀比例大于0.8（即腰较粗，呈管形）的妇女的2倍。在另一项研究中，试图通过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换怀孕的妇女，如果腰—臀比例大于0.8，会再次对其怀孕机会产生负面影响。即便把这些妇女的年龄、身体质量指数和吸烟史考虑在内，这种影响仍然存在。

如果男人们寻找的正是生育力强的伴侣，那么他们被蜂腰女子吸引并不算是一种巧合。心理学家戴文卓·辛（Devendra Singh）在18种文化中检测了男人们对体形的感受。他发现若使一位女子的身体吸引男子，腰—臀比例常常比胸围或体重（除了极端情况之外）更为重要。他展示给人们3种不同体重（体重不足、标准、超重）和3种不同腰—臀比例（0.7、0.8和0.9）的女子形体的线条画，并且要求他们选择出一种最具魅力的形象。结果，认为腰—臀比例为0.7的、标准体重的女子最具有魅力的男士占据绝大多数。

戴文卓·辛相信男人们天生喜欢细腰丰臀的女子，而这种体形意味着生育力强，雌激素分泌量高，雄激素分泌量低。和所有事物一样，有时来点夸张反而受到欢迎。辛发现腰—臀比例为0.6的体形也很吸引人。另一个性炸弹的例子——芭比娃娃，三围为36—18—33，腰—臀比例为0.54。

如果看看美女照片，辛有关体形重要性的观点会不言自明。奥黛丽·赫本和玛丽莲·梦露在20世纪50年代展示给影迷们两种不同的美女形象。然而三围为36—24—34

的玛丽莲和三围为31.5—22—31的奥黛丽的体形都呈沙漏形，腰—臀比例都是0.7。有些人称美国人逐渐开始喜欢男孩子气的、细管形的身体。然而辛否定了这一说法。通过翻阅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国小姐》和1955年—1965年、1976年—1990年的《花花公子》杂志，他发现：美国小姐们的腰—臀比例多年来仅仅在0.72—0.69之间发生了变化，而《花花公子》模特的变化范围也不过是0.71—0.68之间。

现在，超级模特的平均三围尺码是33—23—33，这样她的腰—臀比例为0.7。人称“靓体”的艾丽尔·麦克波森（Elle Macpherson）不仅双腿长44英寸，而且三围尺码为36—24—35，这就是说她拥有极富曲线美的0.69的腰—臀比例。这些模特身材越高，胸部就越丰满，臀部就越消瘦。但是，因为年轻健康的女子贮存在臀部的脂肪要比腹部的多，所以她们并没有因此失去女性独有的、玲珑有致的体形。

心理学家马丁·妥维（Martin Tovee）及其同事在英国研究了300名超级模特（包括克劳迪亚·希弗和纳奥米·坎贝尔）、300名《花花公子》的“迷人模特”、300名普通妇女以及少数几组患有饮食失调症（包括厌食症和贪食症）的妇女。通过比较重要的统计数字，最终得出与之相同的结论。超级模特比其他各组人的身材要高很多，她们和迷人模特比普通妇女更瘦（尽管比厌食症病人重得多）。超级模特和迷人模特的体形都丰满、匀称、富有曲线美，这些时装模特的腰—臀比例是0.71，迷人模特的比例为

0.68。因为迷人模特身材比超级模特低，所以看上去似乎更富有曲线美，但是时装模特亦不是妥维所谓的“三节虫”。

尽管人们把年轻女性中饮食失调患者增多的现象归咎于模特，但是妥维发现两组的体形毫不相同——这意味着节食并不能产生出模特的体形。从统计学上讲，模特是极少见的能把细高的身材和玲珑的曲线结合在一起的人。事实上的确如此，这让人想起退吉（Twiggy）。在她模特的生涯最兴盛的时期，她体重是92英镑，三围是31—22—33，类似在雄激素刺激下形成的腰—臀比例为0.73——甚至在她的臀部仍存有脂肪。

除了表明生育能力以外，细蜂腰一般也表明健康良好。不管男性、女性，腹部脂肪都与心脏病、糖尿病、中风、高血压、胆囊病和一些癌症较高的发病率有关。所以单独从健康角度看，细蜂腰也让人渴望。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慢性病大多是现代生活的产物。因此，总的来说在现代，虽然腰—臀比率是表明健康的一种好方法，但是从进化角度讲，作为美的显示器，它的重要性或许更多地体现在它所标明的生育力上。

在美国，肥胖对人们的感受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胸围和腰—臀比例都无法与之相比。男人们喜欢沙漏形体形，但是比起一位消瘦、体重标准、体形呈管形的女子，他们不会更喜欢一位肥胖、细腰或胸部硕大的女子。在戴文卓·辛的研究中，体重最重的人被认为比苗条的人大8—10岁（尽管模样没什么区别）。她们过早消损的青春

减少了她们的魅力。在我们这个憎恶脂肪的文化氛围里，社会地位也起着作用。社会地位与身体脂肪之间呈反比关系，尤其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女子时装、紧衣胸衣、宽腰带、紧臀裤总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腰部。紧衣胸衣已经流行了500年。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紧衣胸衣”这个词第一次使用是在1299年描述爱德华一世王室服装的时候。女人们不仅用紧衣胸衣勒出细腰、把上身挤得高耸一些，而且使用衬垫以及被称作裙环、裙撑、圆环或撑架的金属笼架在臀部周围形成扇形张开的敞裙。它们中有一些能把女人一侧的裙子撑大，还有一些把她围在一个直立圆锥里，另外的一些使她身体后面的衣裙变得鼓胀起来。妇女直到20世纪早期才摆脱这些讽刺女性服装的漫画，当时的设计师麦德雷恩·维昂耐特（Madeleine Vionnet）和保罗·波瑞特（Paul Poiret）向人们介绍了更为流畅、优美的时装款式。但是，从《1947年新面貌》中紧束腰、穿大敞裙的迪奥（Dior）到维维妮·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和约翰·保罗·戈蒂埃（John Paul Gaultier）有关紧身衣使人发笑的表演，时装继续突出地显示腰部。

人们希望夸大女性的沙漏体形。这种愿望有助于解释一种表面上不相关的流行现象——高跟鞋。人们会认为，如果有谁需要高跟鞋的话，那应该是男子，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高比女子操心得多。最初男、女都穿平跟鞋，但是随着鞋跟从短粗形状发展到细长跟，它们只能为女性专用。1953年随着细高跟的出现，鞋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这种细高跟是在意大利制造的，并且风行于巴黎。

高跟鞋在女性中流行是因为它们不仅仅使身高增加几英寸，还有更多其他的益处。模特维罗尼卡·韦伯（Veronica Webb）直言不讳：穿高跟鞋就像“把你的屁股放在座垫上”。由于重心放在脚前掌，身体不稳，穿高跟鞋迫使女性把肩向后放、背向后弓，这使她们的胸部变得更大，腹部更平坦，臀部更圆更挺翘。除此之外，它们还塑造腿型，使腿显得优美、细长，让人想起由于激动而变得紧绷的腿形。

再说说步态。曾经有人说过女人穿高跟鞋走路在男人看起来显得更性感，这是因为它束缚了女性——使她看起来脆弱，无法很快逃脱。然而，其他人认为是使用高跟鞋才使臀部扭动起来。正如鞋设计大师曼奥罗·勃拉尼克（Manolo Blahnik）所说的：“我干这行已经23年了，我做过平跟鞋、坡跟鞋——但没有什么像一双高跟鞋那样使你走起路来具有女人味。如果女人们抵制高跟鞋，我也不会于这一行了。”

挑剔的体重

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方，美意味着消瘦、轻柔，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的窈窕和克己。身在丰富的食品和诱人的佳肴之中，我们薪水最高的女模特们身高5英尺9英寸，体重仅有110磅。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142英镑的普通身材的女子只有自惭形秽了。

体重经常用身体质量指数（简称BMI）来计算，用以米为单位（英寸乘以0.0254）的身高平方去除以公斤为单位（磅乘以0.45）的体重。美国政府建议人们保持BMI值在25以下。对于一位身高5英尺4英寸的女子，这意味着体重要在145磅以下。即便是这样的体重，她的身材也会显得壮实、跟不上潮流，除非她再减掉30磅。

如果这样的话，她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对一般的美国人来说，即使每年把400亿美元倾注在减肥中心、健身俱乐部、节食食品、低热量苏打、食欲遏止剂、体育器械和健身录像上，他们还是变得越来越重。1/3的人口肥胖（超出公认标准20个百分点）——在美国这意味着3200万女人和2600万男人肥胖。25%的比率维持了30多年后，这个数字在1980年和1991年之间迅猛增长。在英国也报道了体重的苦恼。其人口中患肥胖症的成年男子人数增至13%，女子人数增至16%，是10年前的2倍。在许多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受媒体形象和社会评论的影响，有人可能会认为到现在为止，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是消瘦的，或者至少正在变瘦。大量花在瘦身产业里的钱表明我们正在努力……事实真是如此吗？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油脂的消耗量仅仅下降了2个百分点（摄入的热量从36%下降到34%），但是高脂肪的法式炸土豆条、汉堡包和鸡肉块却在餐馆最热销的食物中占据3/5。在每家餐馆，每份食物的量增加了很多，以致于盘子从10英寸增大到11英寸或12英寸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量。我们也没能较好地运用那些健身

录像或体育器材。一般的美国人每天只花16分钟锻炼身体。24%的美国人完全成了堆在沙发里一动不动看电视的电视迷。一个人如果一整天呆在床上需要1400—1600卡路里热量，正好维持身体和内部器官的运行（更换肠、膀胱的表面细胞等等）。进行各项活动的人们需要2000卡路里热量。有这么多的食物可以吃，而耗费的能量又几乎没有，难怪腰围一直在长。

我们并非懒惰、虚伪、贪食、邪恶，我们是人。我们面临着困境：自然选择几百万年来赋予我们暴食、时存脂肪、尽可能多地摄取脂肪、盐份和糖份的能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适应了干旱、洪水、地震以及植物、猎物匮乏引起的周期性灾害。甚至今天，近半数的发展中国家每年至少有一次食品短缺，其中1/3的地方食品严重短缺。身体有贮存脂肪、通过调节新陈代谢更为有效地利用食物以对付食物短缺的自然倾向。这是节食者的祸星，却体现了身体的高度适应能力。

我们在畜栏里用谷物饲养动物，生产出上好的、脂肪占30%的牛里脊肉，或是生产出纯糖来制作松饼和炸面圈。起码在这一切发生以前，人体具有适应能力。随着其他享乐的增多，我们喜欢恢弘夸大，而不是细致入微。每一家大型超级市场和药店都在过道上设专架售卖糖果棒；每年夏大，烤全牲都会架在火上，空气中充满油脂滴在火上的油腻气味。

由于食物供给量和花样有限，所以直到不久前我们才能吃到想吃的食物（人类学家拿破仑·柴格农 [Napoleon

Chagnon] 说过，棕榈果在美国可算是美食，但当他与雅诺马部落里的人生活在一起，有时棕榈果是惟一可以吃得到的食物时，它们再引不起人的胃口）。直到本世纪，产出才与投入持平。我们过去不得不活动，那是因为没有汽车运送我们，没有超级市场提供包装食品，没有精巧的机器做家务，也没有一应俱全的储备满足我们的每一种需求。在人们逐步发展的世界里，节省时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如今我们可以整天坐在办公椅上，再坐在汽车里，最后花一晚上的时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与此同时却试图强迫自己锻炼或者去健身俱乐部。

我们变胖的原因并不神秘：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却没有有效地控制油腻的食品和甜食，而且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安排下越来越不需要付出体力以谋求生存。这导致我们违背常规：拒绝食物，盲目地参加运动以消耗食物、调节并保持身体处于最佳状态。在其他文化社会中要花费几百年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状况，却在南太平洋中像汤加这样的群岛上迅速出现了。1986年的一份调查发现：2/3的汤加妇女40多岁时都很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在她们中是流行病，而且她们的预期寿命也缩短了。生活方式的迅速改变引起肥胖病的流行。汽车被开进来，食品被运进来，而这之前人们只吃自己种的山芋、木薯和捕的鱼。许多汤加人不知道这不利于健康，也没有以瘦为美的审美观念来控制食欲，他们幸福地吃掉涂有半磅黄油和冰淇淋的整条整条的面包。新西兰人认为羊肉细腻、含脂肪高，所以不能吃。结果被运到汤加，成为每日最受欢迎的油炸主

食。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有必要使汤加领袖塔法阿哈·土朴国王四世相信减肥的重要性。像许多领袖一样，这位国王身材庞大——他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达441磅。1976年他已被列为世界体重最重的统治者。相信自己有必要恢复汤加人做为强壮的运动家而非胖子的声誉，这位国王减少了体重瘦下来，并且为大家录制了他的一些健美运动的录像。

据说非西方文化有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在古代，像米洛的维纳斯这位生育女神，她的胸部、臀部和身体显得臃肿。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安纳和其他西非国家，女孩们被关在特殊的“增肥屋”里。她们被隔离开喂养，这样可使其变得更丰满，为出嫁做准备。身体中的多余脂肪有助于行经和生育，增加生育健康婴儿的机会（身体较重的母亲会生出成长发育较快的胖婴儿）。体重赋予女孩及其家庭社会地位，因为它表明这个家庭有能力抽出部分财物让他们的女儿长得丰满，生育能力强。然而，没有几个女孩能在家呆足够长的时间变“肥”，而且不管她们积聚了多少脂肪，它们很快就会消失。进化论留给我们的测试美的标准要求我们有正常或普通的瘦身材。

事实上，大多数研究结果都表明了这一点。通常是非常瘦或非常重的人更喜欢正常或普通的体重。戴文卓·辛在他检测的18种文化中发现了这一点，心理学家安妮·贝克（Anne Becker）在超重和肥胖居民极多的另一南太平洋岛——斐济岛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然而，不像在美国，这里2/3超重或肥胖的男女没有表现出迫切的减肥愿望，

也不会因为瘦身理想而折磨自己。她采访的对象中50%的肥胖妇女和70%的超重妇女都想保持她们现有的体重。但如果向她们展示13幅从非常瘦到非常胖的不同程度的人体线条画，并且让她们选出最吸引人的一张，斐济人还是选择了居中的几种体形。心理学家阿德瑞安·弗海姆（Adrian Furnham）及其同事把一组与安妮使用的非常相似的体形线条画展示给英国人、乌干达人和肯尼亚人。在哪些体形最具吸引力的这一判断上，不同文化之间有惊人的一致。没有人认为极胖或极瘦的体形吸引人；所有人都在男女线条画中选出同样的、体重居中的一组体形。安妮·贝克发现，在斐济，不管一个村子离市中心远近，男人和女人对这些评判都抱有一致意见。

那么是什么使某些社会的理想体重远离平均标准？达尔文进化论的力量是多重的，有时自相矛盾——一方面要填饱肚子，另一方面却又要吸引配偶。吸引配偶的动机与健康 and 地位紧密相连。地位动机有时使人产生冲动，抵制进食动机并推翻我们的审美观。我们知道骨瘦如柴和肥胖的身材不如平均体重的身材好看，但是我们却把它们看成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并且像渴望其他显示财富的衣着一样渴望得到它们。人类学家玛格丽特·麦克坎兹（Margaret Mackenzie）写道：“在一定情况下，若仅有一位国王掌握足够的食物和劳力，能够吃饱，不做体力活儿，那么他会变成胖子。”富裕赋予人威望。瘦人是太穷的、买不起食物提供足够热量的人，或许是因为干繁重的体力活儿而无法维持体重。当贫穷的妇女长胖的时候（因为没有营养的

食物便宜、容易买到，她们不太了解这些食物的危害性，并且也买不起昂贵的健康食品），瘦身、节制饮食和进行体育锻炼变得受人尊重。

肥胖症调查者杰弗瑞·梭伯（Jeffrey Sobal）和阿尔伯特·斯坦卡德（Albert Stunkard）仔细审查了有关社会经济地位和体重之间关系的144项研究。他们发现在比利时、英国、加拿大、捷克、德国、荷兰、以色列、新西兰、挪威、瑞典、美国以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中，妇女的体重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成反比（社会地位越高，体重越轻）。他们发现，在食物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比例关系完全与此相反。在那儿，不管男人或女人，地位越高，体重就越重。在发达国家，对于男人来说，社会地位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缺少必然联系。

瘦身理想通过节食和锻炼在社会地位高的人们中保持下来。这种保持也得益于社会流动性——身材瘦的女子更有可能“上嫁”，嫁给比自己出身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更高的男人。在美国、德国、英国进行的研究都发现上嫁的女子比嫁给门当户对的男人或者下嫁的女子瘦得多。这里面也有遗传成份。当两个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吃得过多时，他们获得了几乎相同的重量并储存在相同的部位。像身高一样，体重由许多因素决定，基因决定了多种体形种类的上限。但是长成什么样的体形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

表现极端消瘦的观念源于高贵的时装界，事实上它在本世纪已由时装界渗入到大众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退吉和90年代的凯特·莫丝这两个英国女孩，一个身高5英

尺6英寸，另一个身高5英尺7英寸，每人体重都在100磅以下。在广告中出现的孩子中，她们成为消瘦的典范。正如詹姆斯·瓦科特（James Wolcott）在《纽约客》中写道，凯特·莫丝成了一个“投镖的圆靶，中的每一镖都是由于她展示的不良的女性身体形象”。这些形象影响了大众传媒对美的表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小姐们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20磅。20年后，她们的身高增加了2英寸，但却保持了原来的体重。《花花公子》上的游戏伙伴也在同一时期体重减少了几磅，身高增加了几英寸，体重从低于国家平均值的11%降低到低于17%。甚至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标识——那位手持火把的女子——在1992年也变苗条了。

将消瘦作为典范被确立的同时也遭到女权主义和文化批评家的指责，他们认为女性受其迫害，并且相当危险。批评家说模特树立起错误的女性形象：看上去营养不良、弱不禁风。有人说她们看起来像吸食海洛因成瘾的人，或者说这些广告略带有儿童色情的味道。人们最常重复的批评是：她们弃儿般的身体应作为一种传染病的蔓延负责——她们在青少年中引发了饮食失调这一流行病。1978年海德·勃鲁兹（Hilde Bruch）第一次敲响了警钟。她把厌食症描述成“一种流行病”。她用这几行话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新疾病是罕见的，这种有选择地降临在年轻、富有、漂亮的人们身上的疾病几乎闻所未闻。然而这种疾病正在影响富有、受过良好教育和成功的家庭的女儿……过去的15或20年来，神经性厌食症一直以迅速增长的速度出

现。而以前它是极其罕见的。”几年后，《新闻周刊》宣布1981年是发生“无节制使用泻剂综合症”的一年，因此引起公众对第二次饮食失调——贪食症的注意。

纳奥米·沃尔夫瘦削的身材或许吓坏了每一位美国母亲。她写道：“变成厌食者绝对容易。”这意味着每一个正在节食的青少年都容易受到厌食症的影响。她说，女人们“必须声明厌食症是一种社会秩序对我们施加的政治迫害，因为我们是女人，社会地位低，它便认为我们的毁灭无关紧要”。这番话把厌食当成现代女性为减轻身体对自己的压力而进行斗争的象征。沃尔夫的书在年轻女性中引起共鸣。她们厌倦了同自己身体做对，也厌倦了无法符合美丽典范或者即便达到标准也无法受益的事实。

饮食失调的流行情况如何？是什么引起的？节食和过食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存在，很难给标准饮食下定义。但是历史学家琼·贾科布·勃拉姆伯格（Joan Jacobs Brumberg）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饮食失调没有再度出现。就全部人口来说，它们相对罕见，甚至在年轻女性中也不常见。现在，贪食症在美国上大学年龄的女性中占1%—5%。厌食症是更罕见的饮食失调症。它容易在20岁以前的青春期晚期发生，0.5%—1%的女孩患有此症。厌食症也是更危险的饮食失调症。由于厌食者每天限制自己只摄入200—400卡热量，所以会造成死亡机会，虽然机率小但并非无关紧要。贪食者居于节制饮食和无节制饮食之间，她可以每次吃掉8000卡热量。患者中90%—95%是女性，并且绝大多数是来自上层社会的白人。这种疾病隐

藏在了一件“社会外衣”下——它不受种族或性别的限制。同性恋男子饮食失调症的人数不断增加；当非白人妇女进入上层社会时，她们患饮食失调症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尽管人们容易把饮食失调归咎于媒体宣传和时尚，但是人们必须时刻记住：暴露于媒体的所有女性中，有98%的人并没有诊断出患有各种程度的饮食失调症。大多数女性常常节制饮食，许多人对自己的体形极不满意，但是几乎没有人体重减到70磅以下并导致停经，也没有人一顿吃下4天吃的高脂肪食物。发展到厌食症或贪食症并非“绝对容易”，它们是多种病因引起的复杂、严重的饮食失调，尤其体弱的年轻女性和一些年轻男性深受其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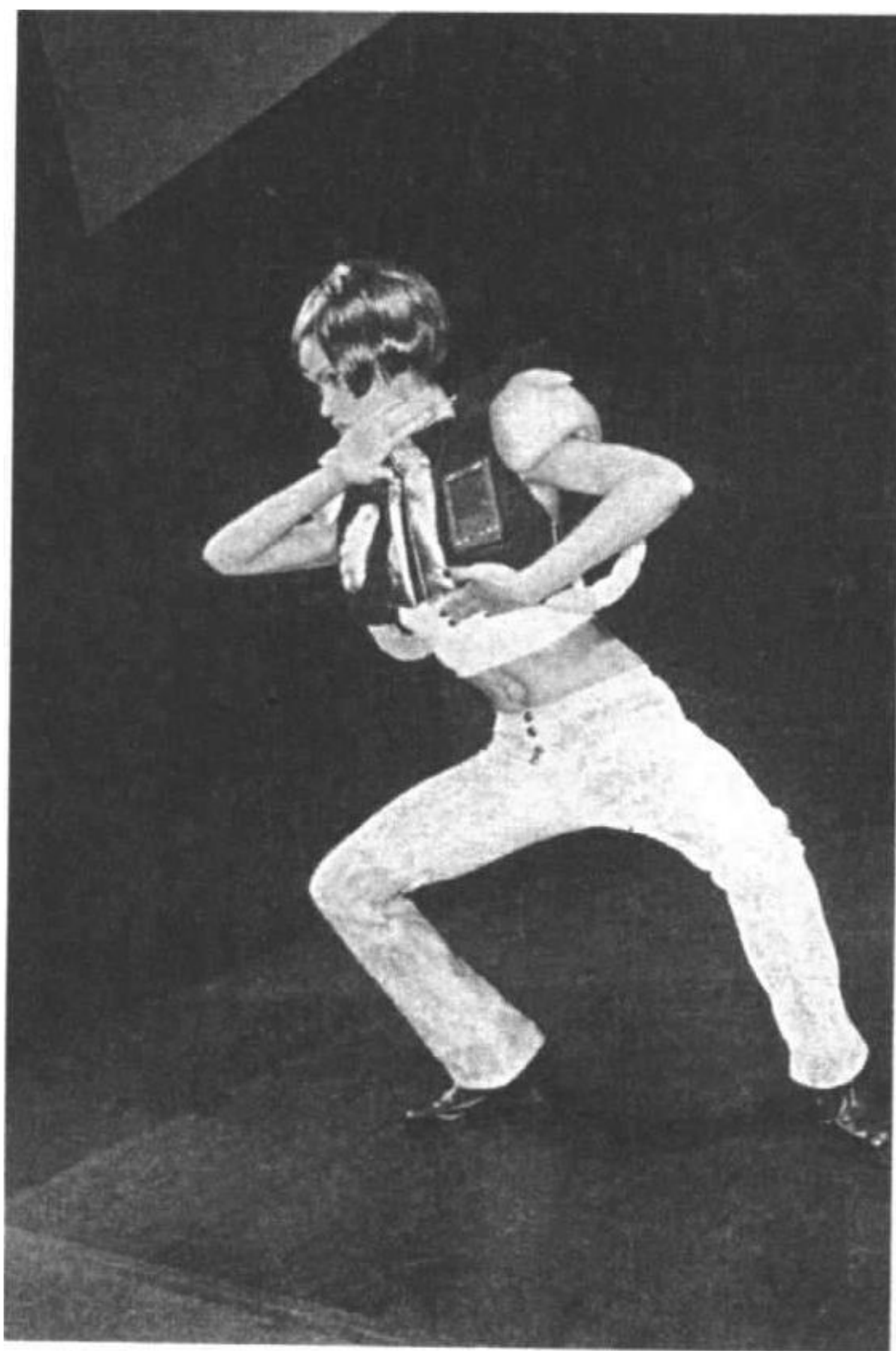
进化论中没有以消瘦为典范的先例。事实上，自然选择应该不利于这种偏好。人们一度知道如果女性饮食失调，她们的能育性和生殖力会被扰乱。甚至被严格限定饮食的老鼠（但是提供营养充足的氨基酸、维他命等等），其发情期的周期也会受到抑制，生育力也降低了。挨饿的动物不孕育、也不交配。停止生育是身体自我调节的安全阀门。它使动物在食物缺乏时期不必满足孕育所需的大量食物。然而，最近，科学家们发现，这些饮食被限制的动物活得更长一些（寿命长出30%）。它们不仅寿命长了，而且生育力也只是处于暂时不活跃状态，等待着充足的食物供应，一旦食物充足了，它们将会迅速进入生育的成熟阶段。这种暂停确实存在——被限制饮食的中年老鼠的卵巢老化得比较慢。

它听起来仿佛与现代女性有一些有趣的牵连。一些心

理学家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女性节制饮食或许是一种潜意识下控制生育的策略。20世纪60年代，当女性获得了相对的性自由和经济独立、并想推迟生育时，饮食失调和节食的现象迭起。对于这一现象，另一种看法认为：女性，而不是男性，正在追赶以消瘦为典范的时尚，这也有助于解释最高社会阶层把消瘦理想化的现象。

如果极端消瘦意味着缺少生育能力的话，那么男人们会成群地撤身离去。当然，当女人们把所有正确而又自相矛盾的东西融为一体——身材高而匀称、胸部丰满（对于有那么轻体重的人来说应该是不可能的）、臀部曲线优美，男人自然不会离去。由于瘦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对于一位男子，尤其当他想与一位其他人都觉得有魅力的女子相处的话，它的诱惑力就更大了。

极端消瘦是一种时尚，像大多数时尚一样，是一种由上流社会固定下来的时尚。我们的身体不仅仅反映了促进生育的、达尔文式的力量，而且也反映出文化和社会的力量，所有这些在时尚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展现。



7 .

时 尚

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很难在我和我的作品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威廉·詹姆斯

或许你的口袋里有一个半便士，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点指望……但是若穿上崭新的衣服站在街头，你会沉醉于美丽的梦境：仿佛你自己成变了克拉克·盖博或者葛丽泰·嘉宝。

——乔治·奥威尔

任何人都无法抵制用时尚装扮自己的渴望。

——汤姆·沃尔夫

时尚常常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我们必须原谅它做过的每一件事。

——珍·考克泰

巴黎女子时装业展示了西瑞·玛格勒（Thierry Mugler）的一件挂在模特乳头上的服装和约翰·盖丽阿诺（John Galliano）的一件裙裾长达12英尺的服装。在缅甸，帕当部落的一位女子在脖颈上套着一只10磅重的铜圈，在脚踝和手腕上也套着一些金属圈。纽约大街上的女孩把迷你裙穿在裤子外面，踏着平跟鞋走路。不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这些装饰物漂亮，然而总有一些人在某一时刻、某一地方是这样觉得的。

凡是认为时尚品味不具普遍性的评论家，我会对他说：你是对的。奥维德说：“我无法跟上时尚所有的奇思异想。仿佛每天都有一种不同款式。”他正在谈论发式，但是这话也正好符合对时尚的表述。浏览一下历史书籍，我们就会清楚：世界上并不存在大家都喜欢的、装饰头、脚或身体其他部分的饰物。

时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什么是美的，原因是什么（在人类形体上夸大了哪一部分，又试图掩饰哪一部分），但是时尚不同于美本身。尽管时尚常产生地震般惊人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美几乎毫不相干。我不可能只用一章就对时尚这样内涵丰富的话题做出公正的评判，但是我在这儿加入这一章的目的在于指出许多不是美的、却经常与美混淆的事物。

昆丁·贝尔（Quentin Bell）曾把时尚比做果蝇——一种短寿命的物种。两者都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兴盛和衰亡，这一特点使前者成为社会学家理想的调查对象，而后者成为遗传学家理想的实验对象。时尚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社

会地位的标志、一种态度的展示。正如我们创造建筑、制作家具一样，我们创造时尚并让它帮助我们协调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提供给我们舒适和安全的保障。然而做为个人的可视外延，它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复杂的内心愿望。

时尚只红极一时。最为名贵的服装在现场舞台的背景中首次登台亮相：数月的工作在应邀观众面前得以短暂的、绚丽夺目的展示，最后在高潮中结束。伟大的服装都有极其引人注目的入场。尽管现代时尚或许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但是它们总是与时下的事物相关，总是捕捉某个瞬间并且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记忆里。

时尚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吸收和同化了周围的旁流。迪奥（Dior）在二战后把大量织物引入女子服装中。与此同时，汽车制造商们使用了大量镀铬装饰物表现出与此相似的豪华。如果没有热衷于赶时髦的60年代和口服避孕药丸，玛丽·昆特（Mary Quant）的超短裙会上人难以理解。

服装告诉我们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被比喻成一种语言：词汇（是衣服、夹克衫、裤子）、修饰语（是镶边、腰带、披巾）、方言（大街上各种款式没完没了的变换）、外国口音（来自法国的香水，来自英国的帽子）、语助词（大靴子）以及个性化的花体字（没有人能解释切尔[Cher]的文字）。正像语言一样，语助词和俚语行话最终融入主流之中——现在如果一个年轻人穿着唐·马汀斯牛仔服、帽子向后戴，不会产生什么异议。我们最容易理解自己所在社会群落的语言，但是有时却难以解释各种

方言和外国语言。在每一个群落里，都有着装讲究标新立异的人们，他们的衣服设计巧妙、雅致甚至富有诗意；也有穿衣墨守成规的人，他们的衣着呆板、普通、乏味；也有不善于用服装表达思想感情的人。正如作家艾里森·卢瑞（Alison Lurie）说的：“甚至即使我们不开口，身上的衣服也在喋喋不休地同看见我们的每个人交谈着……”看别人穿什么自己也穿什么，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无异于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我们有时可以依赖服装语言，或是试图讲述某种事实；除非我们不穿衣服，否则衣服不可能沉默无语。

性

衣装会唠唠叨叨地说很多事儿，但是谈话的内容主要还是围绕性和社会地位这两个方面。时装与性有显而易见的联系，甚至连前卫的时装设计师们也同意这一观点。英国服装设计师凯瑟琳·哈姆耐特（Katherine Hamnett）说过：“在某种程度上，男人和女人着装是为了吸引异性，生儿育女。”另一位古姿（Gucci）时装设计师汤姆·福德（Tom Ford）说：“时尚服装全与寻求配偶有关……想一想18岁的年轻人。他们精力旺盛，出门前竟要屡屡试穿20件不同的T恤衫——而这对于他们来说显得很重要……时尚服装真正使人着迷的地方是它与性有某些联系。”

我们穿上时尚服装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身材更高、也更富有，显得完美无瑕、精神抖擞。它给予我们各种精

良装备去克服缺陷带来的苦恼。换句话说，时尚服装增加了我们作为配偶的身价。在动物界中，炫耀真实而优秀的身体标记颇起作用——正如我们看到的，天生长有长尾羽和鲜艳羽毛的鸟儿在交配中比那些着装普通的竞争者更为成功。同样，这在人类中也颇起作用。时装业之所以成为一个巨型产业，部分原因是由于虚假的广告宣传。说时装界成功地掩饰了真实而不利的标记是有些夸大其辞，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起了一定作用。在天才艺术家，如化妆师韦·邦迪（Way Bandy）或者凯文·奥考因（Kevyn Aucoin）的手中，装饰物真的可以引起变革。

有些人类学家相信：穿衣服的最初目的是想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身体的性感部位来，而不是试图把它们隐藏起来。随着清教徒禁欲主义的出现，后来在西方才出现了掩饰的功能。在原始艺术和身体装饰物中，突出地展现了孕育生命的源泉。直到16世纪早期，基督教的宗教艺术还在强调耶稣的生殖器。在那之后，系在腰间的腰布和用来遮羞的无花果叶出现了，衣服成为保护身体、禁止不洁思想的卫士。

尽管衣服的目的是要减少性吸引力，但是事实上却有增加性吸引力的倾向。阿纳托·法朗士（Anatole France）在他的讽刺小说《企鹅岛》中描绘了在那儿发生的一件事。当一位传教士决定给新入教的雌企鹅穿上衣服时，所有的雄企鹅都兴奋起来。正如僧侣马吉斯（Magis）记下的：“每只雄企鹅的鼻子伸得直直地，向身着粉装的那只年轻的企鹅小姐靠近，仿佛那是一个重力的中心似的，看到这

情景你一定会羡慕不已……此时连我自己都感到一阵眩晕，无法抗拒那只企鹅的吸引力。”

服装能展示并加强我们的自然魅力。它们使人的脖颈显得修长，胸部丰满，肩膀宽，腰纤细，臀部富有曲线美，脚小巧，腿匀称修长。然而服装也激起人们对遮盖部分的好奇心，给我们留下空间去自由地驰骋想象力。身体暴露的部位是有选择性的。J.G. 弗鲁戈（J.G.Flugel）在他的一本关于服装心理学的书中提出：各种款式提供了一个“变换的性感区”。甚至最保守的服装也会让观者一睹身体的风采，这一特点使它不同于那些设计宗旨在于特别说明不许与异性接触的服饰（如修女的修道服，伊斯兰妇女的方披巾）。当人们穿上日本和服时，会感到有向后拉的力量，这样的设计目的在于展现脖颈的修长曲线。在不断推陈出新、富于变化的西方时装界，这代设计师展现腿，另一代设计师强调胸部，下一代则突出裸露的后背。这种变化使人们的兴趣焦点长久不变地集中在性上，并且使身体有无穷无尽的、激发性欲的可能性。

历史修正派学者甚至提出圆撑裙是19世纪用于诱惑异性的工具。女人们认为有了里面的钢架圈是一种解脱，因为她们不用再穿几磅重的衬裙，挪动双腿也容易多了。按照时尚历史学家詹姆斯·拉沃（James Laver）的观点：看似保护道德规范的圆撑裙实际上是“一个空洞、虚伪的东西……我们认为其结构坚固不动；但是，什么也不如事实说明问题。圆撑裙被摆来抛去，总是在急急地晃动着……它一下摆到这边，一下又摆到那边，稍稍倾斜后，又前后

摆动起来。”甚至有时它会向上抛起。它总是在摇摆、起伏、窸窸窣窣地动着，在要暴露的一瞬间又恢复到原位。所以19世纪的圆撑裙以它特有的方式激起了人们的性欲。

20世纪早期的设计师，像保罗·波瑞特（Paul Poiret）和马德雷恩·维昂耐特（Madeleine Vionnet），把妇女从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减少了条条框框的束缚，为她们设计出了柔韧、合体的衣服。他们的设计为本世纪最大的时尚新闻——裸露身体铺平了道路。那时甚至连波瑞特最美丽的模特也不具有完美无瑕的身体。一位模特“为了把胸部塞进她高贵的紧身胸衣里不得不像卷煎饼一样卷起双乳”。如今，作为模特必须要有高贵、漂亮的身材，即便有些人通过实施外科填充手术才得到这样的身材。现在的时装对身材的要求很高。如果形态不美或是身材臃肿，时装反而会突出身体的缺点。

社会地位

性只是时尚的一部分。毕竟没有人会把《时尚》、《哈泼导购》同《花花公子》混淆起来。《时尚》创刊于1892年。最初几期里有许多像格楚德·凡德比特·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这样的上流社会女子，她们都身穿上流社会的衣服。书报业巨头孔德·纳斯特（Conde Nast）于1909年买下这家杂志并且与其编辑艾达娜·吴尔曼·齐兹（Edna Woolman Chase）一起使刊物改头换面。它旨在反映一个“融容貌、才智、形象、财富和成功为一身

的、具有影响力的、不论阶级出身的、民主的精英阶层”。正如肯尼迪·弗拉舍（Kennedy Fraser）注意到并且表示理解的：“即使在昂贵的、手工制做的鞋子里也永远会有令人不满意的粗糙纹面。”《时尚》及其竞争对手《哈泼导购》就是有关那些粗糙纹面的。

和鸟儿最美丽的羽毛、最甜美的歌声一样，它们所描绘的时尚是社会竞争的产物。它们反映了人们在“都看我”的比赛中努力战胜对方、超过对方。它们也展示了许多浮躁的、不断变化的规则：人们总是在解除彼此间的障碍，吵吵嚷嚷地要在顶层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使时尚成为势利的、排斥异己的途径。那些置身上层社会的人们只有通过严密的法规才能保护自己的地位。一个人需要献身精神、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时间和金钱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内情。一些小差错会暴露出一心想发迹的野心和装腔作势的行为。着装上的失礼与其说是审美观上的错误不如说是社交和道德上的失态。这样的规范使人们非常注意细枝末节，如裁剪（西服翻领的尺寸，裤筒展开的程度）、颜色和衣料。一件崭新的而且很值钱的衣服，一旦服装的样式过时了，人们就会立刻把它淘汰掉。

本季度时兴、下季度过时的暂短时尚纯粹是受社会地位的影响。一件衣服，如果抛开它的社交含义，它会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竞争促使时尚风靡一时，但是追求时尚并非是轻浮、愚蠢的行为。虽然比赛进行得紧张激烈、激动人心，但是运动员们头脑清醒、操作理智。他们知道在社会竞争中，服装是有价值的流通货币。

服装表明我们处于众人的前头，或者至少是没有被落在后面。

时尚的诞生

戴斯蒙德·莫尔斯把人类称为裸猿。而事实上我们是惟一穿衣服的类人猿，这种提法似乎更为合适。在镜子前面，许多类人猿会仔细检查自己的牙齿和其他平常看不到的身体部位。雌性黑猩猩会转过身来看自己粉红色的屁股。它们对自己的长相相当感兴趣，但只不过随随便便地装饰一下就完了，有时把一只死老鼠绕在肩膀上充当饰品。仅此而已。它们并不使用饰品标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志向。

而人类几千年前就开始装饰自己，并且在同一时期开始创作岩画。历史学家们估计莫斯科北部的墓穴已有28000年的历史了。勘探队员们发现：当时的人们用穿孔的牙珠子镶在袖子和裤腿边上作为衣服的装饰物。在一位60岁老年男人的尸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遗物：一顶缝缀着小珠的帽子、象牙手镯以及用2396颗珠子穿成的数串珠链。在老人尸骨的旁边躺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尸骨。两个孩子也都覆盖着数枚小珠子。其中只有男孩和老年男人戴着坠有饰物和动物牙齿的项链，这表明当时不同性别的人穿戴的服饰不相同。在欧洲中部，人们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带有针眼儿的针。这些针由猛犸象的象牙或者由鸟骨、鱼骨、驯鹿骨头制成。线由动

物的腱充当。它们的作用跟今天的针一样：把线从小孔中纫进去，用针尖穿刺衣物。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针是在3—4万年前的洞穴中发现的。

尽管人类在数万年前就开始穿衣服了，但是历史学家认为“时尚”直到14世纪才在欧洲诞生。在此之前，人们喜欢穿稍加改动的先辈们的衣服样式。古罗马的托加袍和短袖束腰外衣、印度的纱丽服以及日本的和服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服装中的典范。尽管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Nefertiti）和末代艳后克利奥佩特拉（Cleopatra）生活的时代相隔1000年，奈费尔提蒂的服装若在克里奥佩特拉看来仍然十分得体。

在14世纪，有钱的欧洲人脱下传统的宽松式服装，换上经过裁剪缝合、钉着扣子、镶着花边的衣服来炫耀自己的身材。男式服装的灵感是从军装中汲取的（男式时装几百年来一直是这样）。中世纪骑士的衬衣变成了当时的男式紧身棉袄、紧身上衣（指加厚、絮着棉花或其他材料、像紧身夹衣的衣服）和紧衣裤。用垫衬的方法加厚的上衣和紧身裤保留了几个世纪，成为男性的必备服装。

14世纪的女子穿着长长的连衣裙，裙子的下摆像飞溅的水花一样拖在身后。女子长裙的上装开着低领口，在腰间接缝处镶嵌着滚边用来绷紧上装。宽腰带把紧身上衣和下面宽松肥大的裙子分开。披肩、头巾的边上和袖口、褶边带有各式各样的装饰物，袖子上还缝有几十颗小扣子。这样的衣裙既富有戏剧性又体现个性。这种设计表达了人们不断创新、追求变化的渴望。

历史学家把时尚的出现同商人、银行家、零售商和投机商这些新的金融力量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封建社会按照财富和地位严格地区分了各种界限。然而到了14世纪中期，英国、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随着贸易、商业和城市的兴起，一个在竞争中超过了贵族阶层、力量不断壮大的新阶层出现了。时尚成为繁荣的见证并且表达了这个阶层的社会抱负。文化历史学家斯蒂芬·贝雷（Stephen Bayley）说过：“正是繁荣的却不稳定的中间阶层形成了最大、最活跃的消费群体。”经济学家朱丽叶·斯考（Juliet Schor）写道：“人们消费产品不仅是要满足需要、增强力量、标明社会地位，而且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消费、浪费和消遣

1899年、经济学家骚斯坦因·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其著作《有闲阶层之理论》中分析了人们是如何利用衣服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他的分析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仅仅拥有财富和权力还不够”，必须要展现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为此他总结了几条规则。韦伯伦首创的最有名的词汇是“夸耀性消费”，或者是积聚贵重物品时的排场。贵重物品是指稀少的、难以得到的或是需要花费其他人数小时的技术性工作生产出的物品。1558年，当25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登上王位时，她身披白鼬毛、锦缎、丝绸，戴着许多珍珠。在模特斯蒂芬妮

· 西摩 (Stephanie Seymour) 和艺术收藏家、百万富翁彼德·勃朗特 (Peter Brant) 的婚礼上，斯蒂芬妮身上穿着一件由阿兹戴茵·阿莱亚 (Azzedine Alaïa) 设计的名贵连衣裙。制作过程共花了900多个小时，上面有手工缝缀的4.8万个小镜面。

着装必须证明某人在“夸耀性消费”。韦伯伦认为消遣是指人们从与赚钱无关的、也不生产任何价值的活动中得到乐趣的过程。像狩猎、高尔夫球、帆船和水球这样的高层人士参加的娱乐活动常常体现出对着装的考究。做为男式晚装的高顶礼帽和燕尾服，其灵感来自英国狩猎者的骑马装和帽子；帆船运动员衣服上的铜纽扣和色彩鲜艳的上装在陆地上被采纳成为运动装；卡迪根式开襟毛衣和水球衫也从运动场上挪到家里，成为日常着装。如今我们穿的所谓的“巴塔哥尼亚女式时装”源于潜水、滑雪或登山装。

因为军人总是与上层社会阶层相联系，所以军装被认为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人们采用了用于军事的战壕雨衣、肩章、坦克表、双排钮厚呢上衣和卡其布装。正如琨亭·贝尔所写的：“对于服装系学生来说，战争以及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在于这样的事实：军人和运动员的职业是整个现行等级制度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主要的、惟一的体现。”

证明某人生活得悠闲、安逸还有另外一种方法：穿那些需要精心保养的衣服。亚麻布就是一个好例了，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一上身就会起褶。17世纪的法国贵族穿着用缎子做的绣花鞋，这表明这些大家闺秀们从不在泥地

上走路。她们的鞋也确实不会沾一点儿泥巴：轿子会直接把她们抬到凡尔赛宫的殿堂。今天流行的那些半透明、轻盈柔滑的连衣裙也是一个好例子，它们看上去根本经不起任何力量。

因为追求时尚使人无法劳动，所以时尚便成为生活悠闲、安逸的最明显表现。中国的贵族过去留着长长的指甲，目的是要表明自己不需要干活儿。最近一位时尚记者写道：“高跟鞋是专为那些花钱雇人跑腿办事的有钱人设计的。请别人替她们跑干洗店、叫出租车、取午饭。”鲍德萨·卡斯莱恩（Baldassare Castiglione）在他1538年写作的《弄臣》中提到sprezzatura和disinvoltura这两个词语，它们被用来指弄臣们倨傲、安逸、不劳而获的本质。从古至今都是一样，因此可见这个观点决不是牵强附会、随意编造的。

最后一点，“夸耀性浪费”标榜社会地位。“夸耀性浪费”的基本含义是指由于某人总有足够的物资供应，因此他不怕过分消费。查理大帝在当时手套制作手艺复杂、难以清洗的情况下却拥有800副精致的手套。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使用的卫生纸是由别人手裁的，他们还让男仆用银碗给他们的狗喂食。20世纪早期，纽约社交界名人丽泰·德·阿考斯塔（Rita De Acosta）一个人就有87件黑色的、只有镶嵌的花边不同的天鹅绒外套。意大利鞋匠弗拉葛摩（Ferragamo）曾经卖给葛丽泰·嘉宝70双鞋，仅仅是因为嘉宝要进行一次短途旅行。他曾卖给库奇比哈尔的女土邦主100双鞋。这位女土邦主还给他许多珍珠和钻石用来装饰

这些鞋。

要解释夸耀性消费、夸耀性浪费和悠闲安逸，没有什么比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王宫更好的例子了。他的弄臣们谄媚争宠，在宫廷里没完没了地争夺权势。据说几位受宠的弄臣不惜花费重金买到一项特权，允许穿同国王的王服相似的紧身大衣——用红线镶边、银线刺绣的蓝色云纹绸制成。这一小群弄臣不关心别的，只是相互排挤、一心想超过对方。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宫廷里盛行相互攀比的风气，时尚转而向极端发展。

为了树立宫廷格调，路易十四让大臣们早晨在他整装时朝见他，这样的朝会被成为早朝。早晨，当他睡醒以后，有人会递给他假发套。他允许大约100个弄臣直接在他的卧室里被接见。在助手的帮助下，他穿上长袜、与丝袜相连的齐膝短腿裤、在搭扣上镶着钻石的鞋，最后是袜带（这是由国王自己系的）。此时他略微休息一下去吃早餐。然后，两名贴身男仆帮他脱下晨衣以便他能穿上防身的衬衣。之后，他佩带宝剑、各种珍玩、领结、花边手帕、大衣、帽子、手套以及手杖。给国王什么衣服、什么时候递以及顺序和礼节已经由大臣们熟练掌握。一旦国王穿着停当，早朝也就结束了。

据说，年迈的路易1715年最后一次出现在典礼上时已经几乎走不动了，他身上穿的衣服对于他的年龄来说太沉重了。曾经象征着显赫地位的东西很快变得一文不值了。举一个例子，路易喜爱的巨大的金黄色假发套和所有弄臣戴的假发套后来被人放在破箱子里当抹布和托布贱

卖。

出格

昆丁·贝尔还增加了第四条展现社会地位的规律：夸耀性出格。只有那些处于上层社会的人才时间和精力在不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找到乐趣。由于受到社会地位的保护，他们随意制定法规，还成为先锋派时尚艺术的资助人和创作者们中的一员。英国贵族斯蒂芬·坦恩特（Stephen Tennant）是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旧地重游》中塑造的塞巴斯蒂安·弗林特的原型。20年代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给斯蒂芬拍摄了照片，斯蒂芬当时身穿细条花纹套装和一件皮夹克，嘴上涂着唇膏。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约翰·赫尔（John Hoare）说的：“看上去他好像是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而不是20年代的人。”作为一位英国议员的妻子和伯纳德·罗素的情人，奥妥莱恩·摩瑞尔（Ottoline Morrell）女士穿着的服装仿佛来自“贝拉斯克斯的一幅油画”。尽管这些衣服由华贵精美的布料制成，但它们常没有衬里、系得不牢，只用粗针脚缝合。这些衣服倒更像“演戏的道具”，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舒适而是为了激发观者的想象力”。如今，许多女装设计大师们纷纷从贵族身上汲取创作的灵感。例如阿曼达·哈莱齐（Amanda Harlech）是卡尔·拉格菲（Karl Lagerfeld）的灵感之神，这之前曾是约翰·加里阿诺（John Galliano）的灵感来源；伊莎贝拉·贝娄（Isabella Blow）曾启发

了亚历山大·马克昆（Alexander McQueen）。哈莱齐指贵族哈莱齐小姐。贝娄曾向1998年的巴黎时装界展示了一件“看起来像一顶打开的降落伞一般的”连衣裙。她是德维斯·伯拉顿爵士（Sir Delves Broughton）的孙女。这位贵族爵士被牵扯进1941年谋杀肯尼亚君主艾罗的案件中，后被宣布无罪释放（由于写成书并且拍成了电影《白色的恶作剧》，他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

中层阶级担心自己被认为“没有品味”，看上去丑陋庸俗，所以他们紧紧追随时尚。连最保守的人也会被潮流带着，穿上一件时髦款式的衣服，仅仅是因为这种款式太流行了，人人都穿以致于不穿就是不识时务。上层阶级害怕被人当成仿效他们的中层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中层阶级一采纳某种时尚，他们就会立刻放弃的原因。一次，时尚版编辑戴安娜·瑞兰德（Diana Vreeland）建议一位副主编：“不要害怕俗艳，但是不要让人讨厌，不要像中层阶级似的呆板沉闷。”时尚开始于少数人的出格，以最后成为大众的主导潮流结束，而且当仿效者不再追随后还会卷土重来。

其实出格的服装只适合那些有正确态度的人们穿。让我们看一下中层阶级美丽的女王们，这些美国小姐身穿晚装和泳装面带微笑地出场，谈论种种社会问题，同年长女伴周游，充分表现自己的真挚和热诚。而相比之下，那些入时的、领导时尚的模特们吸烟，参加舞会，面容憔悴，看上去像吸食海洛因成瘾的人，如果一天的报酬低于1万美元，她们就不愿意起床，而且还极少展现笑容。模

特们操纵并展现世界的时尚。她们的工作就是代表精英阶层，让人惊叹，引人敬慕，而不是愉悦他人。

控制大众

时尚开始流行的500年里，上层阶级颁布了各项节约法令用来限制消费，并使其法规化。这些法令对着装的方方面面，从什么人能穿哪种面料到裙子要裁多宽、鞋子能穿多长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只有上层阶级才可以穿更长的鞋，戴更高的轮状皱领，穿更高的鞋跟和令人反感的短式紧身上衣。他们力图保持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权。然而这种努力是一种巨大的失败。中层阶级下定决心偏要穿着上层阶级的鞋子走路。

节约法只是起到了加速时尚步伐的作用。当中层阶级被禁止穿某种款式或颜色的服装时，他们便另辟蹊径，寻找巧妙的方法避开法令，发明创造出新的时尚。法令规定威尼斯人只允许戴一串嵌在领口的珍珠颈链，他们加以改制后，戴上一条由数串珍珠串成的、垂至衣服褶边的项链。18世纪日本的节约法只允许武士阶层穿缝缀金线、染色斑驳并有刺绣图案的绸衣，有钱的商人阶级于是就穿上黑色和服，在衣里藏着华贵艳美的织物。

节约法经常遭到嘲弄。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法国勃艮第、意大利、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男人们穿着叫波雷恩（poulaines）的长长的尖头鞋。有人说波雷恩最初是因为一位贵族的脚趾甲长在肉里很疼痛所

以需要穿这种鞋才流行起来。后来所有人，除了干体力活儿的雇工以外都穿波雷恩。大量的节约法把一般人鞋的长度限定在6英寸，后来到2英寸，但是贵族在此范围以外。然而有些男子穿的鞋太长了以致于不得不把鞋系上链子拴到腿上以防止绊倒。发展到最后，这种鞋不再流行而被方头鞋取代了。

1476年，威尼斯法律设立了一个叫做“奢华长官”的执法职位。此人的工作就是为奢华制定法规。然而无视法令成为值得骄傲的本事。有个词叫“为奢华付钱”，意思是如果被发现穿着明令禁止的奢华服饰，此人愿意支付罚金。仿效上层阶级的风气甚至波及到神职人员。1438年召开的威尼斯圣公会会议提醒神职人员不要穿流行的小夹克，说“小夹克……是如此短小以致于清楚地露出了牧师们的肚脐”，而且还这么紧，他们每天早晨把自己缝进去，拆线后再脱下来。教会命令倔强的修道士和牧师把头发剪短修齐，一律穿教士的长袍。1706年到1709年之间，奢华长官提出一个设想来制止仿效上层阶级的行为：他下令已婚的贵族女子和市民只能穿黑颜色的衣服。结果发生了什么？处于最上层社会的人们只在正式场合才遵从这条法令。更糟的是，即便不是贵族女子也开始穿黑色衣服。当刺绣和色彩明艳的织物面料不再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时，低层阶级便对它们失去了兴趣。

为什么国家对这么小的行为也要制定法规？社会学家埃尔文·高夫曼说，如果购买某种东西标明买主属于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成员，那么这种东西就成为社会地位的象

征。在现代，购买力是通过高价位和出售精品的、令人望而却步的购物场所以及社会标准加以控制的。而在18世纪以前，这样的专有权是由法律控制的。

对服装设计师的崇拜

国家最终对时尚失去了兴趣。查理一世在1643年颁布了英国最后的节约法令，1648年查理一世被处予死刑，这些法令随之被撤消。在法国，最后的反奢侈法规在1720年出台。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793年国民会议规定：“不论男女，任何人不许强迫任何男性或女性以某一种特定方式着装……每个人都有自由穿适合他或她的、或者他或她喜欢的衣着和装束。”这项法规虽然禁止穿异性的服装，但对其他方面几乎没有限制。

到19世纪，时尚变得民主化了。由于发明了缝纫机和成衣，出现了商店，普通人也有了选择服装的余地。欧洲男子远离没落贵族和特权阶层过于炫耀的服装，采用颜色素净的套装，只是从精湛考究的缝制工艺和精致的细节部分入手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正在这时候，一位服装设计师诞生了。他是一位艺术家，赋予最高时尚以新的威望。从前富人穿的衣服一直是由地位卑微的雇佣工和女工按照主顾的要求制作而成。查尔斯·弗拉德瑞克·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使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1858年，他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商店，出售他的妻子在他家沙龙上展示的“现成的裙装、大

衣以及丝绸制品和做工一流、新颖小巧的物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皇后欧仁尼（Eugenie）曾买过一件沃斯的服装。直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沃斯的服装店一直承做贵族、特权阶层以及像莎拉·伯哈德（Sarah Bernhardt）这样著名演员的服装。沃斯的服装具有创新性，其定做的服装自成一统，不同于商店里卖的成衣。那些衣服是由手艺人 and 机器缝制的，而他的服装出自一位艺术家的双手。由于坚持用创新控制产量，沃斯把制衣人从以前同工匠、商人相提并论的地位提高到艺术明星的位置。不久，几十个仿效者也在巴黎开了服装店。

随后的100年里，时装界响彻着巴黎服装设计师具有权威性的强音。他们一建立标准，世界其他地方便趋之若鹜、争相仿效。沃斯用艺术的表现形式创建了高级定做女子时装店，巴黎为它的成长提供了营养。蔡伯·辛迪凯德拉巴黎女子高级服装店始建于1885年，严格使用“高品质缝纫”艺术把关：每一件成品都用手工缝制，在画室中创作，经过精益求精的搭配。从一小块样布、对街上女子不经意的一瞥、历史书上的人物形象、一幅画、芭蕾舞、游历或者仅从想象中获取灵感，保罗·波瑞特（Paul Poiret）、玛德雷恩·维昂耐特（Madeleine Vionnet）、夏奈尔（Coco Chanel）、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克里斯托伯·拜伦西葛（Cristobal Balenciaga）、休伯特·纪梵希（Hubert Givenchy）创作出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灵秀的服装。

高级女子时装设计是一种精湛的艺术。它依赖于穿衣人高贵典雅的气质。在这一点上，它与芭蕾舞很相似，芭

蕾舞也是依赖窈窕的身材传达美的意境。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曾记述过他在巴黎玛德雷恩·维昂耐特家拜访这位96岁高龄老人的经历：“她把自己看成是与巴甫洛夫（Pavlova）处于同一水准的艺术家。她一心追求完美，甚至对日常事物的认识也带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痴迷态度。在她的房间里摆设的工艺品无以伦比……。她摆弄布料正像雕刻大师意识到一块大理石石料具有潜在的可塑性一样。”据说拜伦西葛能用两只大拇指拆衣服，而且为了把一只袖孔的位置弄正会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不睡觉。

高级时装属于横跨大西洋航游的时代而不属于协和式飞机时代。客户必须要量出3—5个人尺码，而后有可能等上数月才能拿走成衣。尽管高级定做衣店赫赫有名，它们的服装设计师也频频在时尚杂志上露面，但是如今全世界不超过3000名妇女购买21家商店生产的定做服装。当杜米尼克·杜恩（Dominick Dunne）报道1998年巴黎高级女装展时，他被告知“大多数买主的丈夫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有5000万美元的财产，这样富的人你可能闻所未闻”。这些衣服极其昂贵。T恤衫可能标价6000美元，套装3万美元，晚装竟达25万美元。但是对于穿这些衣服的女人们来说，“高级女装店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它有其他任何商店没有的东西。”

时装名牌

在巴黎高级定做时装发布会上展出的一些服装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穿。一家高级定做时装屋不可能只依靠出售定做时装维持，它需要大量资金。其实它赚的钱大部分是通过出售各种香水、化妆品、手提包、太阳镜、各种款式的牛仔裤和现成服装得来的。对于许多购买这些廉价物品的顾客来说，追求高级时尚并不是拥有其他任何人没有的东西，而是拥有一些富人拥有的东西，这些小物品越能说明与上流社会的密切关系越好。设计师的商标像纹章图案一样被人们佩带，而且成为服装展现吸引力的最基本部分。汤米·赫尔菲格（Tommy Hilfiger）说：“没有商标，我卖不出一条裙子。”而唐纳·卡兰（Donna Karan）一次遗憾地说：“到处谈论的都是商标！这些开士米织物到底怎么了？”

在美国大约25%的太阳镜和手表是赝品，如今仿造业发展成为资产达2000亿美元的产业。纽约的街头小商贩们兜售着仿制的劳力士和泰·休尔表，路易斯·伍顿、古姿和帕拉达的手提包以及汤米·赫尔菲格和拉尔夫·劳伦的服装。许多人宁愿购买这些由廉价材料制成的、有损身份的产品，也不愿去买材料精致考究、真正名牌、代表一定社会地位的物品。从巴娜娜·瑞普利到西尔斯这些连锁商店的服装都模仿了顶尖时尚。它们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越来越了解时装界最新流行动态的消费群的需要。

顶尖时尚不再是曲高和寡、只有极少数人喝采的阳春白雪。如今，时尚在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站上得到展示。在有线电视上，最受欢迎的服装秀是奥斯卡颁奖仪式前夕播放的节目。在会场上，女主持人、喜剧演员琼·瑞弗斯（Joan Rivers）在被提名者走进来时上前和他们搭话，不让他们谈影片，而是让他们谈一谈身上穿的服装。

服装设计师们知道让女演员、音乐家和运动员们穿上他们设计的服装会给自己带来滚滚财源，因此他们争先恐后地提供赞助服装。这迎合了大众模仿名利双收的时髦形象的愿望。随着服装设计师们趋于迎合大众，服装又怎么能继续代表精英阶层，反映珍贵呢？在一个充斥着赝品的世界里，什么能代表社会地位呢？

超级模特和名牌身体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花掉全世界所有的钱也不会使高级时尚时装适合大多数人的身体。正像灰姑娘的鞋不可能穿在她那两个丑恶的姐妹脚上一样。收看有线电视节目的观众将会看见裸露的双肩、上挺丰满的胸部、扁平的小腹和消瘦的臀部隐藏在半透明的、柔滑的裙装和弹力束身衣里。他们将会发现体现新时尚的超级明星变成了人的身体，它已经成为夸耀性消费的场所。只通过一样的黑衣服和仿制手表、手提包，你可能区分不开富人和穷人，但是很有可能富人瘦得多。很有可能富人将会通过健美锻炼、私人教练的建议、吸脂术和填充术重新塑造身体。富人要

保持这样的身体要支付极其昂贵的费用。他们昂贵的身体与其显赫的地位相称。

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身体已经成为一种地位的标志。关于整形外科手术已不再是秘密。妇女们不再遮遮掩掩，而且像帕姆·斯波林（Palm Springs）这样跻身富豪的女人对此还大加炫耀。女人们参加各种舞会时彼此展示身上动过整形手术的缝合处的针脚，骄傲地谈论手术昂贵的费用。在一些首富们参加的交际圈里，会看见由高级时装设计师裁剪的服装，一流的、著名的外科医生做过的脸，以及在收价最高的私人教练指导下塑造出来的身体。像服装设计师一样，外科医生谙熟自己的手工技艺，而且客户们也经常能认出哪个人的脸出自哪位医生的手。

人们对名牌身体的着迷程度不亚于名牌时装，其原因有很多。正如我们看见的，上流社会的服装容易被模仿和复制。高级时尚时装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震撼。审美趋向简单和朴实。20世纪20年代，夏奈尔引入黑色小巧的服装和朴素的布料，像从前一直用来做男士内衣的平针织物等。保罗·波瑞特对夏奈尔嗤之以鼻，说她发明了“简朴的豪华”。如今避开繁琐装饰，转向简朴和“简朴的豪华”时尚仍在继续。大多数最受人喜爱的服装出自极简派艺术家的审美观和创作。

在现代，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超级模特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退吉、简·施瑞普顿（Jean Shrimpton）和其他模特们开始成名。和服装设计师一样，超级模特刚刚出现时仅被当成地位卑微的雇佣工，正像模

特莉莎·芳莎格瑞维斯 (Lisa Fonssagrives) 过去常常把自己称作“挂衣架”。“超级模特”现象通常要追溯到1990年，当时英国《时尚》杂志把琳达·伊万吉斯塔、克里斯蒂·特林顿、辛迪·克劳馥、纳奥米·坎贝尔和塔堤阿娜·帕提兹刊登在它的封面上，并把她们列为世界级的顶尖模特。如今时装展览常借用最优秀模特的名望和地位，她们技压群芳的登场本身就能表明设计师的实力：他们有钱也有门路能够雇佣她们。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模特名字并不是家喻户晓的词语。然而，今天的模特跻身于富豪和贵族圈子。她们如此的消瘦以致于摄影师在摄影时不得不用别针把她们的衣服别上，使衣服适合她们细窄的臀部。保持模特极瘦的身材需要大量努力。很难不通过一些骗人的手段，例如药物、吸烟、饮食失调等获得那样的身材。事实上，许多身材纤细的人确实采用了欺骗人的方法。保持身材需要钱和空闲的时间，需要强迫性的注意力集中。它还需要对你吃的每样东西加以控制。

当男模特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后，他们也开始面临相似的压力。男模特马克斯·施肯伯格 (Marcus Schenkenberg) 被付以高酬请去做服装广告，但是表现他不着此服装的镜头占了很大的比例。在他做加文·克莱因广告宣传的多幅版面时，摄影师布鲁斯·韦伯 (Bruce Weber) 告诉他说：“你将不会经常穿着这件牛仔裤，马克斯……或许你要把它脱下来披在身上。”显而易见，传达给购买者的重要信息不是牛仔裤的款式而是马克斯出众的体形。

当然，饥饿性节食和在健身馆花掉数小时对于男、女模特来说是值得的。对于他们，将来获得的报酬可能相当丰厚。但达到和差一点的区别可能就是巨额财富和默默无闻、被人遗忘的差异。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的，模特业是一个赢者称王的竞争场所——处于顶端的一小部分人在竞争头奖。世界上仅有大约12位超级模特。在这样的竞赛场里，微弱的优势可能意味着脱颖而出。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有人可以赚几百万而有人赚不到钱。模特是一个报酬高、仅为最优秀的少数几个人设立的职业。

尽管篮球运动员身高7英尺或橄榄球运动员体重350磅，体育迷并不会从中受益。同样，模特身材极度消瘦，时尚迷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不管比赛双方是否是200磅重的运动员对200磅重的运动员或者300磅的对300磅的，橄榄球比赛一样令人兴奋。关键是双方必须势均力敌，比赛才是真正精彩的对抗。但是只要201磅重的队员打败了200磅重的，202磅重的赢了201磅重的，体重便会逐渐上升。同样，只要有巨额奖金，模特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瘦。微弱的优势可以改变全局。那么是什么奖酬让很多人效仿模特呢？不过是看上去像模特、似乎也因此提高了地位罢了。

我怀疑时尚会转而倾向超重的男人或女人。但是过于消瘦一定会转向3尺长的秀发和8尺宽的裙子。因为这种消瘦已经到了尽头：模特们不可能再瘦了，时尚也不可能只停留在一个地方。模特有可能会继续变高（因为她们确

实有条件)。美国时尚在长时间把胸部奉为神物加以崇拜后又重新发现臀部是磨砺和塑造优美曲线的新部位。我们已经看见公众对隆胸手术的强烈反对。在英国,《太阳报》已经从报页上撤下3幅模特的脸部照片,原因是她们接受了隆胸外科手术。在美国,最新的色情杂志是《完美10》(Perfect10),它是世界上第一份无硅色情杂志:出版商确保刊登的模特只有真实的东西。

万变不离其宗

时尚正走向何方?如今,巴黎时装设计师与来自日本、伦敦、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以及其他地方的设计师展开竞争,纷纷借鉴街头时尚中有创意的设计。人们力求避免雷同,努力强调自己的设计是独一无二的创新。他们希望这种愿望通过服装传达出来。性别被认为是构建文化的基础。然而据说服装正在转向一个不分性别的理想方向发展。

在俱乐部里或大街上,年轻的时尚追随者们把“绝不雷同”的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时尚历史学家泰德·波海姆斯(Ted Polhemus)把东京异彩纷呈的俱乐部称为世界“款式浪潮之都”。在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能看见“囊括了西方街头款式整个历史的百科全书”。各种时装经过揉合、搭配、修饰、复制和颠倒被赋予新的含义。没有清晰可辨的品牌,却有丰富的韵味。波海姆斯在伦敦大街上同样也看见许多年轻女子穿着样式各异的服装。如果没有大

量相关的背景知识，谁也无法弄懂它们试图传达的蕴味。它们“取材于‘在你脸上’、坦克女孩女权主义、印度民族装、‘时髦伦敦’、60年代的未来主义、性解放、坏名声女人、70年代的迷人魅力人物、牛仔、无理由反叛、放荡不羁的马路文人、摩登派、光头仔、朋克、嬉皮、学生以及穿着高级时装展现财富的精英人物。”当然，最后一项令人目眩的光芒高高照射在其他灵感源泉的上面。

高级时装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吗？不再有社会地位的象征，不再体现明显的两性差别了吗？我们难道“酷”得不愿仿效其他人了吗？可不是这样。在英国一家流行时尚杂志《面孔》的最近一期里，彼特·莱尔（Peter Lyle）和劳拉·克莱克（Laura Craik）思考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孩子们里穿着银色充气的金属面料衣服？为什么他们易受与液晶显示图片和毒品相关产品的吸引？他们总结道：“在这个时代的大半部分时间里，我们反对趋同，喜欢自我创新，尽管与别人看法相同令人舒服，过于偏离标准会使人易受攻击……。这样看来，90年代是自我崇拜的年代吗？不是的。”

在所有关于流行趋势的讨论过后，女人们仍然身穿柔纱裙走在T型舞台上，男人们同样还穿长裤。从石器时代以来，我们一直标明男、女两性的区别。而如何标明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件服装从本质上非得是男人才穿得或者非得是女人才穿得。如今，男人们穿着丝袜、天鹅绒面的鞋，头发垂在肩膀上。而女人们也从男式服装中轻易地借取其构思。男人和女人或许会更自由地交

换各自的服装款式，但是他们还是会找到戏弄性别差异的另一个办法，因为它是人们性兴趣的一部分。

智慧服装

我们将来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许不会有这么多的品牌。精品时装界正在显出种种迹象要放弃品牌。来自赫尔梅斯（Hermes）的最新时装款式是把一个很小的H字母缝缀在纽扣中间。而道切（Dolce）和盖博纳（Gabbana）因为标识常被人撕去所以决定干脆不再把D&G的商标缝制在衣服上。我们知道只要上层社会失去了兴趣，就说明一种流行时尚将要过时了。那么高级女装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了吗？我对此怀疑态度。巴黎不会让自己跟不上时代。迪奥（Dior）和纪梵希（Givenchy）一贯以端庄雅致闻名的时装屋的首席设计师位置易人，它雇佣了英国先锋派设计师约翰·加里亚诺（John Galliano）和亚历山大·马克昆（Alexander McQueen）指引风格，这使有些人感到极为震惊。但是这正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上层社会与先锋派的设计相结合，创造出新式的、双方都欣然接受的、打破常规的服装。

在许多先锋派服装设计师的谈话中会经常出现一个新词语——智慧。日本设计师山本（Yohji Yamamoto）和川口（Rei Kawakubo）、比利时设计师马丁·马吉拉（Martin Margiela）、海姆特·朗（Helmut Lang）和安·迪缪米特（Anne Demeulemeester）一直在制作体现这一思想的服装。它们引起

人们对其结构方式、与身体的关系和我们的审美观的思考。马吉拉是最前卫的。他设计的服装是由看得见的大针脚和回收再利用的布料组成的半成品。人们渐渐与服装玩起了智力游戏并产生了绝妙的效果。

时装设计师贝西·约翰逊（Betsey Johnson）预言：“我认为时装设计师，如果他们被称为时装设计师的话，将不得不成为未来的科学家。”阿克莱斯·潘兰德（Alex Pentland）及其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里的实验小组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他们正在构建“可穿式”的电脑。这种电脑极其轻便易携，并和衣服混为一体，我们可以像戴手表、眼镜或者穿夹克一样穿在身上。传感器和电线隐藏在珠宝、帽子、鞋甚至在布料里面。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做了一件音乐牛仔上衣：肩上是带有金属线绣的字母、数字的布键盘，兜里是话筒。斯蒂夫·曼宁（Steve Mann），这个实验小组的一个成员，用一个无线电接收器代替了室内的温度自动调节器。这个无线电接收器通过内衣的传感器接收信号，当温度低时会自动打开内衣上的加热器。他把它称作智慧内衣。在这些作品中，还有一种眼镜，在一个储备个人信息的计算机数据库的帮助下能够识别不同面孔，当我们忘了别人的名字时，它会说出这个名字，还会帮助我们在迷路时寻找方向。

当潘兰德及其实验小组在科技的边缘稳步前进时，来自东京、巴黎、米兰和纽约的设计系的学生们一直在努力把美以计算机中的二进制形式呈现出来，以求改变时装的形式。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时装展上，展出了一件透明

硬纱料的球形服装，随着展示者轻盈的舞姿，服装发出光亮，立刻博得观众们的喝彩。“可穿式”却并不适合穿着，它是服装设计迷们精心制作、对审美经过各方面的思考、正确选用材料的结果。潘兰德认为服装是“个人的助手，它如影随形，满足各种需要”。这种服装既标明身份（谁能雇得起一个贴身男仆？），又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主意——服装使你变得更聪明，它是信息时代完美的装备。



8 .

总 结

除非所有年龄和种族的人们都被同一个施催眠术的巫师所迷骗，否则的话仍有一种叫做美的东西存在，一种纯自然的优雅之美。

——安妮·迪位德

但幸运的是，可爱的东西或许并不漂亮，我也希望如此。

——乔治·艾略特

人类的情感正如泽惠地球的滔滔长河：它不等待美——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携带着美，奔流前进。

——乔治·艾略特

古代关于美的观点是绝对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说：“美即好，好的不久会成为美的”。济慈说：“美是真理，真理即美。”在当今这个后现代主义世界，一切都是相对

的。美只是相对“观者的眼睛”，是通过文化构建而成或者从个人喜好出发形成的观念。

然而，我已经证明过对于美，在文化构建和神话传说中深深隐藏着一个核心现实。所有的文化都是美的文化，在任何地方美都有一种有力的、颠覆性的力量。它激起情感、吸引注意力并且指导行为。每一种文明不惜花巨大代价试图彻底改变美、追求美并承担这种追求引发的或悲或喜的结局。

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控制奢华的服装，教堂谴责虚荣，医生们担心人们为了美的缘故而去冒险。但是它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迹。如今，尽管人们对以美为中心的文化状况深为不满，但是为美服务的产业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如此热衷、着迷、充满冒险而又无法抑制的对美的追求反映出一种基本的本能在起作用。告诉人们不要以美为乐正如告诉他们放弃享受美食、性、新奇事物或爱情一样。

每个人都有一时得不到满足的需要。某些强烈的感情指导我们的行为并且可以暂时消除我们的疑惑。人工智能的创始者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相信：美的感受是自然规律之一，它暂时关闭了思维的“消极证明材料”储存室（储存关于不做什么的知识信息）。他说美映入眼帘对于思维来说是一个“停止评估、选择和批判”的信号。在生活中，允许我们对大脑思维的尖刻言语说“不”的感受极少。但美是其中之一。美令人心旷神怡、陶醉其中，正如艺术批评家彼得·斯耶达（Peter Schjeldahl）写道：“它得到了真理的认可。”我们批判性的大脑暂时变得迟钝，

失去了活力，我们在美的面前无法反省美本身，也无法思考其他事物。

对美做出的反映是大脑的一个花招，并不是深刻的自我映照。自然选择使我们的思维得到发展，能够解决生存和繁衍的关键性问题。发现自己有生育力的、健康的配偶长得美，发现弱小的婴儿惹人喜爱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尽管时尚表现出诸多怪异的方面，但是每一种文化都发现大眼睛、小鼻子、圆脸颊和婴儿小巧柔弱的四肢很美。所有男人和女人都发现亮泽的头发、清爽紧绷的皮肤、女子束紧的腰和男子发达的、雕刻似的胸肌富有魅力。美是生命自身成为永恒的方式之一，而对美的热爱深深植根于生物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

在我们对美的热爱中有些东西，如文化批评家肯尼迪·弗拉斯特（Kennedy Fraster）写的，是“带有英雄色彩的、无望的、富有人性的”。美是一件值得庆贺的高兴事儿，也值得把某人抬上美的宝座上。让我们牢记：美是一个，当然不是惟一的引起快乐的事情，人们在寻求配偶时往往把善良放在美的前面。

除了容貌以外的信号

当然，可视的美并不是我们向配偶传达重要信号的惟一途径。正如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在《飘》的一开头写的：“赫斯佳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

人类的诱惑与一种微妙的、表示邀请和诱惑的身体语言有关。心理学家莫尼卡·摩尔（Monica Moore）总结了女人们用来传达对男人感兴趣的许多信号。这些信号可以预测谁将会被谁吸引，其正确率可达90%，她说比起女人外在的美貌，姿势的频率和强度可以更好地预测哪个男人会接近哪个女人：女人们投以快速的一瞥，扬起头，舔舔嘴唇，轻撩头发，绽出娇羞的一笑，而且还忙着跳独舞；她们的肩膀向后仰，臀部摆来摆去，绕着屋子来回展现。男子为了引出这些信号做出的行为尚未被归类，但是可以想象作为另一方的男子同时一定也传达了一套信号。

摩尔的调查表明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发出信号表达自己愿意被人接近或者想单独呆着的愿望（信号可能是无意识的）。吸引力，简单地说，就是能邀请别人的注意力。然而人们有时不邀而至，或者没有认真考虑就发出邀请。身体语言不会减少一个容貌娇美的人自身具有的魅力，只是减少了她被人接近的机会而已，但是只要她肯做一个小动作——轻弹手指，这种情况就会被扭转。然而同样轻弹一下手指（或者轻弹一下头发），容貌稍为逊色的人可能反而吸引人的注意力，于是得到机会可以展现余下的万种风情。

声音

在费里尼（Fellini）的影片《81/2》中，其中的一个 人物把所有吸引过他的女子聚集在一间屋子里。有一位是

航空公司雇员，常身穿制服走来走去，播报飞机航班。他们平生素未谋面，只是他一次在机场换机时听到了她的声音，由此停留在他的记忆里成为一种渴望。戴维·莱特曼（David Letterman）有一次列出了“巴瑞·怀特（Barry White）讲话时10个听起来最浪漫的词汇”，其中包括“小脓疱（doo-hickey）”和“龈炎（gingivitis）”这两个词。当然，使这位灵歌歌手成名的是他的歌曲《得不到你足够的爱，宝贝》，关键是他使每个音听起来都很优美。

正如达尔文注意到的，许多动物借助喊叫、咕噜和发出其他声音表达它们的“爱、愤和嫉妒”。雄昆虫通过能发出刺耳鸣叫的器官有节奏地重复同一个音符，向雌昆虫鸣叫并吸引它的注意力。在产卵季节，青蛙和蟾蜍不停地鸣叫。身体大小和音高相关。雌蛙对声音最低的雄蛙的鸣叫回应得最多，因为这种声音很可能是最大的雄蛙发出的。

世界上只有一种灵长目动物牺牲了脸部的美（起码以人类的标准衡量）以便能提高声音的美。生活在婆罗洲森林里的雄性长鼻猴长着巨大的鼻子，以致于当它把食物送进嘴里时不得不用爪子把鼻子推开。雌性长鼻猴长着小一点的向上翘的鼻子。哲学家海伦娜·克劳宁（Helena Cronin）提出：雄猴之所以发展成大鼻子是为了放大它的吼叫声（她把它洪亮的声音比做一把低音提琴）。她写道：“尽管样子看上去可笑，但是或许它是为了迎合雌猴的品味，鼻子才长得这么长。”

我们有时吹口哨、耳语、恸哭、呜咽，但是在大部分

时间里我们只是在谈话。尽管还没有人确切地弄清楚富于吸引力的声音有什么样的声学特征，但是在哪些讲话的声音有吸引力的看法上，人们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声音的魅力影响人们做的判断。当我们听见有吸引力的声音时，我们断定此人比声音没有吸引力的人更可爱、更胜任某项工作，也更具有领导才。尽管看得见的美更具有说服力，但是仍存在交叉混音声道效果。一个容貌漂亮但是声音粗重沉闷的人看起来不怎么吸引人，而一个声音优美动听的人看上去似乎模样更俊俏些。

成年男子的声音比一般成年女子的声音低沉、响亮。这是因为男子的声带比较长，喉咙也比较大。男子不如女子使用的声域广，这使得他们的讲话听起来更单调、平滑。女子的声音一般更柔和、稍带喘息声，并且使用更广的音调范围。如果男子的声音低沉、和缓、平滑，人们通常会认为他们的声音富有魅力。它反映出同时也夸大了男子的典型声音。

像面孔一样，声音也要经过修饰，趋附于时尚。男子和女子的音域有很大部分重合在一起，人们可以灵活地运用某段音域。为了使声音听起来更有磁性，女子过去说话时常用夸张的音高并且故意带有喘息声。例如，对日本妇女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她们把音高设定在400Hz（这是一个婴儿的音域范围）。玛丽莲·梦露用细高的、带有呼吸的声音轻言细语，把孩子低弱无助的声音同成年人丰富的性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有图谋的喃喃低语，一面说“快救救我”希望引人怜爱，一面又轻诉爱恋做为报答。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过于女性化的声音被认为缺少吸引力。它违背了性解放下女人强大的自信心。在这个施展才能的世界里，用这种声音讲话的女人是否能胜任工作会让人产生怀疑。于是，常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女人们压低了说话声音。有人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尖又细。撒切尔马上学习了声乐课努力降低她的音高。辛迪·克劳馥、琳达·伊万杰妮斯塔和波莉娜·波瑞兹科娃（Paulina Porizkova）都学习过专门教授如何降低声音、使声音听起来不女孩气的课程。超级模特在容貌上尽力模仿青春女孩的娇美，但是她们的声音听起来却更具权威性、更成熟。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们都试图消除自己的地方口音。消除口音与“矫正”种族或民族特征的整形外科手术相类似，只不过不需要开刀罢了。现在，在美国，人们最喜爱的口音是电视人物迪安妮·索亚（Diane Sawyer）讲的一种“纯净的”中西部口音。它过去是模仿英式英语的口音。

气味

对大多数人来说，“体味”是能够用肥皂和除臭剂洗掉或用香水遮盖的东西。然而每个女人都喜欢穿自己男人的T恤衫或睡在他的枕头上；每一个婴儿把鼻子抵在妈妈的身体上时都知道这是妈妈。波德莱尔的诗作《她的秀发》用沉醉狂喜的笔触再现了爱人头发的外观和质地，而

更多的是对其气味的描绘：“我将把头埋在羽绒装饰的发髻上 / 暗香浮动令我心醉神往 / 揉合着椰油、麝香和柏油的芳香。”

因为味觉与大脑中不直接涉及语言能力、发育迟缓的区域有关，所以它是一种用语言无法捕捉的官感。波德莱尔把相似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发现它们是气味奇怪的混合体，闻起来令人不舒服（例如当真的把椰油、麝香和柏油放在一起时）。这证明气味常会引起相反的感受：相同的气味在浓度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是怡人的也可能是令人反感的。一些合成物浓度高时的味道像粪便，浓度低时却像花朵。音乐家勃瑞安·伊诺（Brian Eno）着手进行了调查并发现“甲基辛烷碳酸酯是一个例子，它既会产生紫罗兰的香味又会发出摩托车的气味……鸢尾根芳香油——一种从鸢尾属植物的根茎中提取的混合物，量少时有种淡淡的花香，但当把很多放在一起时有种近乎污秽的肉体的气味（像乳房或股间发出的气味）……”他总结说：“香水，力图获得辨认不出的效果，引起未名的感觉，或是把互不相关的感觉混合在一起。”

尤其令人着迷的是被人称作信息素的、传递化学信息的信使。它们是由皮肤分泌的激素物质，可以直接改变同类物种其他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人们并不是总能觉察到它们的气味，它们要通过与主要嗅觉中心相分离的嗅觉系统来辨认。很多年来科学家们相信人类没有这种第二系统：我们或者缺少被称作犁鼻骨的器官（或叫VNO），或者是我们曾经有过，但是已经退化成没有用处的器官。现在这

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人类在鼻子根部的内侧有一个VNO，我们按照信息素改变自己的激素和心理。

例如，住在一起的女子常常有相同的月经周期。最近，凯瑟琳·斯坦恩（Kathleen Stem）和玛泽·麦克琳托（Martha McClintock）证实这种现象是人类信息素造成的。调查者发现：从一些女子的腋窝擦一些信息素（无味的）抹在另外一些女子的上嘴唇，这些女子有可能改变排卵的时间和月经周期的长度。他们发现并证实了两种信息素：一种在排卵当天发出，可能推迟其他女子的排卵期从而延长整个周期；另一种促使月经提前，从而缩短了信息接受者的周期长度。这项研究表明女人们可能在无意识地控制彼此的生育周期。然而我们还必须弄清楚这种影响的确切限度。不过这项研究敞开了一扇通向信息和性影响研究道路的大门。

查看一下因特网，你将发现许多网站向男人出售信息素，并且许诺会把女人像苍蝇一样吸引过来。对信息激素的研究集中于对雄烯的研究上。雄烯在两性身上都有所体现，但更多地集中在男性身上。这项研究还捎带研究了交配信息素，它们是存在于女性阴道分泌物中的、不稳定的脂肪酸。很多人根本闻不到雄烯的气味；那些能闻到的人发现这种味道令人不舒服。正在行经的妇女发现这种气味是中性的。尽管女人们缺乏对这种气味的热情，但是它们似乎还是影响了她们的情绪和行为。她们感到更镇静，也发觉人们更有吸引力。她们于是被这种气味吸引过去。例如，比起暴露于中性气味的环境，当男人和女人暴露在雄

烯醇（由雄烯制成的乙醇）的环境里时，他们觉得女人的照片更有魅力。在另一项研究中，暴露于雄烯乙醇的女人比暴露于中性气味的女人感到更恬静。当科学家把雄烯酮喷在牙医诊所候诊室的椅子上和戏院座位上时，女人们更经常地使用这些座位，而男人们则远远避开。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阿斯退德·朱蒂（Astrid Jutte）发现男人对女人的交配信息素也有同样的反映。尽管如此，比起中性气味的环境，他闻到交配信息素后认为是女人的照片或声音更具有魅力，而且其睾酮值有很大的上升。当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自然的气味包围时，这个女人魅力越小，她获得的好评越多。交配信息素使漂亮不漂亮变得无关紧要。

香水经常含有从植物或雄性动物中提取的信息素。因为女人们而不是男人们被这些气味吸引（男人们避开喷了男性信息素的椅子），所以女人们使用香水是为了使自己舒服、心神安静而不是为了吸引男人。尽管围绕芳香疗法有很多争议，但是一些自然植物的气味确实可以影响人的情绪和心理。例如，薄荷具有提神的功效，当人们在睡眠时薄荷可以改变他们的脑电波和心率。日本科学家小森（Teruhisa Komori）及其同事们在这方面进行了特别有趣的研究。他们发现柠檬味能减小沮丧感，确实有助于使心情沮丧的人们的荷尔蒙值和免疫功能达到正常标准。

大多数关于气味的调查对象是女性，因为女性对气味比男性敏锐得多。这种两性间的差别从青春期就出现了。女性在月经期间对气味的敏感性达到最大值。瑞士的克劳

斯·韦德凯特（Claus Wedekind）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发现女人被男人（尤其是气味最不像自己的男人）所吸引。而现在服用避孕药的妇女则表现出相反的效果：她们更喜欢体味与自己接近的男性。体味是非常重要的，它被证明是我们免疫系统生产的带有气味的副产品。

以前有调查表明老鼠喜欢和免疫系统基因与自己不同的其他老鼠交配。这些MHG基因（主要的相容性复合体）负责识别入侵者和移居者，保护生物自身不受其他生物的威胁。老鼠通过嗅彼此的尿液，区分和选择携带不同MHG遗传基因的配偶，或许是为了避免近亲交配，以便生育出免疫系统更强的后代。

韦德凯特曾经请44位男士连续两晚穿同一件T恤衫（他还提供他们无味肥皂，不让他们吸烟或有其他气味强烈的行为）。然后他让女士们评价他们的味道。结果表明女士更喜欢MHG与她们最不相同的男士的味道（这也就是闻起来最不像自己的味道）。带有与自己相似MHG的男士T恤衫使她们想起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她们并不认为他们很性感。

母亲能够在生产6个小时后单凭气味认出自己的婴儿，在几天以内婴儿也能识别母亲独特的气味。作为成年人，我们能够准确辨别自己的气味，这使我们能够从一堆衣服中拽出自己的T恤衫。韦德凯特的调查表明我们被那些气味最不像家人的人所吸引。但是当我们干预自身的生育能力，如使用避孕药物时，我们就与这种机制脱轨了。韦德凯特总结道：“一个人的味道闻起来并不是每个人都

觉得好，这依赖于谁在闻谁。”有时人们纳闷儿为什么有些漂亮的人却激不起他们的性欲：或许是因为他们闻到的气味与家人过于相似了。

不等待美

可视的美在我们的感官世界里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也被甜美的嗓音、邀请的姿势和迷人的气息所诱惑。甚至我们还受荷尔蒙和免疫系统产生的分泌物所吸引。即使在这个倾慕美者的、肤浅的世界里，相貌也并不代表一切。

我们仍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如何看待美，或者为什么现在该好好地审视一下美。美诚然是极不公平的，它由基因决定。但是外表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实际上，它无法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智慧、善良、胆量、幽默感和执著等内在品质。正如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写的：“这个时髦世界的内核庸俗不堪：判断他人的标准与他们的内在品质无关，并且那些标准在人们的头脑中已成了一种习惯模式。看见人们强调庸俗、沉溺于庸俗，无异于看见他们在观赏一场下作的电影。两种恶习同样令人生厌。”这种庸俗而龌龊的短见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竟没有人想触及问题的核心。

其实我们没有理由大惊小怪。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对人性了解得越多，我们试图解决不平等和改变自身的希望就越大。价值观不同于科学研究，同样虽然倾向和偏好是

天生固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文化、教育和环境可以促其改变。我们的倾向和偏好或许不对，但是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盲目的冲动。

关于美我们确实需要一番新的讨论：既抛开厌美者的攻击又避免拜美者盲目的崇拜。正如1979年李斯特·邦志（Lester Bangs）谈论另一种生活现象（摇滚乐）时写道，因为它“必定会停留在你的生活中，所以你只是希望看到它发展下去，但不是为这个残酷和倾轧的世界再续砖添瓦”。美不会脱离我们的生活。认为美无足轻重或是认为美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点才真的是美的神话。我们必须彻底理解美，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它的奴隶。

那么我们如何能透视美？让我们记住俊美的容貌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正像可爱和弱小告诉我们对方的可怜无助一样，它告诉我们的是祖先的求偶观。它还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健康、强壮、生育力强，是否有良好的基因，可以与我们结合在一起生出健康的婴儿（至少在我们施加过分控制以致降低了它们的信息价值以前，美确实能告诉我们这些信息）。在更新世时期，注重与生育、健康和力量相关的信息显得很重要，正因为如此，大脑发展了敏锐的、探测此类信息的能力。然而在现代社会，因为每天都有可能无意中与陌生人发生碰撞，看见或接触成千上万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控制这些容易使人兴奋的探测功能。或许像哺乳动物那样先享受短暂的刺激、哺育、回到现实，然后再继续前行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些大脑无法抑制的冲动，我们人类自己凭借理智却能控制。

人们在心里认定美必定是好的。所以美丽的人令他们赏心悦目（这可不是肤浅，它与性和社会地位无关），世界也似乎是公正的。然而美即好的观念否认了人性中摸棱两可、异想天开的一面。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曾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为什么有2.2万本书是有关某人生平之谜的？例如，有关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之‘谜’介绍了一个男人如何谱写各种音乐篇章，或体现高尚（如《帕西发尔》），或体现贵族式的浪漫（如《罗英格林》），或体现睿智诙谐（如《名歌手》），然而在生活中又如何是一个活跃的反犹太分子、勾引好友妻子的引诱者，如何多次充当说谎者、骗子、政客、极端利己主义者和骄奢淫逸之徒。为什么人们认为这不合常规，并把矛盾的人性称作‘谜’呢？真正的谜应该是：经历丰富的人明明知道性格、才智的形成是复杂多样的，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或装作相信，名人的品格一定符合道德规范。”

在使美与好分离的同时，我们不应该犯另外一个错误：把美与坏联系在一起。对于厌美者的假正经和否定男女基本性爱的观点，人们常嗤之以鼻。尤其是男人，他们的一部分性感受无疑来自声色享受。没有什么事物天生是好的或是坏的。正如女权主义者凯伦·勒曼（Karen Lehrman）所写的：“允许漂亮女人展现自己的美或许是个人解放中最艰难的一个方面。”

塑造美需要金钱、花费时间、消耗感情，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我们想在这方面付出多少时间和努力。女人们仅凭借姣好的容貌便获得很多奖酬，而其他长处却无法与

美貌相比，因此她们花钱塑造自身的美是很自然的事情。有一种观点认为：女人若不在美上浪费时间，那么她们的成就将会比现在更大。这种观点纯粹是胡说。不是当女人放弃美，而是当她们获得平等、合法的社会权力和特权时才会做出更大的成就。女性需要更强的实力和更多的社会承认。当其他优势能和美貌一样获得认可、带来同等报酬时，所有女人才会享受更多美带来的愉悦。

那么我们将停止对青春貌美的崇拜吗？事实上，正是人类自身希望激起性欲，不希望露出性欲衰退的迹象。所有年龄段的女人都试图被别人当成是妙龄少女。早在奥维德时代，女人们就在努力模仿年轻人，不过现在模仿得更好了。然而奥维德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避孕、提高生殖能力、闭经妇女生育、同性恋婚姻和自愿不生育等各种情况的出现，人类已经改变了自然风景。没有人要求年轻、生育力强的身体减少点吸引力，但是它们应该帮助我们扩展审美标准，至少应该帮助我们更新婚配价值的定义。我们想看见洋溢青春的美貌，我们也想看见它被装饰打扮到完美的地步！但是我们同时也告诫自己的眼睛，不要用机械、刻板的观点审视美。如今，对于一位时装设计师来说，或许最基本的事情就是重新思考谁应该做时装的模特。

我们将继续醉心于对青春貌美的尽情挥霍。只要不为时世所限，我们应该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否则我们将会使这个世界变得单调乏味。长得美并因此获得奖酬并不是社会罪恶。如果我们对美更加宽容，那么我们会更宽容一个

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有动听的歌声、能给我们出谋划策、能做一顿美味佳肴。正如罗素所提出的问题：如果孔雀嫉妒彼此的尾巴而且因此认为美是邪恶的，那么会发生什么事？“一只精美华丽的孔雀尾将只会成为一种尘封的记忆”。不要诋毁女性魅力的源泉，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提高所有女性的整体实力似乎远比其他有意义得多。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是一名杰出的女作家，她创作的一些作品成为英语小说中十分重要的著作。然而她并不漂亮，年轻时为此有过痛苦的经历。当她是小女孩时，被人称作“铁线莲”（意思是精神美人）。她认为这个绰号是“一种嘲讽”。她自称长相极丑，又不幸爱上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一个写文章阐述过外表美的重要性的男人。他们保持了终身友谊。但是只因为艾略特缺少美丽的容貌，他拒绝娶她为妻。40岁时，艾略特遇见了自己一生的爱人并与这位丈夫一直生活到他死去。后来，已经步入暮年的艾略特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小20岁的英俊男人。在这段婚姻生活中，她创作了英语小说中一些最深刻的作品。当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遇见她时，她已经50岁了。他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她长得太丑了——但丑得有味道。她长着低平的前额、一双无精打采的灰色眼睛、一只松弛的大鼻子、嘴大、牙齿不齐、下巴和颧骨突出……但是在这张极其丑陋的相貌里有一种最有力的美，几分钟以后，它悄然潜入我的心里，使我心醉，所以你也像我一样，最终爱上她。”“她表达出

一个保守、博学、高傲和力量的内心世界”，他写道。最后做了总结：“她比我见过的任何女人见识都广。”

因为女人和男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部试图寻求那种更广阔的见识，所以记住艾略特的话是明智之举：“让我们赞美和尊敬神圣的形式美！让我们在男人、女人和孩子身上、在自己的花园和房子里培育美直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同时也让我们热爱另外一种美：这种美的秘密不在于比例，它存在于人类深深的同情心。”我们不能等待美，我们必须去创造美。